



- 一本集十余种家庭学专著精华的文论集
- 一幅与人人有关的记录家庭“历史”的心电图
- 一部未经“现代化”修饰的——我的家庭观

WODE JIATING GUAN

我的家庭观



● 邓伟志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我的家庭观

WODE JIATING GUAN

邓伟志 著

196059



女子学院 0007780

我的家庭观

邓伟志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875 印张 3 插页 26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

ISBN 7-5309-2784-1

C·31 定价:18.00 元



邓伟志
DENG WEIZHI



作者档案

1938年11月生,安徽萧县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自然辩证法杂志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事理论研究和编辑工作。曾为编审、研究员,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后,为高校开设家庭社会学的第一人,出版家庭社会学专集的第一人,在中国倡导妇女学的第一人。著有《家庭的明天》、《妇女学呐喊》、《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学派初探》、《我就是我》等20余部书,主编有《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等近百部书,发表论文百余篇。有的著作和论文曾获上海市或全国一等奖、特等奖、中国图书奖等。因作品加按语的多、转载的多、引起讨论的多,被新闻媒介称为“三多”学者、“思想界的男子汉”。1986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办《邓伟志信箱》,为建国后第一个用人名命名的节目。1986年同巴金等一起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文化新闻人物。90年代曾在多家报刊办专栏。为八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曾多次赴欧美讲学。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最喜欢的格言是:即使苗儿长不成大树,我也不后悔千百次的浇灌;即使足迹被风雪掩埋,我也珍惜自己走过的路程。

目 录

家庭的改革与建设

试评中国的家庭现状·····	(1)
家庭的“八字宪法”·····	(10)
家庭与生活方式·····	(12)
小康之家的生活方式·····	(19)
研究亚洲家庭,建设亚洲型幸福家庭·····	(22)
上海的家庭日益淡化·····	(26)
家庭在合乎规律的变革·····	(31)

家庭文化

论家庭文化·····	(33)
改革家庭的消费结构·····	(38)
“成套家具”和文化建设·····	(40)
赞体育进入家庭·····	(43)

家庭观念

家庭的淡化问题·····	(45)
再谈家庭的淡化问题·····	(51)
家庭观念史四题·····	(53)

谈妒·····	(62)
家庭教育	
谈家庭教育·····	(70)
多让孩子吃点精神钙片·····	(96)
家庭道德	
社会主义家庭伦理的特点·····	(99)
略论“家规”·····	(102)
科学在向家庭观挑战·····	(109)
民主之家·····	(116)
家庭习俗	
泛论婚礼·····	(118)
婚俗的哲学·····	(124)
谈婚俗·····	(127)
家庭法律与政治	
把目光转向女权保障法·····	(142)
研究家庭的政治功能·····	(144)
家务劳动	
谈家务劳动·····	(146)
研究家务劳动的起因和原则·····	(161)
开展家庭咨询·····	(164)
性与生育	
谈制约生育功能的因素·····	(166)
性社会学研究的难点·····	(172)
婚姻问题	
谈无产阶级的婚姻基础·····	(175)
谈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名言·····	(184)

愿无情人不成眷属·····	(192)
中国的跨国婚姻·····	(194)
中缅边境的跨国婚姻·····	(204)
家庭关系	
试论父子关系·····	(207)
再论父子关系·····	(213)
老人新论·····	(219)
愚昧和自私是婆媳的腐蚀剂·····	(224)
提倡一下“从妻居”·····	(226)
必将疏密有致·····	(229)
分散的紧密型家庭·····	(231)
妇女问题	
妇女问题杂议·····	(233)
怎能“让”妇女退居家庭”·····	(238)
缓解女性角色冲突八点·····	(241)
进一步推动妇女劳动就业·····	(244)
欢迎妇女经商·····	(247)
重要的是革新妇女观·····	(249)
男性问题	
重审男人与重塑人格·····	(251)
为“大丈夫”正名·····	(258)
老人问题	
老人问题与“干”字形家庭·····	(260)
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	(263)
家庭研究	
研究家庭学的理论指南·····	(267)

在家庭史研究中要坚持唯物史观·····	(276)
谈谈家庭学的研究·····	(285)
家庭学研究的新阶段·····	(296)
家庭学的烦恼与烦恼的家庭学·····	(299)
探讨家庭问题的历史足迹·····	(303)
国外家庭	
西方的“家庭解体”·····	(308)
对国外家庭研究的研究·····	(312)
家庭演化	
学点家庭发展史·····	(322)
婚姻有历史吗? ·····	(325)
选择“野路子”研究家庭史·····	(328)
家庭未来	
预测家庭明天的依据·····	(330)
家庭会消亡吗? ·····	(334)
家庭改革畅想曲·····	(338)
2000 年中国家庭草图 ·····	(344)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350)
新技术革命与家庭·····	(360)
跋 ·····	(372)

试评中国的家庭现状

优越的家庭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幸福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家庭制度的优越和家庭生活的幸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和睦。从家庭成员的关系上讲,中国的家庭是和睦的。家庭的和睦来源于家庭内部的平等。

平等体现在男女平权上。现在中国的家长有男有女。有的以女为主,以男为副;也有的小事以女为主,大事共同商量;也有的家务由女主持,外务由男主持;也有的表面上男子为一家之长,实际上由女子掌大权。具体情况的多样性,恰好说明男女都一样。从整体上看,中国是反对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的倾向的。同国外相比,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日本妻子高;中国丈夫的地位比苏联丈夫的地位高。从夫妻感情上说,中国的夫妻感情是真挚的。不要看西方的夫妇形影不离,就以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把妻子当玩物,当装饰品带在身边的,甚至是同床异梦的。

平等还体现在上下辈之间的关系上。“父为子纲”在现代中

国已经不多见了。家长制作风不断受到批评。现在,在小辈未成年前,长辈对小辈既有经济上抚养的义务,又有从思想文化上行施教育的权利。长辈要求小辈服从的成分多。一旦小辈成年以后,为父母者便会主动让权,尊重小辈的权利和意见,平等协商问题。父慈子孝、扶老携幼是中国家庭生活的准则。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是中国家庭同西方那种翻脸不认父、丢下子女出走的现象所不同的。

二、自由。这是从婚姻关系上讲的。中国人有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再婚自由,婚姻是自主的。封建包办婚姻大为减少。人们选择配偶的标准,有的重在政治地位,有的重在经济利益,有的重在文化程度,也有的重在仪表谈吐,更有的重在感情……看起来是各有所偏,实则是各有所好,各有所爱,没有一定的程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选择配偶的自由度较大。

三、稳定。从家庭结构上看,中国的家庭是比较巩固的。中国的扩大家庭约有20%左右,比西方高得多。西方的扩大家庭微乎其微。中国存在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是家庭稳定、延续的具体体现。中国的离婚者不多,中国的多数儿童从出生到成人,一直生长在双亲俱在的家庭中。这同西方子女出走、父亲或母亲出走的脆弱家庭,形成鲜明对照。

四、高尚。这是从家庭的精神生活上讲的。中国多数家庭的物质生活比较贫困,文化生活比较缺乏,家务劳动比较繁重,可是,中国家庭的精神生活则比较充实、高尚。外国资产阶级尔虞我诈,已经渗透到家庭当中,演变成为父虞子诈,妻虞夫诈。国外有的青年为了得到母亲的一笔保险费,不惜在母亲提包里放上定时炸弹,让母亲带上飞机,在空中爆炸。国外还有的中青年,为了夺得一笔遗产不远万里,赶到别国的法庭上去打官司。

这在中国都是没有的。相反的是,中国提倡把家庭置于全社会之中,主张家庭的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思想境界远高于西方。现在放弃财产继承权的事日益增多,“五好”家庭不断涌现。

再者,西方的性生活相当混乱。通奸、乱伦、未婚先孕、同性恋等等,中国比西方少得多。这是举世公认的。

以上是中国家庭的四大特点,或者说是四大优点。

摆在家庭面前的矛盾

中国的家庭优点很多,问题也不少。现在中国家庭制度碰到的主要矛盾有四个。

一、公有制的肌体同私有制的细胞的矛盾。中国早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在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对象——土地,也大部分归公。这些都是有史以来,在所有制方面最大的一次变化。恩格斯说:“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那么,我国所有制的大变化对家庭制度究竟发生了多大影响呢?所有制支配了多少家庭制度呢?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家庭制度的变革距离所有制所要求的,相差很远,更不要说“完全”了。

公有制要求作为社会生产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由国家或集体支配,要求改变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可是,不少家庭往往把劳动力看作家庭私有,忽视国家需要。

传统的家庭制度要求家庭成员“成家”高于“立业”,以致有些学有专长的人不得不为了顾家而改行、弃业。现在,有的家庭妨碍妇女劳动力的解放,妇女围着锅台转,提着菜篮子走。中国的女职工仅占全部职工的三分之一。家务劳动是必要的,但是家务劳动也是不宜过重的,从长远看,势必应该减轻。

公有制要求家庭成员一心为公,可是,家庭千百年来都是要求家庭成员荣宗耀祖。我们现在提倡在家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也是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

二、现代化大生产同古典式小家庭的矛盾。中国还没有实现“四化”,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现代化的东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实现“四化”。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和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伴随着知识量的加速度增加,这就是所谓“知识爆炸”。知识的爆炸与个人的精力有限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分工的精细。社会分工的发达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分工越精细,越需要综合。这个精细和综合,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要求专业工作者在自己所从事的狭窄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国家的广泛交流,频繁交流。因此,有人认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不仅要越出血缘,而且要越出地缘,并进而实现业缘。所谓业缘,就是要一个人处处以专业为转移。专业要求一个人到哪里,这个人就应当立即奔向那里;要求一个人在那里呆多久,就呆多久。地区的远近和时间的长短不能按照家庭的好恶,而是要服从生产规律和科研规律。可是,家庭往往把血缘、姻缘置于业缘之上。事业上的伴侣和姻缘上的伴侣往往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绝对保持一致性。假如一定强求一致,那就势必是妇随夫行,在专业上实行丢妻保夫。假如让夫妻俩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就难免造成分居,乃至分离。是应当让家庭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变革呢,还是应当让生产力的发展适应家庭制度的模式?二者必居其一。无情的现实迫使人们作出抉择。

人类的祖先可以随着火的制造放弃了血缘家庭,随着弓箭的制造放弃了伙婚制家庭,随着铁和金属的发明放弃了偶婚制家庭,今天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为什么倒

要削足适履,让生产力去适应家庭制度呢?

三、爱情同婚姻的矛盾。中国人的婚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在实践上,强行干预他人婚姻的人和事,也不太多。但是,作茧自缚,自己限制自己婚姻自由的,大有人在。

前一阶段,过分强调突出政治,搞唯成分论,以至于有些人明明爱上人家,却因为人家社会关系中有点灰尘,就放弃自己爱的权利,扑灭自己爱情的火苗。结了婚的,也会因为对方政治条件一时起变化,而提出离婚。近年来,又有些人在对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厌倦之后,走上了另一极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什么对方不富的,不要;房子不宽裕的,不要;家具不多的,不要;甚至还有人提出:没有外汇收入的,不要。他们爱财不爱人。他们把自己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金钱割断了社会上一批人爱情与婚姻的必然联系。

再者,爱情并非永不消逝的电波。社会上的种种因素,都会造成人们爱情的消失和转移。这里有正当的,有不正当的。可是中国的传统势力总认为离婚不光彩。有些人以离婚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宁为理由,限制感情确已破裂的人离婚。有人说离婚给妇女带来不利,可是实际上妇女主动离婚的比例高于男子。这又如何解释?不从实际出发,为卡住离婚而卡住离婚,结果也造成不少无爱情的婚姻和无婚姻的爱情。

四、新道德与旧道德的矛盾。道德从来都是变化的。昨天认为道德的事,今天可能认为不道德;此处认为不道德的,彼处可能认为最道德。有人说:如果从这里认为道德的事情中,减去别处认为不道德的事,那一定等于零。这话虽有夸张,但它讲出了道德的相对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道德虽有

继承性,但是,共产主义道德无论如何应当是一种较之剥削阶级道德有根本区别的道德。有人说,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这是不对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定会涌现一批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分子。当然,这些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道德未必十分全面。能在某些方面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就是难能可贵了。但是,就全社会来说,应当全面地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可是,现在有些人在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时候,往往不把家庭观、婚姻观包括在内。他们总认为恩格斯所阐述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还很遥远,要到共产主义才能适用。可是,恩格斯明白指出,那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谁都清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就是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也有些人谈论共产主义婚姻观、家庭观。他们的共产主义婚姻观、家庭观是指的什么呢?一曰:从一而终。其实,从一而终是老掉牙的封建主义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页)可见,从一而终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沿用,但是,它并不是新道德。二曰:婚姻自由。其实,这也是老掉牙的资产阶级口号。问题在于自由度有大有小,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婚姻自由度比我国要大得多。究竟多大的婚姻自由是共产主义道德,多大的婚姻自由是资本主义道德,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三曰:勤俭持家。四曰:和睦相处。不用说,这都是美德。但这也不是共产主义家庭的本质和特色。

关于婚姻问题上的共产主义道德,列宁说,是“在爱情上摆脱物质(钱财的)要求”。恩格斯说,是“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

再也不会会有别的动机了”。相爱,成婚;永远相爱,永远成婚。无产阶级婚姻的性质,是爱情专一、永恒的前提。到那时,妻子是属于自己的,但归根结蒂是属于社会的。婚姻上的自私性、排他性,嫉妒、吃醋,统统消失。子女是属于自己的,但归根结蒂是属于社会的。生育的目的、数量,子女的培养目标以及就业等,都应当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家产是属于自己的,但归根结蒂是属于社会的。家产不再传给子女,而是献给社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

可是,不少人对于这样一个“如此而已”的问题,摇头不已,更谈不上有谁对这样一个“如此而已”的问题造舆论了。殊不知这一条即使一时实现不了,但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家庭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全面估量中国家庭的现状。

家庭,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有个同生产关系的其余部分以及整个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可以说是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

家庭,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就必然有个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也是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

家庭,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或者说作为经济基础的一个

小细胞,它又有个同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也是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

在这三对关系中,不相适应的程度是有差异的。比方说,家庭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程度就小一些,同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程度就大一些。正确估价这三者的关系,是我们提倡改革家庭的立足点。过分强调相适应的一面,就容易导致看不清改革家庭的必要性;反过来说,过分强调不适应的一面,这容易导致在改革家庭问题上的操之过急,脱离现实。只有全面估量中国家庭的现状才能在家庭改革中做到既积极,又慎重,才能发扬中国家庭的优点,抛弃中国家庭的缺点,才能在主要抓淡化家庭的同时,适当浓化(如在家庭教育上要浓化、强化)家庭,做到浓淡相宜。

二、家庭改革的主要内容。

1. 进一步提高婚姻关系中结婚、离婚的自由度,进一步端正爱情的基础——互相爱慕。

2. 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事业,逐步让社会承担扶老携幼的责任。社会福利同家庭消费是成反比的。社会福利越发达,家庭消费的功能越微弱,人们的家庭观念才会越淡薄。

3. 改变遗产继承制。个体婚家庭是同继承制同时产生的。不过,继承制也是不断变改的,如从外甥继承过渡到子女继承,由幼子继承过渡到长子继承,等等。在私有制下,不管什么样的继承制都会助长继承者的寄生性,在公有制下更是这样。现在有些先进分子不让子女继承,这是在用行动向传统的继承制挑战。如果这只能在少数先进分子中推行的话,那么,现在适当收些遗产税、所得税,是不是可行的,值得研究。

三、开展共产主义家庭观、婚姻观问题的讨论,从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家庭观中解放出来,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宣传共产主义家庭观,就是为家庭改革鸣锣开道。

(本文收入《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家庭的“八字宪法”

农业的“八字宪法”曾对农业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解放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要求，凝炼有力量。1994年是国际家庭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白人、黄人，还是黑人，都在议论家庭质量问题。怎样的家庭是高质量家庭呢？从哪几方面来衡量家庭质量呢？

一曰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很难成就高质量的家庭。家庭是消费单位。经济职能是家庭的基础职能。尽管历史上有过穷人的家庭质量比富人的家庭质量高，可是，并不等于说“富必低”，“富则修”。贫穷对家庭质量的提高多少要带来些困难。假定在家庭的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富裕无疑要比贫穷好。尤其是在我们这早已推翻了剥削阶级，并已向自食其力、共同富裕迈进的国度里，只要富的路子正，富裕就会成为家庭质量提高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二曰健康。健康主要是指身体健康。生病是痛苦的。家中有病人是不幸的。“久病无孝子”，固然是对子女的警告，但也可以认为“久病”对家庭关系有影响。为了减少疾病，家庭应当讲卫生，家长应该学点卫生知识。在富了以后，要注意防止富贵病、文明病。除了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心理不健康往往容

易导致生理不健康。健康,全面的健康,是家庭质量提高的生理、心理条件。

三曰和谐。家庭成员间朝夕相处,这是不同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因此,家庭成员间不和谐,日子最难过。有人说,“文革”中自杀的,除了政治迫害外,有不少还同家人不理解,少温暖有关。此论不无道理。家庭不和谐会造成家庭破裂。夫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轴心。夫妻重爱情,家人要讲感情。把家庭成员间的感情调配好,家庭就会成为宁静的港湾。富要讲和谐,穷也要讲和谐;健要讲和谐,病也要讲和谐。和谐是家庭质量提高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指标。

四曰贡献。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假如家庭在富了、健了、和谐了以后,抱成一团坑害社会,那就失去了家庭存在的意义,就是癌细胞扩散。不利于社会的家庭固然不算高质量,无益于社会的家庭也不是高质量之家。在家庭与社会两者中,只能是社会第一。提高家庭对集体、对国家、对社会在物质、文化上的贡献,是提高家庭质量的根本宗旨。

富裕、健康、和谐、贡献是密切联系的。富裕、健康是条件,是内容;和谐是根本,是关键;贡献是目的,是最终指标。可四方面又是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比如贡献,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也是富裕;再比如和谐,也是贡献的条件,甚至也是健康的条件。富裕、健康、和谐、贡献这八个字完整地概括了家庭质量,它理应成为指导家庭建设和家庭变革的“八字宪法”。我盼望有一天能有人把它谱成曲子,成为家喻户“唱”的家庭之歌,我更渴望有一天世上到处都有富裕之家、健康之家、和谐之家和贡献之家。

(原载《长江日报》,1995年1月13日)

家庭的“八字宪法”—————

家庭与生活方式

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不能只从宏观上着眼,还必须从微观上着手。家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当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落实到了社会的细胞上,渗透到了社会的细胞中,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才算确立。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一、生活是家庭的主要职能, 家庭是生活的主要场所

家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庭有功能,家庭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家庭的功能在发展。“家”字下头的“豕”是家庭经营畜牧业的标志。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成的。今天的人类能够常常吃猪肉,应当归功于家庭的起源。

当然,家庭的功能不只是养猪。家庭的职能很多。不过,有些功能在淘汰中。比如家庭的宗教功能,就不是每家都有,并且随着科学的繁荣,一些本来信仰宗教的家庭,如今也不再信仰宗教了。再比如说家庭的生产功能,从前是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男耕女织”嘛,“耕”和“织”都是生产。可是,当代中国的家庭还有没有生产功能,就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了。目前社会学界

至少有三种不同意见。一说家庭具有生产职能,二说家庭没有生产职能,三说城市家庭没有生产职能,农村家庭有生产职能。此外,在“有”的量上,学者们也有不同的估量。

不管对家庭的生产职能的看法,有多么大的争论,在家庭具有生活职能这一点上则是众口一词的。谁人无家?声称不要家的独身主义者还不是照样生活在“一人之家”里吗?独身主义者在成年之前生活在哪里呢?还不是生活在至少有一对夫妻的普通家庭里吗?看来,只要家庭在,家庭的生活职能就在。只要家庭不消亡,家庭的生活职能决不会先于家庭而消亡。

有人说,家庭的生活职能现在不是正在向社会转移吗?是的,公共娱乐场所取代家庭的文娱生活,公共交际场所取代家庭的交际生活,但是任何公共场所都是单项活动,都是某一方面生活,而唯有家庭生活是综合性的,是多元的。在家庭生活中,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衣食住行,休息娱乐,应有尽有。社会上建立的“少年之家”、“妇女之家”也许在技术水平上是高超的,但是从门类上说,没有哪一种“之家”能比得上家庭的生活职能这样齐全。况且,在家庭的生活职能向社会转移的同时,社会的生活职能也在向家庭转移。比方说,自有电影以来,人们看电影都是到电影院去看,可是自从普及电视以后,人们看电影就不必全部去电影院了,在荧光屏前可以看到不少影片,可以得到不少乐趣。

生活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相向转移的结果,既未改变“生活是家庭的主要职能”中的“主要”地位,也未改变“家庭是生活的主要场所”中的“主要”地位。

二、家庭的变革在要求生活方式的变革

一百多年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达到较高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推动之下,当代中国的家庭正处于大变动之中。

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主要表现在:

1. 家庭的生活水平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变化。按国内外社会学者的学说,国民吃的消费占总消费的60%以上为贫困,占40~60%为小康,占20~40%为富裕。我国人民目前吃的消费的比例为60%,应当说已开始摆脱贫困,并已勉强迈进了小康的行列。现在中国人不仅是吃的比重在降低,而且吃的构成也在提高。据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的调查,青工的早餐结构已从过去的“泡饭加酱菜”提高为“豆浆加油条”,或者是馄饨、花色面。1984年11月,上海电视一厂一下子有700多名职工订了“工间牛奶”。千百年来,“吃、穿、用”的消费顺序,在不少地区变成了“用、穿、吃”。

2. 家庭的职能在由家内转向家外。近年来,外国有些未来学家提出:信息化正带来“在家化”,电脑化将带来“回家化”,似乎持有了电脑,“秀才不出门”,不仅“可知天下事”,简直是“可办天下事”了。中国也有些学者跟着这么说。可是,这类看法过于浪漫,如今在国外也已经受到批评。日本就有人提出:在家看病,能代替医生的望、闻、问、切吗?在家学习,能比得上课堂交流吗?在家办公,变成躺在家里睡懒觉怎么办?根据我的推测,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入家庭,家庭的职能将是有进有出,进出相抵,还是进的少,出的多。就拿对子女的教育这一家庭职能来

说,学校就在与家庭争夺孩子,托幼事业的发展,甚至还能把婴儿从母亲怀里抢走——虽说不是“抢”,虽说是家长主动送的,虽说婴儿归根结蒂是属于父母的。我们通常讲,办快餐,减轻家庭负担。所谓“减轻家庭负担”,是用生活语言来表达的,如果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达,还不就是“削弱家庭职能”吗?我们通常讲,家务劳动社会化。何谓“家务劳动社会化”?还不就是把原来在家中从事的为家庭的劳动搬到社会上,由社会代替家庭吗?

3. 家庭的结构在由紧密变得松弛。结构是受功能制约的,是由功能决定的。功能的削弱必然带来结构的松弛。根据北京等地调查,现在青年人大多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再加上现在青年们的收入在提高,也有条件同父母分开。现在中国的家庭在分化。尽管在中国的“五好家庭”活动中,所表扬的多是家庭结构紧密的大家庭,可是仍然阻挡不了大家庭分化的趋势。无论城乡,只有一对夫妻的核心家庭都在从占少数变为占多数,占60~70%是普遍的。甚至于连作为家庭关系基础的夫妻关系,这些年来也在变得松弛。尽管我们的舆论工具怀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大声疾呼休要离婚,可是中国近几年的离婚率、近几年离婚的绝对数,在直线上升。

4. 家庭的规模在由大变小。家庭结构的松弛,加剧了分家。家,总是越分越小。近几年人口的增长率远远低于户数的增长率。原来平均每户人数为六人的地区,现在变为五人;原来平均每户人数为五人的,现在变为四人;有的城市,平均每户只有三几人。中国也开始有了乐于独身的人。

5. 家庭的观念在由浓变淡。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现在仍然要比外国人浓得多,但是同过去相比淡多了。家庭观念是对家庭状况的反映。家庭的职能在削弱,家庭的结构在松弛,家庭的规

模在变小,所有这些都无时不在促进人们家庭观念的淡化。对“少小离家”的人来说,家人见了你都不认识,试问:彼此的感情怎么可能浓得起来?所谓“骨头里亲”,只要有血缘关系,感情上就一定亲密,这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法学、家庭学里有个名词叫“亲等”,它是按血缘远近来分等的,譬如父母与子女为一等,祖父母、孙子、姑、姨为二等,依此类推。过去五等之内都很亲密,“胳膊肘往里弯”,甚至还有同姓掰不开的说法。现在,不用说同姓,就是五等之内,甚至于三等之内,也往来不多了。把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视裙带关系高于同志关系的人,虽然还不少,但也比过去少多了。1980年我曾对父母为了让子女顶替而提前退休的做法表示异议,当时招来了非议。可是,现在这类事几乎看不到了。那些提前退休的同志也有点后悔了,不少人认为顶替制不仅与择优录取的原则相背离,而且多少有点封建世袭制的味道。这也是人们家庭观念淡化后的一种新认识。

家庭在变,作为家庭职能的生活就必然在变,家庭的生活方式无疑也在变。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家庭生活方式变革的潮头了。

三、家庭生活方式变化的趋势

1. 家庭在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家庭从前也是“小而全”。所谓“小”,是低水平的生产,低水平的收入,低水平的消费;所谓“全”,就是自给自足,虽不能说是“万事不求人”,但也可以说是“千”事不求人,吃自己种的粮食,穿自己织的布。可是现在不同了。城市不必去说,就是农民的商品消费也已占到消费总量的62%。在衣和用方面,商品消费已占消费总量的98%以

上。从前有些人受封建的“仕农工商”、“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认为做生意不光彩。现在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开始认为“无商不富”、“无商不活”了。

2.家庭在从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这是从家庭的生活资料的构成上看的。在家庭的生活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只求温饱,哪里有钱购买文化资料呢?现在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文化素质在提高。人们为掌握知识、掌握信息,订阅报刊的现象很普遍。有些专业户一家订阅一二十种报刊。还有些青年结婚,亲朋送辞书、送大百科全书的日益增多,送吃、穿、用品的相对减少。

3.家庭在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从前不仅在农村有些老太太一辈子不出山沟,就是在城市也有些人身居闹市,足不出屋,并且把交际少往来少看作美德。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现在不少家庭成了交际的场所,“谈笑有鸿儒,往来皆信息”。青年人以朋友多而自豪。有的家庭在把婆婆妈妈式的闲聊,变为知识互补、思维共振的信息交流。现在比较时髦的婚礼是旅游。有些农民出国旅游了。老年人也能够正视家庭淡化的现实,不再对子女管头管脚了。

4.家庭的生活方式在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化。家庭生活的单一性既表现在横向的单一上,也表现在纵向的单一上,搞几十年一贯制。现在千家万户要求过着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认为,就是在同一个家庭中,也不一定采取一种生活方式,一家当中可以有多种生活方式。根据共青团山西省委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青年的回答是:要求个性解放。个性是推动生活方式变革的力量。个性是使家庭生活方式绚丽多彩的土壤。毛泽东同志在40年代多次讲: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毛

泽东同志的这一精彩论断,长期未能引起人们重视,很少有人加以发挥。我相信在当前革新家庭生活方式的活动中,对个性的认识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5. 择偶的目标在由政治型向经营型转化。几十年来择偶都是看出身,出身好的不找出身差的,更不敢找有海外关系的。在农村,地主儿子简直找不到对象。天津大邱庄 1984 年出国的那一对夫妻,就是用“换亲”的方式成亲的。他们都是地主子女,都很难找到配偶,最后只好换亲。现在,择偶不计较出身了,甚至有海外关系的反而吃香了。上海《青年报》记者调查,女青年喜欢找“经理型”的丈夫。现在男青年不愿找女党员恋爱的情况,虽说未必正确,虽然不会长久,但这是客观存在,也是近两年的“时髦”,则是不可否认的。

6. 代际关系在由差别小向差别大转化。千百年来,中国的家庭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反映了一部分家庭的代际关系。反动血统论是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的。可是,在敌对阶级被推翻以后,在社会飞跃发展,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情况下,拉大了上一代与下一代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老字辈爱穿的,小字辈不爱穿;老字辈爱用的,小字辈不爱用;老字辈不爱做的,小字辈偏要做。国外把它叫“代沟”,中国有些领导人不赞成这个提法。因此有学者主张称“代差”。不管用什么词来概括,老少在行为方式上差距的扩大,则是客观实际。

(本文收入《最佳生活方式的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小康之家的生活方式

到本世纪末,中国在经济上将进入小康社会。不用说,到那时中国的家庭一般都要变成小康之家。按照国家计划,到2000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将从1980年的227元提高到616元。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前景。到那时,全国人民都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我们怎能仅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呢?我们不能照搬照套西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不能坐等小康生活的自动到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建立和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家庭生活方式。具体说来,那就是: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调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目前我国国民消费需求的主要项目和顺序大致是:一食品,二衣着,三居住,四日常用品,五交通工具,六教育,七保健,八娱乐。这既是消费水平不高的结果,也是消费结构不合理的表现。钱都用在吃、穿上,怎么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现在的许多弊病,包括动不动就设几十道菜的家宴,包括在结婚时床上的被子碰到天花板,都是无知的产物,都是一种低级趣味。今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应逐步提高教育、保健、娱乐的消费比重。即使不能“家藏万卷书”,家中总也得订些报刊。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调整精神生活中文化与娱乐的关系。

现在有些人还是有点精神生活的,比方说下棋,一下就是几个钟头;比方说有些人东奔西走买邮票、换邮票;再比方说有些人天天看电视,从第一个节目一直看到最后一个节目。但是,他们下棋只争输赢,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至于说下棋当中有什么数学问题,那就更加不去想了。他们集邮只求全,从不想到邮票是“百科图谱”,从不想到集邮中有分类学原理。他们体会不到知识享受的乐趣,这是很遗憾的。如能把他们现有精神生活的知识层次提高一步,并且丰富精神生活的内容,如增加点政治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等等,那就好了。就拿幼儿的玩具来说,也有个是成天让孩子玩存钱的猪猡头呢,还是让孩子玩电子游戏的问题。猪猡头固然不可少,电子游戏更加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些精神生活是精神污染,如让孩子看不健康的书,听不健康的音乐,等等。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安排好享受与发展的关系。恩格斯把消费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要求的资料。”这几方面的比例如何,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般说,“守财奴”是只顾长远利益,不顾当前利益;“败家子”是只顾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二者都是不足取的。有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实行的“高消费,高浪费”,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败家子作风。在能源上他们搞“竭泽而渔”。我们不能那样干。我们提倡居民储蓄,支援国家建设,提倡为子孙后代着想,勤俭持家。尤其是在当前,举国上下正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更应当适当发展“发展资料”。现在我们只能是力求家家在收入不太高的条件下过比较幸福的生活。

当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有不同的民族传统,因

此我们不能要求家家的生活方式都是一个模式。再说, 尽管劳动者之间的生活水平没有贫富悬殊, 但是高低差别总是难免的。这也要求各家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整齐划一、处处一样。但是, 鉴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和根本利益的共同性, 就决定了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生活方式, 会有健康的、有益的、丰富多彩的、为人民所喜爱的生活方式。

(原载《解放日报》, 1983年11月23日)

研究亚洲家庭,建设亚洲型 幸福家庭

各位代表:

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下第五专题“21 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研讨情况。

我们专题研讨的情况像我们专题的名称一样美好。

第一,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家庭,我们整个第五小组就像一个大家庭。参与讨论的各国专家亲如一家。不分长幼,无论男女,亲如一家。报告人与提问人之间是兄弟般的,切磋琢磨的过程是姐妹般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同我们专题的召集人绵贯主治教授与李沛良教授两位的主持与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两位是我们第五组这个大家庭中的家长。他们是家长,但是没有家长制作风。他们平等待人,把“家庭”、把讨论组织得热烈而有序。

第二,我们第五组研究的是“生活品质”,我们第五小组的会议生活,品位很高。这表现在发言热烈。先后作主体发言的有 16 位专家,提交论文 23 篇,到会 40 余人。许多人发言多次。因此发言人次远大于出席人数。每个发言人的发言都是有根有据的。王雅林教授根据对中国北方两个村的调查谈家庭,王金铃研究员根据她对中国南方一个乡的调查谈家庭,日本中泽进之右根据他对日本山形县的调查谈家庭,日本木下英司根据他

对中国一个省的调查谈家庭,菲律宾 F. A. Candaliza 对一个市、香港学者刘锡霖根据他对三个市、中国学者杨善华等根据他们对七个城市的调查谈家庭,还有韩国学者、中国学者、阿联酋学者、以色列学者、日本学者根据他们对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来纵论家庭。上面是横向看。再从纵向看,研究的时间跨度有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不等。有村,有乡,有县,有省市;有一国,有多国;有近期,有远期;有具体分析,有抽象概括。林林总总、美不胜收,这就是第五组会议生活质量高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亚洲家庭的一番研讨,我们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简单地讲,至少有两点。

第一、通过讨论,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家庭变迁的走向和趋势上,亚洲具有很明显的共向性。

亚洲人的家庭功能有转移和削弱的势头。宗教职能、政治职能在削弱,就不用说了;在教育职能,经济职能上也有所削弱;甚至连生育职能也在普遍削弱。在家庭功能上虽然也有强化的一面,但总的是在弱化。亚洲人的家庭结构在分化。大家庭、联合家庭在分化,在减少;小家庭、核心家庭、单身家庭在增多。在家族、家庭分化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分而不离、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但是,分化依然在继续中,分化在不断加速。

亚洲人的家庭关系在松弛中。抚幼的时间在缩短,赡老的热度在减弱。在经历了“长辈本位”向“夫妻本位”转化之后,“夫妻本位”在向“子女本位”转化,“家本位”在向“人本位”转化。亚洲各国的情况尽管也不尽相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不一样,同欧、美的分化程度相比虽然有更大的不同,但是家庭关系的松弛是值得重视的现实。

亚洲人的家庭观念在淡化中。生育观在淡化,贞操观在淡

化,敬老观在淡化,继承观在淡化。在家庭观念上,自然也有局部更浓的一面,应当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可是,淡化毕竟是主流。

亚洲家庭发展的共面性,给人们带来悲和喜。总的讲,是喜大于悲。社会学的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化悲为喜,以喜胜悲。亚洲家庭的共向性,正在激发我们亚洲社会学界合作研究,跨国研究。

第二,通过这几天的讨论,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亚洲在家庭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具有明显的共面性。

亚洲的家庭把传统美德与现代观念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亚洲的家庭质量不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家庭质量差,在许多方面比他们更文明、更健康。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同西方大体一样的困惑,大体一样的问题:(1)人口的老化以及老人的寂寞问题。这是由家庭的分化带来的。(2)子女的娇惯问题。这同各国的子女都在减少有关。(3)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者说法律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不平等的冲突问题。(4)贫穷问题。会上有专家揭示了贫穷带来性犯罪以及各类犯罪的材料。(5)文盲问题。(6)失业问题。(7)多子女问题。(8)性混乱问题。(9)离婚率激增问题。(10)心理压力问题。

家庭问题的共面性,唤醒我们亚洲社会学界共同研究家庭的自觉性,唤醒我们解开世界家庭难题的责任感,研究现代化对家庭的影响,促使我们一定要创建亚洲幸福家庭模式的积极性。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在快要分手的时候,我们无不有送家人上路的依依惜别之情。可是,再往深处想想,一家分居几国不正是当代家庭的又一显著特征吗?分手不等于分家。好在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变小了。中国人“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月是故乡明。世界的月亮就数亚洲明亮。今天正值月圆前夕。我们分手以后,愿我们以四海为家的社会学家们,千里共婵娟,千里共研讨,一定要建设出千百万户富裕、健康、和谐、有文化、对社会有贡献的“亚洲型”幸福家庭。

(本文系 1995 年 11 月 5 日在亚洲社会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上海的家庭日益淡化

自辛亥革命以来,上海的家庭一直是中国家庭变革的先声。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上海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淡化是上海家庭发展的总趋势。

上海家庭的淡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家庭规模由大变小

中国人自古崇尚大家庭。山东曲阜府就悬挂着“五代含饴”的横匾。直到现在,舆论界仍然倾向于大家庭。在上海的报刊上、电视上,大多是在为“四代同堂”之家庆贺、祝福。很少有人为“三口之家”庆贺、祝福。即使有人庆贺,也不是庆在“三”字上,而是庆在三口之家的其他方面。

尽管舆论界倾向于大家庭,可是大家庭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减少。小家庭同大家庭的比例已从原来的三七开,变成了倒三七。家庭人口的平均规模已从50年代的五点几人,下降到1990年的三点几人。用家庭社会学的术语讲,联合家庭在减少,核心家庭在增多。即由两对夫妻或者说两对以上夫妻组成的家庭在减少,由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在增多。即使是在经济上要依赖父母的青年夫妇,也都是另立门户。做父母的也能承

受经济上不完全独立的子女单独居住,支持子女另立门户。上海的家庭就是这样在不声不响地分化开来。

择偶对象由内向外

从前,上海人找对象,喜欢找同乡人。无锡人找无锡人,宁波人找宁波人,苏北人找苏北人,或者是南方人找南方人,北方人找北方人。地域观念很重,这有一定道理,彼此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容易合得来。

50年代,女孩子喜欢找“党员、技术员、月薪百元”的。“文革”中又转而喜欢找工人和军人。现在不同了,女孩子,包括男孩子,有不少人喜欢找老外。这个老外,是指大陆以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包括在内。

在十年“文革”中,同外籍人通婚的极为罕见。记得70年代初,曾有一例,外交部不敢批准,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批准成婚的。

近十年不同了。上海人同外籍人成婚的,从数名,到数十名,现在增加到数千名。80年代初,上海只有黄浦区一个有涉外婚,也只有黄浦区一个区有权同意涉外婚。现在各个区都有权登记涉外婚。

再加上两种人,上海的涉外婚就更多了。一是近十年内定居国外的,二是出国后同外籍人结婚的。

现在上海居然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八国联军”式的家庭。这是一家当中,一口人在美,一口人在欧,还有一口人在日。不仅是父母子女分别在几个国家,兄弟姊妹也分处于几个国家,而且还有夫妻居住在两个国家的,土插队把一批上海人变成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洋插队又把一批上海人变成了分居两国的牛

郎、织女。

当然，与总的家庭数字比较，涉外婚的比例还很小，但是趋势在增多。

性生活由婚后推向婚前

性生活，在中国，在汉族，从来都是婚后才开始进行的。至于说婚后方才见面的事，那是太遥远的过去。

可是，近十年来，婚前没有性行为的为数不多。也许有的读者会说我武断，会问我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这诚然是个不可查的问题，但也决非无稽之谈。“稽”还是有的。

现在在医院人工流产的女子，绝大部分是未婚的。有的医院说是80%，有的医院说是90%。过去到医院做人工流产，要证明信，现在不要了，结婚与否，全凭怀孕的自己说。很明显，只会有人把未婚说成已婚。把已婚说成未婚的恐怕不大会有。因此，实际上未婚先孕的数字只会更大。

那么，未婚有性生活，而不孕的人呢？

从观念上，也能看出些苗头来，过去未婚的毛脚女婿是不许在女方家过夜的。如果有谁留毛脚女婿过夜，左邻右舍是要戳脊梁骨的。可是现在父母习以为常，邻居也习以为常了。对婚前性生活的容忍，来自于婚前性生活的普及。

另外，上海还有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上海人有两个结婚的概念：一是到政府部门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二是举行结婚仪式。按理，这两项活动在时间上应当相差无几。可是在上海，二者可以相差甚远，一拖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都有，原因是没有结婚用房。这些未行婚礼的青年男女，无不在婚礼前同居。这在法律上应当认为是正当的，应当不属于婚前同居范围。可是，在上海

人的心目中,历来认为不行婚礼而同居是可耻的。但在住房困难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同情婚礼前、登记后的同居行为。同情了这一行为,久而久之,就反过来助长了登记前性行为的滋生,助长了对登记前性行为的宽容。

离婚率由低到高

“离婚不光彩”,这是上海人世代代的传统心理。直到现在还有人因惧怕“不光彩”三个字而含辛茹苦,不去离婚。许多部门和单位也因为从“稳定社会先稳定细胞”出发而不厌其烦地调解夫妻矛盾,限制离婚。此外,也有少数人因为离婚后找不到房子居住,才不去离婚,继续过“同床异梦”的夫妻生活。

尽管如此,上海人的离婚率还是在缓缓上升。

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原因,有性格上的原因等等。这里想说两点在过去并不突出的原因。

第一点是“感情的转移”。过去,上海人说开放也够开放,说封闭也够封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人数与次数,过去都没有现在多。随着人际交往的增多,感情转移的机会增多,见异思迁的可能性也就大了。再加上新婚姻法实现了由有错离婚向无错离婚的过渡,明文规定“感情确实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现在以“感情破裂”为理由而离婚的越来越多。包括好打好散的“协议离婚”的也在增多。这些人中,大多有着个“第三者”在。上海人对“第三者”褒贬不一。不过,“贬”的呼声日渐降低。于是乎,离婚率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第二点是“性生理不合”。我曾带领一批大学生进行离婚状况的调查,发现以“性生理不合”而提出离婚的人几乎占到百分之十几。这从体质人类学上看,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可是,从

中国人的心态上看,讲“性生理不合”是难以启齿的,因此,我们又不能随便怀疑这个数字有夸张。分析来分析去,“性生理不合”的统计数字之所以这么高,一方面说明在上海的夫妻生活中,追求性生活和谐的人在增多,另一方面又受性知识贫乏的限制,把本来可以和谐的性生活看成了“性生理不合”。可以相信,随着性知识的普及,人们的性生活和谐起来,从这一点看,离婚率会降下来。但是,综合各种因素,上海的离婚率在近几年还会有所增高。

上海市离婚率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即文化层次、经济层次、社会层次比较高的徐汇、黄浦等区,离婚率高。所谓“下只角”,即比上述层次低的区,离婚率低。市区的离婚率高于郊区,近郊的离婚率又高于远郊。从农村的都市化趋势看,扣除一些会降低离婚率的因素,上海的离婚率近年仍会略有上升。

上海人的家庭观念在淡化,上海的家庭结构在分化。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明度的提高,淡化了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可能会适度和谐,离婚的夫妻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打得头破血流。

淡中有浓,浓淡相宜,这是上海家庭几年后将会达到的目标。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1991年第2期)

家庭在合乎规律的变革

浦东的开发,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就是一个浦东社区城市化的问题。浦东本来地处城乡结合部,如今处于由农村向城市的急剧转化过程中。这就决定了浦东的婚姻家庭既有农村的母斑,又有城市的印迹,还有转化的动态特征。浦东全部协议离婚家庭的情况表明:浦东婚姻家庭的变革处于一种合乎规律的运动中,同所有农村都市化地区的婚姻家庭变迁在正向上是吻合的,在负向上也是吻合的。

浦东的婚龄略有升高,同浦西还有点距离,这是正常的。包括复旦同仁就离婚年龄的“抛物线”分析,离婚与文化关系的分析,均属正常范围。

浦东的离婚率在升高,也并未高出异常范围,估计随着都市水平的提高,随着离异观的变化,最近三年内,浦东的离婚率还会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不会很高。离婚采用协议的方式增多,这是时代潮流使然,是生活方式文明度提高的表现。预计今后法院判离的情况会逐年减少。

“见微而知著”,从对婚姻家庭的调查,也可以看出浦东管理者的管理工作状况。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观念上,并没有癌细胞那样的恶性膨胀,也没有出现家庭功能的跳跃

式的迅速转移,这说明浦东的各项工作都是有板有眼,动有节奏,静也有节奏。

浦东的婚姻家庭还将逐渐发生变化,决不会仅仅停留在今天的状态上。这就要求我们社会学工作者仍应该继续密切注视浦东的婚姻家庭,走在婚姻家庭变革的前头,并且不断找出对付和适应家庭变革的策略,采取适当的配套措施,从而把浦东人的家庭变成成为开发者宁静的港湾,可靠的后方。

1995年6月8日

(本文收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写的《变革中的浦东人的婚姻》一书)

论家庭文化

有位大名人说：幸福的家庭是罕见的。这话有一部分道理，反映了某一历史片断的真实。可是，我们决不可以由此推论，幸福的家庭只能是少数的，甚至永远只能是少数的。幸福的家庭在中国是会多起来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幸福家庭多起来呢？关键之一是加强家庭的文化建设。

什么是家庭文化

一提“家庭文化”，有些人就以为是“家庭舞会”，或者以为是“家庭娱乐大赛”。其实，这种看法，至多是说对了百分之一二。在家里唱歌、跳舞、弹琴，这是“家庭娱乐”，只是家庭文化的一小部分。

这样说来，家庭文化不是太玄了吗？不是。说明白，就不觉得玄了。文化，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人要结婚，有婚姻观；人要生育，有生育观；人要讲贞操，有贞淫观；有的人要离婚，还有离婚观；家有财富，有财富观；家有家教，有教育观；家有消费，有消费观。诸如此类，无一不是文化。

总之，家庭文化是指家庭成员的知识、思想、价值观、态度和

行为方式等主观因素的总和,它不仅是唱唱跳跳的文艺活动,而且应表现为在家庭中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伦理道德的升华,审美情趣的拓展,言谈举止、接人待物的文明,生活方式的科学高雅,家庭成员的和睦融洽,并注意通过各种文体活动增进家庭中每个人的身心健康。

家庭文化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家庭文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对一个懂家庭文化的人来说,到一个人的家里站几分钟,就可以对这个家庭的家庭文化水平的高低略知一二,如果说再同这个家庭中的某一家庭成员交谈几分钟,也就会对这个家庭成员的文化心态摸到几分。

家庭文化的四大功能

由于人总是生活在家庭之中的,因此,加强家庭文化的建设,对个人幸福,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家庭文化有哪些功能呢?

一、有导向的功能。高尚的家庭文化是方向,是理想,是家家户户为之努力的目标。也许这一目标因为层次很高,不会很快实现,或者说不会很快地普遍实现,但是,这一崇高的家庭典型、崇高的家庭关系、崇高的家庭道德、崇高的家庭观念的确立,无疑地会有助于提高家庭文化的水平,有助于引导和牵动全社会的家庭文化由低向高发展。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得法乎中”,也得归功于“取法乎上”。提倡不提倡家庭要有文化建设是大不一样的。

二、制约的功能。有千家万户便有千差万别。一家之中几口人,男女老幼,也是“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会一般高”。可是,男女老幼,千家万户之间还是有共同性的。这“共同性”中最重要

的一点是：对多数家庭有益、为多数家庭所接受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即家庭文化，一经倡导，一旦深入人心，一旦形成舆论，就会对人的言行具有制约力。接受这一层次的家庭文化作指南了，按照这一层次的家庭文化去实践了，就受人们欢迎；不接受这一层次的家庭文化为指导，不按照这一层次的家庭文化去实践，就不受人们的欢迎，以致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家庭文化制约力的大小，同社会上的越轨行为的多少成反比。家庭文化的制约力越大，越轨行为越少。

三、凝聚的功能。家庭文化中的重大价值观念在被家庭成员认同之后，既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凝聚的粘合剂，会促进家庭内部的和睦，也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凝聚的粘合剂，会促进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团结。夫妻感情的破裂，家庭关系的破裂，往往是因为家庭观念的差异和家庭文化的悬殊造成的。同是一元钱，一个掂起来分量重，一个掂起来分量轻，就容易引起矛盾。一对夫妻看同一位老人，在这个人眼里重视，在另一个人眼里轻视，这就是夫妻间的裂痕。相反的，如果“所见略同”，“理”同“情”就深，“理同”向心力就大，离心力就小。

四、激励的功能。家庭文化是一种精神。精神的力量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家庭文化建设得好，家庭成员便会心情愉快、幸福、舒畅；家庭成员心情舒畅，反过来又会激励家庭成员建设家庭的积极性。家庭文化建设得好，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后方”巩固，在生产岗位上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会进一步高涨。家庭文化是激发社会和社会细胞健康发展的一个阀门。

建设家庭文化的途径

家庭文化的建设，在中国提出来的时间不长。在许多人心

目中还是一件新鲜事。

要把家庭文化的建设落实到中国数亿家庭中,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些途径。建设家庭文化的途径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基础。在全是文盲的家庭中,家庭文化是很难建设的。在文化水平很低的家庭中,家庭文化也是难以建设起来的。就拿生育来说吧,有大量的统计资料说明,文化水平同出生率成反比。一市之中,文化低的区比文化高的区出生率高,郊区比市区的出生率高,远郊比近郊的出生率高。从世界范围看,也是这样,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高。可见生育观受教育的影响很大。生育观如此,其他方面的观念也一样。你热心于家庭文化吗?你首先要热心于发展教育。

二、发挥家长作用。家有家长,家庭的形象首先看家长的形象。家庭成员要靠家长来带领。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基本上不对,但也不是毫无道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嘛!中国的家长应注意两点:一是要搞家庭民主。家长最忌“家长制”,最忌一个人说了算,最忌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家庭文化不是打出来的。二是要懂科学。称职的家长多少要懂点家庭学、心理学。家长的民主意识与科学意识既是家庭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家庭文化的环境和条件。

三、加强制度建设。不要认为家庭琐事不需要制度,也不要认为家庭问题不能够订出制度。中国的“五好家庭”活动,就是五条家庭制度。这是社会对家庭订出的制度。在家庭内部也可订出制度,以便协调家庭中的学习与生活。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十年前,我的孩子正读初中,大考小考不断,我也只不过四十出头,还得拼搏,家中三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彼此干扰得厉害。

于是我们就订了十条家规。在当时,并没想多深。后来被记者发现给发表出来,又被许多报刊转载、评论了,这才进一步提高了我对家规的认识。记得其中三条颇引人注目。一条是吃饭不超过三个菜(主要是大家都可以挤时间读书),再一条是生气不超过三分钟,还有一条是闲谈不超过三分钟。为了保证“生气不超过三分钟”,我家还制作了两张“黄牌”。当一个人生气时,另一个可以举牌提示,牌上写道:“为了身心健康,请学会控制自己。”家规对我家的文化建设起到一定作用。现在,孩子就要大学毕业,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也起了变化,我正酝酿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家规。我建议,在家庭文化建设的热潮中,能有更多更好的家规问世,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四、发挥舆论作用。舆论是家庭文化传播的媒介,舆论也是家庭文化的氛围。舆论可以为家庭文化建设开道,也可以促进已建设起来的家庭文化巩固和发展。这几年,各级妇女组织、各地各类妇女报刊、家庭报刊,以及广播、电视为家庭文化建设树榜样,传经验,找教训,深受人们欢迎。同时,新闻媒介也因宣传家庭文化而使工作深入到亿万家庭之中,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群众。据我所知山东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中国妇女》杂志、《中国妇女报》,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等报刊办的家庭栏目,都很有特色。舆论界为家庭文化喝彩,家庭的进步也为舆论界增色,交相辉映。

家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随着它的深入与普及,必将给亿万家庭带来变化,而中国也一定会逐渐成为世界上文明度最高的国家。

(原载《中国妇女》,1991年第5期)

改革家庭的消费结构

不管现在对家庭是不是生产单位有多少争论,关于家庭是生活单位、是消费单位则是众口一词的。既是消费单位,就必须着力研究其消费结构。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民”是平民。过去一般人家的家庭消费的顺序是一吃二用,甚至是少吃没用;较富的人就是一用二吃。现在,在我国劳动人民的开支中,数量最大的已经不是吃了。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人们的消费结构一直在变,今后还会不会再变呢?无疑还是要变的。如果说吃用次序的互换是我国人民家庭消费结构的第一大变化的话,那么现在正面临着第二大变化,这就是物质生活开支与精神生活开支的比重在变动。本来物质生活方面的开支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压倒优势,现在在绝对数上虽也会继续上升,但在比重上会有所下降。原因就在于人们开始注重家庭中的文化建设。

家庭的物质建设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度的。而且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在文化生活上必然提出更高要求。提高文化设施在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是一种历史趋势。

不过仅仅注意增加文化设施还不够,还必须调整家庭中文

化设施的内部结构。现在有些人有了“黑白”要彩电,成天围着彩电转,你不能说他不重视文化生活。但是,他家里连个书架也没有,甚至连必备的工具书也不买,这就不太好了。电视固然可看,但是电视上的知识,一般说是不系统、不完整的。一个人要提高文化素养,总要系统读点书。现在国外送给别人结婚的礼物是大百科全书。国外有些人也以家中能摆出一套新版本的百科全书为光彩。当然,这里不排斥他们把书当摆设,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认为书是不可须臾离开的。现在上海结婚用的家具,不论大套和小套,都不包括一只书架,似乎欠妥。古人还主张“家藏万卷”,我们的青年藏一橱总是起码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看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大建设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文化建设落实到家庭中,要把精神文明落实到社会的每一细胞中。我们要从各个侧面为改革家庭消费结构做出努力,从而提高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度。

(原载《家庭》,1983年第7期)

“成套家具”和文化建设

乍看题目,这两者好像是“风马牛”,请看下去,其中倒是有联系的。

成套家具在上海敞开供应了,不必预先登记排队。这是结婚青年的福音,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与此同时也听到这样一种呼声:“成套家具不成套,缺书架……”这是吹毛求疵吗?不是。这是一项普通的顾客意见吗?如果只这么看,似乎还太浅。想得深一点,这是改革家庭消费结构的先声,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有关系。

家庭的消费职能一直存在,可是家庭的消费资料的结构因地而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情况、地理环境对家庭的消费结构影响很大。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曾以狩猎海豹为生。他们吃海豹肉,穿海豹衣,点燃海豹油,用海豹筋当绳。海豹几乎是爱斯基摩人消费资料的唯一来源。同样,以牧羊业为生的民族,如伊朗的尤莫托族,羊是他们消费资料的主要来源。羊给了他们一切。有人写道:“没有羊就没有尤莫托族。”人们常说的衣、食、住、行、用,是依用途来区分的。这五方面,何者居首位,何者居末位,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代不一样。在“一河之隔,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在祖祖辈辈不出山坳的自然

经济条件下，“行”在家庭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现在不同了，旅游业发达，“行”的比重扶摇直上。在有些国家的有些家庭中，“行”占首位。在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消费构成是一“吃”二“用”，现在许多人已经变为一“用”二“吃”了。“吃”让位给“用”，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消费构成的演化从来都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可是，变来变去是在物质生活内部。按理，消费资料不能只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还应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列宁认为，没有文化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是任何人都应该有的。满足文化生活的消费资料就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它不仅对任何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资料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人们对它的要求必然会提高。随着知识化的进展，随着知识分子在劳动者中的比重增大，它在全社会的消费总额中的比重也将愈来愈大。从这个角度看，对成套家具中不包括书架一事的批评，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精神文明程度提高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什么叫“文明时代”？这对正在建设“两个文明”的我们，当然属于ABC，可有人就是不懂得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状况的尺度，更不懂文化既是文明的内容，又是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对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它可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开阔人的视野，改变人的情操，解放人的思想。

文化一般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要用书本来传播。“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多了，自然要用书架来存放。书架是文化设施之一。此外，还有许多文化设施。最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要发展印刷工业，也是一例。最近有人提出扩大发行渠道，也是一例。加强文化建设，不光是普及教育，还有兴办图书事业，广

泛开展文娱活动等等。它是同各行各业都有关的。家庭的消费结构改变了,读书的人多了,要求成套家具中有书架,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还往往落后于现实。认识到“成套家具不可少书架”的还只是一部分人。现在有些人家具不少,各种家用的“机”也不少,就是没什么书。不仅如此,一些能当书的“机”,他们也不当书用。坐在电视机旁,只爱看逗趣的节目,对里面的知识性节目,对不起,不想看;孩子问他问题,对不起,答不出。你能说他们会提出“成套家具不成套”的批评吗?

每一个劳动者都应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改革家庭消费结构就是要把精神文明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去;改革家庭消费结构既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是文化建设的物质保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的家庭消费资料正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次变革的特点以提高文化消费资料为标志。它将比“吃”“用”的变化意义更伟大。人们对书架的要求只是一个信号。谚云:愚者积累财富,智者积累知识。这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1月10日)

赞体育进入家庭

体育设施、体育运动已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尽管还是凤毛麟角，可也值得赞而颂之。

体育进入家庭，增强了家庭情趣，和谐的家庭犹如一台交响乐，独弦琴再悦耳，也奏不出交响乐。家里多了一项体育活动，就等于多了一种交流感情的渠道。

体育进入家庭，丰富了家庭的功能。古往今来，社会学家在讲家庭功能时，总是离不了经济、教育、生育、家教，至多再加个政治、文化、娱乐，没有谁单独把体育列出来。体育普遍进入家庭，体育就会成为家庭的一大功能。不要小看多了一项家庭功能，要知道功能决定结构。家庭功能是家庭中最活跃的因素。

体育进入家庭，提高了生活质量。看家庭生活单纯算家庭收入的时代，快要过去了。在经济收入有了基本保障以后，“富裕不等于幸福”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幸福的家庭应当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里自然应当包括体育。

体育进入家庭，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大功能，那就是健康长寿。人的寿命长短，是社会的重要指标，是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人类学家分析，对远古人来说，30岁就是长寿，就算老人。如今上海人男女人均寿命在七十多岁，故有“七十小弟弟，

八十多来兮”一说,更表明寿命在延长。这里自然有体育的功劳。

体育进入家庭,也有利于全民族体育水平的提高。提高从来都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没有普及,单抓几个尖子,不用说很难上去,就是上去了,也有悖于体育的根本目的。

体育进入家庭,并不等于把足球场搬到家里,尤其是在上海,住房紧张。不过,放两只哑铃的地方总是有的。放一台健身器的地方对有些家庭来讲,也是可以办到的。再不然扔掉些“老古董”,引进点体育运动器材,也是划得来的。

体育进入家庭,对体育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家庭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希望千家万户都来参与、推动这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原载《竞技与健美》,1995年第9期)

家庭的淡化问题

引 子

在上海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于光远讲了个故事:老科学家竺可桢(应为吴有训。因作者记忆错误,将吴误为竺。下同——作者注)有次打电话给他,说要来看他。于光远以为竺老可能有工作上的事找他谈。竺老这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于是,于光远主动来到他的老师——竺老家里。竺老要谈的是什么呢?他说:“能不能找些人研究一下家庭问题?现在,人们的家庭观念太重,能不能淡一些?”不久,竺老就与世长辞了。于光远说:“这个问题就没能再谈。”

一个自然科学家怎么会在晚年关心起社会问题来?这是耐人寻味的。竺老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今天,我们不妨也就这个问题思考一下,至于说思路对不对,那就有待读者评论了。好在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情。

家庭观念的现状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怎样?是轻还是重?我以为比过去是轻了,然而比国外,尤其是比发达国家,要重得多。这表

现在：

一、相依为命。夫荣妻贵、父荣子贵、子荣父贵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里当然也包括它的反面：夫辱妻贱、父辱子贱、子辱父贱在内。由于在我们国家里，对同一个人来讲，荣与辱、贵与贱，往往是交替出现的。前些时候，这种现象是常见的：丈夫一遭殃，妻子就成妖婆；父亲一下台，儿子就成狗崽子；儿子一出毛病，父母也就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同样的，丈夫一走运，妻子就成贵夫人；父亲一上台，儿子也可连升三级。因此，有些夫人拼命帮丈夫扩大权势，有些人梦想“假如我有一个好爸爸”。国外虽也有为丈夫的竞选疲于奔命的，但至少是丈夫下台后，妻子不会下放劳动。

二、望子成龙。这一条本来可以包括在“相依为命”当中，只因这一条实在太突出了，还是单独列出好。请看，在“参军热”的年头里，有些人不惜把别人的儿子挤掉，从后门把儿子塞进部队；在“升学热”的年头里，有些家长不惜丢掉自己的本职工作，走边门去为子女辅导、延师；在“出国热”的日子里，有些父母开洋天窗，把儿子送出去镀金。难怪有人说，现在父母成了“孝”子。“孝”，在这里作动词用，不是形容词。有些父母用自己的行动绘出了令人捧腹的“新编二十四孝图”。也许有人会说：望子成龙总比望子成虫好。这我赞成。但是，用望别人子女成虫来换取自己子女成龙就不好了。不仅如此，现在有些人发展到对子女也不一样看待。他们望亲生儿女成龙，望前夫或前妻的非亲生子女成虫，这不是封建血统观又是什么？

三、聚敛家财。今日相依为命，就必然助长一些人为相依为命者的明天积累财富，这就是封建社会那套为子孙立永久之业，求世世豪富，代代显贵。现在田连阡陌办不到了，有些人便在家

累千金上打主意。一万元存款的年息,接近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工资收入。有了这么多存款,子女即使考不上学,生活也有保障;有了这么多存款,老子撒了职,砸了铁饭碗,也能活下去。因此,他们一会儿试用这个机,一会儿进口那个机。至于说别人家有困难,对不起,慢慢来。

四、变相为家。在封建式家庭中有资本主义成分,但这种变态也能反映出狭隘家庭观念的存在。有的不是父为子纲了,但把子女看作私有物。还有的子女虐待父母,似乎更不是为家了。但是,虐待父母者大多数是儿子和媳妇,二者中只有一个虐待父母,不见得会虐待到哪里去。二者合伙虐待,这说明他们是不要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而是要小家庭,归根结蒂还是为了家。还有些男人怕老婆,这也不是封建主义的夫为妻纳了。但是,即使彻底颠倒为妻为夫纲,那也不过是家庭内部领导权的转换,仍没有改变“为家”这一点。还有些人,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兄弟之间就已经为争遗产而吵开了。这似乎也不是无父从兄,但还是为了各自的家。

形成家庭观念过重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的家庭观念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刷,减弱了不少。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变了,家长制统治也变了点,结婚、离婚有自由了,然而,封建的家庭观念不是一个早晨就可冲刷干净的。“五四”的一员猛将吴虞,反对封建够积极的了,可是,就是在当时,他在自己家里还搞封建主义那一套。虽然,“五四”中涌现过许多比吴虞好得多的先驱,但是,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有封建残余。至于封建的遗老遗少,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五四”以后,半封建的东西俯拾即是。

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封建家庭观念又受到进一步冲刷。至少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了。家庭职能的削弱是家庭观念淡化的前提。可是,思想意识有着相对独立性。几千年来,不断强化的家庭观念会通过各种器官侵蚀人们的心灵。家庭观念中那些未曾冲刷的方面,自然不会自动消亡;一些冲刷过的方面,稍一放松仍会卷土重来。

但是,不能把今天所存在的如此严重的家庭观念,完全归咎于历史和传统。应当承认:这些年来,我们有些做法助长了封建家庭观念的存在和滋长。

比如,用人上的查三代,既是封建家庭存在的产物,又是助长封建家庭观念孽生的温床。一个人的亲属有问题,不管这个人同他亲属见过没见过,或者是在不满三岁时接触了不到三天,都要记上一笔帐。碰到了什么“重要”工作,尽管“非君莫属”,也会因为亲戚不好而“请君靠边”。人家本来已经把这个亲戚忘了,而我们却硬把人家推进、锁在家庭的圈子里。对三代中的红人,也是这样。不管这个红人与他密切与否,只要他有这个红色关系,他不能胜任的职务也要他去担任,德才上不够提拔的,也要抓着头发往上提。

比如政治运动中的株连,古人是九族,我们哪里只有九族?人一倒了霉,鬼也不上门。在朝时门庭若市,下野后门可罗雀。多年的老朋友,被迫变成了老揭发。在这种情况下,能跟自己患难与共的,能给自己送口水喝的,只有子孙。“革命大家庭”不给他温暖,他就觉得血缘小家庭温暖,他自然而然地不遗余力地经营起小家庭来。

再比如就业上的顶替制,在现阶段似乎非如此不行。谁要反对顶替,说不定要受围攻。但顶替制,多少有封建世袭制的遗

风。孩子若考不上大学，就缠住要四十多岁的“好妈妈”退休。自己的前途自己不努力去创造，一心把自己拴在父母的脖子上。“生我是娘，给我出路的又是娘，我又怎能不去报娘恩而去报别的恩呢？”

家庭淡化的必要和可能

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家庭产生以后，对私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对私有制下农业、手工业的进步，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家庭有生必有死。不过，从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看，家庭不会很快消亡，因为没那么多资金办敬老院、托儿所。扶老携幼依然是家庭的职能之一。不会消亡不等于不可以淡化。家庭淡化是势在必行的。封建家庭观念的残余，已成了实现“四化”的阻力。

实现“四化”，需要把劳动力，特别是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可是，叫了这么多年，不只妇女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男子也给牵到家务劳动中去了。有许许多多中青年男知识分子，既当爹，又当娘。有哪个中青年知识分子不是过着“早晨买菜赛武松，晚上回家闹天宫”的疲劳生活！

实现“四化”，需要人才频繁的、远距离的流动。可是，我们往往为了照顾家庭，让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转业、改行、大材小用。还有的城市规定独生子不去外地。虽说颇得人心，但不符合因材施教用。（请独生子放心：我这是一家之言，决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一句，就不让你留城市。）

实现“四化”，需要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生活。可是，群众对社会上存在的那些特别家庭、特别公民，看不惯。家庭关系、裙带关系高于革命关系的不正之风，是干群关系的疙瘩，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好在在我们社会中,除了有这些封建家庭观念残余的阴暗面以外,还有社会主义新型家庭的光明面。我们有一批爱别人子女比爱自己子女为重的先进家长,我们有一批存款交公,不留遗产的革命前辈。这类家庭尽管不算太多,但是它们是战胜旧家庭的力量和希望。

我们之所以能肃清封建家庭观念的残余,还因为我国的千家万户都是生活、消费单位,没有谁拥有土地、机器等大型生产资料。这是我们同封建地主和资本家有本质区别的。没有了生产资料,等于是对旧家庭来了个釜底抽薪。“三十亩地一头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状况迟早要起变化!

我们之所以能肃清封建家庭观念的残余,更因为我们的党和人民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限制特权,就是一例。严惩纵容子女胡作非为,又是一例。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儿子,人民群众就不再会过分宝贝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会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在家庭问题上不讲社会主义原则,还谈得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吗?

我们国家要从体制上改革,在家庭这个问题上也要改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做全面改革的促进派。我们要共同研究微观社会学、细胞社会学。

(原载《文汇报》,1980年9月28日)

再谈家庭的淡化问题

十年前,我曾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谈家庭的淡化问题》。十年来,一直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批评。今借《家庭》一角,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

一、我认为,家庭的功能在削弱,在转移。家庭的功能分固有(天然)功能、基础功能、派生功能三大类。固有功能是指生育功能、性功能;基础功能是指经济功能,即生产功能、消费功能等等。派生功能是指教育功能(也有人认为属基础功能)、宗教功能、政治功能等等。这些功能,首先是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在削弱。过去一家无二教,现在一家人信两种宗教的多得很。过去是一家无二党,现在一家人参加不同政党的有的是。过去,孩子在家读私塾,一直读到结婚;现在,大学教授也不会让孩子在家里读小学课程,孩子一到3岁,便会千方百计把他送进幼儿园、托儿所。不管我们如何大声疾呼家庭教育如何如何重要,但传统家庭教育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正逐渐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所取代。至于经济功能中的生产功能,那就更不用说了。生产资料归家庭占有的日益减少,很少有人仍然把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生产场所的了。即使是那个天然的、固有的生育功能,也有所减弱,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正因为家庭功能的削弱,所以家庭的结构在松弛。大家庭的存在,标志着家庭结构的紧密。可是,谁都清楚,通常所说的“大家庭”正在减少,小家庭正在增加。这说明了什么?这也不是说家庭结构在松弛吗?过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亲戚间的往来也相当之多,亲等的五等之内,亲密无间。如今,不要说五等,就是三等也少联系了。大家庭在分化了,还不承认淡化吗?

三、家庭功能的削弱,导致了家庭结构的松弛,乃至于分化;正因为家庭结构的松弛是客观存在,也正因为有这一客观存在,也就必然决定人们的家庭观念要淡化。所谓淡化,是要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他人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上。这一点,我在1980年的文章中讲得明明白白。我所讲的家庭淡化,从来不是提倡不敬长辈,不抚育子女。试问:以集体利益为重、他人利益为重,难道可以不顾自己家庭成员的死活吗?

家庭淡化是个客观存在,不是一个要不要这种提法的问题。我相信,即使在不赞成家庭淡化的人中,十有八九他自己的家庭也处在淡化过程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了。有些不正之风,同中国人的封建家庭观念大有关系。在家庭观念问题上,来不得鸵鸟政策,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

(原载《家庭》,1990年第11期)

家庭观念史四题

生 育 观

从整个人类史来看,生儿育女是组织家庭的最早的一个目的和职能,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目的和职能。诸如生产、生活、教育等职能,全是中间插进来的,为时不会太久。但是,人类对生育的看法,前后是不一样的,是随着家庭形态的更迭而变化的。

人类的生育观,大体是环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的。

一是子女的多少问题。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不仅做父亲的没有子女观念,就是为母亲的,子女观念也很淡薄。拉法格说:“父亲耽心将来没有儿子只是从他私有制财产可遗传的时候开始的。”子女观念是私有制的产儿,是反映私有制并为私有制服务的。私有制壮大,子女观念膨胀。选择配偶首先看能否生育。很多民族的少女婚前怀孕,或者婚前养子,被看作健壮,被认为会成为贤妇良妻。有的民族盛行抱着娃娃谈恋爱,不抱娃娃就没资格恋爱,即使恋爱订婚了,也会因迟迟不能与他人生子而破裂,终身不能去夫家。从前我国崩龙族(今德昂族)女子,如婚后难产而死,要火化后将遗骸入瓮埋葬。意思是不让

魔鬼再跑出来。他们如此注重生育,是同农业上需要劳动力有关。上沃尔特人认为,农业的丰歉同人的生育息息相通。因此,妇女临产时要跑到田里分娩。用这种方式把人们生产的结果通知田地。上沃尔特不育的女子死后不准葬在地里,要把尸骨挂在树上,认为埋在地里会破坏土地正常生长。

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为了延续统治,继承财产,唯恐无子断后,他们宣扬宗法观念,信仰多子多福。他们往往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泰国北部农村,妇女的地位同妇女所生子女的多寡成正比。子女多的,高人一头;子女少的,见人矮三分。人类的最后一个君主——非洲的斯威士兰生了五百个儿女,所谓“世界之最”。

可是,情况在不断变化。近百年来,人们在研究了物质生产同人口生产的关系后,懂得了控制人口。据人口专家估计,现在世界上有一亿人绝育。文化越高的,出生率越低。美国印第安人的出生率为整个美国出生率的两倍。但也有矫枉过正的。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改多子多福观念,妇女不肯生孩子,尤其是有职业、有收入的妇女,一个孩子也不肯生。他们的逻辑是:多子无福,无子有福,无子可做“自由人”。在美国,无子女者购买力最强。

二是子女的血统问题。在私有制比较弱小的时候,或者弱小的地方,人们对这一点尚不计较。上面提到的“抱着娃娃谈恋爱”,就是一例;16世纪建立圣地亚哥城的阿尔瓦拉多,他妻子对他的一大群私生子“像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这又是一例。不仅如此,有的民族因为非婚生子是促使他们成婚的重要因素,反而对妻子婚前同他人所生的孩子,视为长子,倍加欢喜。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加纳的阿散蒂民族有句谚语:血比水更

浓。就是说,婚生的比非婚生的更亲。幼子继承制的产生,是对非婚生子女的一次剥夺。再往后,“后娘”在文学作品中成了“凶残”的代名词。这就更加形象地说明了人们重亲生子女、轻非亲生子女的狭隘私有心理,已经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三是子与女的问题。在母权社会,重女轻男。我国纳西族以无女为绝嗣。可是,在父权制社会,重男轻女。《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是指儿子。不生儿子,就是不孝。《诗经·小雅》上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生男生女待遇如此悬殊,这在现在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可是在过去,却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文化发达的民族对生男生女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情况仍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力低下,妇女就业比例小的,仍然重男轻女。个别国家,如委内瑞拉,由于有人当选为“世界小姐”,霎时刮起了一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热潮。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在确立一种崭新的生育观。无产阶级生育观的主要特点是:生育为公,把生育同社会相联系。他们不再把子女看作是私有财产,而是看作整个社会的财富。无产者生育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事业后继有人,而不是别的。无产阶级的生育观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礎所决定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贞 淫 观

贞与淫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人类的远古时期,是既无贞操存在,也无淫秽可言的。贞淫观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的产生而产生的。

最初的淫跟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

指的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之间的私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维护他们既得的阶级利益，严禁与奴隶通婚。他们认为，奴隶主之间私通，不算不贞，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私通，就是荒淫了。几十年前，在澳大利亚残存的奴隶社会中，还认为女子是一个阶级的共有物，在本阶级内怎么都行，若与其他阶级私通，就要治罪，直至处死。

到封建社会，淫的概念愈来愈广。《新约马太福音》上说“人若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日尔曼氏民族中，谁要是看酋长的妻子两眼，也就是淫了。与此同时，贞的水准也愈丰愈严，以至变成“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杂坐”，“男女不同席”，才谓之贞节。《明史》上讲，吴县的王妙凤，因男子碰了一下她的手臂，便“持刀斧臂”，被人誉为贞节。《列女传》上讲：楚昭王外出，留夫人在家。楚昭王听说发大水，派使者接夫人出来。因走得急，使者没带信。夫人明知有淹死的危险，也以没丈夫手迹为由，拒绝随使者出走，结果活活被淹死。还有《梁谷传》上讲，贞女伯姬家失火，众人一再劝她躲避一下，她都因“父母不在，宵不下堂”，宁可活活烧死也不出来。从而，落个“以贞为行为者也”。元代有乳疡不医的。宁死，此疾不可男人见。为了守“不与男人同行”、守“宵不下堂”、守“不可男人见”的贞节，宁可淹死、烧死、病死。这便是封建社会的贞操观。

当然，贞操观点一味地紧下去也不行。在封建社会中，贞操观念也是紧中有松。原因是妇女们不怕淹死、烧死、病死的人多了，也会促使男子丧失佳偶；原因是个个妇女守贞操，荒唐的男子就失去了淫乱的对象。在日本的平安贵族社会中，妇女完全是作为男子的性对象而存在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借肚子的”。如果妇女都不借了，他们那帮浪荡公子怎么办？因此，他

们又声称：过于守贞操的女人是“死板”。在我国唐朝，贞操观也一度放松。据《新唐书》上讲，当时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杨贵妃也是改嫁的，照样宠之为贵妃。但是，总的讲，封建社会可谓贞节的顶峰。处在贞操观略有放松时代的白居易写道：“妇女一丧夫，终身守孤子；一折不重生，拓身犹抱节。”节，这种单方面的节，不知害了多少女子的青春。李后主为了贞节，倡导缠足，弄得妇女裹足不前，步履维艰。缅甸巴洞人，为了贞节，在妇女颈上带三十多个金属环，把锁骨、胸骨压下去。妇女犯了通奸，便被取下金属环，使身体前倾，失去平衡，窒息而死。

但是，物极必反。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封建的贞操观，阻碍妇女成为社会生产力。换句话说，在劳动力变成商品的社会中，封建的贞节观不利于资本家榨取妇女劳动的剩余价值。于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大搞了一阵性解放，深刻揭露了封建、宗教贞操的虚伪性。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一大突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是一大推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自由化的泛滥，他们在贞淫观上走上了另一极端。近一二十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流行什么“性革命”，导致离婚率直线上升，未婚母亲的数目在急剧增加。由于未婚母亲无法照管孩子，导致青少年吸毒、犯罪，甚至精神失常。资产阶级的性革命，把贞操荡涤一尽，到头来变成了性破坏，性浩劫。

嫉 妒 观

人们通常讲的“嫉妒”，虽说不完全是指家庭、婚姻之事，但也包括这些事。“嫉”，最早见之于《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这里讲的就是同性相斥的“嫉妒”。

在人类社会中，嫉妒的事很多。《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

好嫉妒者。不管贾宝玉到薛宝钗那儿去干什么，她除了伤心落泪以外，还要挖苦宝钗，奚落宝玉。不过，黛玉的嫉妒之心还不算重。在她之前，唐代管国公任瓌的妻子比她更厉害。唐太宗因为任瓌有功，赐给任瓌两个侍女。任瓌怕自己的妻子嫉妒，不敢带回家。太宗便把任瓌的妻子召来，对她说：“妇人妒嫉，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任瓌的妻子以为这酒是鸩，便在作了死的准备以后，对太宗说：“妾不能改妒，愿饮酒。”说着便一饮而尽。哪知太宗赐她的，既不是酒，也不是鸩，而是醋。因此，任瓌的妻子在吃醋之后，并没有死掉，只是不舒服了一阵。传说，这便是“嫉妒”的同义语“吃醋”的出典。且不论确实与否，总归反映了女人的嫉妒心。

人的这种嫉妒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人类固有的吗？不是的。在人类两三百万年的历史中，有嫉妒的年代只不过是可略而不计的几千年。生活在漫长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人们是不知道什么是嫉妒的。共产主义者拉法格说：“嫉妒是所有权的一种变形的感情。”是的，嫉妒是从私有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在私有制出现以前，不存在嫉妒，在私有制出现之初，也不是到处都有嫉妒存在。据日本的《千岁之基》一书记载，在日本的武士社会中，被视为模范封建领主的“名君”——上杉鹰山，在自己的孙女结婚时，教训孙女说：“你应当一心打算增多后嗣的方法，如果有比自己好的女子，就把她献给丈夫，这是做妻子的道理。”这里指的是女子，男子也一样。中国古代的“面首”，大多也不嫉妒。

古代是如此，在有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的今天，在嫉妒观念包围之中，也有些无嫉妒的“小岛”。西藏共妻的众夫之间不相嫉。从前，云南永宁的纳西族女子的数十个、上百个“阿注”（男友）之

间,和睦相处。文明人因他们无嫉妒之心而惊奇,他们也以文明人有嫉妒之心而叹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嫉妒发展到了顶点。角斗、凶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嫉妒跟其他私有观念一样,一到了顶,就要开始下降。近一二十年来,西方有些青年人的嫉妒心大减。他们容忍配偶同异性保持性关系,他们风行让妻、借妻。如果说他们还有嫉妒心的话,那不是表现在配偶可不可以同异性性交上,而是表现在“你有几个姘头,我也要有几个姘夫”,大家要对等上。

离 异 观

1979年底,雅加达《罗盘报》上登了一位55岁的妇人的照片。这位老太太说她已经结了50次婚,其中49次都离异了,最短的只有11天。

这般频繁的离婚,在今天是罕见的。可是,在对偶婚时代,则是常有的。如今在保留对偶婚遗俗的地方,尽管很难找到离婚四五十次的人,但离婚仍是很便当的。像埃及和苏丹,过去做丈夫的要是想和妻子离婚,他只需要在一位证人面前向妻子连说三次“我要离异你”,双方的婚姻关系便告终结了。从前,我国布朗族,若是男子提出离婚,只要把妻子打扮成未婚姑娘的模样,就可以让妻子走了。我国云南瑞丽一带的傣族,婚后几天就离婚的事,也不是个别的。离婚的多,大家对离婚的看法也自然看作家常便饭。

封建社会截然两样。阿·托尔斯泰在自传中讲到他母亲离婚的时候,写道:“那时,女人跟丈夫离异是一种罪恶,一种堕落行为。”托尔斯泰还说,对这件事,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外祖父母

在内,都有同样的看法。托尔斯泰的母亲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因离婚而受辱是不足为奇的。

封建社会中的离婚的主要特点是单向性。只有夫同妻离,没有妻向夫离。“男不要女一张纸,女不要男只有死。”丈夫一言可以逐妻,妻子有口难辩。孟郊在《去妇》中写道:“妾心藉中丝,虽断犹牵连”。牵连也没用,丈夫说离只有离。男子离了可以再娶,女子离了不能再嫁。“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以后,先是争得了结婚自由,过后才争得了离婚自由。接着,离婚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是随意性。不分男女,谁想离就离好了,自由得很。二是普遍性。这是随意的必然结果。从世界各国的离婚率来看,美苏两国最高。而且,两国的离婚率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美国自1960年以来,离婚率从2.2‰上升为5.02‰。据1977年版联合国世界人口年鉴统计,前苏联的离婚率为3.35‰。日本的离婚率较低,1977年为1.11‰,但也在逐年增加。三是倒单向性。换句话说,女子主动离婚的比例在增加。女子提出离婚的原因,或是男子酗酒,或是丈夫外遇,或者丈夫不管家务,更多的是因为丈夫“没有经济能力”。

离婚,特别是女子的离婚权,是国内外的民主先驱为我们争得的权利。1920年陈望道在《新妇女》上发表文章,提出“既然要自由离婚,就该要求自由结婚”!再早,恩格斯曾经论述过离婚。他说:“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可是,资本主义国家滥用离婚权,糟塌了离婚权。有相当多的离婚,是在铜钱眼里翻跟头,未必是幸事。离婚对下一代的影响,那就更不幸了。资产阶

级社会学家写道：“在这种离婚案中，男女主角可能都说不上是什么受害者，最可怜的倒是那些不幸被卷入这场‘买卖’的下一代。”

（原载《青年一代》，1980年第5期）

谈 妒

妒,或者嫉,造字的人都加了个女字旁,似乎是女性所独有的,至少也是女性比男性妒得严重、普遍。

不过,在先秦的文献里,妒,或者嫉,也常用在男性身上,例如,《荀子·大略》篇中有这样的话:“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屈原的《离骚》里则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妒友、妒臣,显然都是指男性,好嫉妒的混浊之世,也主要是指男性。荀子、屈原都是战国后期的人,这就大体可以看出,尽管妒和嫉都从女,但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把妒或嫉全归之于女性的心理特征。

后来可就变了,全属于女性了,以至有了“妒妇”、“妒女”这种专门性的名词。有些人犹嫌不够,妒字前面要加个与女性的“柔弱”不相称的悍字,称为悍妒。苏东坡更以他的才华,把悍妒与兽中之王作比,称妒妇是“河东狮吼”,于是,“狮吼”又成了妒妇的代名词。

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虽然男性的、女性的神或英雄都有妒的品性,但最妒的却是天后赫拉(罗马神话中称为朱诺),突出了女性。在《圣经》的旧约或新约全书中,妒,基本上是指女子。当然,在后世的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妒男的典型,

如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奥赛罗。但实际上，奥赛罗的嫉恨爱妻苔德蒙娜不贞而把她杀死，是自己轻信，中人奸计，作品真正强调的是爱，而不是妒。相反，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倒是真正把女性看成妒者，并狠整了一下，整得妒妇驯服了，不敢再妒了，这才较真实地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

和莎士比亚大致同时，我国明代人谢肇淛，写过的一部著名的笔记小说《五杂俎》，在该书的《人部》中，他经过广泛搜罗，旁征博引，从皇后到民女，汇集了从古到明代上百个以妒闻名的女性。公元5世纪时，南朝宋明帝刘彧为惩治妒妇，曾命人写了一本《妒妇记》，已经失传了，但又经过一千年的积累，谢肇淛搜罗的内容，肯定比前者丰富得多。

谢肇淛不仅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妒妇，而且概括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凡妇人女子之性，无一佳者”，他一口气列举了妒、吝、拗、懒、拙、愚、酷等十四种不佳之性，妒居“为最甚”的首位，并下断语说，“故妇人一不妒，足以掩百丑”。

不过，谢肇淛也搜罗到一点对妒妇的另一种评价：“士君子情欲无节，得一严妇约束之，亦动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谚有云，‘到老方知妒妇功’。”（见《五杂俎·人部四》）

这另一种评价，虽然只有几句话，却是与那种把妒归罪于女性的“正统”见解相对立的，它表明，妇女的妒，原来是和“士君子情欲无节”大有关系，而且，妇人的妒，尽管士君子在恣情纵欲时会感到受约束，到后来却能体会到这种妒原来是出于对自己的体贴，是有“功”的。

是的，妒，决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本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大约99%以上的时间，并不知道什么叫妒，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妒不妒的问题。就是在一夫一妻制的早期，妒也只是刚

刚萌芽,并不强烈。在那个时候,人类的性生活还有一定的自由。男权制虽然已经开始了,但还不太巩固,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关系还不太严格,女性还有一定的自由。

到了奴隶社会,男权家长制完全确立了,丈夫成了妻子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妻子对于丈夫,不论有无爱情,只能听任丈夫摆布。丈夫可以任意更换妻子,妻子却不能选择丈夫。男权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妻制,一个正妻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妾。妻妾一多,丈夫对她们的态度自然会有亲疏之分、厚薄之别,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别宠爱,对另一些则比较冷漠以至嫌弃。这就很自然地在妻妾之间挑起了矛盾。对于妻妾来说,能否得到丈夫的宠爱,是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幸福和命运的大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独立谋生,只好事事依靠丈夫,把幸福和命运完全寄托在丈夫身上。女性被当作“阴”性,被限制在闺帏之内,这又使她们的见识受到限制。她们不明白自己的这种从属品的不幸地位,是男权制和多妻制造成的,就是有点朦胧的认识,也无法更无力和这种不合理的但又是历史必然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她们所能做也便于做的,就只好在同属于丈夫的妻妾之中争宠,胜利了的,必然洋洋得意,盛气凌人;失败了的,则对胜利者表示不满,甚至想方设法拆胜利者的台,以便为自己的取胜即得宠创造机会。这种同性间的争夺、猜忌、怨愤,就是所谓的妒。

在封建社会,上自皇帝的后宫,王公将相的香阁,下至豪绅、大贾的内室,重则因“妒”而杀人害命,轻则“妒”得风波迭起,家室不安。《五杂俎》中列举了上百个“妒妇”,看似一大串,相当惊人,实际上不过是事情闹得较大,她们的丈夫又几乎全是台面上人物,又有好事者为之记载,这才为人所知。没有人记载的“妒

妇”之妒行，实际上是多得难以胜计。

看那闻名的妒妇、妒行，全都出在统治者、富贵者的家门，这不过是因为这种家门总是妻妾众多，侍婢成群，生活都是很荒淫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说：“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可谓封建社会的经验之谈。相反，广大穷苦百姓的柴扉里，却很少传出和妒有关的奇闻异事。这倒并不是由于他们地位卑贱，不为好事的野史家所注意。而是因为他们穷困得连妒的条件也没有。试想一想：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守着一个不娇不艳的妻子，两人相依为命，家里怎么会闹得出妒来？

当然，在士人乃至官僚层中，无妒的人家也是有的。这大半是由于这些人或甘于澹泊的生活，或不重女色，因而几乎不蓄姬养妾。东汉人梁鸿，有很丰富的知识，但他看到东汉政治腐败，决心过隐逸生活，不要说不蓄妾，连富家女都不娶，他后来有幸娶了个丑而有德的孟光，志趣一致，同甘共苦，虽流离为富家佣人，但夫妻情笃，妒也就无从产生。东汉另一个著名清官杨秉，官位虽高，却计日受俸，财多不入私门，一生坚持酒、色、财“三不惑”，他的妻子也就不可能妒。还有另一类，妻妾互谦互让，和睦相处，共事夫君，不争不妒。例如京剧《红鬃烈马》（即全本《武家坡》）中的薛平贵，先是因偶触彩球而娶了丞相之女王宝钏；后来从军被俘，又娶了西凉国的公主。他领兵回国，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要封皇后了，两个妻子相互推让，毫不妒忌。这只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追求多妻的美梦的编造，离现实太远。一当了皇帝，就要理所当然地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后宫佳丽，争宠还来不及，怎么谦让得起来！

隋文帝杨坚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和独孤氏还多少有一点夫妻情份。及至当了皇帝，就要根据皇帝的独尊身价选妃御嫔。

独孤氏受不了，她无法阻止，却千方百计地干扰，使隋文帝选的妃嫔都是不美不娇的“粗肥长大”者。隋文帝看中了尉迟迥的孙女，纳入后宫，独孤氏知道后，就把这位美女杀了。以致隋文帝愤然长叹：“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独孤氏这一事迹被收入《隋书·后妃传》，因而她就成了闻名的妒妇。五代时的闽王王延翰，荒淫好色，他的王后崔氏，一年之内就杀掉了王延翰的84个宠妃，《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了下来，崔氏也就妒流千古。

贵为天子，也被妒妇妒得不得自由如此，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统百僚、理万民的三公九卿，以及不少以文才名世、以礼义教人的著名知识分子，也常有类似遭遇。曾经手握重兵的袁绍、袁术兄弟，宠妾虽多，却都被妻子杀死不少。王导和谢安，都是东晋著名的丞相，王导纳妾，怕妻子反对，只好另居别室，有一次，他妻子曹氏追来，王导落荒而逃。谢安要蓄妓，派侄子去和妻子刘氏商量，能言善辩的谢家子弟，竟被刘氏抢白得张口结舌。沈括这位著名的学者，为了宠妾，常遭妻子的棍棒。王阳明是理学大师，他宣扬“灭人欲”，自己却要广蓄姬妾，因而被妒妻闹得家室不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妒妇”能够妒得起来，妒得出名，大半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她们虽然是理应“从夫”的妇女，但娘家大多也是有权有势的，有力量可以仰仗。二是她们的丈夫，尽管不一定是荒淫之徒，也必是贪求女色，“情欲无节”，自己就行为不端，违犯礼教，因而被妻子抓住了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妒得他们狼狽不堪，“苦”不堪言。

在封建社会，或者说在封建社会的有条件蓄姬养妾的上层社会中，妒的问题已经超出家门，成了社会问题。统治者不得不

寻求治妒的办法。办法倒也创造了很多,但归结起来是两手:一是以“礼”化俗,那三从四德的规范、妻子不应干预丈夫活动的说教,以及妒行要遭鬼神报应之类的恐吓,都是这一手。但效果总是有限,妒妇越出越多。于是又有另一手,这就是以“法”而罚,“七出”中有妒妇就可以出的规定,表面是礼,实际是一种惩罚。一出了事,这是轻的,罚,常常是要动刑的。这仍然没有用,以至一些皇帝不得不亲自审理妒案。最早以审理妒案闻名的,大约是南朝的宋明帝刘彧。他看到幸臣荣彦远面带伤痕,一了解,是他妻子因“妒”他偏爱美妾而抓破的。刘彧就说,我为你治妒妇,就钦赐一包毒药,把荣彦远的妻子杀死。袁悛的妻子,也是因为妒,被刘彧亲自赐死。刘休的妻子妒,刘彧又亲自判决离婚,命刘妾亲打刘妻王氏二十大板,再责令她开店卖帚,进行羞辱。但这只能解决个别问题,于是刘彧又命虞通之编了一本《妒妇记》,颁行天下。

惩办妒妇最残酷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据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大将常遇春的妻子以妒闻名,朱元璋就下令把常妻杀死,再做成肉羹,分赐给群臣们吃,真是惨无人道之极。

以“礼”化之也好,以法治之也好,总是治不了妒。明代人说连龙王、天神、十殿阎王都“惧内”。有妒妻,这就说明封建的礼与法只能杀死个别妒妇,却无法消灭妒。

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妒是妇女的天性吗?不是。而是私有制的多妻制制造了妒;男性可以恣情纵欲,女子却要受种种拘束,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不平等的性关系,又加剧了妒。而妒妻比妒妾多,这不过是因为,妻子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六礼聘娶的,不一定能互相情投意合。而妾,是自己挑选的,是因为美而买或抢来的,姿容一般都超过正妻,年龄一般比正妻要小

得多，在重女色的社会中也自然就会宠妾而嫌妻。妻子受了冷淡和凌辱，可又是内室之主，照封建礼法，地位比妾高，所以妻子不但有妒的充分理由，也有妒的条件。

男子就不妒吗？其实也妒，有权势者见到人家的妻、女娇美就霸占，就抢夺；权势小者就勾引、私通，这不就包含有对别的男性的妒吗？但在封建社会，这不叫妒，有权者是风流韵事，理所当然，无权者是“无行”的登徒子。但究其实际，这种男性的妒，由妒而行暴力，毁人家室，坏人贞操，比妇女的妒，要严重得多，恶劣得多。在封建社会，对于妒的问题，不讲男，只讲女，把妒归之于妇女专有，视为妇女的最坏品质，这也正是封建男权制男尊女卑的一种表现。

妒，既然是由男性的多妻造成的，因此，治妒只治妇女，那是颠倒了本末，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当然，对于男权制社会中的男人，是看不到本质的，至少是不愿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的。

爱情的本质是专一的，排他的，又是以双方平等的真诚相爱为前提的。如果双方真诚相爱，爱得专一，爱得忠诚，那就不能再与第三者横生枝节，纠缠不清，因而妒的问题也就无从产生。因为产生妒的基地没有了。

纵观历史，妒，实际上是爱情受到歧视、凌辱的妇女的一种变了形的反抗，是企求专一、忠贞爱情的扭曲形式，妒妇总是出在多妻之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妒，有它的合理因素。但是，用妒的方式企求专一、忠贞的爱，反抗男人朝三暮四的纵欲荒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因妒而伤人害命，这本身又是犯罪行为。这也是这种不正确的反抗手段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我们已经实行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爱情又是由双

方的平等自愿而自然形成的,同时又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制约。所以,妒的问题,在今天也就逐渐成为历史了。

当然,今天也还有个别人对爱情不忠贞,不专一,总觉得妻子是别人的好,还要去闹三角四角纠纷,这就不免产生妒的问题。但这种造妒者和妒行,都是共产主义道德不容许的,人们会嗤之以鼻,自己也终会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新型婚姻制度的确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发扬,新一代的人们,将不知妒为何物,也很可能在翻阅历史的时候,对历史人物的妒和治妒,感到不可思议。

(本文收入《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谈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后代的质量和家庭的苦乐。家庭教育的好坏,对学校教育、社会发展和人口素质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终生学校。一个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终生没有上过学,但它总要在家庭中受教育;一个人成年后,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他总要在家庭中生活,在家庭中受教育或者教育子女。父母,是子女的当然老师,是启蒙老师,也是终身老师。因此,对家庭教育问题必须充分重视,对家庭教育的各种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当父母的要重视和研究,社会更要重视和研究。

家庭教育职能的演变

家庭的教育职能,既随着家庭的演变而变化,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原始社会的氏族家庭,既是生产和消费的独立体,又是军事和“政治”的独立体,可以说家庭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家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既是社会(氏族)的,又是家庭的;父母和子女,

同样既是社会的,又是家庭的,子女是全氏族父母的共同子女,父母是全氏族子女的共同父母。在这种社会即家庭的时代里,氏族家庭也就是人的终生学校,全氏族的子女都是长辈的共同学生,全氏族的长辈也都是全体子女的共同老师。这种家庭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第一,教育的社会性;第二,教师和学生的终身性,这种终身性是彻底的,不存在后来的入学和走向社会的问题。

氏族社会解体、个体家庭出现以后,家庭只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不再是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单位了(个别家庭除外),家庭的范围缩小了,家庭由小社会变成了社会的细胞。随着阶级的产生,出现了国家机器,社会教育和教育机构也逐渐出现,于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开始分化。

不过,个体家庭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大致说来,在奴隶社会,家庭主要有两类,即奴隶主的家庭和奴隶的家庭。奴隶主的家庭,实际上是以奴隶主为家长的大家庭,奴隶主拥有众多的妻妾和子女,其家庭基本成员是由姻缘和血缘关系构成的;奴隶主家庭中还有大批家庭奴隶,家庭奴隶和奴隶主没有血缘或姻缘关系,也没有政治、经济地位,但他们是奴隶主家庭中终生的甚至世世代代的附属物。另一类是大量的生产奴隶的家庭。生产奴隶也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也没有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但他们有比家庭奴隶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被奴隶主拆散。因此,在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问题,严格说来,只是在奴隶主的家庭中才比较受重视。奴隶主也对奴隶进行教育,这是为了使奴隶成为熟练的劳动者和勇敢的战士,以维护奴隶主本身的利益。不过,这主要是以社会教育的方式进行的。

奴隶变为农奴以后,人身有了自由,经济上也有了自己的小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这才出现了真正的个体家庭。这种家庭,在奴隶制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但到了封建社会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家庭中,教育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时期,社会的专门教育机构还很不发达,数量也很少。虽然乡、县、郡和中央政权都设有学校,但能进入地方官办学校读书的基本上是地主缙绅的子女,进入太学的更基本上是功臣官僚贵族的后代。私人办学,至少从孔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私学的数量也很少,能够有机会入学的人也很有限。而且这类私学也具有家庭性质,入学者既是学生,也是教师的家庭劳动者,不然吃住都成了问题。孔丘号称有三千弟子(不是同时有三千,而是先后共有三千),两汉时代也时有聚徒千人讲学的记载,这么多人在一起,吃住就都是大问题,只能靠自己从家里带粮食,或者为教师劳动换取口粮。

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长年辛勤劳动,尚难保证一家的温饱,自然难以让可以参加劳动的儿子带着口粮外出求学,只能终生地、世世代代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这样,家庭教育就有了特殊意义。这种家庭教育,一方面,水平极为低下,培养的目标,不过是安分守法、持家立业的农民;另一方面,它又是“百科全书”的:生产劳动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孝亲爱子的伦理道德、纳税守法的政治法律、祭神敬祖的思想观念等等,全都主要靠家庭教育。“童孙未解共耕织,也傍墙阴学种瓜”,就是家庭知识技能教育的生动写照。中国两千多年来世世代代的农民,全都主要是靠家庭教育培养的。各种手工业技艺,也基本上是父子相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虽然有官办机构,有少量的学校,但家庭教

育也占有主要地位。正是由于家庭教育和财产、知识的私人占有,除了世代务农、做工的农民和手工业工匠以外,还有大量的书香门第、世医、祖传老店、梨园世家,甚至妓院也代代相传,有所谓“金粉世家”之称。

远在《大学》中,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言,把齐家放在治国之前,把齐家当作治国的前提。齐家,当然包括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的早期,还是沿用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官职爵位是世袭的,但为了保证世袭,教育出能够世袭的子孙也是个大问题。从汉代起,开始举孝廉秀才,选拔官吏的范围扩大了。但孝廉,首先表现在对父母的孝,这是家庭教育的一种结果。秀才,也主要是家庭或家庭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汉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辑录儒家言论的《孝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一直被奉为重要经典。这固然说明孝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孝主要是表现在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上的。

在封建社会中,一些有钱有势的家庭中有所谓“西席”即延师教子,但这仍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方式,是雇佣家庭教师代替父母担负一部分教育子女的责任。

封建的法律制度,也决定了封建家庭的教育职能的重要性。在封建社会,一人犯法,父子连坐,全家株连,甚至株连三族、九族。反之,一人飞黄腾达,全家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财产和某些官爵,还可以封妻荫子,世代承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人的命运决定着全家人的命运。门第的清浊高下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还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育的问题自然格外受到重视。家庭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格外突出。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生产逐渐社会化。一方面,首先是在城市,接着是在大机器工业的触须所伸到的农村,个体家庭的生产职能逐渐减弱以至消亡。另一方面,大机器生产需要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劳动力,需要研究人才和生产、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管理人才,因此,各种形式的学校纷纷出现。普及教育成为社会的需要,学校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家庭的教育职能的一部分逐渐为社会教育所取代。但是,家庭教育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首先是由于,社会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的命运,养育子女全靠家庭,子女上学的费用也几乎全靠家庭,子女成人后能否独立生活也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利益。其次,子女入学前全靠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入学后仍然生活在家中,要受家庭生活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子女的命运与父母和全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家庭教育对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除少数个体劳动和现阶段的农村承包制以外,家庭的生产职能已经消失,国家也更注意按社会的需要以各种社会方式教育全体社会成员。子女既是父母的,又是国家的,社会教育(包括学校)的作用更大了,范围也更广了。但是,家庭仍是独立的消费单位,子女仍需要家庭养育,即使社会所承担的一些养育费用(如独生子女奖励金、困难补助及教育减免费等等)也是以家庭消费的形式实现的。子女入学以前,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中受教育;入学以后,仍然生活在家庭中,需要家庭教育的配合;子女走上社会到独立成家以前,仍然是家庭的一员,仍然需要接受家庭教育,受家庭的影响。一个人建立了独立家庭以后,也还是切不断与父母的关系,有义务赡养、敬重父母,父母也有义务

关心子女和教育子女。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家庭里,教育职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和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在社会主义时代,家庭的观念、影响和作用总的说是会日趋淡化的,家庭的职能范围会逐渐缩小,在教育职能上也是如此。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一家人愁吃愁穿的现象将逐渐不复存在,这就有可能更多地重视优生、优养、优教的问题。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的教育职能也有可能而且也应该发挥得更好。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职能虽然将逐渐减弱,但家庭教育的职能却反倒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对于这个问题,必需有充分的认识。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家庭教育的内容,因子女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总的说来,是综合教育,教育内容是百科全书式的,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样样都包括在内。

一、体育教育

从家庭教育来说,主要内容是培育子女的健全体魄和坚强性格,而不是训练专门技巧(特殊条件例外)。如果子女体弱多病,不仅是家庭的沉重负担,也无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而且,体弱多病的子女,也势必影响其他方面的教育。

长身体,是人在青年期以前共同的生理特点,这也是一个独立生活、建立独立家庭以前的共同特点。青年期以前身体发育的状况如何,又对一个人终身的健康状况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体育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对子女的体育教育,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婴儿期(两岁以前)和幼儿期(入学以前)。卢梭主张,对于两岁以前的孩子,教育的全部内容应当是体育,两岁以后到12岁是感觉教育,12岁到15岁是智育和劳动教育。这种划分虽然机械片面,但他特别强调婴儿期的体育教育,是看到了婴儿期的生理特点的。婴儿,还不能自己独立走动,但身体的发育比较迅速,为了使婴儿健康成长,这就需要父母给婴儿进行婴儿体操,使婴儿多活动,进行各种适合婴儿的体育锻炼。让婴儿多呼吸新鲜空气,适当地晒太阳,扶着走路,也是促进身体发育的必要条件。婴儿出生后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哭。在整个婴儿期,总的说来也是哭比笑多。哭,有时是有病痛,有时是饥饿或受惊,有时是呼唤父母或向父母表示某种感情。做父母的都不愿孩子哭,一是出于爱,二是怕吵。其实,在无病痛也未受惊吓的情况下,孩子哭一阵,也是一种体育活动,是益多于害的。

在幼小期,孩子能独立行走、玩耍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让孩子多走、多跑、多活动,还应当带着孩子进行各种游戏,这都是最好的体育活动。

进入少年期,孩子能自理简单的生活了,也开始上学了。学校里有专门的体育课及各种课外活动。回到家里以后,也应当鼓励孩子搞一些有益于身心的体育活动。

许多父母,总希望幼儿和少年期的孩子“规矩”一点,“老实”一点,文静一点,怕孩子太“皮”,管得很紧,样样似乎都动不得。这既有害于孩子的身体发育,也不利于孩子发展个性。

家庭的体育教育,是和保健、营养、家庭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和学校体育课的性质不同,这就有可能从孩子的卫生保健、饮食营养、家庭劳动和活动等多方面地加以综合考虑,做灵活多样的

安排。但是,对孩子的家庭体育教育,很容易产生片面性的看法和做法,比较常见的有:

第一,重营养轻体育锻炼。从婴儿长到青年,都是长身体的时期,保证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确实很重要。但是,营养品不能代替体育锻炼。体育锻炼适宜,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才能更充分地吸收营养,促进身体的发育。有些父母,经济条件比较好,恨不得儿子一口就吃成胖子,一眨眼就能成“龙”,因此,孩子还在婴儿期,也没有任何疾病,就让孩子吃人参、鹿茸之类的高级补药,结果适得其反,吃坏了身体,反而闹出病来。

第二,对幼儿期的孩子,片面追求干净整洁,限制孩子很感兴趣的正当的户外游戏。孩子上学以后,又片面强调读书,不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连孩子能够胜任的轻微的家务劳动也一律由父母包办。孩子进入幼儿期以后,能独立走动了,喜欢跑动、游戏。到了六七岁的时候,更加好动贪玩,是所谓“鸡狗都讨厌”的年龄,跌打滚爬,一刻也停不下来,刚穿的新衣服,转眼就脏了,甚至受了伤也照样玩个不停。这给父母增加了劳动负担,也会因孩子的过分顽皮而引起邻里争吵。于是,父母对孩子的顽皮总喜欢训斥、限制,而对不好动的孩子则给予表扬。这是不正确的。孩子贪玩好动,是生理上的需要,是正常现象,孩子正是在不停地玩、动中发育起来的,在玩和动中变得更加健壮,性格也会更加活泼、坚强。当然,对孩子也要适当引导,要防止出事故。齐景公身为一国之主,却爬在地上当牛,口衔绳子,让儿子(孺子)牵着玩;不料儿子跌倒,把他的牙齿都拉断了,可齐景公却毫不在意。“孺子牛”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左传·哀公六年》)。马克思尽管很忙,但也常常趴在地板上,和孩子们一起玩。今天的年轻父母们,不妨学学齐景公和马克思。大人和孩

子一起游戏,既教育了孩子,自己也会享受到乐趣。

第三,对某些会影响孩子健康的不良习惯认识不够,重视不够。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城市的孩子,常患齿病和近视。近视的情况最为严重,有的小孩子,未到入学的年龄就已经戴上了眼镜。据上海某些中学统计,初中毕业生中,竟有40~50%的人眼睛近视,其中约15%的人已严重近视。这是一个大问题。近视的原因很多,有遗传因素,有灯光照明不好造成的,更多的则是用眼过度,这和家庭、学校片面强调孩子看书,不注意孩子的适当休息和活动有直接的关系。牙齿的毛病,则多半是由于吃糖果特别是睡前吃糖果、甜食而又不注意口腔卫生引起的。牙齿有毛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和身体的发育;眼睛近视,会给学习、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应当充分重视保护孩子的牙齿和眼睛。

总的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我国少年儿童的健康状况在普遍提高。据调查,青少年的身高、体重,和解放前比,和50年代、60年代比,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和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又还有差距。在一些大城市中,青少年高而不壮,“豆芽”形的身体较多,这和家庭、学校对青少年的体育健康重视不够,或教育不得法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严重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

二、智育教育

家庭的智育教育,孩子入学前和入学以后有很大的不同。入学以后,家庭的智育教育基本上是辅助性的,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入学以前,智育教育则主要靠家庭承担。智育教育,决不能理解为只是认字和数数,而应当是开发孩子的智力,培养孩子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要使孩子具有聪明机敏的头脑。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有先天的因素,这包括遗传因素和胎儿的良好发育。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后天的培养训练。一个人如果没有后天的培养训练,其先天秉赋不论怎样优越,仍然会变成智力低下的人。王莽为了篡权,在杀死汉平帝以后,从刘氏宗室中选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孺子婴当皇帝,当时,刘婴的智力至少不低于一般儿童。可是不久,王莽正式称帝,把刘婴囚禁起来,除了给他吃饭以外,不准任何人与他讲话,也不准他看到房间以外的任何事物。过了十五年,王莽垮台,刘婴被放出来了,但他不会讲话,也不认识房间外面的一切事物。被称为发明大王的爱迪生,出身贫苦,父母也都是智力平平的普通人,上小学的时候,曾被教师视为愚笨的孩子。但是他靠自己的学习和实践,一生中的科学发明有上千项。可见,起决定作用的,是后天的培养训练。

婴儿刚落地时,脑子还是一张白纸,智力水平还不及刚生下的**大猩猩**。但是婴儿一来到世界上,就开始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感知世界。到三四个月,就能开始区别简单的颜色、形状和声音。随着身体的发育,感知世界的能力也迅速提高。一岁左右就开始学走路和学说话了。到两岁左右,就能说话和独立行走。孩子自己能四处跑动了,视野比在母亲怀抱里及在摇篮里的时候广阔得多。这时候,孩子不仅急于分辨事物,而且已经开始寻求答案。幼儿期的孩子问题特别多,对父母熟视无睹的事物会提出一连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且也特别欢喜听童话故事。这都正表现了幼小心灵热烈的求知欲望,也正是开发孩子智力的大好时刻。父母应当针对幼儿这种爱问的特点,对孩子的问题,耐心地进行通俗而又有趣的解答。不能漫不经心地应付,更不能嫌麻烦而不许孩子发问,如果胡乱解答,那就更不应

当。孩子的提问,大半很简单、很幼稚,但也有些会相当复杂,就是学问高深的父母也不一定都能随口做出使孩子能够理解的回答。父母不但要耐心回答,还要给予启发诱导,鼓励孩子更多地想,更多地问。

有些父母,在孩子稍微懂事以后,就急于教孩子认字,认数字字码,学简单的算术,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低幼阶段的孩子,生动地解答孩子主动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他讲一些有趣的童话故事,看一些生动的画册,教几首简单的歌曲,比硬逼着孩子认字,更有利于开发智力。因为解答问题,讲各种生动故事,还有带着孩子做各种游戏,观察各种事物,实际上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是综合性的智育,比硬性认几个字涉及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四五岁以后,孩子的智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引导孩子看图识字,学着写简单的字,画图画,算简单的算术。除了家中有特殊条件或孩子智力发展很早以外,认字、算数,能为孩子入学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也就可以了。要求过高,是不切实际的。

有些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神童,在幼儿时期就有惊人的智力。能多出几个神童,使上学时间大大缩短,早出人才,当然是好事。但是,从生理学上说,一般儿童的智力发育,总是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如果不顾儿童的生理特点,一味地进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不但灌不进去,而且会摧残儿童的健康,对以后的学习造成损害。

对孩子的智力开发,要注意几个问题,防止几种片面性。

第一,要注意孩子的年龄特点,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不同方式不同内容的教育。入学以前,主要是开发智力。入学以后,智力教育就转为以学校为主,但对初中以下的孩子,对学校中的

学习内容不但要进行经常的督促检查,还要进行耐心的辅导和指导。在这个年龄,孩子还很贪玩,缺乏自制的能力。此外还可以给孩子适当增加一些课外知识。进入高中以后,孩子比较懂事了,自学能力也提高了,但仍要经常进行检查督促。绝不能认为,孩子上学以后,文化学习就全都是学校的事,家庭就不需要关心了。年轻的父母检查辅导孩子,也是对自己文化水平的检查和复习,也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

第二,只重视孩子的文化学习,智力开发,不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和品德教育。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大多数家长比较重视孩子的文化学习,而对思想品德教育则重视不够,抓得不紧不严。特别是在孩子面临小学、初中、高中三次毕业升学考试的时期,更是把文化知识看得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孩子变成了全家的“重点保证”对象,好吃的好用的全都对孩子优先供应。必要的体育锻炼不准参加,自我服务性的家务劳动也全由父母甚至弟、妹代劳。结果,孩子可能以较好的考分毕业、升学,但是过一次关口,体质下降一次,眼睛近视的深度增加一次,害怕劳动、事事依赖别人照顾的不良习气也随着不断升学而越来越严重。一个高中生,在生活上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发展下去,对国家不利,对家庭也没有好处。有的人因为身体垮了,考进了高一级的学校却无法入学。

第三,开发孩子的智力,要善于启发引导,充分调动孩子求知欲强、上进心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幼儿阶段,还要注意生动有趣的教育方法,绝不能生硬地逼和压。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课本古奥枯燥,离现实极远,根本引不起儿童的兴趣,儿童也无法理解课文内容;方法严厉生硬,主要靠填鸭式的背诵和棍棒威逼,这种教育方法,不知摧残了多少幼苗。在今天,学校中

体罚学生的现象已经极少了,但有些家长仍然视体罚为有效手段。孩子完不成父母规定的又多又重的家庭作业,或者考试成绩不好,就要动家法,轻者骂,重者打。学生取得了好成绩,又喜笑颜开地进行物质、现金奖励。责罚的结果,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积极性;奖的结果,又会把孩子引向邪路。罚和奖的混合产物,则是孩子的弄虚作假。其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第四,对孩子的教育,要以精神鼓励为主,激励孩子的自信心和上进心。孩子虽小,却有极强的上进心和自尊心。孩子有了进步,及时进行适当鼓励,并提出进一步要求,很有好处。但不适当的赞扬,又会滋长其虚荣心。对孩子的不足,切忌冷嘲热讽,把孩子看成不可造就的“笨蛋”。须知,孩子的积极性和上进心一旦受到损伤,要重新扶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三、品德教育

孩子刚开始懂事,就会注意区别好坏:看本画册,看个电影,总要问那是好人还是坏人,以“一分为二”的眼光认识世界。认识事物和分别事物的性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好”与“坏”就是儿童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重要标准。这就表明,从儿童懂得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时候起,对儿童进行循序渐进的品德教育,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古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几乎都是从考察儿童入手的。初生的婴儿,脑子还是一张白纸。好坏、善恶的观念,是儿童从自己的极初步的生活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而这种观念的形成,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有些教育家认为儿童心灵纯洁,只能对他们进行善的教育。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善与恶,好与坏是对立的统一,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恶,也就无所谓善。不懂得恶与坏,也就不可能懂

得善与好。如果只讲善与好,不讲恶与坏,尽管可能使儿童的脑子里装满了善、好,但他们稍稍长大,自己接触了复杂的世界和复杂的事物,那满脑子的善与好就会变成一团糍糊。

对孩子的品德教育,至少应当包括思想和性格两个方面。就思想方面来说,要教育孩子爱国家,爱父母,爱老师,爱一切好人,爱孩子自己的小朋友,爱惜“一切好人”的劳动成果,爱劳动。对于幼儿来说,爱劳动和爱自己的小朋友,今天尤其需要重视。现在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娇纵宠溺子女的现象也在一些父母中出现,以至把自己的子女娇纵成了小霸王,一件玩具,稍不如意就摔个粉碎,毫不在乎;与小朋友出现了小矛盾,总是“护犊子”,偏袒自己的子女。娇纵偏袒的结果,必然是害了孩子。入学以后,则要加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教育,鼓励孩子奋发向上,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孩子有了崇高的理想,学习文化知识和锻炼身体的积极性也会更高,就有可能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对孩子的性格教育,主要是培养他们勇敢、坚强、不怕困难和勇于改正缺点的品质。在孩子的生活历程中,总要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这时候就要鼓励孩子拿出勇气和毅力来克服困难,奋勇前进。作业不会做,就要耐心指导;学习成绩不理想,就应帮助孩子总结经验教训,使他振作精神,迎头赶上。家务劳动不会做,就应指导孩子经常练习。有些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作业做不出,就越俎代庖;孩子不会做家务劳动,他们也一手包办。其结果必然是:使孩子养成依赖心理,见困难就怕的心理。据调查,有些城市的女中学生,见到蟑螂、蚯蚓都会吓得哇哇乱叫。试问:连一只小虫子都怕,将来怎么能从事与小虫子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劳动生产?又怎么能和比小虫子厉害得多的坏人坏事作

斗争?

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关键在于父母的以身作则。孩子,特别是幼儿期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可塑性也很大。有些孩子还不太懂事,就已经口吐脏话,这完全是由于父母的嘴里“不大干净”,或者是一些叔叔们热心的“教唆”。父母不尊敬老人,孩子也会跟着样子学。父母有不良习气,也必然会污染孩子的心灵。孩子复习功课、特别是遇到难题的时候,父母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电视、打牌,或者嘻嘻哈哈地谈笑,要想孩子拿出毅力来集中精力学习是很困难的。总之,对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品德教育,父母的榜样作用,比空讲大道理重要得多,有效得多。

对孩子的品德教育,还要特别注意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有些父母,为了使爱子听话,喜欢许空愿、假愿,或者编造荒诞的故事进行恫吓。这是最愚蠢的教育方法,也是最无能的表现。空愿、假愿可能暂时奏效,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久而久之,由于自己失信于孩子,父母的威信就会一扫而光,也会使孩子学着不诚实,说假话。在这个问题上,曾参杀猪取信于孩子的做法,倒是值得借鉴的。

四、美的教育

党中央提倡的“四美”,也应当是家庭美育的基本内容。在“四美”中,关键是“心灵美”,塑造孩子美的心灵。这和品德教育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美和丑,就像善与恶一样,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因此,塑造美的心灵,也要使孩子从美与丑的分辨中爱美、憎丑。当然,这主要是从孩子的生活范围入手,而不是也不应当特地让孩子去见识那些幼儿心灵还经受不住、也难以理解的丑恶现象。第二,家庭的和睦、父母关系的健康融洽,良好的家风,对孩子心

灵的影响非常大。在我国,在世界上,那些性格古怪的儿童,究其原因,多半与不和睦、不融洽的家庭有关。父母经常无谓地吵吵闹闹,甚至拉着孩子当自己的“同盟军”,孩子的心灵必然要受到严重损害。父母做不到“四美”,特别是心灵不美,要孩子美是困难的。古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这个问题上,是常常如此的。这也可以说,好的家风,是心灵美的最有效的教育途径。

家庭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既有一般教育的共同规律,又有自己的特点,或称之为特殊性。这个特点,是由家庭的特点决定的。要搞好家庭教育,就必须认真研究家庭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有些什么特点呢?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终身性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教师,也是终身教师;子女是家庭学校的第一名新生,又是一直到父母去世才能在家庭学校中结业的学生。家庭中的角色是不断转化的,一个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自己就成了当然的老师,如果父母仍在,就既是学生,又是教师。这种终身性,是由家庭的性质和久远的家庭观念(特别是父母和子女的血缘关系及其观念)决定的。即使父母是普通公民,子女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但在家庭这所学校中,父母仍然有权教育子女,子女也有义务接受父母的教育。当然,在家庭这所学校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也需要互教互学,年长的子女自不必说,即使是婴儿,那一哭一笑,伸手抬腿,也会使父母受到启发,从中学到一些婴儿生理、心理的知识。

终身性,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生活,朝夕

相处,因而互相间的了解也比较充分,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随时随地进行教育,耳提面命,教育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就这一方面来说,一般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活动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终身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无可回避性。任何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自然成为父母的学生(私生子而母亲又因特殊原因抛弃婴儿或产后即死者除外)。夫妻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生育,但一经生育,就成了当然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生理规律决定的,是天然的。父母做子女的当然教师,是维护家庭的需要,是种的繁衍的需要,也是为社会承担责任,这是光荣的天职。子女做父母的当然学生,一生下来就得到父母的抚养、疼爱和教育,也是极大的幸福。弃儿就常把没有得到父母之爱视为终生的遗憾。

无可回避性,也就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学校当教师,可以调换任课班级,而且学生总是不断更新。在家庭中,一经形成两代关系,就不能随便选择。孩子是好是坏,都得当他们的终身教师;父母水平不论高低,孩子,尤其是婴幼儿,都得当父母的学生。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父母。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充分承担家庭教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以最大努力当好孩子的终身老师,是很重要的。

第二,由于终身性的时间一直长到父母生命的终止,在教育内容上,照理应当随着双方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需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但是,就今天我国的情况来说,往往在孩子初中毕业以后,父母在不少方面尤其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就不如孩子了。尽管韩愈说过:师不必贤于弟子,但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

人昭昭,总是有困难的。

即使是父母高于子女,但由于子女的某些缺点会反复出现,父母的教育内容也就容易讲旧话,讲老话,内容重复,缺乏新鲜感。孩子对这种“老生常谈”,有时会认为是唠唠叨叨,啰嗦个没完,不大愿意听。这也可能是触发两代人的隔阂,引起所谓“父与子”的矛盾的一个原因。

这个问题,再高明的父母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当父母的绝不应因此而放松自己的要求,而是应当认识到,当子女的终身教师,不仅是应尽的天职,也是有着极高的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大学教授的要求都高。教授把学生教到毕业,任务就算完成了,而父母,可能连大学教授都要教,这自然不是给当教授的儿子教专业知识,而是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即使如此,也并不容易。

第三,由于终身性带来的长期朝夕相处,也容易对许多应当列为家庭教育内容的问题而熟视无睹。许多问题,也可能因一家人的习惯成自然,不以为怪。该认真教育的问题不认真教育,需要及时抓的问题不及时抓,或者为了家庭的表面平安,对不应回避的问题眼开眼闭。在年轻时恨不得孩子立即成龙,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别人的孩子也并没有成什么大器,自己也会感到“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大了,让他自己去碰“运气”,完全放弃了教育责任。

二、复杂性

在教育的职能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会反映到家庭中来,因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会成为家庭教育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虽然只是几个人构成的微型学校,但是家庭教育大纲上的问题,远比一般学校广泛得多,复

杂得多。家庭中的智育,不仅是读书认字,而且涉及大至天文地理小至生活琐事的各种知识,以及各种自我服务性的技能、技巧。家庭中的德育,从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法律治安到邻里关系、亲友关系、家庭关系等等,无所不包。家庭中的体育,也是和防病治病、卫生常识、饮食起居联系在一起的。至于美育,也要涉及到家庭、孩子遇到想到的各种各样的美与丑的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家庭教育,实际上是百科全书式的。

在教育对象上,在今天,虽然只是一个或至多两个孩子,但是孩子从诞生到长大成人,生理特点不断变化,思想品质、文化知识在不断提高。孩子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在教育上也能从不断变化着的对象出发,进行“因材施教”、“因时施教”,而不能像各级学校那样“各管一段”。

孩子能独立走动以后,就开始有了孩子的“社会关系”。到上学以后,又总有自己的一批伙伴。孩子会把学校的各种问题带到家庭中来,也会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带到家庭中来。其中,既有家庭中不大会遇到的新情况,也有与孩子相关的各种矛盾。而且,这些情况和问题,常常是难以预料的,或者说是事先难以“备课”的,有时单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凡此种种,学校不一定全都碰到,教师又各有分工,而且事情不论好坏,最后都直接牵涉到家庭的利害。别人可以回避,父母却不能不管,而要随时管,样样管。

总之,家庭教育的复杂性,就对孩子的天然教师——父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当父母的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德,还要懂得一点生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也要学会细致耐心、循循善诱而又能随机应变的教育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单靠“父道尊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做孩子的师表。事实上,在

孩子心目中,特别是在幼儿心目中,父母的形象也是崇高的,总是认为父母本领最大,水平最高。如果当父母的不争气,在孩子面前拆穿了虚伪的西洋镜,对孩子心灵的打击,就很难弥补了。为人父母者,千万要自尊自重!

家庭教育虽然包罗万象,复杂多变,但并非要求做父母的须具备各种渊博知识,教育对象也只有一个,整天生活在一起,并不难充分了解。做父母的,只要能充分理解教育孩子的责任,能够和孩子教学相长,不断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家庭教师还是完全可能的。

三、特殊的感情色彩

父母子女之间,是血缘关系,是相依为命的亲骨肉。这种特殊关系形成的特殊感情,和同志、师生、亲友关系的感情是不同的。因此,在家庭教育中,总是和骨肉感情、亲子之爱交织在一起。这也和学校教育的师生感情,社会教育的同志感情有所不同。

骨肉情深,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必然会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在今天,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少生、优生,让每一个幼儿都能成才,对子女的教育,就更会周到细致。有些父母,为了使孩子品学兼优,除了严格认真地进行思想教育以外,还对孩子各门功课的课文,自己先一一揣摩,以便对孩子的学习进行检查辅导。有的父母,本来不懂得汉语拼音和外语,为了辅导孩子,也以极大的毅力从头学起。这种在家庭里边教边学,在教中学,教学相长的做法,是一种很好的家庭学风,不但对孩子的成长极为有利,而且也能使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爱子心切,认真教育,是大好事。但是,感情色彩过浓,也会以感情代替理智,不容易客观地全面地对待问题。如果解决得

不好,就容易戴着骨肉感情的有色眼镜看问题,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溺爱娇纵。“儿子总是自己的好”,不容易发现或不大愿意正视子女的弱点和缺点,不能正确处理,严格要求。孩子和别人有了矛盾,总是偏袒自己的孩子,指责别人。孩子学习缺乏毅力,成绩不好,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埋怨学校,责怪教师。孩子不愿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也总是感到孩子太小,不让他做,就是孩子能在生活上自理了,也甘愿当孩子的忠实“老仆”,让孩子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有的甚至把子女的不足或缺点,看成是优点。这样的感情,决不能说是培育幼苗,而是损害幼苗,把“扶正祛邪”变成扬邪压正,爱变成了害。另一个极端,是由溺爱转化为怒和恨,其表现方式是简单粗暴的打和骂。望子成龙,一旦不能如愿,就认为子女不争气,辜负了自己的心血,对子女冷嘲热讽,硬逼重压,甚至打骂,这在升不进名牌中学,或考大学落榜时最易发生。有的人甚至迷信“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这是自己的“家法”、“权力”。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是父母自己不顺心,迁怒于子女,寻机在子女身上发泄。这种封建的教育方式,孩子还小时,会造成性格古怪,大了以后,就会反抗,造成两代人感情破裂,家庭不和。

父母爱子女,祖父母爱孙子孙女,但爱的方式不同,具体内容不同,教育孩子的观念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在怎样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孩子的父母之间、父母和祖父母之间,常各有各的主见。父亲严格要求,母亲会背后给孩子降低条件;父母管教孩子,祖父母会提出抗议。道理各方面可能都有一点,同时又都会有片面性,但这种“教”出多“门”,既会使孩子无所适从,又会使孩子察颜观色寻找靠山。其结果,总是把必要的“教”化为不正

确的爱。在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或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家
长,又往往会有偏爱,不公平地对待孩子。这是在挑起子女间的
矛盾,制造家庭矛盾。有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还喜欢
分工扮“白脸”和“红脸”:父亲发一通脾气,母亲再出来抚慰一
番。这对懂事的孩子往往收不到效果,不太懂事的孩子也不见
得能真正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总之,父母、祖父母都有教育
新一代的责任,具体方法可以不一样,但是都应当把理智与感情
统一起来,并且形成“统一战线”,做到步调一致。如果一个“补
台”,一个“拆台”,是绝对教育不好孩子的。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有自己的特点。各
个家庭也不一样,有完全型的家庭,也有非完全型的家庭;有大
家庭,也有小家庭;有多子女的家庭,还有许多独生子女的家庭。
这些不同类型的家庭,由于环境条件不同,如城市或农村,知识
分子家庭、干部家庭、工农家庭,等等,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又或
多或少地各有其特殊性。

为了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职能,很有必要研究家庭教育的
规律和方法,也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类型家庭教育的特
殊性及其方法。

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基本途径

在今天,教育职能在家庭的各种职能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
地位。家庭教育,也是整个社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
高社会的人口素质、提高各类学校的教育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对于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巩固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后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教育,是一家一户的
大事,也是全社会的大事,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此,全社会

都应当重视家庭教育,关心家庭教育,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就目前来说,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和探讨。

一、“家庭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教师和学校领导。就一个家庭来说,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家庭教师兼校长——孩子的父母。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今天应当说,家庭的教育职能没有真正发挥,没有教育好子女,父母就没有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也没有尽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只养不教,就是不合格的父母,有愧于为人父母的光荣称号。

要教育好子女,父母自己先要受教育,要在如何教育子女这门学科上取得好成绩,至少要取得及格的分。前面已经提到,家庭教育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十分复杂,为人父母者自然不可能样样精通,但至少应当学一点教育学,学一点儿童生理学和儿童心理学。当然,更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这些问题,在组织家庭、进行家庭的“物质建设”时,就应该同时考虑,不妨把用于婚礼、婚宴的大笔钞票拿出一部分来,当作家庭教育的投资。青年朋友在动脑筋进行家庭物质建设的过程中,也应该为未来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动点脑筋,学习一些基本的入门知识。家庭建设也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即抓几大件的“物质文明,又抓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精神文明,这才可能有家庭的幸福和美满。

现在,总的说来,对子女教育的问题是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但是,也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父母认为,旧社会是“养儿防老”,现在退休有劳保,不倒贴儿子就已经很好,用不到靠子女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子女大了都是社会的,做父母的用不着多操心。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教育子

女,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社会。自己既是社会的一员,在为全社会劳动,就应当同时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至于老了在经济上不必靠子女,在精神上却和子女保持着特殊关系,因而有责任把自己承担的家庭教师义务善始善终地进行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放开眼界,想到子女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也有些做父母的,因为工作忙,顾不得子女的教育;更有的人认为自己家庭条件好,子女的前途有保证,也用不着多费心教育。前一种情况可以理解,但一旦放松子女教育,就难免闹出家庭问题。有些为国家和人民费尽心血的同志,家中却有不肖子,所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家庭的不肖子。其实,工作再忙,也总有一定的时间在家庭生活,和子女相处,也就应当以对待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用一点时间好好抓抓子女的教育。至于家庭条件好,那只是一种条件。如果放松教育,好的条件也会变为不好的条件。再说,社会上各种腐朽势力也会千方百计地钻进条件好的家庭中去,起破坏作用。有的犯罪少年正是生于条件好的家庭,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引起警醒。

二、全社会都应当关心家庭教育,支持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既然是涉及全社会的大事,全社会就都有责任关心家庭教育,支持家庭教育。

第一,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和完善各级学校,不但能使适龄儿童都入学,而且尽可能使学龄前的儿童进托儿所、幼儿园,使儿童们及早受到系统的教育。这样,家庭教育的负担减轻了,父母们既可以上班时解除后顾之忧,努力工作,又可以在下班后以较多的时间更好地教育子女,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不但要教育好儿童,还应当做父母们

的教师和顾问,对家庭教育进行必要的指导。

第二,抓计划生育的机构,不但要宣传少生、优生,也要深入宣传优教的重要性。优生,要靠优教来保证。不然的话,优生的婴儿,就会像健壮的树苗一样,虽然可爱,却会因缺乏雨露、肥料而枯萎,不能长成栋梁之材。

第三,文化、宣传、出版部门,应当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教材,多出有益于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好电影、电视、戏剧和书籍、报刊,还要多出一些指导家庭教育的好影剧和好书报。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一户的独立作战,没有文化、宣传、出版部门的支持,家庭教育就会像无米之炊,不论怎样有本领的家长,也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家庭教育才能。

第四,开辟尽可能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活动场所,开展尽可能丰富的活动内容。公园、体育场所应当更多地开展吸引儿童的活动,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要多为儿童及家庭教育提供方便。

第五,广泛开展各种有益于儿童和少年全面发展的竞赛观摩活动。电视上的智力竞赛,报刊上的各种自学考试和各类征文比赛,以及一些儿童少年的歌唱、绘画、音乐舞蹈、书法竞赛活动,深受儿童少年和广大家长的欢迎,应当开展得更广泛、多样和经常化。

总之,全社会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进行更全面的指导。

三、加强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

建国三十多年来,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工作却做得不够充分。儿童心理学、生理学出版过一些,但还主要限于教育、医疗卫生部门流传,还很不普及。家庭教育学的专著,至今还没有出版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科研空白点。

对于这个问题,有关教育机构和学校应当研究,写几本通俗易懂而又切合实际的家庭教育学。不但要写一般家庭教育学,也要研究特殊家庭的家庭教育问题。完全型家庭与不完全型家庭、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独生子女的家庭、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与工农家庭,在教育上都各有其特殊性,值得深入研究指导。

现在,正在开展“五好家庭”活动,“五好”中的一好就是教育子女。对子女教育确有成绩者不但要表扬,还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和专业研究者一起写出一批好的家庭教育学以及各种必要的指导读物来。

(本文收入《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多让孩子吃点精神钙片

独生子女有很多优越性。他们能独享父爱和母爱。享受的爱比人多是大好事,但是太多了有时也未必都是好事。

独生子女经受的风霜少,可谓有“温室效应”。

独生子女从小坐童车,走路比较少,可谓有“童车效应”。

独生子女大部分时间同大人在一起,难得与儿童在一起,可谓有“大人效应”。

独生子女假若进托儿所、幼儿园,又多与女性接触,接受女性教育,可谓有“女性效应”(当然是传统女性)。

温室效应、童车效应、大人效应、女性效应加起来,带给孩子的是一个“软”字。软得生活不能处理,软得不敢见义勇为,软得一遇困难就哭,就自杀。精神上的软骨病是许多孩子的流行病。

精神上的软骨病是同人类社会化这一大趋势相悖的。随着商品流通半径的延长,全球化成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际交往愈来愈广泛、复杂。可是,各种效应的结果是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是关在小而又小的三口之家当中。再加上都市化带来的独套居住模式,独生子女就被关得更严了。再加上家庭设施的电气化、电子化,似乎更加可以“万事不求人”,换句话说,更有条件把家门关得严而又严了。这样,孩

子一踏进社会,就越发显得软骨病严重了。

针对孩子的精神软骨症,我主张多给孩子吃些精神钙片。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至理名言,也是能够同当前的实际情况挂起钩来的。

为了提高孩子骨头的硬度,我们必须给孩子吃“劳动牌”的钙片。一是要让孩子多从事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二是要让孩子多从事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在这方面,也要形成制度,规定时间,养成习惯,不要受功课繁忙的干扰。做父母的,在孩子劳动问题上要保持一致。

为了提高孩子骨头的硬度,我们必须给孩子吃“饥饿牌”的钙片。饥饿对孩子身体不利,营养不良对孩子身体不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营养过剩。孩子的肥胖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尝尝饥饿的滋味尤为必要。当然,这不是要故意演饥饿戏,而是要学会利用时机。比方说,为父母的,在工作忙的时候,不要为了孩子的一顿美餐而加班加点;为父母的,不要为孩子偶尔吃不上热饭而焦急万分,更不要把孩子吃不上饭视为父母的罪过。

为了提高孩子骨头的硬度,我们必须给孩子吃“苦心牌”的钙片。孩子们也是会碰到烦心的事。大人应该为孩子排忧解难。可是,有时候对孩子的痛苦、忧愁,需要分分类,排排队,哪些痛苦需要立即全力帮他们排解,哪些痛苦可以慢一点帮他们排解,哪些痛苦不需要立即全力帮他们排解,有意识地让孩子苦上一阵子,让孩子在苦了一阵子以后慢慢学会独立地排解痛苦。做大人的,如果要帮孩子,也只需要点拨,不必包办代替。这样有助于孩子提高对痛苦的承受力。要知道:从小一帆风顺,是许

多让孩子吃点精神钙片—————

多大孩子一遇挫折就受不了,甚至自杀的缘故。

苦与乐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为了让孩子在成人之后能够化苦为乐,就要让孩子趁早过一点乐中有苦的生活。现在有些国家搞“乡村留学”,搞“挫折教育”、“逆境教育”,其目的也无非是提高孩子“骨头”的硬度。鲁迅讲,孤儿最勇敢。意思是说,幼时少了父爱、母爱的,大了可能无所畏惧。让孩子吃点苦,仿佛是“虐”,实则是似虐之爱,是爱的艺术。

(原载《民主》,1994年第5期)

社会主义家庭伦理的特点

“能当好厂长,当不好家长”;“能说服单位里的群众,说服不了自己的子女”,这类“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原因在哪里?原因之一是这些厂长、领导没有掌握家庭道德,尤其是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特点。家庭道德,或者说家庭伦理,主要是指处理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由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同于工厂中的干群关系、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因此,家庭伦理就有其特殊性。比如说,选择性少,不便取优去劣;平均性大,干多干少一个样。家庭成员间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作为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特殊性。对此,很需要做一番探讨。

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处理家庭内部的关系上,提倡用节制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来体现和达到对家庭成员的爱。夫妻之间要互爱,父母对子女要慈爱,子女对父母要敬爱。这与资本主义家庭内部的父虞子诈,夫虞妻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社会主义家庭道德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在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用节制和牺牲家庭利益的原则,来体现对集体、对国家的爱。这是与封建主义家庭道德相区别的。封建主义家庭内

社会主义家庭伦理的特点——

部尽管矛盾重重,但在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能在“血统”二字蛊惑下封妻荫子,“一致对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家庭,为了整体利益,提倡必要时大义灭亲。马克思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页)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这一特点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劳动者家庭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由家庭转向社会,家庭的观念也迟早要由私转向公。

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在境界上是多层次的,在道德水平上是容许不一的。这是它区别于完全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又一特点。在婚姻关系上,社会主义提倡不讲金钱,不讲门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相爱的方面不断扩大,相爱的方式不断更新,相爱的程度不断加深,是家庭道德的高境界。但是,也容许有些人在感情确实破裂时离婚,容许有些人既讲爱情,又讲物质。不过我们认为这是低境界。在夫妻关系上,白头偕老,保持贞操,是高境界。《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梁三喜主动送给妻子“未来的丈夫”一件大衣作礼物,是对家庭伦理的突破,也是高境界。那些仅仅因为对象婚前失身,就不管她是否改正,而无情抛弃的做法,是低境界。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提倡平等。现在有的国家法律规定父母不许打孩子。我们虽不把它写进法律条文,但认为父母打孩子是道德的低境界,是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无能的表现。成年子女在对年老父母的态度上,不赡养是不道德的,只在物质上赡养也只能是道德的低境界。既在物质上赡养,又在精神上安慰,才是道德的高境界。廖承志同志“无论工作怎样忙,他总是每天要抽一定时间在老母面前慰问有加”,像天真赤子那样,为老母磨墨洗笔,是家庭道德的楷模。

家庭道德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既有稳定性,又有可变

性。新的家庭道德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新道德在形成过程中会遇到旧道德的顽强抵抗。我们相信,开展对家庭伦理的研究和宣传,将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外在舆论优势,产生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从而自觉抵制封建道德残余和资产阶级道德的侵袭,制止不道德,变道德的低境界为高境界,逐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文明度。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11月16日)

略论“家规”

家规与国法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家规，难以理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千家万户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正因为它是“基本”，就不应当要求它“详尽”。“基本”者，起码也。婚姻法是对家庭成员的起码要求，而不是高标准的要求。如果人们只是以不违反婚姻法来处理家庭问题，那么，这种守法之家虽不算太坏，但也决不会很好，说不定连好也算不上。因此，我们为了提高中国的家庭质量，还必须随着婚姻法的日益深入人心，紧接着就提出制定家规的问题。

家规不是法，没有婚姻法那样的法律效力。人们犯了家规，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但是，家规可以向家庭成员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家庭成员犯了家规也应受到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是“硬件”，规是“软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架计算机的两大部分。家规执行得好，国法也一定执行得好，犯法的人一定少；同样的，只有严守国法的人，才有可能自觉执行家规。

从人群来讲，犯法的是极少数，犯规的则可能不少。换句话说，受婚姻法制裁的人是极少的，违反家规的人则可能不是极个

别人。现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为法院所不愿受理的家庭纠纷。清官难断家务事。对没触犯法律的纠纷,不予受理是对的。但是,家务事总得有人“断”;要断,又总得有个凭据“断”。有了凭据才会有人勇于出面断,才会促进人们做出比“清官”还“清”的事来。那么,凭据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只能是“家规”。

家规的威力不只是用在家庭发生了纠纷以后,更主要的是用在家庭发生纠纷之前,就是说家规可以避免或减少家庭发生纠纷,增进家庭的和睦。现在,在巴西,政府规定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要学习两个星期的家庭学课程,即受两个星期的家规教育。受训期间每天上六七小时课。对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亲友关系、子女关系以及日常生活、卫生习惯等问题都要学习。集训完毕,还要考试;考核及格,取得证书,才能办理结婚登记。否则不能成家。如果没有取得家庭学的及格证书,婚后出生的孩子不被法律承认。孩子的读书、工作、继承遗产都要发生问题。巴西的青年人由于婚前接受家规教育,因此,婚后比较和睦,家庭纠纷较少。仅仅是婚前学那么两个星期的家规,收效就那么大;假若婚后还能继续坚持学下去,家庭的状况将会怎样?还有,巴西的那个家庭学,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是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家规尚有如此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家规将会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不容低估的。

制定家规的原则

一、正确处理统一与分散的关系。家庭人口有多有少,家庭规模有大有小,家庭结构有松有紧,家庭关系有亲有疏,至于说家庭的经济、文化、政治状况,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家规由各家自己制定,比较切实可行。但是,一国之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

的要求,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原则要求。不然,各家的家规高低悬殊太大,相互牵制,力量抵消,既不利于高尚家风的形成,也不利于文明国风的发展。把少数先进家庭的家规向社会推荐,就可以变成全社会的家规。自上而下制定家规与自下而上制定家规是一致的。

二、正确处理现状与未来的关系。家规的制定一定要从家庭的现状出发,要把家庭的质量从现有的水平上提高一步。不从家庭现状出发,就容易脱离实际,使人接受不了,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但是,如果只着眼于现状,不放眼看我们改革家庭的长远目标,那也会使得家规的规矩不当,要求不高,方向不明,步子不大。只有把正视现状与放眼未来结合起来,才能使家规建立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家规的低限应当是高于法律,家规的高限应当是少数先进家庭已经达到的高度。这样,处于一般水平上的大多数家庭,才会学习有榜样,提高有信心。

三、正确处理民族传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中国的传统与发达国家的现状差距是很大的。对这个差距应当怎么看,是个大问题。看来,对人对己都得一分为二。我们的民族强调从一而终,家庭关系比较稳固。新婚姻法规定兄、姊对弟、妹有抚养义务。这一点在别国是另一回事。在一些发达国家,不用说兄、姊不抚养弟、妹,就是父母对子女也大多只抚养到成年或半成年,如上中学后就不抚养了。还有夫妻之间,我们提倡白头偕老,可是,西方搞什么“性革命”,他们的性关系已经相当混乱。我国的新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可是,这一条在有的国家已经名存实亡,有的连“名”也不要了。我们在拟定家规时,不能不参考历史和外国的做法。我们民族的传统是优秀的,但也杂有封建主义的因素。外国的家庭现状有

的是外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但也有资本主义精神堕落的一面。在我国的传统中,哪些是封建主义的?在外国的做法中,哪些是资本主义的?这是需要花点功夫理一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的特色,在家规中应当得到充分反映。

四、正确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在讨论了上述三个问题之后,必然要归结到的一点,也是社会主义家规与封建主义的“朱子家训”,与资本主义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所不同的地方。我们认为,中国的家庭无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由家庭组成,家庭受社会支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家庭是不存在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要在各家各户打下烙印。因此,我们的家规应提倡从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出发,应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服务。这是家规的关键之所在。舍此,一切都是次要的。当然,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也是为千家万户谋福利的,这是事情的另一面。我们说,家规要体现社会主义特色,也就是要处理好一家与千家的关系。在一家为千家的同时,千家也在为一家,这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家规应当回答的问题

家规就是家庭生活的准则。家规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换句话说,家规应当回答并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家庭是按血缘和姻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无不有血缘或姻缘关系。领养来的人,也是家庭成员,虽无血缘关系,但有类血缘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时,首先要碰到的是如何看待血缘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早年,曾有一个血缘家

庭阶段。所谓血缘家庭实际上是一种不懂血缘关系、不讲血缘关系的家庭。在性关系上,既无长幼之分,又无血缘亲疏之别。这种血缘家庭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无知的表现,是蒙昧的标志。随着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的提高,人类身上的兽性渐渐减少,人类身上的社会性渐渐增多。血缘家庭开始消亡。血缘家庭的消亡,是人类懂得血缘的表现。尤其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一夫一妻制,血缘关系开始受到重视。封建社会是讲究血缘关系的顶点。他们强调从一而终,强调私有财产只能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可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的社会性又有了极大提高。现在血缘关系开始有淡化的苗头。淡化的趋势在由远及近地展开。现在,近亲变远亲,远亲变无亲。西方有些官宦子弟、有些富家儿也不肯向父母伸手,而靠国家贷款读中学。在我国青年心目中,血缘观念也在淡薄。血缘观念的淡化是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上升。针对血缘观念的现状,我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一方面要照顾人们还残存的血缘观念,注意血缘的亲疏和辈份的高低;另一方面更应该强调:人不是家庭的私有物。人是社会的财富。大家都是同志,应平等相处。要像尊师爱生那样,尊长爱幼。要有母爱,但不溺爱;要有子孝,但不做子“奴”。

二、如何对待家产?家庭是按血缘(包括姻缘)组织起来的经济单位。没有经济联系,就不成其为家庭,即使血缘关系很近,也不是一家人。近几十年来,家庭的经济职能在削弱。在许多国家,家庭已不再是生产单位。在我国城乡,家庭已基本上不是生产单位。但是,家庭依然是消费单位。在家庭中如何科学地安排消费,在消费中如何讲究经济效果,这都是大有文章好做的。至今家庭成员还习惯于把各自在社会上所得的劳动报酬,

交给家庭统一安排。一般说,同一家庭的成员的消费水平大体一样。家庭内部搞点平均主义,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有时也要有点差别,可以因各人的收入不同而不同。一家之内在经济利益上的计较程度,远没有在家庭与家庭之间计较得厉害,但是,计较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因此,在家里,仍然应该提倡先人后己,应该发扬“孔融让梨”的风格。

三、如何对待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分两类:一类是生产劳动。上面讲,家庭不是生产单位,这是从总体上讲的,是同从前的家庭作坊相比较而言的。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务劳动仍是生产劳动的继续和补充。这种生产性的家务劳动,既生产生产资料(如农民把自留竹卖出去做锄头柄),又生产消费资料(如加工食品,缝补衣服等)。不用说,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是极少的,生产消费资料的劳动是大量的。另一类是服务性劳动。人们用于这一部分劳动的时间比前一类多得多。这种服务性劳动有些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继续,是种的繁衍的必需,如带孩子等等。无论是家中的生产劳动也好,还是家中的服务性劳动也好,都是不计报酬的。这是家务劳动的特点和优点。可是,由于家外计报酬,因此,家内的这种不计报酬形式便使其极端脆弱。家务劳动之不均,有时也会带来家庭不和睦。在没有实现家庭生活的自动化、现代化之前,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比较繁重。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务劳动中要争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四、如何处理社交活动? 公民都有社交自由。对正当的社交活动无论是父母或是配偶都不应阻挠。社交的广泛性是由生产的社会分工决定的,胡乱猜测和限制配偶的社交活动往往是引起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的重要原因。嫉妒和吃醋是私有制的变形,是私有观念在夫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嫉妒和吃醋终将随

着私有观念的破灭而破灭。但是,正当的社交活动必须是公开的。对同志不应回避,对配偶更不应躲开,不仅如此,还应当主动同配偶商量、打招呼。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社交活动就难免引起配偶生疑。当然,如果一旦发现配偶有不正当的社交活动,可以进行批评帮助,加以疏导,不必大动肝火,以致助长配偶感情的进一步转移,加剧夫妻感情的破裂。

随着家规的普及,中国的家庭质量必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家庭学理论也必将大大提高。试看中国之家庭,必是高度文明之乐园!

(原载《理论探讨》,1982年第1期)

科学在向家庭观挑战

美德的美与不美

五年前，我在云南傣家做客。听说小房东同妻子本是相亲相爱，几天前，却因为妻子没能很好招待他的男朋友，便决然离婚，宁要朋友不要妻子。我对此表示惋惜。小房东却笑着说：“你对我们不吵不闹就离婚，感到奇怪；我对你们汉人夫妻大吵大闹还不离婚，也感到奇怪。”

小房东的一席话勾我回想起一名古希腊的名言：“如果将这一地方认为神圣与道德的风俗一一列出来，然后又从这里面将别处认为是猥亵行为和不道德的风俗一一抽出去，其所剩必等于零。”

不是吗，咱们这里见面问名字，换名片，是常有的。被问者如果不讲名字，则认为是不道德的。可是生活在南美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从不肯把名字告诉陌生人。他要么是答非所问地告诉你住处，倘若你继续追问，他就认为你不懂道德。苏丹有个部落，他如果听到谁讲出他母亲或姐妹的名字，他就会骂你不道德。

还有年龄，这是爹妈决定的，自己改不了。在咱们这里见面

问年龄是亲热,可是,现在在美国,你如果问年龄,尤其是问妇女的年龄,却是不道德的。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出嫁是喜事,要笑。可是有的地方出嫁一定要哭。坦桑尼亚的哈亚人认为出嫁时大哭是美德。她们出嫁时一个劲地往眼里涂刺激物,使其泪如泉涌……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严守“朋友之妻不可戏”。可是,我国有的民族过去盛行借妻给客人。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民族认为借妻予友是美德。现在美国有些大学生也喜欢借妻予友。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抢婚犯罪。可是,有些地方成婚一定要抢。不抢,不足以表达所爱之切。不抢就是不道德。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多妻是犯法的。可是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可以多妻。东南亚有的国家,现在规定多妻的数量限额。不超过限额就是美德。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视婚前为处女是美德,不是处女就是失身,不道德。可是,现在北非贝尔人瞧不起处女,认为处女没本事。

再比如,在咱们这里尽管一再提倡后父、后娘处理好同非亲生子女的关系为美德,总有不少人处理不好。可是有些民族,后父对待妻子婚前与别人所生的孩子比对待自己的孩子更好,根本不需要说服教育。原因是没有这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夫妻。这孩子是妻子有生育力的象征。

还有打孩子,有的国家,像瑞典,规定打孩子是犯法的。可是,在咱们这里,如果认为打孩子犯法,不知会有多少万人进病房。

诸如此类,都说明道德的相对性。也许有人说,上面列举的道德差异有先进、落后之分,并非你好我好大家好。是的,此处

与彼处空间上的差异，也意味着此时与彼时进化的程度高低，“后人视今，犹如今人之视昔”。试问：我们今天认为是美德的，就完美了吗？就不变了吗？后人会怎样评论咱们今天的美德呢？

科学是道德的催生婆

道德观会变是无疑的。问题是：推动道德变化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不论绕多少弯，九九归一是生产力，是科学技术。

人类家庭的第一阶段是血亲家庭。在那个阶段，一切男子属于一切女子，一切女子属于一切男子。可是从现代猿母子不交媾这一点可以推断：那时已排除了亲母与亲子的乱伦。当时，虽说谁也不懂道德为何物，但对那种不分长幼亲疏的任意交媾，一定认为正常，也就是说，合乎道德。这样一个道德观念在人类史上大约保持了一百多万年。

到距今 170 万年的时候，人们懂得了用火。用火，是人类技术史上的第一次能源革命。现在打火机生火，不用吹灰之力。可是，对一百多万年前的类来说，要掌握用火的本领，比现在考博士还难，非花毕生的精力不可。于是，老少之间在用火上就有了技术高低之差。老少在生产上的自然分工，带来了人类在婚姻上的上下辈之别，从而把血亲家庭推进为血缘家庭。在血缘家庭阶段，父母辈与子女辈不能通婚。换句话说，兄妹成婚是允许的。人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兄妹成婚的传说？这不是谁的臆造。这是历史的折光。马克思曾针对人类史上不存在兄妹成婚的错误观点，指出：“在原始时代，兄妹曾经是夫妻，而这是合乎道德的。”因此，我们可以通俗地讲，兄妹成婚的新道德是人类的祖先用烈火炼出来的；父女成婚的旧道德是人类的祖先放火烧

掉的。

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前，人类从使用天然野火进化到人工造火。会造火，人类活动的领域广多了。于是，原来出于跟自然界斗争的需要所结成的原始群，渐渐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始群，从此，不仅排除了上下辈间的通婚，而且排除了同辈的兄妹通婚，进而演化为两个母亲集团间互相通婚。生活在这种家庭制度下的人认为，兄妹成婚是不道德的，而两个母亲集团间的血缘内婚是道德的。因此，我们又可以通俗地说：兄妹成婚的旧道德是人类祖先用自己所造的火烧掉的；血缘内婚的新道德是人类祖先用自己所造的火烧出来的。

以上都是范围从大到小的族内群婚制。大约在两万八千年前，原始弓箭出现了，人类跟自然界斗争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血缘社会中的母亲集团有条件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再加上，人类朦胧地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害处。于是，族内婚变为族外婚，即从伙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人在一段时间内虽说只可以同一个人成婚，但离婚方便，在一生中仍可以同许多人成婚。生活在对偶婚制中的人认为，群婚不道德，内婚不道德；而朝秦暮楚、见异思迁为道德。因此，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通俗地说：群婚制的旧道德是人类祖先用弓箭射掉的，偶婚制的朝三暮四、喜新厌旧的新道德是用弓箭射出来的。

一直到几千年前，人类发明了金属，这是技术史上的第一次材料革命。新材料的出现，改进了生产工具，丰富了物质生活，改变了男子在家中的地位。家中的消费品一多，就有个贮藏问题。那么，由谁来管仓库呢？当然是由伴侣固定看管好。消费品再一增多，又出来一个死后由谁继承的问题。当然是身边的子女好。这两点为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提出了要求。而男子地位

的提高,又为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父亲夺了母亲的权。做父亲的有能力要求妻子从一而终,做一名终身“仓库保管员”、“炊事员”;同时,也有能力要求妻子专为自己生孩子,而不为别人生孩子,从而保证继承权不会转移。因此,我们又可以通俗地讲:个体婚是人类祖先用金属换来的。生活在这种家庭里的人认为从一而终是道德,认为男女授受不亲、通奸和离婚是不道德的。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家庭制度、道德观念的催生婆。

那么,道德是不是一定会成为顺产儿?未必。道德往往是难产的。因为,道德同科学技术相比,有较大的惯性,有较强的保守性。

科学在加速度发展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在加速度发展。远的不说,单单是跟家庭道德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够快了。

半个世纪以前,人们还不太会贮存精子。那时,美国的生理学家为解决有些妇女的丈夫不育的苦闷,允许妇女们在丈夫陪同下,去偷偷摸摸地购买第三者在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前流出的精子。购买者同出售者是不见面的。随着对精子的深入研究,“精子银行”的水平正迈向新的水平。美、日遗传学家谈到:现在出售精子是一件可以引为自豪的事,是优者的标志;加之,可以把精子冷冻贮藏几十年,因此,不仅有条件在人活着时,择优留下精子,而且有条件“在他死后数十年,对他的性格、健康,特别是对他的业绩进行客观的判断后,从中优选精子进行人工授精”([美]H.J. 缪勒)。有人甚至进一步提出要留下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的精子,对此,有人提出异议:精子只能传递仪表、健康等性状,不能传递学识。因此,只应择健康、美貌之优,不宜择文化知识之优。再说,精子面过窄,变成近亲繁殖也不好。反对尽管是反对,既然精子已可贮藏,就必然引出一系列问题:天真的少女,会不会出于对死去的英雄的崇拜,用死者的精子生孩子?人们还担心:长此以往,普天下的孩子岂不会变得只见其母、不见其父?母系社会的孩子不知父,但孩子的妈妈还是有可能知夫的。现在,连孩子的妈妈也没见过夫了。丈夫、父亲成了偶像了。可怕吗?

还有避孕问题。本世纪20年代,美国一位名叫山额的护士,在穷人中宣传避孕。不料,在开放的美国,很多人认为她不道德。法院竟判了她五年刑,罚了她的款。后因学者们上书总统威尔逊,才得以获释。最终,还是被美国驱逐。她逃往日本。日本有人认为她不道德,不许她上岸。可是,如今避孕不仅是道德的,而且还给予物质奖励。这远非山额始料所及。可是,避孕的发展又带来些新问题。随着性交与生育的分开,接着出现了性关系与婚姻的分开,接着又提高了无婚姻性交的比例,接着又增加了无生育的婚姻的数量。这在国外,方兴未艾。生孩子是痛苦的。不想生孩子又想育孩子,怎么办?“子宫出租”,“借腹生子”,“婴儿饲养场”就应运而生。老板雇佣一些体壮貌美的女郎,专门生孩子,而一些不愿生孩子而愿育孩子的妇女便叫丈夫带着钱去借肚子。因此,在美国,有人认为:“婚姻不再是为产生继承人的经济结合,而是基于爱与欲的结合。婚姻的性质变了。”现在,许多国家在讨论家庭、婚姻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从美国现有270万男女未办结婚手续而公开组成家庭这一情况出发,从存在的同性恋出发,要求修改传统的家庭定义。

科学在加速度前进,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必须加速度前进,不然,就会成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随着高度物质文明而来的一定是高度的精神文明。——也许人们对什么是精神文明尚有争论。

鲁迅曾这样形容从前的道德规范:“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恩格斯对未来的性道德也作过一番设想:“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白天或黑夜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

(原载《未来研究》,1982年第1期)

民主之家

我已结婚二十五年了。孩子也已经成为一家大报的小记者了。在庆贺银婚的日子里,不少友人称我家为和睦之家、温馨之家。不过,“民主之家”才是我家的主要特点。家庭民主是家庭和睦的动因和保证。

家庭民主的方面很多,其中一点是表现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

给孩子以自主权。我们夫妻俩对我们唯一的女儿的教育是严格的。尤其是我妻子对女儿的教育更为严格。但我们对女儿又是很尊重的。1980年春节,远在郑州的祖母想叫孙女来身边。我们做儿子、媳妇的,也想去看望老人。可是,哪有时间呢?就是有一两天时间,哪有那个路费呢?于是,我出了个点子:让女儿一人坐飞机去看奶奶,半价,只要25元就可以从上海飞到郑州。然而,我爱人不放心,怕11岁的女儿出事。在教育子女方面,我们做父母的,意见一般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一致,因此女儿在回答“爸爸好?妈妈好?”时,总是说:爸爸妈妈一样好。这次我俩不一致了,女儿也就无所适从。怎么办?她提出抓阄。这一下,全家乐开了。大家静静地等着她抓,她乐不可支地抓了一个,打开一看:“飞”。这时,我妻子想利用她的权威地位,推翻

刚才的决定,但是,又觉得在孩子面前不能说话不算数,便同意了。女儿在飞机上备受爱护,尝到了人间的温暖。

给孩子以批评权。一般说,批评是父母的专利。可是,我们早就把批评权交给了孩子。大约是在1979年,我们过了次家庭民主生活会。我们的民主生活会不仅不搞变相斗争,而且也不按一般方式进行。我们商定,每人都可以对另外两人进行批评,但是,这批评只能是一个字。用一个字概括别人的主要缺点,写好后放在被批评者的面前。不大一会儿,每人面前摆上两片纸,批评的内容在下面。大家同时打开。令人信服的是,每人面前的两个字是一样的,说明看法一致。在我面前的两个字是:懒。我检讨了家务活干得少。我夫人面前的两个字是:凶。她检讨了态度生硬。在女儿面前的两个字是:娇。她也检讨了自己的娇气。别开生面的民主生活会后,各人都有一定的改进。

给孩子以监督权。我家用硬纸板做了好几块“黄牌”。当三人中有谁说话、办事不当时,别人可以口头制止,也可以举黄牌警告。记得有次我在家同客人讲话时发火。女儿就站在只有我能看见,而客人看不到的位置,向我举起“学会控制自己”那张黄牌。我马上有所收敛。

我们家就是这样寓教于乐的。教也民主,乐也民主。乐哉民主!

1993年2月9日

(原载《人民政协报》,1983年2月20日)

泛论婚礼

婚礼，人们见过，许多人经历过，有什么好论的呢？在婚礼问题上，值得议论的地方很多。如果设一门“婚礼学”也无不可。本文的题目曾想写成《论婚礼学》，只是担心笔者自己说不出多少学问，才省去“学”字的，但“论”字仍想保留。

婚礼的起源

自人猿分野后，人类就有婚媾现象。那时有没有婚礼呢？没有。在175万年前的血亲家庭阶段，没人行婚礼；在50万年前的血缘家庭阶段，没人行婚礼；在30万年前的血族家庭阶段，也没人行婚礼。那时候，一群男子属于一群女子，一群女子属于一群男子。只是到对偶婚的末期、个体婚的初期，才出现婚礼。

婚礼意味着对夫妻关系的重视，显示了从一而终的决心。我国古代周文王结婚的礼仪就很隆重。他跑很多路到渭水去迎亲，以示敬重。婚礼的产生本是一个进步。婚礼是个体婚的伴生物，而个体婚又是私有制的伴生物，而私有制则是人类“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恩格斯语）。因此，婚礼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俗语说：“三王不同俗，五帝不共乐。”古代的婚礼同今天的

婚礼,已有很大差别。原始的婚礼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人们会脸红。不过,还是把话说透为好。说透了,可以启发人们不要把今日时髦的婚礼凝固化,不要都照一个模式套。

先说举行婚礼时要请客的起源。恩格斯说:“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人类的祖先为什么要这样不给后人留面子?原因是:这般婚礼是由群婚制向个体婚过渡的必经之道。这反映了个体婚在萌芽时对群婚制所作的妥协和让步,也反映了群婚制向个体婚索取的代价。

再说送礼。送礼起源于“嫁娶取傼皮之俗”(《淮南子》),起源于“聘则为妻”,起源于“无币不相见”,一句话,起源于买卖婚姻。买卖是很难听的。从周朝起,给“买卖”起了个雅号,叫纳征。过去人们行婚礼时,喜欢在门上贴“六礼告成”四个大字,意思是六道手续齐备。哪六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这六礼,据《吉昏礼》上讲,纳采(择偶)用雁,问名(通报姓名)用雁,纳吉(问卜)用雁,请期(迎娶的吉日)用雁,亲迎用雁。用雁,就是说要送家禽。六礼之中有五个要送东西,那么第四个纳征礼,要不要送?也要。不过不是送实物,而是送货币。婚礼演化到今天,不管礼物如何时髦,都无非是“雁”的变种。送保温瓶,那是送不会飞的“雁”;送台灯,那是送会发光的“雁”。

对剥削阶级把人身当商品这样的婚姻,傅立叶说,那是“两个卖淫则构成一对美德”。对他们的婚礼,鲁迅说,这是专一卖淫的广告。

制约婚礼的因素

社会形态的影响。尽管在不同社会形态下有大体一样的婚礼,尽管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有千差万别的婚礼,但是,就其主流看,婚礼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比方说抢婚,主要存在于“向个体婚过渡”的时期。恩格斯说:“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页)这是对偶婚的迹象。再往后,真抢变成了假抢。我国瑶族,男方于婚期之夜,派出十来位大汉,闯入女家。男方见了女方的人,开口就骂。女方立即对骂。然后,双方喝酒格斗。新郎趁乱抢走新娘。女方佯装追赶,追至婿家,杀牛祭祖,双方聚歌畅饮。他们以抢为吉,说什么不抢不得偕老。因此,从真抢到假抢,标志着婚姻制度的变化。真抢,表明在由母权到父权的转化中,母权在挣扎;假抢,表明在由群婚向个体婚的转化中,群婚制在顽抗。

政治的因素。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那婚礼呢?不消说也是政治的礼炮。文成公主的婚礼规模相当大。在她的嫁妆中不仅有家具器皿、珠宝首饰、绫罗彩缎,而且还有书籍、药物、谷种、蚕种,此外,还有乐队、工匠。带前边那些东西,容易理解,带后头这些干什么?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传播经济、文化,即服从于一种政治目的。

经济的因素。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婚姻时说:“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

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5页,下同)接着,恩格斯指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这类情况,今天依然存在。日本最近公布一个材料,说日本有的地方“新娘价格”是50万日元,相当于2300美元。委内瑞拉一家报纸1979年报道了犹太人的婚礼,说穷人“在一个普通的小房子里举行婚礼”,富人要“在具有法国风味和音乐环境的豪华大厅里举行婚礼”。穷人在婚礼那天到教堂洗澡,富人在婚礼那天要到婚礼公司用奶油给新娘洗澡。在送礼方面,他们写道:“商人习性在赠送礼品方面也有表现:支票代替了结婚礼品。因此,一个犹太人的婚礼可以说是一次交易。”

文化的因素。一般说来,商人的婚礼重商,文人的婚礼重文。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婚礼就很朴素,嫁妆是两部自行车,家中的摆设也十分简陋。蜚声文坛的契诃夫的婚礼只有四个人参加,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婚前一小时遇到弟弟,也只字不提结婚的事。他严格保密是因为他讨厌达官贵人、亲朋至友满座的庸俗场面。现在,西方有些人在举行婚礼时,以摆出一部新版本的大百科全书而感到光彩。这是耐人寻味的。

宗教的因素。不同的宗教,行不同的婚仪。印度尼西亚农村的伊斯兰教徒,在婚礼上,只要女方陪一部《可兰经》就可以了。在信仰佛教的缅甸,有些人的婚礼则更简单,双方只要住在一块就算合法了。

决定婚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对具体的婚礼来讲,有的因素起的作用大,有的因素起的作用小。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决定一次婚礼的性质、规模和形式。说到底,婚礼既是家庭观的亮相,也是世界观的流露。从一个人的婚礼上,可以看出一

个人在追求什么

婚礼改革的方向

人间的婚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基督教徒喜欢婚礼带金戒指,说是因为黄金耐高温,带了金戒指意味琴瑟和谐。可是,肯尼亚的基西吉斯人举行婚礼时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是一对新人互换草编手镯。生活在陆上的苏丹希莱克部落结婚时,妻子婚前的众多情人要向新郎赠送牛羊;生活在湖上的缅甸依恩特哈族人在女儿出嫁时要陪送一个“水上浮动花园”作嫁妆。既然婚礼是变化的,那么,今天的婚礼就是最文明了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婚礼还会再变。

社会主义国度中的婚礼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婚姻的性质。无产阶级的婚礼要体现无产阶级婚礼的特色。无产阶级婚姻的性质,有人说是从一而终。不对,从一而终是封建婚姻的特点,是为了防止财产旁落而产生的。有人说是婚姻自由。不对,婚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些东西可以继承,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特点。1915年列宁在写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列举出人们对婚姻的十点要求。他说,第八至十点所讲的恋爱自由,那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对无产阶级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点。”第一点是指“在爱情上摆脱物质(钱财)的要求”;第二点是指“摆脱物质上的操心”。列宁的意思很明确,摆脱钱财的要求应该是无产阶级婚姻观的重要内容。

列宁还两次在“摆脱”二字上加了着重号。所谓摆脱,就是推翻。以推翻资产阶级为使命的无产阶级,也包括推翻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这样的家庭中

无聊和金钱是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6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中,一再说资产阶级婚姻同卖淫一样。在这样的家庭中,“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象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这些话都是针针见血的。

一切讨厌“卖淫”二字,甚至看到“卖淫”二字都要闭上眼睛的人们,就更应当自觉地在“摆脱”上下功夫。摆脱物质要求是婚姻改革的方向,也是婚礼改革的方向。婚礼改革是婚姻家庭改革的组成部分,也是婚姻家庭改革不可缺少的一步。

文明是一个历史过程。婚礼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以后,如今又呈现从复杂到简单的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物极必反。盛大的婚礼已成了挥霍的代名词。连一些明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开始注意资产阶级婚礼的弊病。土耳其的议员建议制定法律,禁止结婚送彩礼。斯里兰卡从1980年起,青年结婚时,政府送有关计划生育的书籍作贺礼。巴西青年婚前要学习两个星期的家庭学知识,学了还要考试,考不及格不能登记结婚。国外的这些做法,是发人深思的。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尚且要简化婚礼,以摆脱物质为特色的无产阶级婚礼应该怎样,那还要说吗?我们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的文明度,要全面提高社会主义的文明度。愿中国的年轻人在婚礼上讲究无产阶级文明。

(《本文收入《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婚俗的哲学

对现行的婚俗,老少都不满意。不满意归不满意,实际上还得照那婚俗办。有些年轻人今天还在破口大骂排场越搞越大的婚礼,可是明天就随俗而去了。这不能全怪青年人软弱,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给青年以理论武装,提高他们摆脱旧婚俗的勇气。

旧俗之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它是经过长期重复出现而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虽说这种习惯法不具有法一般的强制力,但是家族、亲朋、邻居是习俗的监督者。他们有时候也会对违俗者采用暴力,至少会给予舆论压力。习俗也常常能成为道德的准绳,成为人们评价善恶的标准。随俗,被看作有德;违俗,被看作缺德。兼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职能,恰是旧俗难破之所在。但是,辩证法也告诉我们:透过习俗的双重职能,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立新俗的重大意义吗?

作为习俗重要组成部分的婚俗,范围很广,包括择偶的范围、择偶的方式、择偶的季节、择偶的权限,以及婚礼的礼仪、礼物等等。这些都不是哪一个人随意决定的。比方说择偶的方式有机遇型的(抽签),有娱乐型的,有考察型的,有商品型的,有开放型的;再比方说婚礼的礼仪,有祝福式的,有驱邪式的,有劝戒式的,有卫生式的,有宗教式的,有取乐式的。所有这些都不是

无缘无故的，都是受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在阶级社会中是受阶级支配的。即使是从神话传说中来的婚俗，归根结蒂，也逃不掉经济关系的影响。同样，今天我们要破旧婚俗，立新婚俗，也不是什么人杜撰的，而是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变了，婚姻的基础变了。原来那种散发着铜钱气味的婚俗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相适应了。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婚俗，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破坏和阻碍作用。不管这种婚俗在历史上起过多么好的作用，一旦不适应了，就势必要淘汰。在经济基础急剧变革时，无视婚俗的改革，把婚俗凝固化，是徒劳的。前些时候，报纸上披露的一些抢亲、换亲、童婚、冥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都是社会上泛起的历史沉渣。

现在有些人不肯抛弃旧婚俗，还因为他们只看到婚俗的神圣性，没看到婚俗的相对性。对某一地区的人来讲，恪守某一种婚俗似乎是极端严格的，不可疏忽的，可是换一个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此处所好者，往往为彼处所忌者。随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变化，这带来婚俗的多样性。俗语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个人有点比较民俗学的知识，就不会坐井观天，死抱着一种婚俗不放，就不会把新婚俗看作伤风败俗。一百年前有些史学者把各种各样的婚俗“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恩格斯语），导致他们理不出个家庭史的线索来。这个悲剧值得记取。今天有些人勒紧裤带大办婚礼，不敢采用新婚俗，也是庸人自扰“扰”出来的。

婚礼也有个螺旋式上升的问题。婚礼变得复杂，是在进入私有制以后，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是一种文明病。在封建社会，官宦人家嫁女，是既陪土地，又陪侍女。1922年溥仪结婚，

单是金银、珠宝、绸缎和各种食品就有 100 抬, 花费了大约两万袋面粉的钱。张勋一人就送了万元厚礼。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妻子成了商品, 婚礼自然成了一场交易。物极必反。现在国外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奢华的婚俗看作社会公害, 看作灾难, 呼吁改革婚礼, 简化婚礼。婚礼在经过了由简到繁的演化以后, 大有由繁到简的趋势。当然, 这里的简是饱和着文化素质的简。简中有欢, 简中有趣。据社会学者调查, 婚礼的规模与文化水平的高低一般成反比。

先进的婚俗能对社会生产力起促进和开拓作用。为了振兴中华, 为了祖国的“四化”, 我们要勇于“脱俗”。列宁把“摆脱金钱”看作无产阶级婚姻的特点。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应该在婚俗中加以体现。

(原载《解放日报》, 1983 年 11 月 2 日)

谈 婚 俗

人类曾经历过一个“无婚姻可言”的漫长阶段,那时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婚礼、婚俗。在有婚礼之初,人们并不把婚礼看得很重。中国古代把婚礼写作“昏”礼,称作“阴礼”。《周礼》等不少书中讲:“昏礼不用乐”,“不行贺”。就是到现在,在我国,有些民族的婚礼仍很简单。贵州布依族姑娘出阁,姑娘自己打着雨伞,步行到男家,没有什么嫁妆。在外国,尼泊尔的婚俗更加别致。他们把妇女同男子成婚而行的婚礼,称作“假婚礼”,因为有可能离婚;把与一棵贝尔树成婚而行的婚礼,称作“真婚礼”,因为不会离婚。以假乱真,足见他们对婚礼的轻藐了。

不过,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对婚礼是重视的。就是在尼泊尔,也是对“假婚礼”比对“真婚礼”要重视得多。重视归重视,各地的婚礼在具体做法上是大大不一样的,或者说是大相径庭的。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也是对人间婚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形象概括。

既然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婚俗存在,我们就应该对婚俗,尤其是对一些不常见的婚俗,进行比较研究。看一看它们有什么不同,问一问它们为什么会有不同,从而找出婚俗演化的规律和方向,把对婚俗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择 偶

择偶是婚姻的前奏，是婚俗的一个方面。看起来择偶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可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人都受社会的支配，受法律的约束，受观念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择偶的范围

人类择偶的范围，在“人之初”是极其广泛的。从血缘上讲，不仅兄妹可以成“夫妻”，而且父女也可以有性关系。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更迭，逐步依亲等有序把近缘关系从婚姻中排除出去。千百年来，从地域上看，人类择偶的地域范围愈来愈广，人类择偶的血缘关系愈来愈远，本来可以通婚的近亲，后来就不能通婚了。这是总的趋势。可是在不同民族间是不一样的。

一方面，现在仍有准许血缘很近者通婚的现象。厄瓜多尔的阿乌卡人，风行堂兄妹联姻，因此，在他们那里畸形人相当多。我国的景颇族，流行姑表婚。兄弟的女儿注定要嫁给姐妹的儿子做媳妇，但这是单向的；姐妹的女儿却不可以嫁给兄弟的儿子，理由是“血不倒流”。

另一方面，现在又有血缘虽远却不准许通婚的现象。如缅甸的们当族规定不准有九代以内血亲关系的人通婚。这未免有点过分。又如科威特的贝都印人不准不同部落间通婚。这不利于人的繁衍。再如美国的一个拥有两万人的阿米人，他们禁止与外族人通婚，对违者要严惩。英国有个地方不同民族间通婚，不仅要先付“罚金”，而且还要新娘在与陌生同族男人接吻后才能与异族人成婚。再比如，印度和我国四川彝族，在几十年前都不准不同等级和不同阶级间通婚。不用说结婚，就是私通也要

受罚，乃至处死。印度现在尽管也有人大声疾呼不同阶级间可以通婚，但是不同阶级间真正通婚者仍寥寥无几。

二、择偶的方式

在一定的择偶范围内，采用什么方式择偶是大有讲究的。各地有各地的规矩，在此处认为神圣的、不可逾越的方式，在彼处可能会是忌讳的、要被人当笑料的。人间现有的不太常见的择偶方式，大体可分以下五类：

(一)偶然型。定亲前彼此一无所知，全凭机会。罗马有一块地方，在牧神节那一天，男青年在游戏时，可以到“签筒”里抽出写有某个少女名字的签片。被抽中的姑娘就成了这男青年的当然情人，不管他们相见后是否相爱。说来也怪，由于他们对抽签的笃信，视抽签为天意，因此，用抽签方式结成的情人彼此感情甚笃。英国也有那么一块地方，在情人节那天，外出时见到的第一个异性，彼此就要结为情人。这种择偶方式演化到今天，也在走样。有些情人常常在节前相约早起，有意安排彼此第一个相见。这种偶然中已包含的必然，从形式上看，不过还是属于偶然型的。

(二)娱乐型。这是指在娱乐活动中，择娱乐中的优胜者为偶。我国浙江南部的畲族流行“以歌代媒”，彼此以歌谈情，以歌说爱。唱得好，爱得深；不会唱，那是难以找到情人的。中美洲的多米尼加东北部的兹莫达人，盛行以笛择偶。姑娘听小伙子吹“求婚曲”吹得好，便会吹起“应婚曲”，表示满意。德国与荷兰交界处的一个叫马克格罗宁根的小城市，在牧羊节这一天，牧羊男女青年都不穿鞋袜，赤脚在麦茬地里赛跑。两名男女冠军不仅受到奖赏，而且当即在众人面前举行婚礼。这看起来是单纯的游戏，但也多少包含“考察”的意思。在麦茬地里赛跑，如果怕

苦、怕痛是不能获胜的。

(三)考察型。这是同偶然型、游戏型相反的另一极。他们在择偶时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坦桑尼亚的马萨伊族,在择偶时,必须要小伙子杀死一头狮子或狮子一类的猛兽才能定亲。生活在亚马孙河边的亚瓜人,小伙子必须捕捞一条大鱼,才能向姑娘求婚,不然就是没本事。生活在非洲卡拉里沙漠的小伙子,因为那里既没狮子,又没大鱼,自然不必以杀狮子、捕大鱼来作求爱的资本,可是,他们要到姑娘家做为期五年的义务劳动。经过长达五年的考察,姑娘认为他能吃苦耐劳,便同意嫁给他;考察下来不行,就不能成婚。我国的仡佬人,在择偶时也要考察。他们的考察颇像考试,从家世到处世,从犁田打耙、栽秧收谷到喂养牲口、打猎狩山、撑船捕鱼、经营买卖,都要盘问一遍。因此,仡佬人把这种考察称作“盘郎”。既有女方对男方的盘问和考察,就一定有男方对女方的盘问和考察。肯尼亚的奥尔马人小伙子婚前要检查姑娘是否是处女;如不是处女,就解除婚约。西班牙等国,婚前要由老太太检查姑娘的贞操。我国四川左所的藏族对姑娘的考察手段是罕见的严格。他们称“审偶”。主要也是“审”其是否同别的男人睡过觉。如果认为姑娘没讲老实话,先用烟熏,再用刑罚。在左所,被折磨成残废的妇女不是个别的。为什么这样残忍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求得“真种”。求“真种”是巩固父权制的必需,同时也是“父权制”的污秽。

(四)商品型。出售姑娘的事,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有按年龄定价的,有按体重定价的,有按容貌定价的,也有按本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定价的。至于变相出售妇女的事,那就更多了。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时,说:“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

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买卖婚姻,是裹有一层精美包装的。现在没有“包装”的买卖婚姻也并非罕见。印度有一个苏拉特村,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专卖新郎的集市。小伙子坐在集市上,不许动,甚至都不许偷看一眼前来购买他的姑娘。只有当交易谈成后,才准许被卖的男子与买主见面。

(五)开放型。这里讲的“开放”,不是指正在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性解放”,而是指在物质财富不发达前提下的所谓开放。比如我国台湾省的高山族,姑娘为了选到合适的佳偶,常常同时领来四个小伙子到她家中做为期一周的廉价劳动,供她择优而取。再比如苏丹的希莱克部落,比我国的高山族还要开放。未婚夫居然喜欢听未婚妻讲述她有过多情人和姘夫。未婚妻的情人越多,他越高兴。如果姑娘说除了你以外没有情人,那么这位小伙子可能会很伤心,他甚至可能要等姑娘有了情人和姘夫以后再结婚。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他们那里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照他们部落的习惯,他未婚妻的每一个情人都要在他们结婚时,来向他们祝贺,来赠送牛羊。换句话说,妻子的情人越多,丈夫的牛羊也就越多,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离婚者再婚,在我们这里有时要受阻拦,在有些国家要被人唾弃。可是,在摩洛哥,离婚后尚未再婚的妇女,故意用尖顶发式表露出来,让人们一看就明白她离过婚,而现在她正想求偶、再婚。

三、择偶的季节

动物求偶大多有季节性,人类择偶是没有季节性的,这是人类已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标志之一。可是,仔细研究一下各民族的择偶状况,也不难发现有些地方的择偶仍有季节性。云南白族多在三月,瑶族多在春节前后,拉祜族多在冬、春两季,海南

黎族更是把三月三节看作“爱情之节”。总而言之，多在春季。这不仅是因为春季气候宜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时农业生产不太忙。拉祜族在夏、秋两季一般不谈恋爱，其原因在于这时正是农业大忙的季节。国外也有类似的规矩。美国的阿米人大多是在11月和12月农闲时谈情说爱。各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一样，可是在利用农闲择偶这一点上则有共同性。农村择偶服从农时，城市自然不会这样。城市青年择偶大多利用节日，比较多的是利用宗教节日。例如，美国多在大斋节前后择偶，用意在于图个大吉大利。

四、择偶的权利

择偶按理应是“当事人双方”自己的权利，可是在阶级社会中，“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婚姻“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恩格斯语）。所谓“门当户对”，所谓“父母之命”，所谓“媒妁之言”，都是剥夺当事人的自主权。当事人没有择偶权，有择偶权的不是当事人，二者是脱节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错综复杂。比方说我国云南瑶族，他们的婚姻既不是只听父母的，也不是只听媒妁的，甚至也不完全是由自己做主的。他们是在以歌相识、相爱以后，再请媒人说合成婚。当然，媒人的这般介绍，是做样子的。明明是假的，为什么还要以假当真？这只能说明瑶族的媒婚制度方才兴起，还不够普及，也不太严格，但是既已产生，而且又处于媒婚的包围中，因此不得不采用媒婚的形式。

婚 礼

择偶的目的是结婚。结婚一般都要举行婚礼。通过婚礼宣布择偶的结束和婚姻的开始。怎样看待婚礼，怎样举行婚礼，是大有讲究的。

当今世界,有种种婚礼:

一、喜事中的悲哀

喜事已成为结婚的同义语。现在人们几乎都认为结婚是喜事,不少地方的婚礼要载歌载舞欢庆多日。但也不尽然。

瑶族姑娘出嫁时非哭不可。不仅要哭,而且要大哭;不仅要一个人哭,而且要对着每一个参加婚礼的客人痛哭;不仅是新娘要哭,在新娘哭时,客人也要陪着哭。哭成为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内外都有人把出嫁称作“哭嫁”。用“哭”作“嫁”的定语,生动地说明了在由母系向父系转化中,人们对出嫁的看法,说明了喜中之悲,悲喜交集。

法国农村有些地方的婚礼就更离奇了。他们在婚礼前夕要举行葬礼。葬礼要摆酒宴,招待来“吊丧”的亲友。酒宴要奏哀乐,要行“安魂”祈祷仪式;众人还要抬着棺材送葬,直到把棺材埋在地下或扔到河里为止。棺材里装的什么?莫非真的死了人?否。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棺材里装的是“单身汉生活”。埋棺材,是向单身汉生活告别。为什么那么留恋单身汉生活?这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结婚之喜。今天的人们认为个体婚是乐事,可是生活在群婚制中的人对个体婚是看不惯的;刚刚进入个体婚的人对群婚制是留恋的。

法国农村这种婚礼前的葬礼毕竟是象征性的,而法国西部的一个小小的孤岛——赛恩岛上的新郎新娘,在去教堂举行婚礼前,则一定要在亲人的墓地周围绕上一圈。把扫墓当作婚礼的一部分,看来是扫兴的,不过如果知道这个岛的具体情况也会认为是很自然的了。那里全岛只有几千人,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海浪吞没。不难想象,对这个小岛来说,任何一个死者都是自己的亲人。既然天天有亲人死去,不消说每天都有扫墓的

任务,因此在婚礼前扫墓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婚礼的礼仪

对婚礼的礼仪,有的人把它视为准绳,有的人则不屑一顾,这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婚礼上的重大节目,只要家家户户都在遵循,都有其解释,都有其渊源,就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婚礼上的礼仪,大体可分如下几种:

(一)祝福式。对新郎、新娘来讲,值得祝福的方面很多。首先,要祝福的是新郎、新娘之间的关系。我国拉祜族在行婚礼时,大家要围着燃烧的火塘跳舞。他们说,这标志着夫妻双方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鄂尔多斯族新娘到婆家时,要同新郎一起从两堆火中走过。这表示都已经过火的洗礼,可以成为纯真的一对。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大概是他们地处亚热带的缘故,不用火来表示祝福。他们举行婚礼的最后一个内容是由新娘的舅舅往新人身上洒水,表示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用水冲不开的。喜火的用火,喜水的用水,总之是用当地心爱的东西来祝福。其次,要祝福的一个内容是婚后多子。肯尼亚的基西吉斯族,新娘要带着装满酸牛奶的葫芦来到新郎家。他们认为葫芦是一种吉兆,它意味着新娘婚后很快就会怀孕。还有许多民族在婚礼时撒五彩碎纸。这起源于古希腊人在新娘头上撒甜肉,以兆多子多孙。第三,那就是除了上述两种以外一般性的祝福。我国的哈萨克人在婚礼中,要新娘往炉火里泼羊油,让炉火烧得更旺。这里的火上加油是表示万事吉祥如意。再如土耳其人在新娘进门时,不能走泥地,要踩着铺地的羊皮进房。他们说这是祝福新郎新娘婚后的幸福多如羊毛。

(二)驱邪式。对相信恶魔或者是曾相信恶魔的人来讲,驱邪与祝福同样重要。我国彝族在婚礼时要举行摔跤比赛,并且

在摔到最后总要让新郎获胜。因为彝族兄弟有一传说：多少年前魔鬼来到他们山上，最后是靠一位大力士同魔鬼摔了三天三夜，才把魔鬼打死的。新郎能在摔跤中获胜，意味着他们有本领战胜恶魔。在印度农村的婚礼上，新郎要在新娘额上涂红色的吉祥点。他们相信用祭神的牲畜的血给新娘涂斑点，可以避邪。信仰印度教的人在婚礼上，要用燃烧着的樟脑在新娘头上转三圈，然后用水灭火。他们认为，火花的熄灭表明邪恶眼光的消逝。

(三)劝戒式。劝戒比驱邪要实在些。邪魔是子虚乌有，如何驱法？而劝戒要“戒”的，则是人们常见的，也应该警惕注意的事情。我国哈萨克人婚礼的第一个节目是揭面纱，唱揭面纱歌。面纱许多国家都有。按希腊、罗马的说法，面纱是为了遮住新娘，不让其他情敌看见真面目，免得争风角逐。这是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的产物。哈萨克人揭面纱，意味着已经可以放心了，但是也意味着教育新娘对爱情要专一。印度泰米尔人在婚礼上要给新娘系上打有三个结的带子。据说这三个“结”，是提醒新娘要懂得伺候父母、丈夫和儿子。日本长野有个新婚林，凡新婚夫妇都要到新婚林中植树。用意是教育青年婚后要关心集体。土耳其新娘的彩车、乐队快到新郎家时，看热闹的人要故意阻拦彩车。这不是失礼吗？否。他们认为，这是教育新婚夫妇要懂得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并非一路顺风。

(四)卫生式。出于讲卫生和性教育的需要，不少民族的新娘在结婚时要洗澡。印度有些地方，新娘在婚礼前一天要在用茉莉花和玫瑰花泡过的水里洗澡。土耳其人一直把“新娘澡”看作婚礼中的大事。洗前，新郎要给新娘送来衣服、肥皂和香料；洗时，要有母亲和女友作陪。信犹太教的人结婚时夫妻都要到

教堂洗澡。现在有些有钱的犹太人发展到用奶油给新娘洗澡。

(五)宗教式。信仰宗教的人的婚礼总要同宗教教义相联系,或在时间上,或在地点上,或在主婚人上,或在礼仪上,都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巴基斯坦人的婚约要由清真寺里的阿訇主持签约。日本有五种宗教的教徒喜欢在神社举行神前结婚仪式。不少地方的伊斯兰教徒喜欢在回历三月十二日、即穆罕默德诞辰这一天前后的月圆那一天结婚。此外,有些地方的婚礼日期喜欢由巫师或算命先生择定。

婚礼的礼仪是五花八门的。譬如婚礼上有各种不同的逗趣、取乐的方式。再譬如世界上有从婚礼开始到婚礼结束历时几个月或几年的“马拉松”式的婚礼。在形形色色的礼仪之间,有些是互相排斥的,有了这方面的内容,就不能再有另一方面的内容;但也有些礼仪是并行的,既有祝福式,又有劝戒式;还有些礼仪,可有多种解释,既可往这方面解释,又可往另一方面解释。如印度的踩羊皮入洞房,既有祝福幸福多如羊毛之意,又有教导新娘养成羊羔般温驯性格之意。

三、婚礼的礼物

婚礼的礼物分两类,一是新娘、新郎之间互送的礼物,二是亲朋向新娘、新郎所送的礼物。这两类有区别,但也相互影响。

从礼物的多寡来看,量的差异很大。我国川滇一带苗乡,女青年以向自己的情人要东西为耻辱。印度尼西亚农村的伊斯兰教徒,只要女方陪一部《可兰经》就可以住到一块了。但是,多数地区的礼物很重。有的要女方陪嫁,像肯尼亚的奥尔马人,女子出嫁时,父母要送 20 至 30 头牲畜作陪嫁。也有的要男方送聘金,像哈萨克人的新郎不仅要向女方送 70 匹骡马的彩礼,还要送“吃乳礼”、“成婚礼”等等,名目繁多。

从礼物的品种看,那也是无奇不有的。在有些民族中,辣椒的名声不好,可是,我国云南一带却用辣椒作为求爱的礼物,认为爱情会像辣椒那样火红。大葱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可是喜爱吃葱的侗族人,却以赠葱篮为厚礼,他们认为爱情会像葱一样洁白纯真。同样的,在出产白桦并以白桦为经济来源的波恩郊区,以赠给情人嫩叶满枝的白桦树为厚礼,人们认为白桦树象征爱情蒸蒸日上。而在出产松鼠的云南,苦聪人以松鼠为聘礼,因为松鼠比较机灵,不易捕捉,谁能捉到松鼠,就意味着谁的箭法好,值得爱。就地取材,产什么送什么,是礼物构成的一大特点。当然也有舍近求远的。如山上的人喜欢以水里的贝壳为礼物,湖上的人喜欢用自造的“水上花园”为嫁妆。物以稀为贵。以自己心目中贵重的东西为礼物,是礼物构成的另一特点。无论是就地取材也好,还是舍近求远也好,它们本身都是不断变化的。有些国家,在几十年前还是以牛车陪嫁,而今天已改为以汽车、摩托车陪嫁了。

结 论

了解了当今世界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婚俗,我们不难从中抽象出婚俗的本质,不难从中把握婚俗发展的规律。

一、婚俗的特点

任何婚俗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都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关系的反映。婚俗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近乎道德,又不同于道德;它近乎法律,又不同于法律。它是一种习俗,是不同于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习俗。

(一)婚俗常常能成为道德的准绳之一。从人们对婚俗的信仰看,从人们把婚俗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看,婚俗构成道德。千

百年来,人们把尊重婚俗,看作有德;把无视婚俗,看作缺德。不过,从已有的婚俗看,它大部分属于思想型的社会关系;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物质型的社会关系,即一种经济关系。这里既涉及生活资料的再分配,又涉及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有人用耕牛、耕地作嫁奁,不就是经济关系吗?我们知道,金沙江是四川、云南两省的天然分界线,可是云南在金沙江北有一个村子。其原因就在于,在很早以前,四川某个奴隶主的女儿在嫁给云南奴隶主的儿子时,把这片土地作为陪嫁“嫁”给云南了。

(二)婚俗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习惯法,是不成文的“婚姻家庭法”。违反婚俗,不但受人唾弃,有时还受到严惩,乃至被处死。从婚俗的这些强制性来看,这个“俗”不比法差多少。但是,任何法律条文的形成和推行都借助于行政手段,而婚俗等习俗则一般不借助于行政手段,大多是依靠舆论的力量。家族、亲朋、邻居是婚俗的监督者。

(三)婚俗对社会的影响和干预是极其广泛,极其深远的。世界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没有法律,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无婚俗。无法能生存,无俗难生活。俗先于法而又广于法。在那些既有法,又有俗的地方,法比俗概括、简略,俗比法广泛、精细。俗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婚俗几乎是没有人能够逃脱的。

二、婚俗的作用

婚俗的作用,方面很广,有起直接作用的,有起间接作用的。这里列举婚俗直接作用的几个方面。

(一)巩固婚姻制度。婚俗是为婚姻制度服务的,是与婚姻制度相适应的。婚姻上是重母系的,婚礼上也重母系;婚姻上是重父系的,婚礼上也重父系。对偶婚的婚姻脆弱,离婚手续简单,因此,他们结婚的婚礼也简单。假如婚礼隆重,聘金高昂,谁

有一生结十几次婚的钱？没有十几次结婚，自然也就没有十几次离婚。结合不巩固，正是对偶家庭的一个特征。

(二)调整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的疏密一般是与亲等成正比的：亲等近，关系密；亲等远，关系疏。自封建社会解体以来，亲属关系由远而近，逐步变疏。疏者更疏，密者变疏。近年来，亲属的聚会，要利用婚葬时进行；亲等的划分，也只有婚葬时才比较明显。婚礼为增进亲属关系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三)追加精神力量。一个人在幼年时，就在接受婚俗的灌输，在千百万人之间一直在相互灌输。婚俗一旦为人所接受，就会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有不少人对婚俗那样虔诚？为什么有些人在婚礼时不惜忍受侮辱、不怕触及皮肉？无非是婚俗已深入到他的心灵深处，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三、婚俗的趋势

(一)婚俗的神圣性与相对性。对某一地区、某一阶级的人来讲，恪守某一种婚俗似乎是极端严格的，不可疏忽的。可是换一个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此处所好者，往往为彼处所忌者。正因为婚俗会因地而异，所以才有今天多种多样的婚俗。婚俗的相对性与婚俗的多样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立足于此处，认为彼处的婚俗是奇风异俗，那是坐井观天的表现。一百多年前，学者们之所以理不出一个家庭史的头绪来，就因为他们把那些远古家庭的子遗简单地看作“奇怪习俗”。同样的，把别人超出本地婚俗的做法看作伤风败俗，看作大逆不道，那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表现。我们要做两点论者，对流行的婚俗，既要看看其有神圣性的一面，更要看看其有相对性的一面，既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它，又要有勇气超出它。

(二)婚俗对经济基础的保护和破坏。婚俗，说到底是由生

产方式、阶级利益决定的。有时候文化水平、宗教信仰乃至一个民间传说,也会决定婚俗的某一细节。比如,云南苦聪人用松鼠作聘礼,传说是从前有位苦聪姑娘为了考验一位勇敢的小伙子是否机灵留下的传统。事实上,传说很可能是为了配合传统而编出的。即使是先有传说,后有习俗,那这传说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苦聪人生活的写照。因此,在通常所说的制约婚俗的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婚俗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婚俗对经济基础能起保护和巩固的作用;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婚俗仍然不动时,落后的婚俗就会对经济基础起破坏和阻碍的作用;而当经济基础有变革的苗头时,自觉改革婚俗就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促进和开拓作用。在经济基础急剧变革时,无视婚俗的改革,把婚俗凝固化,甚至抛弃已经变革了的婚俗,重新搬出旧婚俗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前些时候,在一些省、市,包括在大城市里出现的抢亲、换亲、重婚、冥婚、包办婚姻,都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格格不入的。

(三)“简—繁—简”的婚俗演化规律。作为婚俗重要组成部分的婚礼,是在对偶婚阶段萌芽的。那时的婚礼极其简单,一般不同物质相联系。只是到了个体婚阶段,婚礼才完善,才变得盛大隆重,并且愈来愈豪华奢侈。婚礼的郑重,本是巩固个体婚的需要。反正一生就那么一次婚礼,何不办得郑重点?婚礼愈是郑重,离婚的可能则愈小。可是,事情早就走到了反面。不少人为婚礼而婚礼,为盛大而盛大。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婚礼成了资产阶级竞争的一部分。妻子成了商品,婚礼自然成了一场交易。现在,西方国家有许多有识之士,把婚礼看作一场灾难。不少国家的学者在呼吁改革婚礼。有些国家已用法律条文

来限制彩礼和喜宴。法律在同习俗合流,习俗在求救于法律。简化婚礼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东西方都有一大批青年人把婚礼办得很简单。在中国,城市的婚礼比农村简单;在城市,文化高的人的婚礼,比文化低的人的婚礼简单。随着中国文化素质的一天天提高,随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普及,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简化婚礼。当然,简繁要适度。究竟以何者为度,只能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度。

列宁把“摆脱金钱”看作无产阶级婚姻的根本点。这一根本点应该在婚俗中加以体现。因此,我们都要注意“脱俗”,脱旧俗!

(本文收入《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把目光转向女权保障法

中国把男女平等写进宪法,把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写进那么重要的法律、法规,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也是为许多国家的妇女所赞美的。可是,法律有了规定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事实上,男女不平等还在许多地方严重地存在着。再说,法律、法规上有了规定,也并不等于我国的法律在保护妇女方面的条文已经尽善尽美。老实说,现实的有关保护妇女的法律,还不够具体,略嫌笼统,距离法律配套还比较远。因此,研究妇女法学,完善妇女法规就成了一项紧迫任务。

然而,时至今日,有关女性问题的研究,较有价值的著作仍不甚多,尤其是有关女权法律保障方面的专著更为少见。所以,中国女学者吴妙华同志撰写的《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领域之不足,它对我国法学、社会学、妇女学的发展与司法实践,都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在妇女法学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

比方说,怎样理解“男女平等”就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单纯强调“妇女解放”会不会偏离“人的解放”;会不会忽视竞争原则?

比方说,在妇女参政问题上,是否需要规定比例,也是见仁

见智。

比方说,在妇女就业问题上,那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不要实行阶段就业,分歧就较大。

还有,如何看待婚姻的基础?是单一爱情论,还是经济、爱情混合论?还有,对事实婚姻怎么看?对男女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能否视为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还有,在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划分上,也是一个难题。

所有这些,都是妇女法学界正在探讨而没有统一看法的问题。

我很高兴地看到,作者所著的《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一书中,不仅没有回避这些敏感而又尖锐的问题,而是知难而进,以科学研究者具有的素质,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为指导,贯穿全书。尤其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我国召开之际,作者能紧密结合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具有一定的深度。

《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一书的出版,既会丰富妇女法理论的研究,也是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妇女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我相信,《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专著的问世,将在中国的法学百花园中,又绽开了一朵绚丽多姿的鲜花。

可以预料,它的出现,必会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并会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1994年8月25日

(此文系《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一书的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研究家庭的政治功能

大约是1987年吧,金永华先生同我谈起他打算写《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我当时为他的学术胆量所感动。最近又拜读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的手稿,我更对他的广博学识表示钦佩。我致力于家庭学的教学与研究已多年,著书十余种,可是在金先生所阐述的这个命题上,我没有充分展开过,可谓浅尝辄止。如果说从未涉猎过,那倒也不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卡片似乎做了上千张。没有深究的原因是投鼠忌器。主要“忌”两个“器”:一是忌历史动力这个器,二是忌领袖人物这个器。

对这两个“器”,金先生在《自序》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金先生这一举是撞开了一个禁区。假如要避一避“为朋友捧场”之嫌的话,我认为这部书至少是松动了禁区大墙上的一块砖头。继这一块砖松动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同道去松动它旁边的砖头,一块接一块地松动。

在学术上,常常有这样的怪事。在禁区撞开之前,总觉得撞开的难度很大:一旦撞开之后,又会觉得是天经地义,平步坦途。读完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以后,我仿佛也有这种感觉。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这种“政治行为”本身又怎会不作用于政治呢?我们为

什么不可以顺着恩格斯的思路多走半步呢？

既然中外的家庭学教材都认为，政治功能是家庭的几大功能之一，那么这种政治功能难道不会作用于历史吗？在中外历史上因联姻而立国、兴国、亡国的事还少吗？

因此，问题不在于爱情会影响历史的命题能否站住脚，关键是这一真理到了鼻子底下我们还不敢去抓到手。我们的理论神经衰弱得太厉害了。宗教靠信仰，纪律靠服从，科学靠议论。科学是不怕讨论的。新见解是不怕多的。我上边所说的忌器，有时是杞忧。老鼠离器有丈把远，投鼠不仅砸不到器，反而是对器的保护，干吗要忌器呢？当然，有时投鼠会碰到器，那也得看看是什么器，倘是不锈钢的器，碰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倘是陶器，碰破了，那也值不了几个钱，再换一个更好的器就是了。器是发展的。一部技术史证明了这一点。

我为金先生向社会投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而高兴。我相信这一有胆有识的佳作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议论。

1988年6月14日

（此文系《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的序。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谈家务劳动

尚未结婚的青年人，总是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在他们的想象中，小家庭的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称心，下班以后，夫妻依偎在一起，听一听轻音乐，逗一逗机灵健壮的孩子，工作后的疲劳，思想上的烦恼，就会消除干净。

然而，建立了家庭以后，他们却逐渐发现，家庭不只会带来幸福、温暖，还会带来麻烦，没完没了的繁琐家务劳动，就会使人疲劳不堪。因此，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倦的晚上。”面对着耗费大量精力的家务劳动，有些人又羡慕“快乐的单身汉”了。

婚前对家庭的憧憬，总不免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婚后为家务劳动而烦恼，在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与家庭生活的现实发生矛盾的结果。

世界上任何美妙的事物，都有它的并不美妙的伴生物。家庭也有它的伴生物，家务劳动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恋爱好比盖房子，结婚是住进新房子，那么，家务劳动可以比作清扫和维修房子。假若房子不经常清扫、维修，再好的房子也难以住得舒适。因此，从根本上说，家务劳动，就是为家庭服务的劳动，是保证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劳动。只想享受家庭的幸福、温暖，却不

愿意承担必要的家务劳动,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今天,家务劳动虽是家庭成员为自己家庭服务的劳动,却又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家务劳动安排不好,人们不但不能充分享受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也无法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工作和学习,从而直接间接地给社会带来影响。因此,正确地对待家务劳动,科学地安排家务劳动,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进行家务劳动的革命,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家务劳动随着家庭的产生而产生, 也随着家庭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家务劳动,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家庭,要从事家庭生活所必须的生产活动,同时就要求有生产活动所必需的辅助劳动。要进行生产,先要吃饭穿衣,这就要有解决穿衣吃饭的各种劳动。家庭的消费、生儿育女、文化娱乐,也要通过一定的家务劳动才能实现。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也是独立的消费单位。在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中,“男耕女织”,丈夫肩负着田野生产劳动的重任,妻子承担全部家务劳动。那时的家务劳动,不只是缝衣做饭、侍奉丈夫及抚育子女等服务性劳动,也有生产性劳动,如采桑养蚕、纺纱织布、饲养禽畜等等,都是生产性劳动。这种男管外女持内的不同劳动,也可以说是按照男女生理特点的自然分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男权家长制的条件下,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属品,是侍奉丈夫的。妇者“服也”。妇这个字的原意,就是一个女人抱着一把“帚”,妇女的天职就是围着锅台转,操持家务。因此,这种分工又是建立在男

权家长制和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基础上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沉重繁琐的家务劳动,像枷锁一样世代地束缚着广大劳动妇女,她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也没有走出家门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一直受着封建君权、政权、神权和夫权的统治,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这种家务劳动虽然极为繁重,却最受人轻视。一个男人如果干家务活,就会受到嘲笑,被人们看成是“没有出息的人”。这种偏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干净。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原来的个体农民逐渐变为雇佣工人,由原来为自己家庭进行的生产劳动转为给资本家劳动,用出卖劳动力换取养家糊口的工资。生产的社会化,引起了家庭职能的变化,家务劳动比以前简化了,却与社会大生产沟通起来,不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了。一方面,家务劳动安排得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在机器大生产中的效率;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又为减轻家务劳动提供了可能,例如纺纱织布、缝衣做鞋等耗费大量时间的家务劳动就可以由大工业生产取代。大工业生产,也需要女工,在某些产业部门,女工可以比男工干得更好。这样,妇女就有了外出谋求职业,寻求经济自立,摆脱家务劳动的可能。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家务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的传统冲击。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妇女仍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妇女就业不仅受到种种限制,劳动报酬也比男工低得多。虽然不断地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喊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让妇女摆脱家务劳动,走出家庭。但是,这些合理的要求,始终没有真正变为现实,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男权制社会制度,是以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而男女的平等,又是阶级不平等的必然产物。所以,即使是在劳

动人民家庭中,也仍然是男权家长制,妇女基本上仍然被限制在“使她们愚钝和受人鄙视”的“作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4—375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妇女解放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半边天”。妇女和男人一样,都具有就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男女平等,在经济、政治和法律上得到保障,逐渐变为现实。这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化,也必然引起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变化,夫妻关系由旧社会的占有与附属的关系,变为平等的爱情加同志的关系。两性的平等,是爱情的基础,也是家庭幸福和睦的基础。这个大变化,也向每个家庭提出了新问题:历来完全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应当怎样解决?是应当继续由妇女全部承担或为主承担,还是应当由家庭中能够劳动的全体成员合理分工,共同承担?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承担家务劳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社会进步中带来的新问题,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已经从根本上提出了原则性的解决办法:男女平等也应当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家务劳动不应当完全是妇女的份内事,而应当由家庭中能劳动的全体成员共同负担。这是前提。其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利用国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社会服务范围,减轻家庭劳动负担。还有,家务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一致,也使家务劳动具有了为社会服务的性质,而不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私事了。

但是,旧的传统观念还残存着,还在一些人头脑中作怪。如何摆正家事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也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实际问

题。如何合理安排家务劳动,也还有个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因此,尽管有许多家庭对家务劳动问题安排得比较好,因而既得到了家庭的幸福、和睦,也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但是,也有不少家庭,却因家务劳动问题解决得不好,既影响了家庭关系,又影响了工作和学习。这既是家庭“小事”,又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很有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的必要。

家务劳动问题的现状及 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城市中的家庭,除了少数个体劳动者以外,家庭的生产职能已经消失。在农村,正好相反,广大农民及个体劳动者的家庭,仍具有生产职能;不具有生产职能的家庭只占少数。

从家务劳动的内容来说,城市中的家庭,主要是买菜、做饭、洗衣物、清洁卫生、抚养婴幼儿、侍奉病弱老人。后两项,只是一部分家庭所具有的;自己做衣物的现象,已经很少,数量也并不多。在农村的家庭中,上述劳动内容全都具有,但自己做衣物的现象比城市要多,此外还有家庭生产职能带来的各种服务性劳动,以及种菜、饲养禽畜等。

再看家务劳动的技术装备。在城市家庭中,就全国来说,拥有煤气或电炉者,只占少数,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煤气用户也只占半数左右。洗衣机、电冰箱的拥有者,为数不多。在广大农村中,除个别地区以外,仍然使用柴草锅灶,拥有洗衣机和电冰箱的,只是个别人家。在农村中,大多数家庭还要自己缝制一部分衣物,但拥有缝纫机的家庭远远不到半数(个别地区超过半数)。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我国现在家务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还相当落后,家务劳动费时又费力;第二,总的说来,农村家庭的家务劳动,比城市家庭繁重得多。

但是,因家务劳动负担过重而出现的家务与工作、学习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盾,城市反而比农村尖锐。原因在哪里?原因之一,是城市与农村的生活节奏很不相同。城市生活的节奏强而且快,工作时间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迟到或早退,家务劳动必须严格服从工作节奏,而且要为上下班留有适当余地。在农村,除了农忙季节以外,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对说来可以自由安排。原因之二,是城市家庭双职工占绝大多数;而在农村,虽然全家劳动力都要参加生产,但妇女可以相对地多做一些家务,少参加一点生产,或者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兼做一些生产上的辅助劳动。另外,农村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自留小菜园,而城市家庭几乎每天都要费去不少买菜的时间。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这几种种因素即已表明,城市家庭的家务问题,确实有比农村家庭尖锐、紧张的一面。

当然,并不是所有城市家庭的家务问题都很尖锐、紧张,因为家庭构成不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同,家务劳动的安排和解决方式也不相同,这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聘请家务劳动人员做家务,或聘请计时工做一部分家务,自己基本上不做家务,或只做一部分家务。这基本上是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为数还很少。

2. 由已退休或无业的父母承担全部或一部分家务。这类家庭为数不少,但总的比例少于双职工家庭。

3. 中等上下经济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全部由双职工(夫妻)负担。这类家庭数量最多,约超过总数的一半。这类

家庭,家务劳动的繁重程度因家庭构成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子女已经进入中学或已开始工作,做家务的人多了,家务劳动则相对减少了。有婴幼儿的家庭,家务劳动就要繁重得多,如果既有婴幼儿,又有年老多病不能从事家务劳动的老人,家务就更加繁重。

4. 夫妻分居两地的双职工家庭,以及有低年龄子女或病弱老人的不完全型家庭,家务主要由一个人承担,更加繁重。但从现在看,这类家庭为数也较少。

5. 个体劳动者家庭及夫妻一方未就业的家庭,家务基本上由一方承担。这种类型的家庭为数极少,家务劳动问题一般并无矛盾。

上述五种类型,第三种家庭即双职工家庭,约占半数,其他各类共占半数。其中第五类情况比较特殊,第一类则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到的,为数都很少,又都实际上不存在家务负担过重的问题,这里不多谈。值得重视的是其他三种。

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婴幼儿或上小学的孩子,没有老人,这样一个三口之家的小型家庭,每天为家务劳动要耗费多少时间?买小菜、做早饭、照料孩子、吃早饭、整理房间,总共约需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中饭在单位吃,可以略而不计。晚上做晚饭、吃晚饭及洗涤餐具,夏天还要洗澡、洗衣物(秋冬春不必天天洗澡,但到浴室洗浴一次,连同洗衣服,至少要两个小时),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单是一早一晚的生活必需劳动和活动,就占去三个半小时至四个小时,每天上班时间,至少需要八个小时,来回的路上时间,情况不一,但大致共需一小时至两小时,平均按一小时半计算。这样,每天上下班共需十小时,最必要的家务劳动需要三个半小时至四小时,睡眠若按八小时计算,

那么,每天剩下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再做点其他家务,或教育孩子,那就所剩无几了,连看看报纸、电视的时间都不够,更不必说学习了。这都是最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实际上家务琐事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这些,何况上述必不可少的“几大块”时间,并不能经常做到紧密衔接,因而还应适当放宽计算尺度。这样看来,开头所引的那个顺口溜,确实反映了城市中半数以上家庭的实际情况。

自然,上述的计算,有些地方也要打一些折扣。例如,早晨买菜、做饭、照料孩子等,可以分工进行。吃饭的家务如能合理分工,也可节省一些时间。即使如此,家务劳动还是繁重的。

家务劳动的繁重,使得人们不能充分休息,必然导致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也使得人们没有业余学习的时间。这都会影响工作效率。这就成了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

家务劳动的繁重,也是夫妻纠纷、家庭不够和睦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的家务劳动过重,就容易产生厌烦情绪,也容易相互埋怨。家务劳动过重,也影响了家庭娱乐的时间,厌烦、埋怨情绪就得不到及时消除和排遣。日积月累,就要影响夫妻感情,影响父子(女)母子(女)感情,这常常是家庭争吵的导火线。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使夫妻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大半是由于家务劳动的负担不够合理。这可能有一方工作单位较远、工作担子较重等“家外”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家内”因素,是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作怪。夫妻同时下班回家,妻子忙个不停,丈夫却跷着二郎腿抽烟,等着吃现成饭,不肯主动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这种不平等的态度和“大少爷”作风,常常是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些男同志不大肯做家务,表面上是笨手笨脚,做不好,骨子里往往还有潜台词:自己是个什么干部,做了家务,似乎

有失身份；有的人的潜台词还具有“商业”性质：我的工资比你高，全家主要靠我养活，我少干一点家务是理所当然的。说穿了，这是封建男权制的残余。社会主义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在家务问题上，也应当相互平等。当然，平等，并不是绝对平均，斤斤计较，而是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只要别人服侍自己，自己不愿照顾别人，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要求特殊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也不可能处理好家庭事务。事实上，做一些家务，不但不会失掉身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调节脑力劳动，有利无弊。

有些人把家务完全推给老人。老人体弱多病，还要忙个不停。身强力壮的夫妻反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人不仅要照顾第二代，还要照顾第三代。理应受到敬重服侍的老年人，反而变成了家庭保姆。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子女做一些家务，不仅可能，而且应当。绝大多数老人，虽然有自己的经济收入，也仍然乐于为下一代、下二代做些事情。但是，他们的体力毕竟有限。有些人不仅把家务全推给老人，还要挑剔责难，甚至虐待，这是非常错误的，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社会主义道德。

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孩子更加受到爱护，这对下一代的成长极为有益。但是，也有些父母，由爱护关怀变为溺爱娇纵，孩子已经长到可以帮助做一点家务的年龄，也不让孩子做。其中，也有重智育轻劳动的思想因素，认为孩子做一点家务，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久而久之，便使孩子养成了不爱劳动的不良习惯，有些住校的高中男女学生，还把换下的衣服积存下来，星期天带回家中由父母洗涤。连自我服务性的简单劳动也不肯动手，后果如何，是令人忧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习俗倒很值得借鉴。例如在联邦德国，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已成为

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规,它明确规定:6岁以前的孩子可以尽情玩耍,不必参加家务劳动;6岁到10岁,就要帮助洗刷杯盘碗碟,购买零星物品;10岁到14岁,要整理草坪,洗刷鞋子;14岁到16岁,要参加宅旁园地的劳动;超过16岁,就要像成人一样参加家庭劳动。如果不愿干规定的家务事,法院就有权干涉。另外,在西方不少国家,从小学起,就有关于家务劳动的课程,这一切不一定全适合我国的情况,但让孩子参加一些可能的家务劳动,不至于影响学习,既能收到培养劳动习惯的效果,又可减轻一些父母的家务劳动。就是在有能够承担家务劳动的老人或雇有保姆的家庭里,让孩子参加一点家务劳动,也是有好处的。

减轻家务劳动负担的出路

既然家务劳动负担过重,不仅影响家庭的和睦幸福,而且影响工作和学习,解决家务劳动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应当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着手。

从家庭来说,要想回避家务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合理负担,科学安排,并力求家务的简化。

合理负担,是指家务劳动由家中一切有劳动条件的成员共同分担。当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合理分工,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只要是家庭生活的必要劳动,家庭中的一切能劳动的成员就都有承担的义务。这不仅因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保证全家的正常生活,也是尊重、爱护其他家庭成员的一种具体表现。家务活,共同做,说说笑笑,还能使一个人劳动时的厌烦情绪化为轻松愉快,不知不觉地就干完了。在这里,互相体谅和关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爱妻子(丈夫)的人,是绝不会把家务劳动完全推给对方的。一个真正关心家庭的人,也是

绝不会推卸家庭正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的。

科学安排,是指对家庭日常生活中最经常的必要劳动,分清主次,井井有条地作出安排,根据轻重主次和各人的特长,分头包干。比如做晚饭,有的生炉子、淘米煮饭,有的洗菜切菜,时间就可以缩短不少。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几样兼顾,生起炉子,煮上饭以后,再抓紧焖饭的时间洗菜切菜,如果饭仍未焖好,还可以抓紧时间简单整理一下房间,几件工作交错进行,也可以缩短不少时间。科学安排,还可以把有些事化整为零,利用小的空闲做;有些事又可以化零为整,利用假日集中做。仍拿洗菜、拣菜来说,常常是很费时的。不坐班的脑力劳动者,在家工作的时候多,就可以利用休息时间,拣拣菜、剥毛豆等等,这既做了一部分家务,又调剂了紧张的脑力劳动,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利用休息时间把一部分准备工作做好,烧饭所需的时间就可减少。在如何科学安排、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的问题上,数学上的统筹法也是可以“引进”到家务劳动中去的。

家庭生活还要简化。首先,房间陈设要着眼于实用、简便和舒适,不必搞华而不实的東西。不实用,也不见得能增加美感,只是浪费了金钱,又当了服侍这种物品的奴隶。现在,一些青年朋友结婚的时候,不惜花很多钱搞几十条“腿”,却不置办一只书橱和一张书桌,这很不利于工作和学习。那么多条“腿”却塞满了房间,于生活不便,也增加了维护的时间。有的还一定要置备8条被子、12个枕头,积压了资金,还要加上经常翻晒的时间。其实这完全可以从简一些的。其次,简化也包括各种传统习俗和礼仪。我国的传统习俗节日非常多,每个节令或节日都有特定的过节食品,有条件的时候,做一点,调节一下口腹滋味,自然可以,但也不必样样都要从俗,这实在耗费时间和金钱。朋友亲

戚之间的来往，一杯香茶，或一杯麦乳精，相互交流工作和学习；或者是请他们吃便饭，这并非待人不恭，而是互相方便的君子之交。常见这种情况：国庆节连同星期日休息三天，不少人却为互相来往吃喝，忙得不可开交。吃坏了肚子，累坏了身体，这又何必呢？

人们常把小家庭称为“安乐窝”，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家中，有个舒适清洁的“窝”，得到充分休息，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喜欢把房间的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这虽然很好看，却会拘束人，反而休息不好。其实，首先把自己家称做“安乐窝”的邵雍，只是几间茅屋，一张硬板床和几条木凳，离许多人的安乐标准很远。但邵雍白天种地，晚上读书，却感到有无穷的快乐，认为是华屋高楼、锦衣玉食无法相比的。当然，像陈蕃那样，庭宇芜秽不扫，还以“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的话，顶回友人希望他注意清洁卫生的规劝，也是不足取的。

响应政府号召，只生一个孩子，更是减少家务负担的重要途径。这个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这里不具体谈了。

从社会来说，对于怎样减轻千家万户的家务劳动问题，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应该和可能从多方面进行的。

1. 积极发展简便实用、价廉物美的各种家庭机械装置。洗衣机、电冰箱应着眼于经济耐用，体积注意小型化，以适应住房特点。缝纫机除了向多用途发展外，也可以向简易化、小型化发展，适合大多数家庭以购买衣服为主、以缝补为辅的特点。现在的家用缝纫机，在许多城市家庭中已变为很少使用的装饰品，于家庭、于国家都是一种浪费。

对于使用范围极广的煤炉，也应当研究改进，使它易燃、易旺。这似乎是小事，但改进得好，却是为千家万户造福的大事。

能代之以煤气,当然更好。

总之,家庭机具,应当列入科学研究的议事日程,这是全国居民的大事,应成为重要的科研项目。

2.大力发展和推广多种方便食品,进行饮食习惯的改革。面包、方便面应当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发展“方便饭”、“方便菜”,品种要多,口味要全。大饼店、早点摊也应进一步发展,广泛设点,方便群众,减少排队现象。根据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和饮食习惯,也可以试开一些稀饭馒头店,一碗稀饭,两只馒头,一碟酱菜,就可以解决一顿饭问题,薄利多销,是有利于群众的大好事。

3.工厂、机关、学校也要多为减轻职工家庭负担着想。在解决职工吃饭的同时,充分利用设备和人力,也供应一些职工可以带回家食用的早点。利用单位条件,给职工洗衣,也是可以试验的。

4.进一步发展托幼事业。现在,一方面存在孩子入托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全托的现象大幅度下降,这其中的因素比较复杂,但如果认真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对孩子的照料、教育不比家中差,大多数人还是愿意让孩子全托的。

5.可以利用待业人员多的特点,试办家庭服务公司或家庭服务队(组),定点或登门进行家庭服务,至少在洗衣、小修小补等方面是完全可以试行的。只要保证服务质量,创出信誉,是会受到欢迎的。现在的洗衣店,数量少,收费高,周期长,送取都不方便。

6.买菜、拣菜,是占用时间相当多的一项家务劳动。菜场的蔬菜供应,也可以考虑半成品化或成品化,买回家一炒或者一热就可以吃,这会节省很多时间。现在菜场的盆菜、半成品菜生意尚不够兴隆,常与变相推销冷门货有关;花色品种太少,也是一

个原因。个体豆腐摊的生意四季皆旺,主要原因就在于营养丰富,烧煮方便,价格也比较稳定。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家和国是息息相关的。从多途径着眼,尽力减轻千家万户的家庭负担,这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和文化水平的一项必要投资。

尾 语

家务劳动的负担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丈夫不参与家务者有,丈夫和妻子及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共同负担家务者也很多。但是,他们解决家务负担问题,主要是三种方法,即发展家用机械,发展方便食品及成品半成品菜肴,丈夫就业、妻子操持家务。前两点,前面已经谈到。后面一点,我们应当借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研究。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单就业在我国是否可行的问题。

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丈夫就业,妻子主持家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妻子不就业,已成为社会习俗。哪个男子汉的妻子就业,还会受到嘲笑,认为没有出息,养不起孩子、老婆。其中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妇女就业。他们的这种就业方式,除了民族习俗外,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有关。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但是也必须看到,就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单就业实际上主要是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而且还有另外的因素,例如两人同时就业,收入虽然多得多了,但要交较多的所得税;家中另外雇人料理,工钱也高,其结果,两人同时就业,实际经济收入和一人就业相差无几,另一个

人就自然干脆不就业了。

至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家庭,一人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生活,因而夫妻共同就业者也还相当多。其中有些人没有同时就业,并不是不想同时就业,而是失业率高,找工作难。还因为社会上对妇女就业的限制多,使许多劳动家庭的妇女根本无法就业,不得不当家庭主妇。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从当前的经济水平看,要改为单就业、高工资是不现实的。反之,男女同时就业,不但有利于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可以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因此,用妇女回到家庭中去的办法解决家务负担问题,在我国是不足取的。

(本文收入《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研究家务劳动的起因和原则

围绕着家务劳动的各种分歧意见正在发表出来。为什么家务劳动的理论在今天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这倒成了研究家务劳动者先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家务劳动的讨论是社会化大生产促进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急剧变化以后，提出的新课题。半个世纪以来，一种只包含父母和子女的核心家庭在许多国家中呈增长趋势。五十年前，核心家庭一般占各类家庭的 50% 上下，现在一般占 80% 以上。在我们国家，无论城乡，核心家庭都在增长。据上海妇联调查，上海科技界核心家庭占到将近 70%。再加上出生率下降，本来就不大的核心家庭其规模便更加缩小，扩大家庭也变得不大。我国城市的家庭平均人口解放初接近六人，而现在只有三点几人。家庭规模缩小以后，从一家看，家务劳动少了，因为照顾一个孩子总比照顾八个孩子方便。可是，从全社会讲，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数则增多了。原来六口之家是一两人搞家务。现在三口之家也是一两人搞家务，搞家务的人因此也就翻了一番。那么多人对家务劳动有切肤之痛，必然要求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探讨。

家务劳动的讨论也是人们价值观改变以及文化素质提高以

后,提出的新课题。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人们宁可蜷居家中搞家务,也不愿投身于“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因此,在那时候,一般不存在家务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我有一位同学,“文革”中带“罪”劳动,倒三班。当时我去看他,他正在用论斤买的有机玻璃碎片做台灯。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中,他接连出了几本书。仅从发表的字数看,他决不会再自制家具了——兴趣从家里转向社会,转向知识化、专业化。家务劳动与知识化、专业化的矛盾突出出来了。

家务劳动的讨论又是就业面扩大,特别是妇女就业面扩大以后,提出的新课题。女职工占我国职工总数的比例1978年为32.9%,1982年上升为36%。按传统,家务劳动是妇女干的,如今妇女就业去了,那么家务交谁干?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交男子干,二是仍由妇女干。交男子干,男子不习惯;仍由妇女干,妇女里外双肩挑,不胜负担。据上海市妇联调查,上海大多数中青年女科技人员每天要投入四小时左右的家务劳动,以致体质有所下降。

显然,家务劳动成为突出问题是前进中的曲折,是好事中的坏事,是历史的要求,知识化的必然,妇女解放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寻求解决家务劳动的途径时,万万不可从降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放慢知识化的步伐,阻挠妇女解放这方面去动脑筋,不然,就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了。

那么,解决家务劳动应该有一些什么原则呢?

一、在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应坚定不移地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促进家务劳动向社会转移。千百年来,已转移了不少。衣,本来是“织女”干的,现在“织女”进厂了,在家中纺纱织布的微乎其微。谁都承认,大生产织的布比小生产织的布质量

要好。今后,随着国力的发展,应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事业的设施,改变社会福利事业的构成,组织家务专业队,从而减轻家务劳动。

二、在男女之间的分工上,应各显其能。现在除了个别地区由男性包家务以外,家务从来都是所谓“贱内”的事。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家庭中,男女同样参加社会工作,家务应由夫妻双方一起承担,共同完成,根据各人的体力和工作情况,各尽所能,合理分工。最近有人提出“妇女退居家中”专搞家务,这是行不通的。六十年前德国法律规定:奖励退职的已婚妇女。结果德国老姑娘激增,妓女满街。今天,其后果虽不至于如此严重,但它不利于妇女的解放则是无疑的。

三、在处理粗活与细活的关系上,应当随着家庭生活水准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断变革家务的内容,增添家用新设备,变粗活为细活,提高家务劳动的经济效益。当然,粗、细是相对的,粗活总是有的。但不论粗细,作为家庭成员,都要发扬勇挑重担的精神,都要把家庭心理学、家庭美学运用在家务中,从而增加家庭情趣。在日本文化生活展览会上,他们表演打补丁的艺术,是耐人寻味的。补丁有艺术,别的家务劳动就没有艺术可以讲究吗?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10月5日)

开展家庭咨询

听上海市妇联的同志说,她们想开展家庭咨询活动。这是一个好主意。人人都有家庭生活,社会上的事也大多要反映到家庭里面来。家庭的幸福与否,直接关系到生产和工作的质量。可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弄得“家家都有一本难言的经”。如何使大家把家中“难言”的苦衷“言”出来,并得到解决,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干吗要花精力管这些琐事呢?恩格斯说得好:“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琐事。”琐事中有学问。“清官”之所以难断家务事,是因为他只掌握了行政管理学,没有掌握家庭学。现在有些人能当好厂长,却当不好家长,会说服群众,却不能说服子女,就说明家庭学应是一门独立学科。用管企业的经验套在家庭上是行不通的。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在学校里开设家庭咨询委员会,负责回答家庭问题。

有人担心对青年过多地讲家庭学知识好不好。其实没什么不好。对青年不仅可讲一般家庭常识,而且还可讲讲结婚的道理。当然,咨询的方式应该不拘一格。比方说,可以让来访者通报姓名,以便从侧面了解;也可以让来访者隐姓埋名,使其不至

于话到嘴边留半句。另外,咨询也不必一味地搞你问我答,有时也可以共同磋商,有时还可以发动来访者一块“会诊”,共同解决疑难问题。

(原载《文汇报》,1983年3月3日)

谈制约生育功能的因素

马克思说：“结婚不是同纯石头的艺术打交道”，而是“要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家庭一直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厂。生育是家庭最早的功能，也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个功能。生育的功能几乎是家庭所独有的功能，迄今为止还是别的社会组织所无法代替的。

种的繁衍，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就自然关系而言，生育新生命本是人的一种本能。这里通行着生物学上的规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

但是，人口的生产，又如马克思所说，总是“在一定关系中进行”。那么，哪些社会关系会影响家庭的生育呢？

1. 婚姻家庭因素：

婚姻有早婚与晚婚之别。一般说，早婚倾向于早育、多育；晚婚倾向于晚育、少育。育龄妇女如果在 20 岁就生孩子，那么在一百年内，就会比 25 岁才结婚生孩子的妇女，在人口的再生过程中，多生育一代人。

有结婚就有离婚。在离婚率高的国家，出生率低；在离婚率

低的国家,出生率就高。

妻子有多有少。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一般比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出生率高。妻多,一人生一个,合起来就不少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家庭,出生率一般都高。

妇女在家中地位的高低也与生育的多寡成反比。妇女在家中的地位越低,经济不独立,陷在家务中,越是把自己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越是要充分显示自己在传宗接代中的作用,子女自然就多。

老人由家庭负责赡养的,他们就把生儿育女看作自己晚年生活的一种保障,看作一种必要的“预付”。他们就认为多子多福,愿意多生孩子。反过来,社会福利事业发达,老人不用家里人赡养,人无后顾之忧的,就不愿意多生孩子。一句话,养儿防老养儿多;养老(指社会养老)防儿儿就少。

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关系的疏密程度与生育状况成反比。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密切的,家庭经济力量的增减就跟家庭劳动力的多寡直接有关,生育就被看成是同家庭利益攸关的私事,就倾向于多育。在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家庭结构紧密的大家庭,倾向于多育、早育,家庭规模越搞越大。韩非在《五蠹》中写道:“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现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子女一到成年就分居,甚至还有不到成年、不能独立生活的,也分居。父子不相愿,父就不养子、少养子。

2. 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似乎与社会无关。实际上,社会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生育状况。

一般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愈低,生产社会化程度愈低,社会

生产的发展就愈依赖于有较大数量的劳动力。有人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对社会制度变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资料生产,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原始社会以后,如果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主要靠大量劳动力的协作和分工的话,人们仍然倾向于多育、早育。相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高,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必然是主要依靠提高技术构成,并相对地减少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样,人们就倾向于少育、晚育。人们宁可把时间和费用用于专业技术的提高,也不肯多用于生儿育女。因此,社会生产力是影响家庭生育的首要因素,生产力水平同出生率高低成反比。

一般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生育看作家庭的大事。因为,那时家庭就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家中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是自己亲手劳动所得,所以,人们就倾向于多育、早育。相反的,商品经济发达,生产组织与家庭组织分开,生产、生活用品的自给程度很低,人类社会转而倾向少育、晚育。这说明,生产的组织形式,经济的结构,也是影响家庭生育的一个因素。

一般说,生活水平高,生活费用高,他们成家、生子、教育子女的费用也大,这种人就比较倾向于晚婚、晚育、少育。反过来,如果生活水平低,生活费用低,他们成家、生子、教育子女的费用也不会高,这种人就比较倾向于早婚、早育、多育。因此,我们说:“贫困出人口。”我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平高,早婚、早育、多育的就少。农村生活水平低,“多生一个孩子,只不过是做饭的时候多放一把米,多加一瓢水”,那不用说,早婚、早育、多育的也就多。解放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出生率高;解放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生率下降。国外也是这样。日本吃饭、房租

费用大,入托费用大,教育费用大,因此,现在日本有不少青年“宁可早买三大件(电冰箱、空调机、小汽车),不愿早婚多生孩子”。马克思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指出:“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费用成反比。”这是完全正确的。

3. 政治文化因素:

上述的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对生育起主要作用,另外,政治、文化、伦理、宗教,对生育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观念上看,坚持宗法观念、门阀思想和血统论的,就赞成多子多福。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就多育。据有关方面在农村的调查,第一胎就生男的,大多能主动领独生子女证;第一胎生女的,约有80%的人,就不大主动领独生子女证。安徽宣城一带,因生女而多胎约占多胎人数的30%。

从文化上看,文化程度高的,晚育、少育;文化程度低的,早育、多育。欧洲国家的妇女结婚较晚,平均年龄近24岁;非洲国家的妇女结婚较早,半数以上在20岁以前就结婚。世界上,平均结婚年龄在25岁以上的八个国家里,欧洲占五个。全世界妇女结婚的平均年龄在26岁以上的是苏联、瑞典,为年龄最大的国家。日本妇女的平均婚龄为25.5岁。据1978年统计,日本不愿生孩子的家庭占12.4%。在我国也是这样,据1980年的统计,独生子女率全国为42.56%。文化程度高的上海,独生子女率为87.06%,而湖南为34.86%,有的地区还要低。在本世纪60年代,我国各阶层的生育情况是:农四、工三、知二,这也是对生育与文化关系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最好说明。

从宗教上看,伊斯兰教准许12岁的少女结婚,准许男人多妻,因此,一般信伊斯兰教的倾向于早育、多育。罗马天主教禁

止离婚,禁止控制生育,因此,信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尽管经济、文化发达,出生率也并不太低。

从政策上看,许多发达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出生率。如法国颁布过法律禁止人工流产和出售避孕药具,匈牙利也奖励过生育,曾起到增加人口的作用。相反的,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采取过一些鼓励节育的措施,从而降低了出生率。在政策威力作用下,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做了绝育手术。其中中国有 3600 万人,印度有 220 万人,美国有 1200 万人,欧洲 1000 万人,拉丁美洲 400 万人,非洲 100 万人,亚洲其他国家 400 万人,加拿大 1200 万人。当然,政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只能起扬汤止沸的作用。像印度,官方从 1952 年起一直在用政策来控制人口,可是收效甚微,出生率还是维持在 38~40% 的水平上。匈牙利利用政策奖励人口,短期生效,过后又弹回到原来的水平上。

从性知识的普及情况看,东方国家性生理神秘化,过去不自觉节育。譬如日本,曾多次颁布“打胎禁止令”。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伦敦开过万国节育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仍不顾国际呼声,于 1929 年 11 月,出动警察,武力干涉,强行停止东京节育方案。相反的,西方国家性生理不神秘,不讳言,比较重视节育,能够自觉节育。

影响家庭生育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对这些因素所作的抽象概括,也只能是就多数而言的。具体到特定的家庭,情况就复杂了,可能是既有促进多育的正因素,又有促进节育的负因素,诸因素之间往往会互相抵消。因此,我们只有把握这许多因素的综合效应,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客观上看,从长远看,认为:人穷多育;可是,从微观上看,从近期看,

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1961年,是我国解放以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一年,有的省份出现了负数,这跟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出生率很低不无关系。因此,就1961年来说,又是“人穷‘少’育”了。

家庭生产人口同社会生产物质财富是不相同的。生产物质财富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家庭生产人口是人类改造人类的产物。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生产和培育人口的周期比生产物质的周期一般要长一些。即使不到一百年,那也要二十几年。二者更大的区别是:生产物质可以工业化,集体化,用机器大生产;生产人在目前还只能是个体化,靠人工,一个一个地进行。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里写道:“从事于智力活动的妇女,……以致使她生涯中最高贵的部分为妊娠、哺乳及育儿所耗费。到现在,大多数的妇女还憎嫌子女的过多。”是的,尽管人们不会因生育痛苦而不生育,但是,生育总是妇女的苦差事。不能把妇女从生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这是人们正在探讨的问题。

(本文收入《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性社会学研究的难点

近年来,随着两性之间的交往频繁,性学正在中国大陆悄悄兴起。性伦理、性社会学的研究亦随之展开。性社会学研究的难度远大于性生理、性医学。其主要难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性生活的目的。性生活的目的历来是两点:一为生育,二为享乐。可是,近来,人们的生育欲日益减弱,少生或者不生的人在日益增多。于是,以生育为第一目的的性生活微乎其微。再者,避孕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也为享乐式的性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避孕工具有效地割断了性生活与生育的天然联系。从此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没有了后顾之忧。性生活中的享乐成分急剧上升。对性生活目的的这一转变,怎样评价,现在是见仁见智。对这一转变可能引起的后果,更是各执一端。

二、婚前性行为。历来都认为性行为只能在婚后发生。可是,由于性生活目的的转变,由于避孕技术的提高,不少青年人的性行为提早到了婚前。美其名曰:试婚。试婚制在有些国家是允许的、提倡的,在中国大陆曾经批评过。试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一直认为女性婚前性行为为“失身”,而对男性未用“失身”一词,这是否公平?今后对“失身”的道德评价尺要不要调整?

三、婚外性行为。自婚姻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以后,性行为就被限制在婚姻范围内。但是,婚外性行为也不是没有。社会学界曾指出过几个“危险年龄”的阶段。现在危险年龄阶段在拉长。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在由少变多。前些时候中国曾批评有婚外性行为的,或与已婚者有两性行为的“第三者”。现在有人认为性行为是“纯属两人间的私事”。社会上还出现对某些“第三者”的同情。性社会学者提出对“第三者”要作具体分析,要分几种类型,有的要谴责,有的不一定谴责。究竟如何是好?

四、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同性恋是禁止的,并认为是违反人性的。如今有些国家允许同性恋者组成家庭,户籍登记。同性恋的合法性正在蔓延开来。有人说,中国的司法部门虽然反对同性恋,但是在处理上,已较前有所松动,是不是这样?如是这样,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五、排他性。两性生活中的“排他性”,在不同婚姻阶段是不一样的。在一夫一妻制阶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爱情总是自私的”观点十分流行。有人说:动物都有排他性,何况人呢?也有人说:动物有排他,也有不排他的。人,在有些婚姻阶段排他是天经地义,在有些婚姻阶段不排他也是天经地义。有人说,现在社会上的排他性在淡薄,相容性在增强。对这一变化是应当支持呢,还是反对?

六、手淫。手淫历来是禁止的,但又是从未间断过的。在有些场合,允许手淫确能避免两性间的混乱,能使一些人平静。但是手淫确能带来很多生理、心理上的问题。对手淫应当如何分析?

七、人工流产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人工流产的态度不一。有的国家认为人工流产是违法的,有的

国家认为人工流产是合法的。有的国家认为人工流产是不合乎道德的,有的国家认为人工流产是合乎道德的。在中国大陆,对已生过一胎的人的人工流产是受到鼓励的。性社会学界提出:自愿人工流产也是人权。尊重自愿人工流产就是尊重人权;反之,强迫人工流产才是不尊重人权。对这种解释如何从理论上阐述?

八、性和谐问题。性生理不和谐的现象是有的,但比例极小。过去,性生理不协调的人是不公开说的,是不会承认的。现在,有些人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动不动就堂而皇之地声称性生活不和谐。据性社会学家调查,性生活不协调的比例高达10%左右。有人认为这里有把性无知带来的不协调说成生理不协调的,但也不排斥把明明和谐的性生活说成不和谐的。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性生活不和谐在离婚中的位置。并不是一说性生活不和谐就准予离婚。决定离婚的首要因素是感情还是性生活?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社会学中还有很多,值得从长计议。

1991年9月16日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1991年第12期)

谈无产阶级的婚姻基础

提起婚姻的基础问题,我作为家庭社会学的爱好者不由得脸红。在这个问题上,近几年发言较多的是文艺界,而不是我们社会学界。文艺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早,发表的文章也比较多,既有用文艺作品形式、又有用文艺评论形式讲婚姻基础的。现在,不论文艺界内部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从探讨的广度和深度看,文艺确实是走在前面了。我本来不大看文艺杂志,可是这几年我看了不少,还做了些卡片和剪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文艺作品感染我,文艺界的同志促进我开始从理论上关注婚姻的基础问题。

文艺界对婚姻基础的看法不外乎三类:一是爱情为主论;二是经济为主论;三是爱情、经济、政治等等混合论。从三种呼声的音量看,早两年,前一种说法喊得比较响,现在是后两种说法喊得比较响。

在婚姻基础问题上,既然社会上出现了这么多观点,家庭社会学就不能回避。为此,我又对上海部分区的结婚、离婚情况作了点调查。在调查中,我深感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大多是幸福的、持久的。

比如,有家塑料厂的女青年小孙,爱上了一位“干一天,九角

钱”的男青年小许。小孙的姐姐为小孙介绍了个大学生。小孙断然拒绝。由于小孙和小许真心相爱，不计较金钱，婚后生活得很好。小许的父亲瘫痪在床，小孙精心服侍。

又如，领航员小吕同女工小刘相爱。在恋爱过程中，小刘患了脉管炎，手脚麻木，腐烂。小刘劝小吕：“忘掉我吧……”小吕不但“不忘掉”，反而备加体贴小刘。他请了九个月事假，看护小刘，为小刘喂药，用嘴吸出堵塞小刘喉咙口的痰。

可是，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两样了。他们大多是不幸的。

父母包办的婚姻，固然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婚后相爱不起来的更多。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不是父母包办的，而是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婚姻，也为时不长。钱一拿到手，夫妻便分手；也有的因钱弄不到手，也会气得闹离婚。他们貌似相爱，实则假爱，是在做戏。

还有那些以所谓政治为唯一基础的婚姻。他们所爱的大多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爱的是地位、权势。权大时，大爱；权小时，小爱；没权时，就不爱。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十年动乱”中崩溃的婚姻，有许多是以“政治”为准绳的产物，而崩溃则是由一方的政治地位变化造成的。当然这里有自愿的，也有勉强的。依我看，即使是被迫的，那也是因为迫使人的人坚持婚姻以政治为基础。有人说离婚增多，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充其量只是讲了问题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社会的政治不安定，带来了离婚的增多。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每逢社会上搞一次什么运动，抓一次什么分子，就会出现一批崩溃婚姻和残破家庭。这笔帐，无疑地应该记在频

繁的政治运动上。人为制造的斗争是最大的破坏婚姻的第三者。但是,这同婚姻以政治为基础的观点又何尝没有关系!婚姻以政治为基础的观点本身,就是“突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顺便说一句:新婚姻法颁布后,有人说离婚增多了,也有人说是绝对数增多了,相对数即离婚率并未提高。不管怎么说,从绝对数上看总是比前几年增多了。于是有人担心会带来社会不安宁。据我了解,就是从绝对数上看,这两年的离婚案,只抵1953、1954年的几分之一。试问:当时的社会安定不安定呢?应该说是安定的。夸大离婚的影响,把离婚增多归罪于新婚姻法,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婚姻基础的看法。新婚姻法强调“感情确实破裂”方能离婚,就是从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理论出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致的。

前些时候报刊上有些文章认为,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是什么弗洛伊德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不足的。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问世时,弗洛伊德还是个普通学生,没写过什么著作,更谈不上有什么“主义”。

系统地提出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不是别人,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0页上,恩格斯写道:“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第77页上,恩格斯写道:“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在第79页上,恩格斯写道:“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恩格斯的论述当然不只这些。此外,恩格斯还讲过“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还讲过“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等等。

恩格斯的话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可是,有些同志硬说这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讲得通吗?

诚然,这种观点不是恩格斯一人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他是“执行遗言”,他是在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这里说的亡友是谁呢?不言而喻,是马克思。换句话说,这些看法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共同看法。马克思在谈到爱情时说:“……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15页)马克思是打的比喻,意思是:爱情就是互爱,不是爱物质,也不同于阶级之爱。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列宁曾改动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提法。可是,列宁在评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

当然,列宁主义也得发展。不过,不管怎么发展,总不能把马列主义说成弗洛伊德主义。

现在也有些报刊这样说:恩格斯的说法并不错,错在不该在今天拿出来宣传,因为恩格斯这话是指的未来,是指“实现了按需分配”以后可以爱情为婚姻基础。这种说法比上一种说法似乎好一些。它毕竟肯定了恩格斯的论述。可惜,在阻挠宣传婚姻以爱情为基础方面,二者却是异曲同工。

恩格斯在一个世纪前说这番话固然有预言的性质,但决不是指“实现了按需分配”以后。恩格斯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规定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

灭以后”，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0、79页）。具体说来就是，“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3页）。

请问：这些前提条件在中国出现了没有？

应该说：有的已经出现，如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的消灭，等；有的正在出现，如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等；有的开始出现。

一言以蔽之，总不能认为，在中国，“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对“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的封建婚姻毫无触动吧！总不能认为，在中国，“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对资产阶级的“权衡利害的婚姻”毫无触动吧！（引文为恩格斯语）杜林先生曾认为，“不必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经济基础分隔开来”，结果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反杜林论》第313页）

我并不否认到共产主义才能普遍实现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是，到那个时候处处都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了，还有什么“基础”可言？还有什么必要留到那个时候去宣传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基础”是相对“非基础”而言，没有了“非基础”，“基础”作

为它的对立物也就不复存在。

古代虽也有夫妇之爱，但在古代不可能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合，大概不是为金钱吧？要不，李清照为什么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绸衣呢？黑格尔的妻子与黑格尔结婚前，拒绝嫁给有钱人，却要嫁给五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的黑格尔，并主动提出“分文不要”，这岂不更说明他们的结合不是为金钱了？但是，在她那个社会，这种夫妇之爱，仍“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正因为还有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存在，有以地位为基础的婚姻存在，有以仪表为基础的婚姻存在，总而言之，还不能普及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所以我们才有义务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唱赞歌，造舆论；所以我们才应当有勇气把旧社会的“附加物”变为“基础”，把旧社会的“基础”变为“附加物”。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做不到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当中的个别人物都能做到，无产阶级为什么做不到？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象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9页）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恩格斯的论断“不是凭空说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多次指出：“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这话是一个世纪以前说的，今天大工业

的规模更大了,大工业甚至已波及到家庭生活里来了,怎么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反倒宣传不得呢?在马克思、恩格斯说这话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具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么,在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中国,怎么反倒不会促使“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产生呢?从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一事实来看,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并不渺茫,这不是什么“例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我这样翻来覆去引经据典,有人可能以为我的“文风”不正。请原谅,我认为,谈别的问题不一定引得这么多,而在婚姻基础问题上却不能不大量引证。因为,目前争论的双方都说自己的观点并不违背恩格斯的教导。所以,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原原本本地引出来,就不能把问题的实质讲清楚。

在对婚姻基础的探讨中,也有人提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这并不错,那么再进一步追问一下: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们的言下之意,还是金钱、地位那一套。换句话说,金钱、地位是婚姻的基础的基础。

这种提法似是而非。

准确地说:爱情的基础仍不是金钱、地位,而是马克思讲的互爱。

男女双方假如有一方不爱了,按理爱情就可能消失。也许他们各自都有许多可爱之处,但也于事无补。我们常用“最可爱的人”称呼一些好同志,可是一对“最可爱的人”闹离婚的事也不是没有的。这就雄辩地说明爱情的基础不在于双方是否可爱,而在于彼此是否相爱。

这里的爱当然不会是超然的,不会是神秘莫测的。古人说:

谈无产阶级的婚姻基础—————

“择偶须借千秋业，爱有源头情不竭。”爱情的源头就是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人生观。有了这几“共”，才能互爱得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里，以哲理的形式，讲了主人公薇拉和普罗霍夫之间，以及后来和吉尔沙诺夫之间，在追求先进科学和崇高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纯真而高尚的爱情。因此列宁称这部书为社会主义恋爱圣经。

爱情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结合体，忽视其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爱情的根本特性取决于人的社会性。现在有些人单纯追求自然性，喜爱“悦其容”者。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诗经》上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的为什么看中这个女的？一是因为她“窈窕”，外形美；二是因为她“淑”，品德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还有点两点论，我们有的青年却只取其一点，实在是愧对古人。话也得说回来，要两点论也不容易。俄国的著名诗人普希金因为娶了同自己没有共同志趣的“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坦丽为妻，结果把精力都花在陪妻子赴宴、跳舞、应酬、交际上，弄得债台高筑。到头来又与情敌决斗，不幸中弹，37岁就夭折了。

从不正确的动机出发建立的“爱情”不消说了，就是从正确的动机出发建立的爱情，也还有个维系、巩固和发展的问題。如何巩固？周恩来、邓颖超从他们夫妻相处几十年的实践中，参照周围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的“八互”，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帮、互让、互谅、互慰是发展爱情的保证。

互敬、互爱，就是要平等待人。不能把配偶当作私有物。如果像《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那样，对林道静说：“你是我的！”那就错了。时间一长，也就爱不下去了。

互信、互勉，就是要彼此信任，不胡乱猜疑。多疑，是庸人自

扰。列宁和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订了个“条约”：互不盘问，决不隐瞒。这两条是值得人们在爱情生活中借鉴的。互相信任，彼此放心，当然不是说放任自流，还得互帮、互让。

互帮、互让，是由于人们的水平有高低之别，因此要开展互学。一个愿教，一个愿学，两人一起享受“小红低唱我吹箫”的闺房之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夫妻之间一旦发生口角，切不可“以牙还牙”，更不能大动干戈。慢性子的，要让急性子的；急性子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有些男人打老婆，这是要不得的事。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忆马克思》里写道：“打老婆的人（当时在伦敦非常流行）马克思要把他打个半死才痛快。”这固然是形容之词，但我还是想奉劝那些打老婆的人：应该停手了，免得将来到马克思那里去的时候，被马克思“打个半死”。

互谅、互慰，这是指一方出了差错，或者不称心时，另一方要给予体谅和鼓励。假如丈夫一失手把全家心爱的花瓶打碎了，本来已很心疼，这时妻子如果再严加责备，那就会更加恼火，弄不好会吵起来；如果妻子体谅他的心情，即使妻子自己也很心疼，但能克制自己，再安慰对方几句，效果就会是很好的。

此外，还有个婚姻的破裂问题。破裂不破裂也要看其爱情的状况。

爱情是婚姻的灵魂。婚前恋爱以爱情为基础，婚后生活以爱情为基础；婚姻崩溃也要以爱情为准绳，再婚又要以爱情为基础。这才是真正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本文收入《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谈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名言

恩格斯在谈结婚和离婚问题时，各有一句名言。这就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二章的末尾中所讲的：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是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

对这两句话，早些年人们不大引用。这两年先是文艺界有人引用，接着是理论界有人阐述。随着社会学的死而复苏，似乎

谈论这两句话的人在日益增多。如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警句或者其他人的什么警句一样,虽然都在引用,但出发点不尽相同。比方说,有些喜新厌旧的人就用它作为闹离婚的挡箭牌。这么一来,就有人认为,这两句话不宜多引,甚至有人把离婚率的提高也归之于这两句话引得太多。当然,老是讲引得多,似有笨拙之嫌。比较婉转的说法是:“引得不全面”,“引得过早”。

于是,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对恩格斯的两句话究竟应当怎样认识?

结论的前提

真理总是具体的。无条件的真理是没有的。恩格斯所论述的真理自然也不会例外。

那么,这两句结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关于结婚自由的前提,恩格斯在这句话的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以后。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没被消灭以前,婚姻“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77、74页)。说到底,就是没有多少婚姻自由可言。

离婚呢?关于离婚为幸事的前提,恩格斯在这段话中也讲了:“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这便是离婚“为幸事”的前提。不过,这个前提不是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的,不像“结婚自由”那样,明确指出是在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因此,人们便有多种理解,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比

谈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名言————

如,认为这是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就是各种见解中的一种。持有这一见解的人,旨在保护现有的家庭,不希望离婚案增多。这种动机并不坏。问题是不合恩格斯的本意。

恩格斯的本意是什么?这只要看一看这句话中的“诉讼”二字,就可以明白大半了。法院是专政的工具。到共产主义社会大概不会有法院了,至多会有个调解处。没有了法院,看来也不再会有“诉讼”。反过来说,既有诉讼,就不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很明显,离婚为幸事的前提一定是在共产主义到来以前。

前一句是指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后一句是指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姑且不问“后”到什么时候,姑且不问“前”到什么时候,我们根据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可以推断,紧接着资本主义消灭以后的是社会主义,紧连着共产主义之前的也是社会主义。毋庸置疑,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话,至少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适用的。

时代的需要

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但是,恩格斯毕竟没能见到过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恩格斯关于婚姻的名言只能是预言。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巍然屹立在地球上长达几十年后的今天,历史不容许我们继续把这两句话当作预言而束之高阁。我们有义务把这两句话放在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并作出判断。

恩格斯的两句话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婚姻的结合应是以爱情为基础;婚姻的保持要以爱情为动力;婚姻的解除也只能是因为爱情的消失。爱情是婚姻的灵魂。

在恩格斯以前,认识到爱情是婚姻灵魂的人是有的,但,多

是诗人的浪漫主义,不是科学的论述,而况且真正实践这一点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们知道,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是从商品开始的;同样,恩格斯论述人类社会的演化是从家庭谈起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家庭社会学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恩格斯指出:“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5页)

那么,千百年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在奴隶社会靠的是掠夺和买卖。胜利者往往是变战利品(夺来的女子)为妻子的。在封建社会靠的是封建礼教,靠的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靠的是门当户对,一言以蔽之,靠的是牺牲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掠夺、买卖婚姻没有了,口头上也讲男女平等了。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虽然“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象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5、67页)总之,在剥削阶级主宰一切的私有制社会中,婚姻同爱情是割裂的。有爱情的婚姻是偶然的例外,无爱情的婚姻被视为正常。

可是,生产资料一旦实现了公有化,作为私有制细胞的个体婚家庭就开始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贫富对立状态不复存在了,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婚姻范围。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男女可以平等地走向社会,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妇女因为没有经济

收入而在家中受奴役的从属地位。妇女在经济上的自立带来了妇女在婚姻上的自主。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从而为清除私有观念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公有观念的确立和加强,必然要触及到家庭这一最顽固的私人堡垒。妻子将不再是也不愿是丈夫的私有物。丈夫将不再是也不愿是妻子命运的主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婚姻关系的这些巨大变化,为婚姻的充分自由开拓了广阔天地,为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做好了准备,从而使恩格斯的伟大预言有可能逐步变成光辉的现实。

1953年,当社会主义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萌芽的时候,随着老婚姻法的实施,离婚案突破一百万件,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最高纪录。这,说明了什么?这里尽管有欠妥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有勇气向封建婚姻发起进攻的。

1981年,新婚姻法实施了。离婚案又有增多的趋势。现在的离婚案跟过去不同的地方,一是无错离婚的增多,二是因爱情转移而离婚的增多。于是这又引起人们的非议。有的人甚至写文章批判被新婚姻法所采用的恩格斯的理论。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怕离婚,归根到底是不认为离婚为幸事。你如果认为是幸事了,你只会去为他们庆幸,怎么还会去为他们担忧呢?应当看到,离婚案增多,主要不是离婚者的无理取闹。用恩格斯的话作离婚挡箭牌的人虽有,但多数人是在运用恩格斯的理论。尽管有的离婚者可能并不知道恩格斯的说法,但这更加说明恩格斯的话代表了后人的呼声。他们是在不自觉地实践恩格斯的理论。

道德的跚跚

既然恩格斯的“两句名言”指的是今天，既然今天也开始具备实现恩格斯“两句名言”的经济基础，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践恩格斯名言的人并不太多呢？这跟传统的封建家庭观、婚姻观是分不开的。

经济基础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迟早是要变的。不变是不可能的，道德观总有一天要同经济基础相协调，相适应。但是，要变还要一定的时间，还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主要是因为道德观念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同经济基础不是一码事。道德观念是经过千百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尤其在中国，封建的道德观经历的时间最长，体系最完整。因此，当旧的经济基础“刹车”时，车上的旧的道德观念的惯性作用很大，不会在一瞬间就停下来。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好比风与浪。通常讲：风平浪静。从根本上讲，是这样。其实，不论是湖泊，还是海洋，风平，浪都不会马上“静”。至少在风平一两小时后，浪才会静下来。旧道德也就是那不会立即平静的“浪”。对道德与经济基础所不同的这一特性，可以称“道德惯性”。

道德观念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是互相牵制、彼此交错的。家庭观、婚姻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有谁想在家庭观上有所突破的话，必然受其余部分的牵制。比方说，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回家谁烧饭，几个问题一提，你那刚想露头的突破，则必然要缩回去（其实，实际困难的解决同先进道德的宣传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道德观念内部相互关系的这个特性，可以称“粘滞性”。

从道德的惯性和粘制性来讲,家庭、婚姻上的道德同其他道德是一样的,或者说还可以加一个“更”字。为什么会“更”呢?这主要是因为,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事,涉及到每个人锅台边、枕头边的事,所以,阻力就特别大。多少年来,家庭都是别人不得干预的“禁区”。以致家庭成了私有观念的避难所,成了针也插不进的“封闭体”。

家庭观念的惯性和粘滞性之所以要加一个“更”字,还因为在中国,家庭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领域。管“国事、天下事”都还来不及,谁去管“家事”呢?所谓“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便可以说明家庭学在中国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出版过家庭学方面的著作,甚至连文章也很少。要有,那也多是泛泛地讲一些传统观念。究竟无产阶级应当有什么样的家庭观,社会主义应当有什么样的家庭观,大家不甚了了,不“承前”难以“启后”,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立新”,就难以“破旧”。这是事情的又一方面,二者都是不可忽视的。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旧的家庭观念在支配着今日之家庭。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共产主义表现在锅台上。现在是到了在家庭领域中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时候了,不容再拖下去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号召我们撕去蒙在家庭上的资产阶级面纱。我们撕得怎样了呢?我们愿意在一切领域中同私有观念决裂,为什么不肯清理一下在家庭、婚姻上的私有观呢?什么“爱情总是自私的”,什么“儿子总是自己的好”,这同共产主义道德有共同之处吗?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无疑地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家庭中提倡共产主义家庭观、婚姻观。恩格斯的两句名言就是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家庭观的准绳和核心。有些人一方面批评人家认

——谈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名言

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宜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看法,另一方面却不主张宣传被他自己认为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其实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恩格斯的名言,岂不是咄咄怪事吗?我们不应该把共产主义婚姻家庭观从共产主义道德中排除掉。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

(本文收入《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谈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两句名言————

愿无情人不成眷属

——对影片《谁是第三者》的思索

我想从社会学角度就影片谈点看法。桑雨晨既说过她自己讲不清第三者问题,又批评别人没搞清楚。依我看,不少理论家也没搞清楚。“第三者”的专利权在中国。这是几年前,在北京一次会上首先采用的。“第三者”作为生活语言,随便说说,未尝不可,作为理论术语,就显得内涵糊涂了。请问:第一者是谁?没明确第一、第二,何谈第三?还有,划分第一者与第三者(假定非用“第三者”不可)的界限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婚姻。

如果再追问一句:婚姻的基础是什么?那么,用马、恩、列的观点回答,只能是爱情。第一是爱情,第二还是爱情。

爱情应当是划分第一、第三的根本标准和最后的标准。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面不爱了,另一面原有的爱,严格讲,也就不复存在。至少是不太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假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共产主义萌芽的话)是什么?谁都知道,叫“他人第一”。第三者不应当不顾“他人第一”的道德原则,插足到相爱甚笃的一对夫妻之中。但是,如果因种种原因,第一者(或称第二者)已同第三者相爱甚笃了,那么,第二者(或称第一者)岂不是也应该坚持“他人第一”的道德原则,主动退让吗?如不退让,是不是自己从第一、二者的地位转化为第三

者了呢？这不是诡辩，这是无情的辩证逻辑在捉弄人。

华超在绘画上是强者，但在世俗面前是弱者。弱者则弱矣，但是他有一句话是颇有价值的。他一再提出要同张恩寿“客客气气地分手”。我们虽不能给“客客气气地分手”的说法打到“5、4、3”分，但是说它是合乎“语言美”不算过分。“客客气气地分手”用法学、社会学的术语讲，叫协议离婚。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在拥有“地字第一号”球籍的中国，不客气固然不容易分手；客气了，更难分手。不打不闹不判离婚，这是司空见惯的，同时也是“司空”们逼出来的。有客客气气分手愿望的华超，不就被学校内外的“司空”们逼得只好不客气地离婚吗？电影只有两集，如果允许我学高鹗，续《谁是第三者》的话，那我将安排华超帮前妻张恩寿做成一笔生意。不难想象，必定有人骂他们“藕断丝连”。可我认为：协议离婚与藕断丝连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也可能是高级阶段的婚姻道德。为什么夫妻之“藕”断了以后，连起码的同志之“丝”也不能有一点呢？当然，要“有情人成眷属”，要“无情人不成眷属”，要已不成眷属的前夫、前妻之间还能有同志之爱，还得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花大力气。这需要文艺界、法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党政部门等各方面通力协作，为新观念配套，按恩格斯所说的“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原载《文汇报影时报》，1988年4月2日）

中国的跨国婚姻

要研究中国的跨国婚姻,是一大难题。首先,婚姻是个人私事,虚实难辨;其次,中国的跨国婚姻,绝大部分是跨出国门之婚姻,难以跟踪调查。因此,本文所述之跨国婚姻只能限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并在中国政府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的跨国婚姻。至于说那些不履行婚姻登记手续的国际间的事实婚姻,不在本文叙述之列;还有那些不在中国境内登记的跨国婚姻,也不计入本文所统计的数字里面。其实,国际间的事实婚姻,在中国是不少的。有人把外国老板养在中国别墅里的“准妻子”称作“金丝鸟”现象。中国有多少“金丝鸟”?有人做了个大胆假设:“有多少跨国公司老板,就有多少‘金丝鸟’。”可是,假设毕竟是假设,本文依然把这类问题“打入另册”。文中,为了说明观点所运用的数据,其原则是:宁可距离观点远一点,根据也要充足一点。

一、中国第一部跨国婚姻法规的 诞生是一大转折

中国与异族通婚的历史久远。汉代有王昭君,唐代有文成公主。她们与异族通婚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传为佳话。她们的远嫁,不仅为民族换来了和平与安宁,而且对彼此在经济、文

化上的交流起到很好的作用。盛世出跨族婚姻。自唐以后,封建制度日益稳固,跨族婚姻不复出现。一直到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又带动了中国跨国婚姻的兴起。翻译家李立三、杨宪益,诗人萧三,文学家郭沫若,外交家王炳南等人的跨国婚姻,为世人所称颂。

可是,在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中,中国不仅几乎没有一例跨国婚姻,而且连以往那些著名的跨国婚姻也惨遭不幸。“文革”后,直到1978年前后,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那么几例。

一例是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田力与来华学习汉语的法国女郎奥迪尔的相爱。他们之间的爱,受到周围人的恨,谁也不敢批准他们结婚。奥迪尔找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找到了法国总统和国民会议议长。法国的这些领导人很同情她,便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奥迪尔的求婚念头。最后是邓小平点头,这对异国恋人才于1977年11月7日在北京举行婚礼。

此后不久,1978年春夏之交,辽宁大学中文系七八届毕业生尹国庆,在毕业前夕向组织递上了要与法国女留学生玛丽安结婚的申请报告。校方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是组织围攻,最后是分配尹国庆“回农村”。玛丽安在与校方多次交涉均无济于事,后,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此情况通过多种渠道反映到中央高层,才了却了这桩从地方打到北京的“鸳鸯案”。

几乎与他们同时,在湖南师范学院一位来华任教的美籍女教师朱迪,突然宣布要与中文系学生梁恒结婚。于是,招来一批又一批的人做思想工作,招来数不尽的好心“提醒”,劝他们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辽宁尹国庆案了结之后,湖南的这一对也迎刃而解了。

问题很清楚,在1978年前后,中国的跨国婚姻全是凭领导人的开明来解决的。遇到了开明的领导,有情人能成眷属;遇到不开明的,就要被拆散。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跨国婚姻已不是一年有一起两起,而是每天都有好几起了。怎么办?再继续靠“通天”,靠国家领导人审批,已是不可能的了。只引进资金,不引进感情,已是不可能的了。不是吗?人类通婚圈的半径一直是在不断延长的。今日人类通婚圈的半径是同一个国家商品流通的半径、经济交往的半径相伴相随的。经济的国际化必然带动婚姻的国际化。于是,经过反复讨论,在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198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接着又颁布了《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法律规则形式认可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同胞通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规定》中指出:“只要男女双方自愿要求结合,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不是现役军人、外交人员、公安人员、机要人员和其他掌握重大机密人员,不是正在接受劳教和服刑的人,都准予结婚。”

——中国的这项规定,同许多国家的同类法规相比,是比较宽泛的。

——中国的这项规定,将人们在跨国婚姻上的担忧、恐惧、踌躇、疑虑一扫而去。

——中国的这项规定,把中国的跨国婚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领导恩赐变为公民权利,从舆论不容变为政府保护。

跨国婚姻既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产物,又是中国改革深化的标志,开放面扩大的标志。

跨国婚姻除了对众所周知的人种融合起到作用以外,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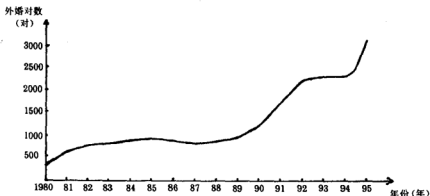
要的是对中外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观念、文化上的交流和汇合中,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中国有句话:“枕头边吹的风,风力大。”事实也告诉人们不可低估跨国婚姻的文化价值。

199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增选了一位具有法国血统的女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在中国领导集团的悠久历史中是第一次,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开端”。

二、中国跨国婚姻的特点

中国当前的跨国婚姻,既不同于欧洲的跨国婚姻,也不同于中国过去的跨国婚姻,有其自己独有的时代特点。

1. 发展速度快。自1980年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上升。1995年为1980年的七倍多。现在,每年都有三万对“异国鸳鸯”从中国飞到世界各地。以上海为例,可以绘出一幅涉外婚姻增长趋势图:



中国的跨国婚姻

从上海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跨国婚姻的增长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前,逐步上升;1986年至1988年略有下降,虽有回升,但尚未赶上1985年;1989年以后,大幅度上升。换句话说,前九年增长2.3倍,后六年增长3.2倍。

2. 地域分布广。中国的跨国婚姻涉及到53个国家和地区。早几年,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近年以东亚居多,东亚中又以日本居多;在日本人中又以道地的日本人居多。具体地说,1986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美国71人,日本40人;而到了1990年,美国183人,日本262人。两者相比,美国只增加两倍以上,而日本则增加了近七倍。

3. 华侨多。在所谓同外籍人通婚中,华侨、外籍华人一直在跨国婚姻中占很大比重,通常有70%。近年来,中青年新华侨回国找对象的比例在上升。比如在1995年的上海跨国婚姻中,仅澳大利亚一国的新华侨就占有所有跨国婚姻的1/6。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寻根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并不令人满意。

4. 外嫁的多。中国的跨国婚姻基本上都是跨出国门之婚姻。女性外嫁的约占跨国婚姻的90%以上。据美国的统计,嫁到美国的东方女性,70年代每年约为几百名,80年代初期每年约为几千名,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跃而为年均万名。其中,菲律宾女性一直遥遥居首位,中国大陆的女性始终名列第三。在外嫁的中国女性中,有女明星、女球星。上海近三年中,婚后留在上海的外国女性,只有一位朝鲜姑娘。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嫁向中国的人数尽管不多,可是呈上升趋势。

5. 文化层次不高。在中国登记的跨国婚姻,在文化层次上,尽管可以说有高有低,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但是从总体上说,文

化偏低。文化水平同华侨的跨国婚姻不能相比,同过去来华的跨国婚姻也不能相比。比如日本的男性,多为农民、小职员、私营企业主,学问、气质、形象都不怎么样。与此相应的,同日方相匹配的中方层次也不算高,多为中学毕业,或是待业人员或是服务员,幼儿园、小学教师,护士。相比较而言,倒是与欧美成婚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有博士、总经理、总裁等。

三、影响中国跨国婚姻质量的几个问题

跨国婚姻的质量参差不齐。其中,质量不高的不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 婚姻的基础不是为了爱情。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这是人们的共识。可是,据学者就婚姻动机所做的调查看,为爱情的跨国婚姻趋于零。为出国的占到48%,为改变环境的占了近20%,为留学的占13%,迫于压力的也占13%,盲目的占6%多一点,为爱情是零。多数人的动机是:做一年夫妻,换一张绿卡。

2. 出现了一批年龄悬殊的“祖孙婚”。在跨国婚姻中,老夫少妻的现象不胜枚举,“年近耳顺之年的老翁娶到妙龄女郎”的事随处可见。有学者对广东省涉外婚姻做过统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20—29岁的占11%,相差30—39岁的占5.8%,相差40岁以上的占2%。上海某饮食店一位21岁的女子,心甘情愿地嫁给72岁的海外老翁,还有一位20出头的姑娘嫁给了一位82岁的外籍人士。自然,也有一位20几岁的男青年娶了一位60多岁的美国妇女为妻的。他们的逻辑是:年龄越大越好,身体越差越好。

3. 出现了一批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有人对30起跨国婚姻做调查,其中相识1~3个月的占1/3,相识3~6个

月的占 1/3,从相识到结婚时间最短的,有四天的,还有两天的。个别人,吃准对方有钱财,就来个“当天相识——当天同居——当天登记”。据中国某市涉外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说,有位姑娘在连外籍人士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来登记结婚。北京有一对异国男女因语言不通,竟靠打手势来表达。当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劝他们三思时,那中国少女反诘一句,语惊四座:“你们难道不懂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吗?”诸如此类的闪电式结婚带来了婚姻生命周期的瞬时性。

4. 外国男性的“骗婚”现象严重。外国男性隐瞒婚姻史的情况相当严重,结过婚的说没结婚,没离婚的说离婚,没丧偶的说丧偶。这里举一桩不是欺骗也是欺骗的例子。一位阿拉伯人在婚史证明上写的是:“没有婚姻障碍。”结果,一位中国姑娘就嫁给了他。可是,婚后发现他家里已有三个妻子,因为他们国家允许一男娶四女,这就是他所谓的“没有婚姻障碍”。还有的外国男性隐瞒轻度精神病史,或夸大家庭富裕程度,还有个别人怀有不良的政治动机。这些都为婚姻的解缔设下了伏笔。

5.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上述问题的存在,其最终表现是离婚率高。离婚不是坏事,但离婚率过高也值得注意。以上海为例,近年回上海办离婚手续的逐年增多。离婚增长速度高于结婚增长速度。从 1990 年到 1995 年结婚对数增长 2.4 倍,而离婚增长对数增长 2.8 倍。1990 年离婚与结婚之比为 20%, 1995 年为 26%。应当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离婚率并不是很高的。但不回上海办离婚手续而在境外离婚的,也相当多。很明显,跨国婚姻的实际离婚率远不止于此数。

四、中国跨国婚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是不会再关的了。只要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指导思想不会改变,只要经济的国际化大趋势不变,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跨国婚姻必将有增无减。这是中国跨国婚姻的第一个大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的由穷变富,中国的跨国婚姻必将由单向变为双向。现在已经露出了嫁向中国,留在中国的苗头。这是中国跨国婚姻的第二个大趋势。

中国的跨国婚姻已在中国引起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关注,也引起了各国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的关注。只要我们完善婚姻管理制度、提高婚姻管理水平,中国跨国婚姻的质量一定会由低变高,这是中国跨国婚姻的第三大趋势。

这三大趋势是必然的。可必然出现的东西,也有个实现得早还是晚的问题。为了尽快把三大趋势变成为三大光辉的现实,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 从法规上下功夫。为了避免草率的“闪电式”的婚姻,我们做出补充规定:凡办理涉外结婚登记的人,应双双填写结婚登记申请书,三个星期后方能领取结婚证书。如在三周内撤回申请的,必须在半年以后才允许再与他人办结婚申请。为了减少外国男性的欺骗行为,1984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涉外婚姻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上海办理涉外婚姻时,要持有外方在中国的本国领事馆出具的在华居住半年以上的证明,否则不予办理。这些补充规定都对堵塞跨国婚姻中的不良行为起了一定作用。

2. 在政府行为上下功夫。根据国务院 1994 年 104 号文件, 上海撤销了五家跨国婚姻咨询机构。事情是这样: 随着“外嫁热”的蔓延, 中外便产生一批专干跨国婚姻中介人的人。人称他们为“专业红娘”。美、日都有什么“相亲团”之类的组织来华。他们都是以介绍跨国婚姻为手段牟取暴利的人, 搞变相买卖婚姻。后来, 由政府出面, 予以取缔。并由工会出面, 办了个涉外婚姻咨询机构。

3. 在道德水准上下功夫。跨国婚姻是中国亿万家庭的一部分。中国的家庭质量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中国的家庭有“五词宪法”之说。这就是: 富裕、文化、健康、和谐、贡献。

富裕, 是指经济收入和消费。富裕是物质生活幸福的前提条件。但富裕决不等于幸福。

文化, 是指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 是指家庭品位。家中没有文化, 情趣不会高雅。但是, 文化也不等于幸福。

健康, 是家庭幸福的生理条件。长寿也是一项社会指标。但是, 健康又不完全能由主观决定。

和谐, 是家庭幸福之所在, 是家庭质量的根基。不和谐就不能组成家庭。和谐是婚姻的生命线。和谐则婚姻存, 不和谐则婚姻亡。

贡献, 是家庭的社会目标, 也是衡量家庭的重要社会指标。人总不能只为自己活着。社会要靠千家万户对社会做贡献而发展。贡献自然是多方面的。

上述五个方面, 是家庭质量的方向和目标, 是衡量家庭质量的五把尺子。五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可是, 它们在把家庭质量量化中的权数不会是一样的。中国学者认为: 富裕的权数为 2, 文化的权数为 2, 健康的权数为 1, 和谐的权数为 3, 贡献的权

数为2。

这就是说,最佳的家庭质量是:

$$(富裕)20 + (文化)20 + (健康)10 + (和谐)30 + (贡献)20 = 100$$

当然,家庭质量指标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方说富裕,不仅有个收入多少问题,还有个消费结构问题。单有一个英格尔系数是不够的。再比方说和谐,既包括夫妻和谐,又包括长幼和谐。还有贡献,有物质贡献,有精神贡献,还有各类公益活动。这些都需要有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来延伸和补充。

中国在婚姻质量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是环绕“和谐”来做文章。上面提到年龄悬殊问题,便是从和谐角度考虑的。年龄悬殊不是不能和谐,而是说,由于有代沟存在,至少为和谐增加难度。上面还提到“闪电式”问题,也是从和谐出发的。一见钟情是有的,但是,相容性毕竟需要相识的过程。中国有句话,叫作:和气生财。夫妻不和,家庭不和,财富很难积累起来。没有财富,如何添置文化设施,又如何为社会做贡献。

跨国婚姻是国际婚姻。国际婚姻应有国际的关心。希望我们各国的社会学者携起手来,为提高跨国婚姻的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1996年4月18日在荷兰莱顿大学讲学的讲稿

中缅边境的跨国婚姻

1990年8月,我去云南省的潞西、陇川、瑞丽、畹町四县市,沿中缅边界走了数百里,就跨国婚姻和跨国家庭问题做了些调查。

所谓跨国家庭,包括六种类型:一、中国人同外籍人结婚,或定居国外,或定居国内。二、夫妻为同一国籍,但分别居住在两个国家。三、夫妻分别为两国国籍,或居住在同一国家,或分居在两个国家。四、同一个人,在两个国家有两位配偶。五、家庭成员有的在中国,有的在缅甸或其他国家。六、整个家庭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缅甸,经常流动,两地都有住处。

跨国婚姻在激增

中缅边境的跨国婚姻基本上是逐年增多。如畹町市,全市七万余人,跨国通婚的:1982年为5对,1984年为10对,1985年为18对,1986年为10对,1987年1至9月为20对。近年没有全面统计,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大幅度增加。

据德宏州政府民政部门1987年对瑞丽、潞西、畹町三县市的统计,跨国婚姻有1314对,约占总户数的4%。实际上决不止这个数字。我对畹町、瑞丽的几个寨子挨家挨户调查的结果

是,混板村 53 户,有跨国婚姻 12 户,约占 22.6%;瑞丽的大等贺,是个大寨子,有跨国婚姻的户数占全村户数的 30%。在陇川,流动家庭比比皆是。

中缅边界的跨国婚姻有如下特点:一、农村大大多于城镇,农民大大多于工人。二、傣族大大多于景颇族,少数民族大大多于汉族。三、进来的远远大于出去的。

跨国婚姻增多的原因

中缅边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跨国婚姻呢?

一、有历史传统。在瑞丽一带,是“一个坝子,两个国家”。有的是“一个寨子,两个国家”。中国的母鸡可以到缅甸下蛋,缅甸的小猪可以到中国寻食。中国有傣族,缅甸有更多的傣族。中国有景颇族,缅甸也有景颇族。血缘姻缘互相促进。有一对百岁寿星,他们是五代同堂。在五代之中,除了第一代老人和第五代小孩以外,在二、三、四代中都有跨国婚姻。

二、中缅边境为和平边境。两国边境贸易不断发展。在跨国婚姻中,有很多是在做生意时相爱的。他们说,介绍人就是商号。

三、当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程度相对高一些。边境人口的水平流动是国家政策的风向计。1958 年以后瑞丽县的边民大部分跑到缅甸。大等贺当时全村 80 户,跑得只剩 7 户。“文革”期间也有相当多的人往缅甸等国跑。近十年,情况大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生活改善,因此很少有人跑出去,几乎没人嫁出去。相反的,他们的女孩子看到中国人富了,中国的小伙子不吸毒,不随便甩掉妻子,便千方百计嫁给中国的小伙子。这两年,举家由缅来华定居的,在这几个县市中,也不乏其“家”。

跨国婚姻提出的问题

一、加强婚姻管理。在潞西、陇川、瑞丽、畹町这四个县市数以千计的跨国婚姻中,有不少人没有办过结婚登记手续。在1987年前几乎全是事实婚姻。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怕麻烦,怕害羞,怕体检,想早婚。这种事实婚姻没有法律保障,极易离异。解缔的婚姻占跨国婚姻总数的23%。

二、要做到管而不死。1989年10月以后,边境往来实施了一些新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妥善解决,使之有利于边境贸易,有利于人际交往。

三、适当调整法定婚龄。中国的法定婚龄是世界上最高的,现在看利大于弊,不宜变更。可是对中缅边境的人来讲,这里的人性成熟比汉人早,历史上不大有20岁以后结婚的。流行事实婚姻的原因之一是不到婚龄就结婚。对边民,包括妇联的同志建议,恢复为老婚姻法男20,女18的规定。我认为,对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来讲,要不要在地方法规中降低法定婚龄,仍是一个值得从长计议的问题。

(原载《德宏团结报》1990年10月11日)

试论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关系。但是,要把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也不那么容易。有人认为,它扑朔迷离、反复无常。本文想从这种“无常”中找出一点“常”来。

父子关系的实质

要讲清父子关系的实质,先得回顾一下它的演化史。

《吕氏春秋》上说:“太古尝无君矣,其民众而群处,知母而不知父。”在远古,人们是真的不知道父亲的。在由群婚制母系社会进入到对偶婚母系社会后,婚姻关系较前稳定。做母亲的有时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孩子有时也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是,由于父亲毕竟不是家庭成员,没有成为家庭经济的缔造者,父子间没有在家庭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培养出感情,因此彼此还是相见不相识,视若路人。当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大于女子,而女权还未让出时,舅权大于父权,舅甥关系高于父子关系。那时是父子之交淡如水,舅甥之亲亲如甘。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宁救外甥不救子女的故事。在刚果,不久前有的部落还风行“宁可儿子受损,也要把遗产传给外甥”。

可是,随着男子在生产中作用的突出,家长非男莫属,父子关系就日益强化起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家长为了巩固家庭私有,维护特权,搞起了家长统治。他把子女当私有物,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古希伯莱社会,父亲有权卖女为娼;古埃及,父亲杀子祭神。恩格斯说,当时的道德观认为,即使打死了子女,“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17 世纪的日本农民在回答什么最可怕时,说:“地震、打雷、起火、父亲。”他们把父亲看作灭顶之灾。中国汉字中的“父”字,古形为“𠂔”。“𠂔”中的“丨”为杖,“乂”为手。“𠂔”为用手持杖指挥、打人。它形象地显示出父亲之尊严。

这就告诉我们:父子之间尽管有血缘关系,但父子骨肉亲主要不是骨肉引起的。要不,为什么千百年来父子间的血缘关系没变,而父子感情却一变再变呢?父子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父子间的道德观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父子关系,说到底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父子感情也是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培养出来的。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社会制度的大变动,阶级关系的大震荡,都会对父子关系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西方的家庭道德在贬值

西方随着社会危机的蔓延,父子关系在瓦解中。

远古是因不知父而无父,如今在西方是因双亲离异而使得有父变无父。美国无父或无母的“缺陷家庭”约占 40%。在缺陷家庭中,无父之家占绝大多数。因没有父爱或母爱而外逃的青少年达一百多万人。在西方,即使有父亲的,或者有继父的,父爱也不见得多。据英国《泰晤士报》和西班牙《终极日报》报

道：“五万多英国儿童挨打受气。”为什么这样多呢？英国的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认为：“经济衰退的威胁，高失业率，对裁员的恐惧，物价上涨，公家提供的津贴的减少——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加剧家庭中的紧张，增加了孩子成为替罪羊的危险。”显然，是经济危机在加剧家庭危机，在加速父爱的消亡。

从为父为母的方面看，还有个把子女商品化的问题。这里的“商品”不是泛指政治、经济斗争中的“筹码”，而是指货真价实的婴儿制造业、婴儿交易所。在美国肯塔基州开办了一个“代人生子服务公司”，雇用一批贫苦妇女生孩子，供阔佬贵妇“借腹生子”。报纸透露：一般纯盎格鲁撒克逊种的男女婴儿价格为8000至10000美元；混血儿为5000至7000美元；黑种婴儿为4000至5000美元。

从做子女的方面看，有些子女，视父母为老不死，不管父母的死活。尽管他们有什么父亲节、母亲节，那也不过是在节日那天做一次“礼节性访问”罢了。节日一过，劳燕分飞，各不相干。据《南华报》报道：台湾有一位退休的将军，把在台的房子等卖掉，带了30万美金赴美投奔儿子，以为老年有靠。谁知未过半年，他终为儿媳所不容，愤然自杀而死……30万美元不算少，可是，道德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对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资本主义世界道德的贬值已泛滥到父子间的交易上。他们的私有观念已从封建社会的为“家”，演变为彻头彻尾的为“己”。在为“己”的观念支配下，父不父，子不子。

建立新型的父子关系

父权是与文明一起进入人类社会的。但是，恩格斯说：“文

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文明时代的发展，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摒弃污染文明的那些贪欲、情欲、物欲。现在，在我国城乡都已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关系提供了前提。因此，完全有条件克服既可能导致父子关系破裂，又可能导致父子关系高于一切的私有观念，促进父子平等、尊长爱幼新风尚的形成。事实上，我国的父子关系比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西方公开承认老少之间有“代沟”，在中国就没那么明显。但是，道德观念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粘滞性。新风尚的形成不能一蹴而就。

现在，在父子关系中存在截然不同的两极。一极是封建主义的残余，“父母之命不得有违”。这种情况农村比城市严重。江苏的“苦命娜”因不堪父母的打骂而想去当尼姑，是一例。山东省有个县一年中竟有128名青年因父母包办婚姻而逃婚，又是一例。此外，传子、纵子、福荫子女、子以父贵的情况，也不是一点没有。另一极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即视父母为老不死。这种情况城市比农村严重。父母钱多——抢；父母钱少——推。更可悲的是有那么一些亦父亦子的中年人。他们对父母来讲，是子女；对子女来讲，是父母。他们对父母感情过淡，他们对子女感情过浓；集不孝与溺爱为一身。这些同志应该“放眼看”：当你的子女变为中年人时，你的处境将会怎样？如果他们将来也学你今天的样子对待你，你受得了吗？况且，西方的父子不相顾，也是从“顾子不顾父”演化而来的。当他们发现养子女对自己没好处时，才看破红尘，变得不肯生孩子，不肯管孩子，乃至不肯结婚的。

应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为提高中国父子关系的文明度,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父子关系,从发展来看,有几个问题应引起重视。

要处理好“托幼”与“托老”的关系。现在,“托幼”的工作供不应求,有待加强。与此同时,“托老”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是几对青年夫妇赡养双亲;今后,随着“一孩化”的落实,不用多久,一对青年夫妇就有赡养12位老人的可能。以25岁为育龄期,以75岁为平均寿命计。一对青年要赡养四位50岁、八位75岁的长辈。“托老”的工作不抓,怎么行?看来,不仅要抓,而且还要优先抓。

要处理好平等与教育的关系。父子平等不等于父亲不可以教育子女。把父亲的教育看作压迫,这是当前的一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知子莫若父”,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有的也是终生老师。做父亲的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是父亲的失职,也是对正常的父子关系的破坏。如果不是以理服“子”,不是以情动“子”,而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往往是适得其反,甚至会使子女养成打人骂人的不良习气。只有坚持说理,坚持平等,教育才会奏效;也只有敢于教育,善于教育,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才能巩固和发展父子的平等关系。

要处理好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关系。子女应当给父母必要的物质享受,但是,更应给父母必要的精神享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知识的老人在增多。给老人足够的知识享受应引起人们足够注意。许多国家开办“老人大学”,是个好办法。瑞士纳沙泰尔湖畔的老人大学,有80岁的学生。他们开设十多门课程。老教授、老学者也来听课。有人认为,专业转移,听新鲜

知识,是一种享受,是延年之道。

要处理好“天伦之乐”与“天下之乐”的关系。人类本没有天伦之乐。天伦之乐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是文明的表现。在今天,应该保留一点天伦之乐,对不慈之父、不孝之子来说,不妨强化一点天伦之乐。但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里的“以及人之老”是很重要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里的“以及人之幼”也是很重要的。不论是“父”,还是“子”,都应当是人民的儿子、党的儿子,都应当是社会的公仆,都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一时办不到,那也总该以天下之乐而乐吧!对于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人来讲,更应该把“天伦之乐”看作“天下之乐”的一部分,把“天下之乐”放在第一位。没有“天下之乐”,哪里还有“天伦之乐”?同样,连父与子这个起码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哪里还谈得上为全人类争取“天下之乐”?

(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4月1日)

再论父子关系

以 敬 为 孝

《试论父子关系》一文(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篇文章对拙作所谈将来“一对青年夫妇就有赡养12位老人的可能”,提出质疑。理由是其中有四位尚未退休,不需要赡养。(见4月22日《解放日报》)这条意见指出了赡养四位50岁的父母同赡养八位75岁的祖父母之间的区别,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因此得出50岁的父母不需要赡养的结论,就未免对“赡养”理解得过窄了。

“赡”字从“贝”,是因为较早的货币是贝壳做的。对“赡养”的传统看法是要给年老体弱、没有劳动收入的父母以生活费。这一点现在还是应该坚持的。1980年通过的婚姻法继续把这层意思写进了条文。比方说,在农村50岁以上的人便不大能干重活了,收入开始下降,生活上需要有人赡养扶助。尽管现在农村老人也开始有一点养老金,但入不敷出。一般说,50岁后没有人赡养和扶助是不行的。农村人口是我国人口的大头,约占4/5。说5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即使从传统的意义上理解,也是可以的。

当然,对城镇职工来说,情况就两样了。职工退休以后享有退休金,生活完全有保障。不仅有保障,而且还有结余。对离休的老干部来讲,自然更不存在要子女供应生活费的问题。

再加上近几年情况有些特殊,实行顶替制以后,带来了退休人员的年轻化。那就是说,有些不老的人加入了老人队伍。他们需要不需要赡养呢?按“赡养”的狭义理解,他们不需要赡养。不仅不需子女供应其赡养费,相反的,他们还要给有劳动收入的子女以生活补贴。

因此,现实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全面理解赡养?

我们认为,赡养应当既包括物质上的,又包括精神上、感情上的。对需要从经济上赡养的,要保证经济上的赡养;对不需要从经济上赡养的,要重在感情上的赡养。说实在的,就是对需要从经济上赡养的,也少不了感情上的赡养。感情上的赡养,是物质上赡养的前提。倘若子女对父母只是在经济上依法给钱,而在感情上冷若冰霜,让父母吃“法”来之食,日子是不会好过的。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以敬为教是古已有之的。

尤其是在衣食大多有保障的今天,更应该把尊敬看作孝的重要方面,把供应父母精神食粮看作赡养的主要内容。不论父母的年资高低,收入多寡,只要他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子女者都要对他们有丰富的感情,对他们殷勤照顾,体贴入微。敬,不只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更是对其大半生劳动的尊重。西方有些生活优裕的老人为什么总觉得活不下去?就是因为缺少一个“敬”字。

以教为养

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自从抚育子女的责任由社会转移到父母身上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虐子杀子者有之，溺爱子女者也有之。社会发展到今天，虐子已为法律和舆论所不容。随着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不给子女吃饱穿暖的已不多见。现在突出的是教育问题。教育子女是同抚养子女不可分割的。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

教育子女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君不见有些人教育别人头头是道，教育子女不见效果吗？这是为什么？主要是没有认清教育子女的特点，没有把握住子女特殊的思想运动规律。

对子女进行教育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呢？

一、终身性。父母是子女的“终身教授”，即使子女成了比父母高明得多的教授以后，父母仍有权利对子女进行教育。对子女教育的这种终身性、长期性，就带来一个重复性。重复有时是必要的，但重复多了，不免令人发腻、生厌。所谓“婆婆妈妈”，就是指在教育人时，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一味地唠唠叨叨。“婆婆妈妈”式的教育，效果无疑是不会好的。通常讲，人有从幼年到少年、青年、壮年的成长过程。因此，父母作为“终身教授”，就要既懂点幼儿心理学，又懂点少年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壮年心理学，对各种年龄所关心的知识也应大体有所了解。更何况这样的分期，还是粗线条的，仅幼儿期又可以分好几个阶段。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搞多层次。没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怎么行？有人对犯罪青少年的父母做调查，发现文化高的，尤其是教师的子女犯罪少。这会不会与他们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有关呢？

二、独立性。这是从子女那方面，即从教育对象方面来说的。独立是幼儿、少儿成长过程渐渐萌发出的心理特征。儿童本有一种依赖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便滋生独立性，自信自尊，不那么听话，并演化为对抗性。在教师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虽也有抵触、对抗的，但累教不改者最终会被开除，从而解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可是，父子关系则不同。子女再坏，父母也无权把他们开除“家籍”。不用说，这种血缘上的不可分割同成长中的独立思考交织在一起，也助长了一些子女的对抗性，使得他们有待无恐。老师一句话能解决的事，家长十句也不顶用。家庭教育的这一特点，促使社会对家长的教育方法、教育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可是，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独立性和对抗性认识不足，既看不到它的进步性，也看不到它的危险性，更谈不上正确处理这种独立性和对抗性了。在独立性和对抗性面前不是束手无策，就是施展高压政策。这自然都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对对抗性，一要限制，二要改造，限制其拒绝教育的一面，把它改造成为大无畏的独创精神。

敢不敢教育子女，怎样教育子女是检验父母为什么要养育子女的标志。你是真爱子女么，那你就教育子女成为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你是假爱子女么，你就去溺爱吧！就去听其自然吧！教就是养，教是更重要的养，这是当前父子关系中应当强调的一点。只养不教，等于不养，不如不养。

三 点 建 议

以敬为孝，以教为养，是对父子提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家庭成员关系的一个方面。在旧社会，虽也讲敬和教，但是，目的是不同的，他们的目的是巩固私有制，内容也是不

同的,他们是鼓吹旧礼教。我们今天虽然具备了建立新型父子关系的需要和可能,但是要变为光辉的现实,还要花很大气力。为此我建议:

一、加强家庭学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是从剖析最常见的商品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恩格斯是从剖析最常见的家庭开始,找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家庭学理论的研究是改造旧家庭、创建新家庭的先声。中国的家庭学研究在停顿了几十年后,最近开始恢复,但是,我们更要着眼于创新。在创新方面,现在还很薄弱。社会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势必给它的细胞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家庭变化的速度要适应社会前进的步伐。忽视细胞社会学的研究,或者是不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从事细胞社会学的研究,将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的形成,将会拖“四化”的后腿。

二、普及家庭学知识。鲁迅曾主张办“父范学堂”,是有道理的。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嘛!我们不办学堂,也应办点讲座。讲座要系列化,要分层次,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家庭类型的家长讲座。比如,双职工家庭是妇女走出家庭后所出现的,问题很多。如何对待脖子上套钥匙的孩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大有学问。普及的形式要多样化。办少年宫是一种形式,办老年宫也是一种形式。就杂志来说,北有《父母必读》,南有《为了孩子》,都是家庭理论的普及刊物。还可以考虑建立家庭科学普及“网”,各自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开展家庭学普及工作。

三、开展评选优秀父母优秀子女的活动。现在评选活动多如牛毛,唯独没有父子关系“奖”。全国妇联号召开展“五好家庭”活动,是英明的。但是,也可以搞单项奖。建议报上多宣传

“父子好”的报道。让精神文明的大花园中盛开出优秀父子的花朵吧!

(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7月22日)

老人新论

日益突出的大问题

人,从幼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老人在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比往年大得多,并大有继续增大之势。1975年65岁以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7%,到1979年则上升为6%。我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属于壮年型。1978年,65岁以上的老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4.6%。再过四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怎样?据上海的人口学家估计,下一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中国老人的比例将会猛升至20%,乃至25%以上。这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未遇到过的局面。这是就全国而言。至于上海市区的情况,到那时老人将占市区人口的40%以上。

人口的老年化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由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所决定的,说到底是由经济、文化的发达决定的。

有老人在,就有个对待老人的问题。既然老人在增加,那就有个如何更加重视老人的问题。要重视对老人的研究,不只是因为老人将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还因为这百分之二三十同

占百分之七八十的那一部分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说二三十年后老人的比例会增加,那无非是说,现在的中青年会活到那个时候嘛!

老人地位的曲线图

在人类的前半生中,尽管老幼之别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可是,人不知“老”字为何物。这表现在父女可以通婚上。后来,人类从怕天然野火慢慢地懂得了用火。在一百多万年前,要掌握用火的技术那可是比今天的考副教授还难的事,需要花毕生的精力才行。于是,老幼之别明显了,上下辈之间不许通婚了。父女不婚,意味着人类的语言中产生了“老”的概念。上下辈的划分,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划分,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划分。

从人类中分化出的老人,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最先受尊重的是老妇人。我曾经访问过处于母系社会晚期的少数民族,那里从分食到管仓库,从祭祀到处理纠纷,都要由老母亲做主。如果母亲死了,就要由大姐姐做主。再往后,最受尊重的是老头子。他们年高有德,年老有技。在许多原始氏族中,都有耆老议事会之类的组织。由耆老人决定氏族中的各项事务。我国西南哀牢山上有位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长。他曾打开衣服给我看。他胸部、腹部上面尽是伤疤。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过去取火的方式是用竹片磨擦,居住的“房屋”是以树为柱的芭蕉棚。山雨一来,保存火种就成了头等大事。每遇大雨,氏族长总是身先士卒,不惜用身躯遮风挡雨护火。于是,辩证法便出来奖励他们:这些不搞一点特权的老人,享有最大的特权。人们都对他们无比尊重。因此,恩格斯说: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长更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伟大国家的

统帅,也要羡慕氏族长不用强迫手段所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可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老人的权力被滥用了。《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格言其实不是讲孟子时代的。在孟子时代,这话已难以兑现了。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养老育幼的权利和义务,已从社会转到了家庭。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在形式上着力加强尊老。什么“孝经”、“孝道”出来了,什么“孝廉”、“孝子”出来了。在汉武帝时,搞起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评选起孝子来了。《孝子传》一类东西也相继出版,这既是尊老风尚的一部分,也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尊老的客观存在。由于私有观念作祟,尊老的面大大缩小了。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近二三十年,老人的地位每况愈下。1980年9月10日美洲的一家报纸在一篇题为《美国的老人生活》的文章中写道:“‘壮年的战场,老人的坟场’,一般美国人常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美国的社会。”常言道:养儿防老。这话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适用的。在那里,子女常常是,为了争夺遗产,先去争养父母;一旦争到了遗产,那就马上翻脸不认父。

拉法格说:“年老受尊敬是出现在人类社会里的第一种特权。”如今这一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已荡然无存了。老人的厄运已成了社会危机的一部分。现在,在美国众议院下设老年人事务委员会,此外,还有什么“全国老年公民委员会”,还有类似“灰豹党”那样的老年人团体;在日本,规定每年9月15日为法定的敬老节;在香港,也有“老人屋”、“老人楼”,说起来是为老人着想,实际上这是扬汤止沸,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问题的。

老人的“特权”在复归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是40年代从列宁的故乡流传到我国解放区的一句歌词。如今列宁的故乡已今不如昔了。从苏联自己的民意测验看，不喜欢老人的青年占多数。“老人到处受尊敬”的风尚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儿首先形成。

社会主义制度是使老人受尊敬的根本保证。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把敬老的范围扩展到最大限度。

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去敬老，才会使敬老有坚实的基础。从现象上看，封建社会里的敬老似乎也敬得够那个的。诸如卧在冰上为母亲求鱼等等。但是，那完全是从狭隘的血统观念出发的，是从家庭的小天地着眼的。说实在的，封建的那一套母子关系、家庭观念还是淡一点为好。相反的，把敬老看作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平等互助的人们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从解放全人类出发的敬老，则是应该大大强化的，是能够持久的。

精神上的安慰、感情上的融洽是敬老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论是国，还是家，给老人一定的经济收入都是必要的。人一生中有两个转化。从幼年到青壮年，是从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从壮年到老年，是从生产者又转化为消费者。前一个消费阶段的消费，是对其劳动报酬的预付；后一个消费阶段的消费，是对其劳动报酬的补付。从物质上关心老人是对其劳动的尊重，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现在，在许多所谓福利国家中，养老金在社会保险基金中占的比例不算小。但是，美洲一家报纸写道：“老年人住得虽好，衣食也不犯愁，但孤单寂寞之感是很严重的，所以老年人十之八九都养猫养狗。”他们视女儿为“大女儿”，称猫狗为“二

女儿”，大女儿是要走的，“二女儿”可留在身边。还有些欧洲国家正在为老人设计“终生工业”、“老人车间”，其目的无非是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填补精神空虚。近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华侨回国度晚年，还不是觉得这儿精神充实吗？

中国老人的处境较好，这是举世公认的。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如何发挥退休工人、离休干部这些“识途老马”的作用，是老年社会学的一大课题；我们的老一辈是爱护中青年的，中青年应当如何尊敬老人，这又是老年社会学的一大课题。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能够诚恳尊敬老人的人，才能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才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本文收入《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愚昧和自私是婆媳的腐蚀剂

在《采风》报讨论婆媳问题时，我正在上海电视台举办的婆媳、姑嫂、伉丽、情侣娱乐大赛中担任评委。脑子里装着《采风》上提出的问题，评选时的注意力就不一样了。

舞台上，那些一起唱、一起跳、一起表演的婆媳之间，为什么感情这样好？相反的，社会上有些婆媳之间的感情为什么那样差？我琢磨着。

婆媳关系不好的面有多大？我组织人调查过，也看过不少调查报告：5~10%不等。可是，由于我认为调查的客观指标很难定，也由于我对调查对象答卷的准确性有怀疑，因此，我始终认为那些数字只能是参考，我始终觉得婆媳感情差的面比母子关系不好的面要大。

婆媳关系为什么会不好呢？从社会学上看，无非是这样几点：一、异质介入。婆与媳原来分别生活在两个家庭中，彼此有不同的习惯和情趣。现在突然合成一家了，便打破了各自的心理平衡，要使她们协调，还要有个过程。二、感情转移。原来母子之间有深厚感情，现在儿媳一来，儿子的感情分散了，母亲就会觉得不自在。三、权力变换。家里也有权力系统。儿媳一来，或婆婆认为权小，或媳妇认为婆婆不给权。四、义务不均。在家

庭中，各人都应尽义务，但是，究竟各人的义务是多少，没一定模式，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搞不好，忙闲不均，就会引起冲突。

这样说，婆媳关系在初期可能不好，在后期应当好了？那也不一定。早期处理不好，会使得后期有更大裂痕。这也是有些家庭的生态环境迟迟不好的缘由。

那么，这是不是说婆媳关系不好是“不治之症”？那也不是。这只能告诉我们，处理婆媳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懂点社会学、心理学，要用科学指导家庭建设。不然，鸡毛蒜皮的小事会酿成一场灭顶之灾。愚昧是婆媳关系的障碍。

那么，为什么有些有学问的人，甚至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婆媳关系也很紧张呢？这除了说明她们理论脱离实际和实际脱离理论外，还可能是彼此私心太重。钻在铜钹眼里的人，头脑就不容易清醒，会把科学丢在脑后。私心会玷污科学，会驱走科学。自私是婆媳关系的腐蚀剂。

但是，愚昧和自私都是可以解决的。不是吗？请看荧屏里那些亲如母女的婆媳。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固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可以讲一句：“我家婆婆不一样”，或者“我家媳妇不一样”。不过，不要忘记，婆和媳都是人，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婆是生产你心爱的丈夫的母亲，媳是你心疼的儿子所心疼的人。现代人的特点是，朋友多，会交际。能以家外人为友，为什么就不能团结好家里的人呢？怪了……

（原载《采风》报，1986年10月1日）

提倡一下“从妻居”

近年来,在我国城乡的家庭中出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从妻居”家庭在渐渐增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2年对江苏开弦弓村的调查,从妻居家庭占总户数的8%;据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1983年对上海康定街道的调查,从妻居家庭占总户数的16%。

从妻居家庭过去是罕见的。旧社会,从妻居被视为下贱的事。人们把从妻居称“入赘”。赘者,质也。赘婿,就是以身为质,作抵押,卖身求妻。《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到越国巡视,在会稽山上刻石,说什么可以把赘婿当作公猪一样杀掉。因此,有钱人谁肯去当“公猪”?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入赘”的人反而增多了呢?

要知道今天的“从妻居”与封建社会的“入赘”是大不相同的。从前男子入赘要改姓女方的姓,现在不改了;从前入赘后所生的子女,要姓母亲的姓,现在姓谁的姓都行;从前入赘者,可以继承女方的家产,现在也不那么笃定了。当然最根本的差别是:从前的入赘,一般是女尊男卑;现在的从妻居,一般是男女平等。没有男女平等这一条件作保障,从妻居家庭不可能增加那么多。

从妻居家庭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两个四方”关系

的对比上：在从夫居家庭中公、婆、子、媳四者的关系，在从妻居家庭中为岳父、岳母、女儿、女婿四者的关系。而在这“两个四方”中，又主要表现为婆媳关系和岳婿关系上。许多社会学家对此做过调查，尽管他们所得出的数据高低不等，但是婆媳关系不好的家庭数大大超过岳婿关系不好的家庭数这一点，则是共同的。另据原复旦大学分校蔡鸿德对上海 30 户从夫居、30 户从妻居的调查，从夫居中的婆媳关系不好的户数为从妻居中岳婿关系不好的户数的 8 倍。8 倍，这是令人深省的信号。它足以说明从妻居家庭有助于家庭关系的调适。

从血缘和亲等上讲，婆媳和岳婿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岳婿之间比婆媳之间亲密呢？这是由中国的家庭现状决定的。就多数家庭来说，由于“男治外，女治内”的传统习惯，现在家务劳动的重担主要还是压在妇女身上。据上海市统计局的调查材料，在双职工家庭中，女职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职工多 62%。至于非双职工家庭，妇女家务劳动的时间可能会更多。换句话说，过去担任内当家的是婆婆。“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媳妇进来以后，必然成为潜在的内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婆婆是不习惯的。这在社会学上，叫做“角色冲突”。当然，在从妻居家庭中，母女之间也存在这一“角色冲突”。可是，女儿被长期支配惯了。因此，在内当家这一“角色冲突”的冲突程度上，母女不如婆媳激烈。更何况母女间本来就熟悉，彼此积累了相互适应的经验，因此，有时有了“角色冲突”，也容易调节。而婆媳间，本来彼此不熟悉，属于“异质”关系。异质整合的难度比同质大。在康定街道，从夫居家庭中婆媳分灶的占 65%，而在从妻居家庭中，母女分灶的仅有 28%。分灶，是调适不好的产物。而岳婿之间，虽属异质关系，彼此间也无调适经验，但是他们不存在“角

提倡一下“从妻居”——

色冲突”。没有“冲突”，“调适”薄弱一点，问题不大。上述调查，在从妻居家庭中，女婿认为在岳家同在自家一样的占 93%，而在从夫居家庭中，媳妇认为在婆家同在自家一样的，仅占 36%。

当然，从妻居家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假如都从妻居了，只有一个儿子的老人的赡养就成问题。尤其是从现在起，将有一半家庭是独生子，更不能全部实行从妻居。但是，从妻居家庭只有 10% 上下，总是太少了！

适当提高从妻居家庭的比重，既是以男女平等为前提的，又是以男女平等为结果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养女可以防老了，谁还会出于养儿防老而去弃女婴、溺女婴呢？

（原载《解放日报》，1983 年 9 月 21 日）

必将疏密有致

假如把一对夫妻,或者再加一个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称为“子”家庭的话,那么在这个子家庭上头就会有两个“母”家庭。一个是丈夫的父母,称“夫——母家庭”;一个是妻子的父母,称“妻——母家庭”。

子家庭同“夫——母家庭”过往甚密者,有。或因妻子很懂得家庭心理,或因丈夫血缘观念特别强,或因“夫——母家庭”的经济、政治等条件特别好。

但是眼下,尤其在城市里,子家庭同“妻——母家庭”过往甚密者居多。

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妻子同“妻——母家庭”有感情基础。妻子从小生活在“妻——母家庭”中,彼此比较了解,而同“夫——母家庭”的关系就没有这个历史基础。

二、丈夫性格比较粗犷。丈夫同“夫——母家庭”也有历史基础,也应该常去,只因男性性格粗而不细,大大咧咧,丈夫不提出去“夫——母家庭”,妻子也就作罢。

三、在家务分工上,中国现在还是“男主外,女主内”者居多。男子忙于务外了,就容易忽视与自己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夫——

必将疏密有致——

母家庭”的联系,而务内的女子,则常常想到与“妻——母家庭”的联系。

四、岳婿关系一般比婆媳关系密切。丈母娘同女婿好相处,不用说丈母娘喜欢女婿,就是丈母娘在语言上有什么差错,女婿也不会太计较,为女婿的能忍得住。而婆媳则不同,由于血缘与性格上的差异,婆婆如果在媳妇面前稍不留意,话讲得重了,媳妇就承受不了,就会结成个大疙瘩。同样的,如果媳妇对婆婆有所失敬,也会引起一些麻烦。

子家庭同母家庭的关系是双向的。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也是越往来越密切,越不往来越疏远,以致出现“子家庭”同“妻——母家庭”关系比较密切的局面。

但是,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现实的未必是不可改变的。随着血缘观念的淡化,血缘终将为业缘所战胜;随着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妇女的性格、心胸都会起变化。到那时,子家庭与两个母家庭的疏密程度将会大体平衡,将会疏密适度,疏密有致。

(原载《家庭》,1993年第9期)

分散的紧密型家庭

我从1981年春就在复旦大学分校讲授家庭社会学，可是一联系自己的家庭，就有些说不清楚了。

我家三口人：妻子、女儿、我，堪称核心家庭。不过我不甘心承认家里只有这三口人，通常是把母亲、姐姐、弟弟以及侄子、外甥都算作家庭成员的。按社会学的亲等说，父母、兄弟姐妹同子女一样，均属一等。那么，为什么只把子女算作家庭成员呢？当然，按户口我们不在一块，母亲与大姐、三弟在郑州，四弟在北京，我在上海。殊不知世上有多少父母同子女分居两地、两国的？为什么我们已婚的兄弟姐妹之间就不算一家呢？

家庭发展的趋势是小家庭、核心家庭在增加，大家庭、联合家庭在减少，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可是，我的家庭恰恰属于“减少”类。其根据有二：

一在经济上，我家类似“六十条”前的人民公社，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具体地说，收入是以小家庭为基础，支出和消费有的以小家庭为基础，有的以大家庭为基础。我母亲没有工资，政府给她的老干部遗属补贴，她全部用于给孙子、孙女发奖学金上。家庭里实行的奖学金制度，对鼓励孩子学习，对缩小高收入、低收入间的差距，起了良好的作用。包

括衣服,我同弟弟、姐夫之间,也是相互穿来穿去,不分彼此。

二在感情上,我家更是融洽和睦。我写过一篇家庭民主的文章,竟然有人认为是夸张。其实,还有许多民主、团结的事例没有写出来。我家男女平等是有传统的。我外祖父在辛亥革命时废私塾、办男女同校的学堂。“五四”时,外祖父、母亲和大舅母都主张重女轻男。比如在兄弟三人中我是老大,可是侄子称我二大伯,外甥称我二舅。原因是母亲认为不可动摇大姐之大的地位。平等是和睦的保障。我们并不主张恢复封建孝道,可是,我们姐弟几位个个孝顺。身为军人的四弟,一身戎装,威武雄壮,可是在家里,母亲下床,他为母亲穿鞋;母亲洗脸,他手端脸盆。姐姐更不用说了。差劲的是我。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少,但是我对母亲的礼最重。去年春节,我向母亲拜年的方式是磕头。这是我自觉的。我想,礼节总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为什么磕头就是封建?没规定过嘛!再说,建国前我每年给长辈磕头,为什么当了教授以后就不能磕了?结果,我用我的磕头权,给母亲带来莫大欣慰。因为这般大礼已不多见了,她老人家能享有,自然高兴。

家庭民主带来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带来心情舒畅。心情舒畅干什么带劲。

(原载《中国妇女》,1994年第5期)

妇女问题杂议

重男轻女思想在回潮

我对妇女的地位问题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跟有关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认为近来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抬头:

在生产中,有以男代女的倾向。纺织厂的挡车工,百十年来大都是女性干的。可是,有家纺织厂却非招男性不可。

在招生和招工中,有些工厂和学校无视劳动局和教育局的规定,擅自提高女性的录取线,“同优”不“同取”。

在家庭生活中,有的城市开始出现青年家庭妇女。这些新式家庭妇女说:“我们比老式家庭妇女还难做人。”有些妇女生了女孩,丈夫跑到产房里打,婆婆在家里骂。甚至还有因生女孩而闹离婚的。

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我想原因主要应从社会上找。

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副作用。如同一切伟大的变革都难免有副作用一样,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同时,也促使一些人过分注重劳动力的强弱和多寡,以至于渴望生男孩子,不要生女孩子。

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明确。多少年来,我们有些同志搞

的是为生产而生产,为产值而生产。近年来,经过生产目的的讨论,情况有了变化,但追求产值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有些企业的领导人总觉得妇女的“四期”耽误生产,总以为男劳力有利于完成他那个产值。他们不去想物质生产同人的生产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忘了生育的社会作用。不想一想:没有生育,没有人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的后备军从哪里来?

三、封建的“无后为大”思想在复活。“五四”以来,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后为大”的旧思想受到了抨击,可是远没有根除。在多子女的情况下,全生女儿,不生儿子的极少。传子的思想不易暴露。提倡“一孩化”后,矛盾激化了。按几率,要有一半的家庭没儿子。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用一句封建老话来说,就是一半人“绝后”。在上亿无子的父母中,假如有万分之一的人以无子为“绝后”,岂不是有上万人嫌弃生女吗?

要倍加重视妇女理论

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我们对妇女学一知半解,这里只就几个词儿作点新解。

何谓女性?性别是娘胎里带来的。可是,根据现在的科学水平,在胎儿的头几个月还分不出男女,后几个月才慢慢可以分清。男女在身心的差异是明显的,但也是相对的。在任何人身上都有雌性和雄性两种荷尔蒙。在男人身上无非是雄多雌少;在女人身上无非是雌多雄少。过去,只知道有些阴阳人时而为男,时而为女。现在,已经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改变性别。世界上已有一批变性的先驱。不管他们的出发点为何,他们的存在足以证明性别的相对性。人还是那个人,大脑还是那个大脑,一切都没有变,可是性别变了,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男女的聪明才智

一样吗？自然科学的成就还提醒人们注意比例失调的危险性：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不解决男女都一样的问题，在刮重男风时，世界变成男人世界怎么办？在刮重女风时，世界变成女人世界怎么办？科学是无情的。科学没给封建思想立足之地，在观念上不迅速跟上科学的发展，行吗？

何谓“后”？现在人们认为“后”是指儿子。从二三百万年的人类历史看，“子为后”的观念只不过是一瞬。在刀耕火种的远古，连儿子都养不活，拿什么来传子呢？不用说，那时只能是以无后为小了。有了点结余，才会想到“传后”。在有了点传后的念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母权社会就是女权社会。女儿一直是母亲的接班人，不传女儿传谁？当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超过女子以后，不传给男子不利于生产。可是，人们首先想到要传的仍不是儿子，而是外甥。传甥是传女向传子过渡的桥梁。再往后，母权制被推翻，父权制确立，视子为后，开始传子。但那时要传的“子”，仍不是巴金《家》中所塑造的长子，而是传幼子，视幼子为后。只是到了封建社会，才由幼子继承制过渡到长子继承制。可见，“后”，不是恒定的。长子继承制正在崩溃。《家》就是描绘长子做傀儡。“后”，已经变化多次；今日之“后”，难道不会再变吗？我们将赋予“后”以新的定义。今后之“后”一定是全新的。现在有些人把遗产献给国家，对女同对子一个样，对别人的孩子同对自己的孩子一个样，这是值得重视的苗头。它将把“后”的概念引向新阶段。

要有相应的实际措施

理论是开路的。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相应的措施跟上，理论也会腿短。

就业是妇女解放的基础。解放后妇女地位的好转,同就业有很大关系。在旧中国,就业妇女仅占妇女的 0.22%,女职工只占职工总数的 7.5%。可是,到 1979 年女职工占到职工总数的 30%。这两年又有增长。现在,尽管生产部门在安排女劳力上有种种应予体谅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在减低,工种在急剧增多,按理有着安排女劳力的广阔天地,有可能逐步扩大妇女的就业面。工种是人设的,工种不应成为妇女解放的桎梏。

文化教育既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前提,也是提高妇女就业率、改善妇女职业构成的前提。现在女学生占学生的比例比解放前、解放初都有提高,可是,提高的速度不快。现在,小学女生占学生的 50%,中学女生占 40%,大学女生占 25%。社会各界应为改变这一“剪刀差”做出努力。女性不首先在教育上占半边天,以后在社会上难顶半边天。

改革家庭制度是转变妇女地位的保证。旧家庭是妇女的羁绊。毛泽东同志认为,旧中国的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这“四权”中有两权同家庭制度有关。建国以来,政权根本改变,神权也算有根本改变,而族权、夫权只能认为有很大改变。城市家庭可能比乡村家庭变化大一些。整个社会制度在变,家庭制度不变是不可能的,迟早要变的。比方说,社会上开始出现的男嫁女家,就是改变妇女地位的一个尝试;再比方说,办食堂和托儿所也是解放妇女的一个方面。

歧视女性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去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詹姆斯·约纳说:“在联合国,妇女的处境并不好。”不要认为西方妇女很自由。她们只不过是男子手中说扔就扔的花瓶而已。在美国,十年前国会通过的“男女平等”,至今没有批准,成

了废案。在日本,他们自己认为:“就连家庭社会学也把妇女作为从属于男子的对象。”还有些富裕国家的妇女的面纱才摘掉一二十年,距离妇女解放的要求还很远。面对歧视妇女的严重问题,国外有些人感到棘手,斗争也很激烈。今年春天,巴基斯坦还撤掉民联邦委员会中一位主张妇女“统统离职回家”的委员的各项职务。我国的妇女运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始终把尊重妇女看作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的一部分,始终认为妇女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大报告指出:“妇女不仅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上是高的。我们要加强妇女理论研究,更好地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1月26日)

怎能让“妇女退居家庭”

——妇女问题再议

想不到拙作《妇女问题杂议》会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见1983年1月12日《解放日报·新论》）。这里仅就“妇女退居家庭”搞家务的说法，再谈点意见。

妇女在家搞家务的历史久远，大概是从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以来就是这样的。它开始是一种自然分工，后来就被封建社会接过来，演化为“男治外，女治内”。这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男尊女卑。因为治外的，有经济收入，有发言权；治内的，无经济收入，无发言权。因为治外的，在社会实践长了才干，会发言；治内的，长期关在深闺，孤陋寡闻，思想闭塞，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发言。不要以为男尊女卑只是一种观念，要知道这种观念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过，女之所以卑，是阶级压迫的产物，是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社会活动权利的产物，决非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请看就是在“女卑”的社会中，不是还涌现出大批令男子惊叹的女豪、女杰吗？

后来，随着人类向自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尤其是大工业的出现，需要千百万妇女进工厂。长期处于卑下地位的女性，在就业之初，劳动力是廉价的。正因为廉价，在资本主义经济萎缩时

曾有一阵在工业中是女劳力代替了男劳力。这就是马、恩精心研究过的妻子挣钱养活丈夫的社会现象。这固然也不合理,但是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女性的才能。

因此,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共产主义者,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十分关注妇女的解放,关注妇女的就业。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我们自建国以来,为妇女的就业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国有女职工三千多万。这一可贵的数字,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颂歌。

为什么今天会有人提出“妇女退居家庭”呢?据说理由是“在职职工双重负担”。这种现象当然不能说不存在。人们在紧张的公共劳动之余,希望少承受点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仅有些男同志提出“两个当中保一个”,而且有些女同志也无可奈何地愿“牺牲”自己,“保”丈夫。然而,这种看法绝非“灼见”,说得不客气点是在向困难低头。家务事是可以男女一起商量解决的。家务劳动的方式从来都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改变的。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改进家务劳动的技术设备去减轻家务劳动呢?为什么不可通过提高家务劳动的科学性,来改善家务劳动的效益呢?当然,根本改变家务劳动的性质和结构,不是单靠一家一户所能解决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改革全社会的家务劳动着想,而偏要把正在解放的路上迅跑的妇女拉回到锅台边呢?要知道,“限制在作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的家务劳动,会窒息妇女,会使妇女变得愚钝。这是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几年里多次强调的一点。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务劳动同封建社会不同。这固然不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附庸,是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力保护的必需。但是,家

怎能让“妇女退居家庭”——

务劳动的非生产性,并没有变;家务劳动的非商品性,也没有变。每人向社会提供商品量的多寡是衡量社会物质文明的尺度,这总是起码的经济学常识吧!

再说,现在人类的信息量激增,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知识老化加快。不用说本来知识不多的人关在家里会变愚钝,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做出过贡献的人,如果关在家里一段时间,也会变成“桃花源中人”。近来,“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很风行。试问:做了家庭妇女,成天忙于家务,还谈得上继续受教育吗?

妇女走出家庭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妇女“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是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3月2日)

缓解女性角色冲突八点

当代中国妇女的就业面在扩大。这是妇女解放的途径,也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可是,社会工作与家务劳动两副重担压在女性身上,使得社会人同家庭人(当然,家庭也是社会细胞)双重角色的冲突,在职业女性身上显得相当尖锐。在这种尖锐的角色冲突面前,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女性从充当单一(相对地讲)角色,到充当多种角色,既说明家庭离不开女性,也说明社会离不开女性。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是女性的骄傲,也是对女性的考验。江河横溢方显英雄本色。双重角色冲突方显女英雄的本色。在风平浪静中看不出水手的胆识。人生的价值往往要在角色冲突中来实现。冲出从两性不平等到两性平等转化过程中的“山重水复”,便是“柳暗花明”的平等村。不用说,要冲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根据妇女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八点对策。能否缓解冲突,要看这八点的合力如何。

一、社会再分摊一点。换句话说,就是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有责任帮助中青年女性赡老抚幼。入托难,难于进大学的局面应该结束了。把送老人进敬老院视为不孝的时代也该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社会服务项目很多。这里想特别提一提两地分

居问题。夫妻两地分居对家庭的破坏性远大于什么第三者。因此,我常想:要不要对那些无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头头们追究其法律责任?不然,牛郎织女之苦无法解决。

二、机器再代替一点。机器是人手的延长。机器可以缩短家务劳动时间。相当多的中国人只喜欢存钱,舍不得买家用电器。谁购了电器,就说人家高消费。这里有很大的片面性。

三、丈夫再体贴一点。丈夫的体贴能驱走妻子的疲劳。有些人,包括女性,总以为男性干家务就不像男子汉了。不对!大丈夫应有大度、大气、大方才是。对女性有相容性的人,才称得起男子汉。能为妻子排忧解难,才是男子汉。

四、孩子的独立性再强一点。有些女性的角色冲突,是自讨的苦。把独生子女当小皇帝,甘做子女的牛马,能有好日子过吗?倘能培养孩子早当家,既锻炼了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又解放了自己,有多好啊!

五、家务劳动的安排再科学一点。有些女能人治厂有一套,管起孩子来却不够高明。这只能说明齐家同治厂不完全一样。齐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要管好家,婚前婚后都得学点家庭学的ABC。

六、家庭观念再革新一点。封建的家庭观念严重束缚人们的头脑,或明或暗地加剧女性角色冲突。“性别隔离”吞噬着人间之爱。这些问题不解决,家电堆成山也缓解不了角色冲突。

七、处理工作同家务的模式再多一点。中国的家庭千差万别。“比翼鸟”最好,“二保一”也无不可。在家庭生命周期中,角色如何互补、代偿是夫妻间的事。

八、经济收入再高一点。经济是缓解冲突的前提。“寸金”有时候是可以买来“寸光阴”的,比如交通、通讯工具就可以省出

时间。而要有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必然离不开收入。收入哪里来?三产是一条。三产是女性的主战场。况且中国的三产在世界上是倒数第几名的。再一条是从事第二职业。第一职业已经搞得角色紧张了,再有第二职业,会不会弄得更紧张?未必!经济收入高了以后,第一职业加第二职业所导致的角色冲突,可能不是2,甚至也不是1,而是0.8了。第二职业会不会妨碍第一职业?那也不一定。问题是第一职业的领导者是否管理有方。

可以相信,这八点做到了,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就会有所缓解。但是,缓解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缓解而来的,可能会出现更高层次上的紧张。人生是弓箭,总是一张一弛。

(此文系199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当代职业女性角色冲突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进一步推动妇女劳动就业

《“丽妃杯”妇女劳动就业大家谈》历时近一年，至此告一段落。这次讨论不仅受到中年妇女的重视，而且得到各个年龄组的女性的关心；不仅许多女性参与讨论，而且也吸引了许多男性的介入；不仅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女工发表切实的意见，而且有专业理论工作者的高谈阔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集中的，牵涉的面是广泛的。

这次讨论的背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编制着手调整。一批女工，尤其是中年女工首当其冲，于是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或者不被人理解，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上海妇女》抓住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对改革的推进，对社会的安定，对妇女的解放，都是有益的。

就业是妇女走向社会的重要途径。这是讨论中达成的共识。就业，有助于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而经济独立恰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之一。就业，也有助于女性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人的思想的开扩，心胸的豁达，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成天关在狭小圈子里的人，思想是开朗不了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常识。见过大世面，就不会计较“铢两之价”。因此，千方百计为妇女就业提供方便，是妇女工作的长期内容，是全社会都应当关心的课

题。

妇女下岗的比例较大是前进中的小插曲,这也是讨论中的共识。企业以劳动者的劳动质量、数量为准绳,决定去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批中年妇女下岗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各行各业的劳动强度只会减轻,不会加重。再者,第三产业从来都是女性大显身手的主战场。现在我国的三产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太小。今后只要我们生产的配置和结构能趋于合理,那么,可以预料妇女就业的天地是广阔的。放眼未来,当前出现的这些令人不安的下岗,只不过是—段小插曲而已。令人高兴的是,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对策,有的已经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将被吸纳为政策。

妇女双重角色的冲突日益尖锐,这也是讨论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妇女走出家庭,投入社会,成为社会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妇女在家庭中,依然是家庭主妇,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两副重担压得许多职业妇女透不过气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不利于妇女就业的。事实上,已经有少数妇女在角色冲突面前打了退堂鼓。在我们这次讨论中,在已刊出或未刊出的来稿中,都有人为女性角色冲突的缓解提出了不少可操作的建议。比如,在如何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等方面,在男性以及社会方面如何充当职业女性角色冲突的缓冲剂,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有些文章还把中国同外国做了比较,既有利于找差距,也有利于增强自信心、自尊心。

总之,《上海妇女》杂志举办的“‘丽妃杯’妇女劳动就业大家谈”是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举办的,讨论是有一定深度的。大家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是正常的。渴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能够进一步获得解决。可

以相信这次讨论,不仅在妇女学史上,而且在上海妇女解放史上,都会留下重要的一页。

最后,感谢上海娜丽丝化妆品有限公司对此项活动的鼎力相助。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中,该公司能敏感于妇女就业这一热点,不难反映其对妇女工作的支持,以及对上海妇女的厚爱。

(原载《上海妇女》,1994年第1期)

欢迎妇女经商

中国人轻视经商是有历史的。

“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妇女轻视男子经商。至于说妇女经商，那就更加受人轻视、蔑视、歧视了。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经商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社会已由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复杂商品经济以后，在全国人民奋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如果再轻视妇女经商就说不过去了。

据美国经济杂志《卓见》披露：美国正在出现妇女经营企业的热潮，美国妇女开始占据企业首脑的位置，以妇女为首脑的企业，1979年为75万家，1984年猛增到300万家，五年之内增长了4.3倍。在计算机软件行业，妇女大有取代男子之势。商业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桥梁，从商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妇女比男子更具有经商的天赋，理应在这个社会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妇女的解放是衡量社会主义文明的尺度。在中国，动员和鼓励妇女经商有助于商业结构和布局的合理，有助于解决一部分女青年就业，有助于以走出家门的行动来反对封建思想，有助于男女平等、平权的真正实

现。

中国已经培养和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企业家,但是同男性相比,比例还嫌太少。在女企业家中,为“首脑”者更少。我们希望在短期内会有更多的女经理、女董事长问世。

(原载《消费报》,1986年3月8日)

重要的是革新妇女观

上海妇联工作四十年的历史,是妇女观念不断创新的历史,妇女工作的成就是与妇联干部具有创新意识分不开的。妇女界要在未来取得新的成就,就必须增强创新意识。

妇女工作的创新意识应该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上,既要看到妇女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中的作用,更要看到妇女在生活中的作用。妇女不仅是伟大的生产力,而且是生活的带头人和主宰者。过去我们重生产,轻生活,这就必然看不见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在,我们端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一认识,生活比生产的层次更高。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肯定妇女在变革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继续革新妇女工作的观念。妇女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妇女,而妇女的解放是一个过程。不断破除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是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昔日曾对妇女解放发生过历史性作用的概念,今天可能不再具有解放妇女的作用,有的甚至可能变成束缚妇女解放的东西。墨守陈旧,抱着过时的所谓先进经验不放,有时不利于当代妇女的解放。解放妇女是要增加妇女的幸福,不管我们辛辛苦苦做过多少工作,如果妇女不

感到幸福,我们的工作就等于零。当然,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有时 would 牺牲少数人的幸福,但是,我们不要把明明有利于多数人幸福的观念,说成是只有利于少数人。为了妇女的解放,为了增强妇女的幸福感,要革新妇女的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就业观。区别这些观念的新与旧,是要看它们是否能使广大妇女在各方面都有幸福感。妇女工作要让结婚的妇女感到幸福,也要让离婚的妇女感到幸福,还要让独身的妇女有幸福感。看似爱护,实是不利于妇女幸福的事,我们妇女工作者决不能干。

第三,全面革新妇女工作的方式。有人说我们妇女工作者婆婆妈妈,这是有片面性的。婆婆妈妈里头有学问,但是,婆婆妈妈不等于学问。我们妇女工作应当运用现代心理学、现代领导学、现代公关语言和公关艺术来做妇女工作。提高妇女工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是改进妇女工作的当务之急。

第四、要为变革妇女工作的观念创造条件。新观念无不具有二重性。有些所谓新观念完全有可能是荒唐的,而正确的新观念从产生到被认定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轻易为一种新观念贴标签是不可取的。新观念的正确与否,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再得出结论。妇女界要为新妇女观的存在和纠正,提供宽松、宜人的环境。否则,对妇女有益的新观念就可能消失或者被扼杀。

当然,促进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幸福感,变革妇女观念,不能全靠妇联。妇女解放是全社会的事,全社会都要为妇联工作提供宽松宜人的条件。但是,作为妇女自己的团体,不管大环境如何,妇联都要矢志不移地为妇女解放做出贡献。

(原载《上海妇女》,1991年第2期)

重审男人与重塑人格

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别看大街上熙熙攘攘，小巷里摩肩接踵，人口爆满已成为地球不堪忍受的重负，但静下心来认真想来，整个世界满打满算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自诩为“万物之灵”后，更关心的是对世间万物的利用，原本也许可以进行的与其他生物的交流便阻断了，故而，人活在地球上，实在是孤独得很。而在这孤独中，如果男女间再缺少了解，缺少理解，缺少沟通，缺少合作，那么，人类在这地球上可真正要“没戏”了。

两性间的交流与合作无疑已成为必须，可不知是“孤雌繁殖”的残余及泛化；还是人们更多地认为相比较女人而言男人的身心更为康健；亦或作为主角的男人当然更多地承担了了解另一性的责任，当然更多地隐匿了自己希望隐匿的一切，而作为配角的女人也就当然地得到人们更多的了解，能被人们更多地了解。总之，几千年来，人们更多地知晓了女性，而对男性的了解却不甚了了，即使是男人自己，对自我大多也是一知半解。

直至近十几年来，随着女势高涨，女权勃兴，人们，包括男人们和女人们是越来越多地重新认识女人，了解女人，对女人的研

究已形成一门包括女性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社会学、女性文化人类学、女性史学、女性文学、女性教育学、女性法学等等分支学科在内的新兴学科——女性学，而对于男人的研究仍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仅从实质上应与女性学所包含的内容相对应的男性学还只是一个对男性性生理、性疾病进行医学研究与诊治的医学术语这一“孔”中，人们不难窥见对男性研究的滞后这一“全豹”。甚至，即使是对于性生理的研究和性疾病的诊治，也是躲躲闪闪的，远不如对于女性性生理研究和性疾病诊治那么公开。综合性医院中均设有“妇科”，还有专门的妇女保健院，而男性性生理研究和性疾病诊治统统归于风马牛不相及的“泌尿科”，这便是——一证。

近年来，随着对人学研究的展开与深入，社会对于男人的研究开始重视，外国人解析外国男人的专著不断在市面上出现。可惜的是，外国男人毕竟只是外国男人，外国人的解析也只是外国人的解析。对中国人而言，对期待着了解中国男人的中国女人和期待着了解自己的中国男人而言，在需要与外国男人进行比较的同时，更需要的是获得对于中国男人的解析，而这，当然应是由更了解中国文化的演化轨迹，更了解中国男人的心理进程的中国人写的。

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就摆在我的案头，这本名为《男子咏叹调》的书（谷迎春、王金玲著，湖南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从社会、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男人的专著。

在中华文明的构建中，男人的作用当是巨大的——这不是出于性别偏见的臆断，而是历史存在的铁一般的事实，尤其是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四五千年以来，社会文明发展的突飞猛进更直接是男人思维和劳作的结果，而正是这种直接，决定了男人在社

会与家庭中的“种子”和“柱子”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男人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的“群星灿烂”,因此,不能不说近四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是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历史。

至于男人为何能在四五千年前将高居“女神”之位的另一性拉下宝座,自己取而代之为“男神”,且“神力”绵长至今,本书作者认为社会主要控制力的转换是关键:

在旧石器时代,社会以生殖力为第一需求,因此,具有生殖力的女性便成为社会的希望所在,进而成为社会的主体和统治者。在新石器及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人口退而成为社会生存发展的多因素中的一个普通因素,社会开始以个体体力为依托,女性的生殖力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决定意义,而男性的体力优势则更进一步决定了女性权力的削弱,地位的下降,直至步步后退,最后成为男人的依附者和被统治者。女性以生育力的优势在第一个回合中胜于男性,在第二个回合中以同样的原因败于男性——社会控制机制的需求不同,战争胜负所属者也就不同,这次被恩格斯称为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社会主要控制力中生殖作用的削弱和体力作用的强大乃至全面占领。

在今天,中国一方面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少城市已进入智能社会;一方面是体力仍在不少社会劳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一些落后地区还基本处在体力时代,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男人在社会发展中仍不失主体的作用,仍承担着主角的角色。

当然,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个体体力在社会控制力中的

决定性作用必将被智能替代。在这一以智能为基础的社会中,由于就总体而言,女性的智能不低于男性,男性的智能也不低于女性,两性就能同时拥有管理社会的权力和机会,由此,两性进入了真正平等、独立和自由的时代。

从社会运行控制力出发来研讨男人及两性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将此展开,无论是母系社会中的女人压迫男人、男人依赖女人,还是父系社会以来男人压迫女人、女人依赖男人,在更高的层面上,是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和阶层,超越群体和个体而存在的一种社会自我运行的显现,一种社会秩序所需的平衡。正是渗透了这一点,本书作者才能超出性别的局限,更明晰地解析了男人,公正且准确地把握了已进行了近五万年的两性冲突的实质。

不仅是对男性地位和作用的重审,以婚姻、家庭、性需求为突破口,中国男人的心理也被本书作者审阅于阳光之下。

作为“种子”和“柱子”,漫漫四五千年来,男人在享用着众多的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在拥有无尚的至尊的同时,也蕴积了深厚的无奈。在这巨大的责任和无奈的压力下,男人常常只能作为男人——某种角色生存于世,活动于世,原来内含的“人”的意义被极大地湮灭了。

男人必须投身社会,必须造福乡里,必须保家卫国,必须传宗接代,必须养幼贍老……而任何事情一旦成为必须,一旦成为责任,就必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任何强迫性的活动都难以使当事人产生盎然的兴趣。所以,男人总是难以忽视行为结果导致的效益,总是不可能完全淡漠身外之物,总是免不了比女人有更多的浮躁和焦虑。

——与女人相比,男人的人生更多地是一种功利人生,或者

更通俗一点说,男人的一生更多地以功利的实现为指向,在这功利人生中,男人其实并不像女人所认为的那样,活得轻松、自如、潇洒。

特别在今天,女人们一方面雄赳赳地以自立自强自主的姿态向男人们讨还曾经失去的权力,一方面又不无习惯地仍希望在男人身上有所依,有所靠,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格矛盾进一步陷男人于心理冲突之中。

根据权力与义务相关联的原则,男人的权力偿还当然是与义务的出让并举的,尽管义务的出让意味着责任的转移,但权力的偿还毕竟也决定了权威和利益的减少。更何况,权利和义务的拥有更实质性的是当事人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一种显现,今天男人们权力和义务的削减无疑折射出男人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弱化,这给男人内心带来新的不适,这是一。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依靠或依赖原先是互为存在的,可今天,更为自我化了的女人们在推开了向自己靠来的男人的同时,却仍在潜意识中视男人为当然的依靠乃至依赖者,仍期盼困顿之时有人援之以手。作为人,出于一种人性的生存本能驱动,男人愿意无偿地援助女人;作为男人,出于一种效益的考虑,男人也不可能一味地实施这种无偿援助。这样,今天的男人们难免被人们更多地斥为“自私”,斥为“不是男人”。这一空前的敌视引起男人更多的烦恼,这是二。

以女人的“男性化”为代表,整个社会的两性行为规范正开始进行一次浩大的变更。“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之类在个体体力时代成型的两性行为准则在今天虽仍或多或少地规范着一些男女的言行,但就总体而言,其规范性是不断地弱化了。只是新的性别行为标准尚未成型,尚未具备强硬

的约束力,与由于抗争更多地获得了进退自由的女人相比,社会还未能允许作为主角的男人较多地超前改变传统的行为模式。这一桎梏导致了男人新的压抑感的产生,这是三。

作为“种子”和“柱子”,主体和主角,男人心中原本冲突深刻,而这些新的不适、新的烦恼、新的压抑更加剧和深化了这一冲突,于是,今天的男人活得更累。

更进一步看,男人的心理冲突实质上是一种人性与男性的冲突。作为人,他崇尚自由,追求自然的享受,力图一身轻松地逍遥于人生中;作为男性人,他需要权力,追逐效益,争取着功名的显扬。男人集人性与男性于一身,其内心冲突便成必然。而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变得物欲横溢功利至上的今天,男人们更不得不或必须以自由和自乐的丧失为代价去换取物质利益和功名,男人们的心理冲突又怎能不日益加深?

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理解男人的这一心理冲突——这是人类(包括男人和女人)一种心理常态。

作为原生意义上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应该且可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看一下自由在地生息嬉戏于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物,作为属于自然生物之一种的人类,其原生态想必也该如此,然而,人一旦成为社会人,成为某种角色——从两性角度讲,便是成为男人或女人,人便不再是自由和自如的了。虽然何为男人,何为女人的两性标准在人类社会诞生后已有多次的变更,但男人必须成为男人,女人必须成为女人,却始终是一铁律,它使得男女两性的自然属性都不得不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属性。由此,人的活动往往只是一种扮演,一种有目的的运作。人,不再是人自己。

对应于大自然的造化,人渴望成为自己;服从社会的分配,

人不得不成为“角色”。这样,人就免不了总是处在内心冲突中,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这一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类自我和角色冲突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不完结,人类自我和角色的冲突也就不会完结。但人们今天内心冲突日益激烈的事实提醒我们,我们是否该换种活法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人已提出“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的口号,借用这一口号,我们认为也可以说:“男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将这一口号继续扩大,那么,人更应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角色”。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首先是应该作为人而不仅仅是角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是应该以人然后再是以角色的规范去律人律己;我们首先是应该从人而不仅仅是角色的角度去观察思考人类乃至全球的问题。总之,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多地应该是人,而不仅仅是某一角色。

当然,转变已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的生存方式并非易事,它需要整个社会控制力的变换,更需要人类自我人格的重塑。在“人首先是人”的认识上,女人们已先行了一步;在这自我人格的重塑上,且让我们男人来打这“头一炮”,如何?

(原载《书城》,1993年第2期)

为“大丈夫”正名

现在人们一提“大丈夫”，就仿佛有个傻大黑粗的形象出现。其实这是误解。大丈夫并非是粗声粗气的代名词，更不是气势汹汹的化身。

但是，我也不赞成把大丈夫变成小丈夫。大丈夫还得大。

大丈夫之大，应当是大在大气上。这就是说，大丈夫应当有恢宏的气魄、气势。办事要有胆略，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人，不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人，不是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人。

大丈夫之大，应当是大在大度上。夫妻是对立的统一。大丈夫在处理夫妻关系上，要有容忍精神。妻子有苦闷，丈夫要主动为之排解。夫妻有矛盾，丈夫应当让三分。有人认为，这是小丈夫。不对。“有容乃大”之“容”，包括“容”妻子，能容妻子方能称上大丈夫。连妻子的一两句带火药味的话都容不下，在社会上就很难成大事。

大丈夫之大，还应当是大在大方上。大方的内容很多。我在这里着重讲经济。夫妻之间的矛盾，经济往往是导火线，不管贫和富，在经济上夫妻都要谦让。抠门，抠得妻子手足无措，不是大丈夫。

说到底，大丈夫应当是人格形象高大。张学良将军前几年

曾给充满着大丈夫气概的阎明复同志写过一首诗,诗云:“大丈夫不要有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应当说,这是为这大丈夫绘出的素描,也是对“大”规定的尺寸;顶天立地是也!这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作为男人,还是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1994年5月31日于上海

(原载《家庭》,1994年第9期)

老人问题与“干”字形家庭

与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的同时,要求与父母分居的青年人也在增多。据北京社会学者的调查,明确表示希望同父母分居的男青年占 87%,女青年占 91%。这是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有人主张发展大家庭。可是,这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因为大家庭是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古代人与大社会联系少,与家庭这一小社会的联系多。在私有制与小生产的前提下,在家庭的细胞膜铁一般坚硬的情况下,家庭的规模大,意味着同自然的斗争能力强,家长的权威大,老人的地位高。“一户之内,所有之田粮,家长主之,所有之钱财,家长专之。”可是,一旦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以后,人与大社会的联系多了,与家庭这一小社会的联系就少了。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很好的概括。社会化大生产产生小家庭,破坏大家庭,这是带有规律性的。因此,想通过维护大家庭来维护老人,是很难的。而发展“干”字形家庭,则是解决老人问题的好办法。

家庭按结构分,有“土”字形大家庭,“T”字形核心小家庭,“干”字形直干式家庭。所谓“土”字形家庭,是指一对老年夫妻偕两对以上中年夫妻,而每一对中年夫妻又偕若干子女或若干

对青年夫妻所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用图线表示,很像“土”字。所谓“T”字形家庭,是指一对夫妻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小家庭。由于现在国内外盛行只生一个孩子,因此这类家庭的图样如英文字母“T”。所谓“干”字形直干式家庭,是指一对老年夫妻偕一对中年夫妻以及一个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用图线表示,它很像汉字中的“干”字。

“干”字形家庭与“土”字形家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排除了叔伯、姑姨、妯娌等横向亲属;“干”字形家庭与“T”字形家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容纳了三代人。“干”字形家庭是介乎“土”字形家庭和“T”字形家庭之间的中间型家庭。它既抛弃了“土”字形家庭不易管理的缺点,也避免了“T”字形家庭撇下老人不管的弊病。

“干”字形家庭比较适应中国的国力。在振兴中华的大业中,百废待兴,是不可能拿出很多经费资助老人福利的。我们只能采取以家庭赡养为主,以公共福利为辅的方针来解决老人问题。

“干”字形家庭比较符合千百万老人的愿望。据原复旦大学分校黄小勇调查,现在90%以上的老人不愿意同子女分居,而要求与子女住在一起。一般说来,老人身心安康的程度与家人生活料理的相关系数为0.42,与子女感情的相关系数为0.25,与老伴的感情为0.16。说实在的,就是在那个生活料理的0.42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子女料理。正因为“干”字形家庭顺乎老人之心,所以在“T”字形家庭已占大部分的情况下,“干”字形家庭在上海仍占33%。近两年党和国家充分重视中青年,三令五申发挥中青年作用以后,广大中青年忙于业务、疏于家务,于是又产生家中需要老人的紧迫感。“干”字形家庭似有增长之势。

看来在近年内推行“干”字家庭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但是，要推行“干”字形家庭也不是没有工作好做的。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青年不愿同父母一起住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吧养老作为一项国策来宣传，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建设。其次，在城市住宅设计上，今后要着力于从“干”字形家庭出发，要改变现在主要从“T”字形家庭出发的状况。“干”字形家庭要求三间一套，看起来比两间一套面积大，但是从合居比分居节省住房面积看，不会给国家增加额外负担。第三，在各项经济政策上，要给养老者以好处。扭转过去家分得越小，捞到的票证越多的局面。

1990年上海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将占20%左右。家庭学应把这个“20%”列入课题，找出解决老人问题的途径。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9月28日)

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

从人类的性别比来看,一直是女性多于男性。这是自然规律。这是XY染色体搭配的结果。

从老人的性别比来看,更是女性多于男性。这主要也是自然规律决定的。

因此,老年研究的重心应当放在老年女性上。

对老年女性的研究和关心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社会的,有家庭的。方方面面的关心,都会给老年女性带来温暖和幸福。可是,有一个问题对老年女性来讲是最大的难题,这就是老年丧偶的女性的再婚问题。现在的状况是青年结婚难,老年再婚更难,老年女性再婚难上加难。现在子女为父亲介绍对象的不少,为母亲介绍对象的十分罕见。再加上现在有许多老年男性再婚喜欢找中青年女性。这就加剧了老年女性再婚的难度。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从趋势上看,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有可能成为最后一个最难攻克的社会堡垒。老年女性人数的增多与老年女性再婚人数的相对减少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剪刀差”。“老寡妇”增多,是社会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中国有句话:老友能使老人长寿,老伴更能使老人长寿。有

一位好朋友能使人多活好几年。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位好配偶也有极大的可能使人多活十几年。朋友再多代替不了一位老伴。子孝代替不了性爱。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代替不了老人的黄昏恋。“霜叶红于二月花。”老年女性，尤其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女性的内心深处是渴望爱情的。尽管她们爱情的欲望有所减弱，但是远没有熄灭。有些老年女性确实已经熄灭了爱情之火，那也是被人用灭火器扑灭的。这里包括怀念前夫也是一种爱情之火。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里的“人类”，应该包括老年女性。谁也没有资格把老年女性从人类中开除出去。对中国人来讲，谁也没有资格把人数相当于英国、超过于法国人口的中国老年女性开除出“球籍”。

老年女性是需要爱情的，可是，老年女性又是害怕爱情的。在爱情生活中，老年女性有“五怕”：一怕子女横加干涉；二怕后娘难当；三怕社会舆论谴责；四怕对不起前夫的在天之灵；五怕“难填”子女在金钱上的“欲壑”。

需要爱情与害怕爱情的共存和交织，构成了老年女性的心理矛盾和冲突。

怎样解决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呢？

有人主张实行老年男女同居制。近几年此类观点比较流行，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人同居的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合易，分也易。换句话说：来去自由。人到老年，各人的性格类型和生活习惯都已定型，可塑性比较小，彼此的相容性也比较小。老年男女之间初接触，可能合得来；深入下去，朝夕相处，就难说了。这也是再婚老年离婚率高的缘由。采用同居制，实行松散的结合，一旦发现合不来，就可很快分手，似乎也不存在财产上

的纠葛。

可是同居制,也带来不少弊病。在爱情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假如鼓励老人同居,那么,对青年人的同居怎么看?能不能容忍青年人同居?假如说,不能容忍青年人同居,这又如何解释老人同居?有人说,老年人不会繁衍后代,因此可以同居,也就是说,他们的性生活不以生育为目的。那么,假如说青年人也实行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同居,是不是可以容忍?这样问题就复杂了。依我之见,在婚姻法没做修改的情况下,还是对老中青一视同仁为好。是婚姻,就要有法律承认。法律承认了,也是对老人婚姻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不然,没有法律保障的老年婚姻,一旦受到外界干扰,说不定也会酿成悲剧。也还要注意老年犯罪率升高的问题。老年同居这个口,还是不开为好。

在老年女性再婚问题上,究竟如何是好?我先谈两点看法:

一、进一步批判封建的血统论。现在,父荣子贵的现象还在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健康的社会生活。现在,把家庭关系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甚至为了家庭利益而破坏社会利益的行为还相当普遍。如果封建血统论的地位下降了,老年女性再婚的顾虑就会减少了。

婚姻是自由的。不论性别,不论年龄多大,都有爱的权利,都有选择配偶的权利。过去,父母包办、干涉子女婚姻是不对的;今天子女干涉、甚至包办父母婚姻,是更加不对的。因为历史前进了,时代不同了。过去,父母干涉子女婚姻,封建社会的历史有很大责任;今天,子女干涉父母婚姻,历史不会替你承担什么责任了。

二、进一步改革遗产继承制。财产继承制从来都是变化的。

老年女性的再婚问题——

从古代的幼子继承制变为后来的长子继承制,今天又变为配偶子女平等继承制,将来还要变,有可能变为遗嘱继承制。有了遗嘱继承制,子女就不是当然继承人。

现在子女干涉父母再婚,大多是为了财产。财产继承制一变,子女干涉父母婚姻的念头就会减弱了。再就是:建议提高遗产的税率,使下一代没多少财产可继承,从而减弱他们为了财产而反对老人再婚的劲头。

老人说:人类的未来在青年。从某种角度上说,青年的未来是老年。我们祝贺青少年过生日,说穿了,就是祝贺青少年向老年逼近。我们勉励青少年成长,说穿了,就是勉励青少年成长为老年。老年是青年的未来。今天的老年如果凄凉,明天的老年会不会也凄凉呢?反之,今天的老年幸福,就预示着明天的老年也可能幸福,或者是更幸福。

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愿天下的有情老年女性能成眷属。

(原载《上海老年报》,1994年11月18日)

研究家庭学的理论指南

——读毛泽东同志关于家庭问题的一封信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同志就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家庭问题给博古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所阐明的观点,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它对于今天蓬勃开展的家庭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

写信的时代背景

在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写信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实行了土地改革,陕甘宁边区的新区以及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许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互助组或变工队。各根据地还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毛泽东同志上述精神指引下,1944年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和副参谋长杨立三同志提出了著名的“滕杨方案”。这个方案贯彻了生产有分红、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精神,纠正了过去把共产主义远景当作现实,认为个人积蓄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的错误观点,从而推动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农民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的同时,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了参议会和政府的选

举;在军事上实行了抗战的兵役动员和勤务动员,建立了民兵组织;在文化上普遍组织了识字班、秧歌队等文化团体。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种种变化,都对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带来深刻的影响。政府对劳动者实行了“公私兼顾”,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在家庭里要不要兼顾家庭与家庭成员这两头?农民有权选举县长,那么他们也会很自然地想起:家长是不是也可以由选举产生?全社会开展生产竞赛,那么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内部要不要也来一个竞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猛烈地冲击着旧式家庭制度和陈旧的家庭观念。

农民家庭状况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报纸版面上来。1944年上半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农民改造旧家庭,实行家庭民主的消息、通讯和文件。

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魏希文、田方采写的《家庭会议》。这篇通讯介绍了家庭关系比较和睦的李树厚一家。李家是个大家庭,12口人。兄弟、妯娌之间有活抢着干。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不论大小生活,都一起来作(做),互相客气着,有些小生活上,你也动手我也动手就浪费了”。为了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有效地组织生产,李树厚一家召开了家庭会议。什么农活男子干,什么农活女子干,什么农活老大干,什么农活老二干,由大家民主评议,安排得有条不紊,收到了显著效果。

5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这份《宣言》是用事实来讲话的。它列举和推荐了许多治家有方、治家有功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如创造饲养母畜新办法的小脚女人刘先知,坚持十天开一次家庭会议的管家模范王世兴,等等。

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王国桢采写的《靖边劳

动英雄王国保召开家庭生产会议》的消息。王国保的家庭会议规模比较大,不只儿孙媳妇们全都来开会,连他家的帮工、伙计也都来了。他们一起回顾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并细致安排了今后的生产。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在各根据地引起极大反响。家庭改革的事例不断涌现。大约是在7月,编辑部又收到了王若采写的《庆阳蔡德旺家团结和谐勤劳生产》的文章,讲了他们家带动全庄搞好生产的情况。还收到了吴殿甲采写的通讯《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李家本来不太团结,个别家庭成员的手脚也不太干净。很巧,县里的劳动英雄座谈会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他们一家听了劳动英雄的发言,深受教育。于是李来成决心来一个转变。用这篇通讯的话来说,李家运用“每个人先检讨自己,再批评别人”的办法,解决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团结。接着他们又用民主方法,选举了家长 and 副家长。最后,制定了生产和节约计划。经过了两个月的实践,效果良好。于是李来成又制定了奖励办法,有超产奖,有节约奖,还有助人奖。这样一来,全村人都来学样子了。李家的做法很快受到县里的重视。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认为这两篇文章有分量,决定在发表它们的同时,发一篇社论,提倡一下家庭改革。社论经张闻天同志审阅后,送给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改动了60余处,在删节的同时,又加了1184个字。可是在改完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觉得他所修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于是又在他修改过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不发表”,而要编辑另写一篇社论发表。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的社论,宣传家庭民主,鼓动家庭改革。毛泽东同

志看了,觉得言犹未尽,于8月31日挥笔给当时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写了这封信,阐述了家庭改革中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基本的理论观点

毛泽东同志致博古的信,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论家庭的提纲。信中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怎样认识根据地里的家庭?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都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家庭,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家庭。对这种家庭应当怎么看?当时有人认为,不宜再提倡“走出家庭”,理由是跟“五四”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同志从“民主革命的目的,就在脱离封建压迫,解放人民”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一切存在封建束缚的家庭里,都有走出家庭的必要。农民的家庭在阶级地位上同地主家庭是对立的,是反对封建的,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下,封建的家风一直在侵袭着它。因此,在不少农民家庭中也有封建家长制的残余,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毋庸置疑,也有需要改造的一面。再说,扩军、招工、招生、移民、参加革命工作,等等,也要求农民走出家庭。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明确指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预见到打下北平之后,“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强调改造家庭,走出家庭,破坏旧家庭,是毛泽东同志写这封信的出发点之一,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家庭问题的基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了根据地家庭也有需要巩固

的一面。因为，在40年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只有家庭团结、巩固了，劳动力才能解放，大生产运动才搞得起来。因为，根据地的社会是民主社会，只有民主进了家庭，民主才算普及。因此，毛泽东同志又说：“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

一要走出，二要巩固；既要否定，又要肯定，否定其封建性，肯定其民主性。这是由农民家庭自身的两重性决定了我们应该对待家庭所持态度的两点论。

二、怎样改造家庭？在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开始，历来有人主张家庭改革。就是根据地一些认为“五四”口号已经过时的人，也并不否认家庭有需要改革的一面，只不过是把改革看得不那么重要就是了。在主张改革的人们中，分歧较大的是如何改革，也就是通过什么道路进行改革。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实行为期不超过一年的契约婚，这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在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不论未发表的社论文稿，还是8月25日已发表的社论，也都存在未能把家庭改革的途径讲清楚的毛病。纠正这一毛病，是毛泽东同志致博古同志信的第二个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在信的一开头就指出：“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他又说：“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群众运动同家庭改革的关系时，把群众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脱离家庭的

群众运动,另一类是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他认为,不论哪一类,都会给家庭带来变化。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的家庭之所以能得到初步的改革,是因为有群众运动;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家庭要进一步得到改造,依然要有赖于群众运动。社会是肌体,家庭是细胞,不改造肌体,怎么成呢?全局是局部的统帅嘛!

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分析了家庭制度与生产方式的联系。他写道:“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了家庭改革的社会物质基础。生产力没有飞跃发展,社会制度没有巨大变革,家庭的改造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像俄国的民粹派那帮人把群众当群氓,才主张不用政治斗争而达到救民的愿望。只有那些改良派,才主张不触动社会制度而建设好家庭。历史已经表明,他们的这些主张完全是一种幻想。

毛泽东同志把家庭改革与社会改革辩证地统一起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创造性发展,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的伟大贡献。

三、改造家庭以后会不会取消个性?抗日根据地里的家庭改造是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是要把一村一县的“组织起来”同一家一户的组织起来相结合。于是,有人认为家庭的改造和把家庭组织起来会压抑人的个性。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文稿时,两次提到个性问题。他在致博古的信上写道:“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

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对个性解放问题是考虑再三的。看来,为了把个性问题讲明白,是毛泽东同志挥笔给博古同志写信的第三个出发点。

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是片面强调个性的。他是把个性解放与家庭改革统一起来研究的,是把个性解放与组织起来统一研究的,归根结蒂他是把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统一起来研究的。他在修改延安《解放日报》谈家庭的社论文稿时曾经指出:只有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与抗战事业,家庭成员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够发展。他还指出:在根据地,一方面仍是家庭,一方面却以个人为单位组织成为许多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性被极大地发展了。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同社会间的信息交往越多,人的社会化的程度越高,人的本质的层次才越高。一个人成天关在闺房里,孤陋寡闻,人的特点都难保住,还谈得上什么个性?

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阶级不解放,哪里谈得上个性的解放?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个性从属于阶级性,个性只有依附在阶级性中,个性才能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是个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论者。我们认为,阶级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阶级的解放又要通过个性的解放来体现。

巨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距离毛泽东同志写给博古信的时间,已有41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平等互助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已经初步建立。与此同

时,家庭的生产职能、消费职能、教育职能、娱乐职能都在愈来愈多地向社会转移,甚至连生育职能也受到社会的制约。与此同时,家庭的结构也在开始变化,联合家庭在一年年减少,核心家庭在一年年增多。随着生产、生活、教育等各项事业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走出家庭的人数与日俱增,距离也越来越大。从前,“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是值得一颂的。可是今天呢?人们对频繁的远程流动,视若等闲。我们的格言是:“哪里需要哪安家。”请看,有多少上海人在青海湖扎根,有多少亲兄弟分别在天南地北。这无疑是对大家庭的破坏。托儿所、幼儿园的兴起也大大减少了“儿女绕膝”的机会。家庭观念的淡化是必然的。置家庭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现象,迟早要绝迹。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家庭不管怎么分化,总还会存在。家庭是一个人的后方。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人们就无“后顾之忧”,在前线打仗也有劲。因此我们在看到家庭职能不断转移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发挥和运用家庭现有的职能,努力维持家庭的团结。这也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走出家庭,巩固家庭,破旧家风,立新家风,仍然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家庭的两点论。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今天改革家庭的任务还很重,还有不小的阻力。这表现在中国的家庭还要不要改造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应该改造哪些方面的问题上。有些人对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观的影响和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侵袭熟视无睹。有些主张搞封建家庭的人,对批评资产阶级家庭观很起劲,而认为封建家庭观是中国传统。也有些赞成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人,对批评封建主义家庭观很起劲,而视资产阶级家庭观为先进。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风俗习惯各不

一样,究竟什么是家庭里应当改造的主要方面,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在中国广大农村似应把继续反对家庭中的封建成分作为改造家庭的主要方面;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似乎应把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在家庭里一起反。

当然,在改造家庭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家庭改革依赖于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仍然是今天我们的指南。你真正热心于家庭改革嘛,那你就应该首先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然,就会像康有为的《大同书》里的家庭改革方案那样,完全是空中楼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绝不是四十多年前的生产力所能比拟的。在科学技术发展时,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在生产方式变更以后,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家庭制度必然要起变化。可是现在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热心于社会改革,而不热心于家庭改革,甚至把恩格斯多次阐述的无产阶级婚姻观、家庭观,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分割开来。在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草稿中有一段话,值得深思。原文写道:“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则用一切方法反抗这一潮流,在思想上想把旧家庭制度神圣化、永久化,说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这样来为旧社会作辩护,这样来反对民主主义……”社会改革是家庭改革的前提,家庭改革要与社会改革相适应。社会改革也只有与家庭改革同步前进,才能顺利进行。在改革中,运用毛泽东同志家庭改革的思想,发展毛泽东同志家庭改革的思想,就一定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不论从绝对数讲,还是从相对数讲,都是幸福家庭最多的国家。我们的民风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民风。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12月29日)

在家庭史研究中要坚持唯物史观

——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被称作马克思“遗言”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是马克思于1881年5月到1882年2月,在病魔缠身和丧偶之痛的情况下写的。恩格斯形容马克思当时的心情说:“摩尔也死了。”是的,摩尔这时已终止了他那本“无产阶级圣经”——《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可是,他却捧起了在当时被认为犯有“渎圣罪”的《古代社会》,并在这死一般痛苦的情况下,挣扎着写出这本《摘要》。

名曰《摘要》,实际上不仅摘录了《古代社会》中的精华,而且变更了原著内容叙述的顺序,同时还指出了书中不确切的地方,包括一些错误观点。名曰《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实际上还把其他几位学者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述一并摘录,又加上大量评语。因此,我们应该把这本《摘要》看作是一部著作,一部以笔记形式出现的著作。

这部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财富,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武器。

发现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发现

早在摩尔根被易洛魁人收为义子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阐明了唯物史观,指出只有物质生活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应从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出发来说明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可是,当时人们对原始社会的了解还不是很全面的。而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恰恰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不懂得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很难对科学共产主义有足够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一直关注人们对原始文化的研究。1879年,马克思出于研究原始社会的需要,曾把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一书,作了摘记。两年后,马克思发现了《古代社会》,他就像居维叶以极大的热忱关心巴黎的一些有袋骨片一样,以极大的热忱关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发现的“社会化石”。

摩尔根根据北美洲印第安人这块“社会化石”,第一次发现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发现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他绘出了家庭史的略图,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此,恩格斯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页,人民出版社)。

这样一部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伟大著作怎能不吸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始人去阅读它呢?马克思不顾英美学者对《古代社会》的沉默、抵制和仇视,决心把这部著作介绍给德国无产阶级。

当然,这部独立发现唯物史观的伟大著作并未充分体现和

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更有责任对这部伟大著作进行扬弃。于是,马克思写出了这部20余万字的《摘要》。马克思把《古代社会》第三编移到突出的位置上,提到了第二编的前面,这说明马克思重视摩尔根绘出的“家庭史的略图”。马克思把《古代社会》第一编第二章的标题改为《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使得唯物史观在家庭史的背景上更加鲜明和清晰。

马克思本来是想在写完《摘要》以后,进而再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可惜,在《摘要》写完后不久,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马克思的计划没能实现。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动手写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家庭》)。关于恩格斯的这部书,正如列宁所说:“这是现代社会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恩格斯有哪些根据呢?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就决定“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写点东西”。写完之后,恩格斯又在《家庭》的第一版序言中写道:“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抄录。”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摘要》与《家庭》的关系。

马克思的《摘要》用唯物史观的红线把《古代社会》中的大量资料贯串起来,赋予《古代社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灵魂,提高了《古代社会》的理论深度。在马克思逝世后,《摘要》又成

了恩格斯写作《家庭》的框架。第二提琴手是接着第一提琴手演奏的。《古代社会》的结论同马克思的结论相同；《家庭》的结论又同《摘要》的结论相衔接、相吻合。《摘要》是对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巨著的再发现，《摘要》又为系统地、完整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巨著从观点和材料上做了准备。《摘要》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

家庭史上的唯心史观绵延起伏

人类的家庭史在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调查做出判断以前，是颠倒着的。谁先谁后颠倒着，谁决定谁也颠倒着，甚至还有人认为家庭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历史。在《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后，家庭史上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也仍然没有止息。

斗争是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一、家庭有没有起源？

差不多与恩格斯的《家庭》问世的同时，勒土尔在1884年出版了他的《婚姻和家庭的演化》。稍后一点韦斯特马克于1891年出版了《人类婚姻史》。这两部书都公然声称人类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他们矢口否认原始杂交和群婚的存在。

二、家庭演化的动力是什么？

有些人也承认家庭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但是，在推动家庭前进的动力问题上，其观点是唯心主义的。

考茨基认为推动家庭发展的是“社会欲”。恩格斯在发现考茨基不承认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家庭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后，写信批评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听不进去，直到1927年考茨基还用他那个“社会欲”来冒充唯物史观。他认为嫉妒是固有的，

不承认人类祖先通行无区别性交。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派的罗维,认为决定家庭发展的是“礼教”。他写道:“兄妹或姐弟配偶,间或见之于记载,那也不是因为野蛮未开化,都是过分讲究礼教的结果。”(《初民社会》)

三、《古代社会》过时没有?

上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派,在攻击摩尔根的家庭起源理论上是极为卖力的。他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古代社会》已经过时。罗维为同《古代社会》唱对台戏,于1920年出版了《初民社会》。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摩根(即摩尔根—邓注)的书成为无可挽回的古董。”又说:“今日之下还要向那里面(指《古代社会》—邓注)求教关于初民社会的知识,这简直等于向达尔文以前的生物学者那里学生物学。”(1935年商务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功能学派、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派,也都以所谓“新资料、新解释”来贬低摩尔根,否定《古代社会》,兜售他们的唯心史观。

在苏联,对《古代社会》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在列宁时代,估价很高;在30年代,估价很低。不仅对《古代社会》,就是对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苏联学者也讲它“犯了一个错误”。50年代后,评价又高了些,但是依然声称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期法“不适应现代科学水平”。

苏联的这些说法,一直被我国所沿用。直到1981年还有同志提出,应当重新探讨摩尔根对家庭史的划分。一位社会学家在1981年重版的旧著中,仍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有母系社会的说法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证实。

所有这些说法,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史理论格格不入的。

——在家庭史研究中要坚持唯物史观

家庭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愈不发达，“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原始社会，“家庭”关系几乎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一百年来，在对家庭史的分期上之所以争论不休，主要有几个根本理论问题没搞清楚。

一、生产工具是不是家庭制度的指示器？

马克思在《摘要》中说：“弓和箭之标志着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正如铁剑标志着野蛮期而火器标志着文明期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清楚：弓箭、铁剑、火器等生产工具是社会进步的指示器。工具是历史的见证人。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人类自身都在起变化。马克思在这里讲了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那么初级阶段呢？无疑地也应当以生产工具作尺度。

近几十年人类学家在南非、东非发现了“南猿”化石，在中非发现了“副”南猿。我国南方采集到的“半人”化石，也被认为与南猿同类。从这些命名中可以看出，学者们不大想把他们看作人。现在有些学者提出，他们应为“早期猿人”。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这主要是从他们的体质特征上考虑的。可是，仅仅着眼于体质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初，把它们称为“南猿”，这不就是受体质尺度的限制吗？差一点把人类的老祖宗排斥在人类之外，还不是因为囿于脑量少、额部平、眉脊粗的缘故吗？那么，这个错断是怎么纠正的呢？今天人们为什么又公认他们是人呢？这主要是因为发现他们能使用和制造石器和骨器，而且“器”的花样还很多，既有砍砸器、刮削器，又有盘状器、球形器，还有什么多面体石器。尽管这些石器是标准的“粗制滥造”，是所谓砾

石器,但毕竟是有了工具,那就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他们是人而不是猿。既然肯定了他们是人,那就不妨按照他们生产工具的发展阶段,称其为“砾石人”。砾石人一说,能较全面地反映出他们的本质特征。砾石人应是蒙昧人的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正如马克思在《摘要》中说的,“无婚姻之可言”,有的只是“杂交的男女关系”。过去认为在蒙昧人的初级阶段,即砾石人阶段,存在母子杂交。然而根据近年来猿猴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野生黑猩猩中,母子是不交媾的。猩猩尚且如此,已经从猿转化为人的砾石人,总不至于有母子交媾吧!不过,没有母子之杂,父女之杂还是比比皆是的。因此,使用砾石,血缘杂交,是砾石人的两大特征。

过了一百多万年以后,即到了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如被我们称作“元谋猿人”的阶段,人类学会了用火。火由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这是人类同大自然斗争中的一大飞跃。从群体上看,确已会用火;而从个体上看,要掌握驾驭火、利用火的本领,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比今天提升为教授要难得多,需要花毕生的精力才行。因此,当时能掌握用火技术的,只能是长辈。在生产技能上的上下辈之差,使得上下辈之间在婚姻上出现了鸿沟。换句话说,不同辈不能成婚;只要同辈,哪怕是兄妹成婚,也是合乎道德的。用火和血缘家庭的存在,是蒙昧人中级阶段即“用火人”的两大特征。

二、家庭制度是不是受所有制支配?

这一点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事实上是谈到了的,但在概念上是不清楚的。而在马克思的《摘要》中则跃然纸上,赫然写进标题。

这一点在今天的学者中,有些人在分析阶级社会时是清楚

的,在分析原始社会时,则比较含糊,或者说忘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主要是看不清在原始社会中,所有制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可是在漫长的三百万年历史中,所有制发生过许多部分质变。看不清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前后的变化,就很难划分清楚家庭发展的阶段,即使接受前人的分期,也不容易贯彻到底。

原始公有制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原始群所有制。最早的原始人过着合群的社会生活。一般一群为数十人。群内无严格分工,比较松散。群与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种以群为基础的漫无边际的原始公有制,决定了血亲杂交。既然生产上没什么分工,在性关系上谁还会去考虑分工呢?

二是原始公社所有制。公社不像原始群那么松散。生产资料和产品由原始公社所有。如土地、草场、森林、河流、池沼等由公社集体占有。归个人所有的只是些随身携带同时作为防御武器的生产工具。公社的产品平均分配。公社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彼此抱成一团,一致对付别的公社。社内长者就是强者,幼者就是弱者。技术上的强弱之分,决定了上下辈不能通婚。公社范围内的公有,又决定了公社范围内的群婚。

三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公社所有制。这时公社所有制还是公社所有制,但是公社的比重开始下降,公社徒有形式。而按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成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一方面尚有公有所有制的外壳,一方面公社内各氏族的经济独立性日益突出。这就造成了由氏族内婚向氏族外婚的转化。同一氏族内的兄妹婚不允许了,但是允许在两个氏族间通婚。这就是所谓普那路亚家庭。

原始公有制的范围、程度在不断缩小,带来了家庭制度的更替和演化。而通婚范围的缩小,最终导致婚姻冲出血缘和近亲

的空白,导致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

三、家庭制度是不是曲折发展的?

家庭制度同生产力、生产关系是相互适应、平衡发展的。因为家庭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家庭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这是三者相互联系的一面。但是,在各个具体历史阶段上,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下,这三方面的发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彼此有脱节、背离的一面。这是辩证法留给后人的难题,也是使人在研究家庭史时感到扑朔迷离的症结。比方说母系社会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存在过的。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还有母系社会的孑遗。这无疑是阐明母系社会的有力证据。可是如果没有辩证法,看到他们的生产力并不那么原始落后,就会把母系社会的孑遗看作为一种奇俗,并以此作为否定曾有母系社会存在的例证。我国的纳西族,是举世闻名的母系社会的“社会化石”。可是,在这个大的母系社会中夹杂有父系的小社会,甚至在一家人当中,也有父系和母系并存的情况,甚至还有从父系向母系倒退的情况。这只能说明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能说明事物的发展是无规律的。尤其在今天,与同样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有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低的,家庭制度可能处在较高的层次。看到家庭制度演化的多样性和曲折性,可以增强我们把社会主义文明落实到社会细胞——家庭中去的信心。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家庭建成文明的细胞,从而巩固全社会文明的肌体。微观的文明同宏观的文明是统一的。

(原载《博物》,1983年第2期)

谈谈家庭学的研究

家庭社会学简称家庭学。家庭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家庭的学问。它以古今中外的千家万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通过对家庭内部矛盾的剖析,通过对家庭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阐述家庭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化的客观规律。

自从人类社会在地球上出现以后,一直是社会即家庭。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按家庭制度划分。后来,阶级社会产生了,社会成了“肌体”,家庭才变成“细胞”。一直到现在,家庭仍然还是社会的细胞——尽管有人认为,快要不成其为细胞了。从根本上讲,家庭学是从“细胞水平”上,对社会进行研究。因此,家庭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是“细胞社会学”、“微观社会学”。

研究家庭学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开展家庭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必要的,迫切的。

一、从家庭与人的关系来讲:人的一生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不管人们在从幼到老的过程中,家庭会起什么变化,人总归是离不开家庭的人。人要受家庭的影响,人也会给家庭以影响。这里甚至包括背叛家庭、脱离家庭,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有人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藉以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其

实家庭又何尝不是人们永不毕业的学校！我们固然不应该认为家庭决定人生，但是，不论怎么说，也无法割断人与家庭的关系。因此，为了教育人、解放人，必须研究家庭学。

二、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来讲：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人总是从家庭走向社会。我们要认识社会，少不了要先认识家庭；我们要改造社会，也免不了要改造家庭。同样的，家庭制度的变革要依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制度要受所有制的支配，要依靠道德观念来维系。因此，为了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为了推动社会前进，必须研究家庭学。

三、从家庭的状况来讲：当今的人类家庭正处于转折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的规模在由大到小，家庭的结构在由紧到松，家庭的功能在由多到少，家庭的观念在由浓到淡。这种转折的转速，国与国之间不一样，我国的城乡之间也有差别。如何使得这种转折快慢适度，如何使得今天的家庭结构松紧有致，如何使得家庭的观念浓淡相宜，这就迫切要求家庭学从理论上进行指导。因此，为了适应家庭急速变革的潮流，为了在家庭变革中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必须研究家庭学。

四、从家庭学研究的现状来讲：解放前，中国研究家庭学的人，本来就寥寥无几。解放后不久，整个社会学都给砍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这样，家庭社会学的教育与研究一下子停顿三十年，大学里没有了社会学系，自然更谈不上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可是，这些年来，国外对家庭学的研究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美国每年要出版六百多种有关家庭社会学的书刊。国外对家庭学的研究如此重视，是同他们面临着所谓“家庭解体”有联系的。大变动出新理论。家庭制度的大变动必然会引出各种各样的议论。不过，西方的议论，普遍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但也有些可取的观点。就是在一些观点有错误的论著中,也有一部分颇有价值的资料。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就该有勇气补上家庭学的“缺环”,应该下功夫在家庭学方面有所建树。

家庭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决定的,是由现阶段家庭的实际状况决定的。

家庭学的任务

所谓家庭学的任务是指理论上的任务。明确了家庭学的任务,就使得家庭学的教学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有了衡量教学质量的准绳。那么,家庭学究竟有哪些任务呢?

一、揭示家庭的本质。古往今来,人们对家庭下过不少各不相同的定义,这都是正常的。事实上,家庭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变化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应该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给千差万别的家庭,下一个能够概括出家庭本质的定义。我对家庭定义的表述是:按血缘和姻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简单地讲:血缘+经济=家庭。当然,在有法律以后,还有法律承认的问题。但就历史上的家庭形态看,血缘(姻缘)和经济两个因素,缺一不可。有血缘关系而无经济往来的不成其为家庭;同样,有经济往来而无血缘关系的,一般也不成其为家庭。只有领养一种,虽无血缘或姻缘关系,也可以成为家庭成员。条件是被领养者,参与家庭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可见,在血缘(姻缘)和经济两大要素中,经济更为重要。血缘是先天的,经济是后天的;血缘是不可选择的,姻缘是可以选择的;经济既是可以选择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在阶级社会中,不仅姻缘要服从于经济,就是血缘关系的亲疏,也要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因此,家庭

的本质,归根结蒂是一种经济关系。生活于同一家庭内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的生产劳动上,是各尽所能。如果他们参与家庭以外的不同劳动,其收入一般是如实交给家庭。在家内的消费上,不论家庭成员的收入高低,贡献大小,大体上实行平等原则,即平均消费。总而言之,生产、交换、分配再分配、消费都是按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在不同家庭之间,经济水平尽管有高低悬殊,但在同一家庭内部则差别不大。家庭内部在经济上的这种相对平衡,促成了家庭千百年来始终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或称社会的细胞。

二、探索家庭运动的规律。家庭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家庭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家庭前进呢?这是家庭应当回答的问题。从家庭内部来看,家庭功能(职能)的变化,是决定家庭变化的首要因素。不用说,家庭功能的变化决不是随意的,它要受社会上多种因素的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家庭功能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会直接影响家庭功能的变化;还有意识形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发展的进程。

从总的趋势上看,制约家庭制度变更的诸因素是同向同步变化的。比方说,生产力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以上三者的变化,势必带来家庭功能的变化,从而推进家庭制度的更迭。但是,事物是复杂的。对某一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家庭来讲,这些因素是参差不齐的,有时甚至是脱节的,或者说是背离的。这一因素可能在推动家庭向前中起正作用,另一因素则可能同时起反作用、负作用。譬如,意大利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联邦德国差不多。可是,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大不一样,联邦德国的离婚率比中国高得

多,而意大利的离婚率则比中国低得多,其原因是:意大利的宗教势力大,限制人们的离婚。

家庭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影响家庭制度变化的几个大因素分别所占的比重大小,以及组成每一大因素的变动情况(比如,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尺度就是多种多样的),从而熟练地驾驭家庭运动的规律,把握家庭运动的进程,引导人们站在家庭运动的前列。

三、保护家庭,改革家庭。现在的家庭需要保护,不保护,人不安宁,社会不安宁;现有的家庭应该改革,不改革,生产力难以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当然,对家庭的保护要依赖法律。婚姻法也可以认为是家庭法。中国的新婚姻法是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制定的,是集中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体现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是保护亿万家庭的武器。可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任何法律都是阶级意志的反映,都有相当大的时效性和相对性。永恒不变的法律是没有的,世界通用的婚姻法也是不存在的。美国各州有各州的婚姻法。中国的新婚姻法同老婚姻法就有不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婚姻法之外,有自己的补充规定。然而,家庭运动的规律则有普遍性、长期性。只要条件存在,规律就必然适用,决不受人的意志左右。因此,规律指导法律。规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法律是保护家庭、改造家庭的轻武器的话,规律便是保护家庭、改造家庭的重武器。家庭学的任务就是要给保护家庭、改造家庭以理论武器,指导人们处理好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处理好亲属关系,处理好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处理好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家庭学的这三项任务是相互关联的。前两项是从提炼理论上讲的,后一项是从运用理论上讲的。前两项任务完成得好,理

论提炼得准确、丰满,第三项任务就会迎刃而解;同样的,最后一项任务完成得好,又会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前两项的理论成果。

家庭学的基本内容和逻辑体系

家庭学是社会学的分支。不过,这个分支并不是学科之“末”。在这个分支下面,还有更低一层次的分支学科。

一、家庭结构学。正像细胞是由细胞核和细胞质构成的一样,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有自己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父母子女为“核”,由他们组成的家庭称核心家庭;叔伯舅姑为“质”,包括他们在内的家庭,称扩大家庭。世界上有千家万户,家庭的结构也必然是千姿百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的参考系上,可以把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规模上划分家庭,可以分为大家庭、小家庭;从婚姻关系上划分家庭,可以分为伙婚、对偶婚、个体婚;从家长上划分家庭,可以分为母权、父权、平权。专门研究家庭结构的学问,称家庭结构学。

二、家庭功能学。事物有结构,就必然有功能。不同的结构必然有不同的功能。家庭功能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宗教,从教育到娱乐,还有家庭所固有的生育功能。家庭学应该对这许许多多功能,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阐明什么家庭有什么功能,阐明哪些功能应该加强,哪些功能应该削弱。专门研究家庭功能的学问,称家庭功能学。

三、家庭演化学。家庭的结构决定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结构变化,功能也相应变化。家庭的功能也同样有制约家庭的结构的作用。功能的稳定,可以巩固结构;功能的发展,可以突破结构。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推动着家庭制度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家庭制度从来没有静止过。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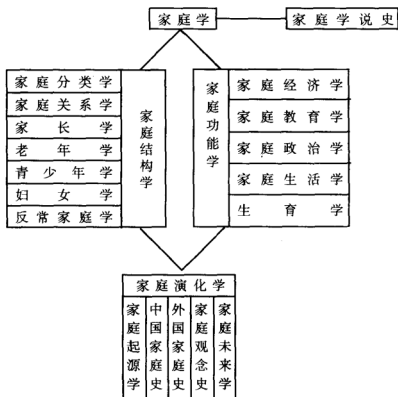
制度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化史,有其量变、质变的历史过程。专门研究家庭演化的学问,称家庭演化学。

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家庭未来学。演化有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化,又有从现在向未来的演化。现在国内外都有人专门研究家庭的未来和未来的家庭,称家庭未来学。未来是演化的延续。我们姑且把家庭未来学作为家庭演化学的组成部分。

四、家庭学说史。家庭结构学和家庭功能学是对家庭的横断面进行研究;家庭演化学是对家庭的纵断面进行研究。有了这三方面的研究,家庭学就成了一门有经有纬、纵横交叉的学科。可是,人们对家庭的纵横研究,有早有晚,有深有浅,甚至有根本对立的学说。因此,就有了对家庭进行研究的学科,这就是家庭学说史。

家庭学的前三个分支是以家庭为对象,家庭学说史是以家庭学为对象。四个分支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家庭学的立体化的逻辑体系。

这个逻辑体系是严密的,完整的。如下表:



研究家庭学的态度和方法

一、必须明确为解放全人类而学习、研究家庭学的正确目的。一切革命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解放人、解放全人类。而人，无不生活在家庭中。不论是要把人性从动物性中解放出来，还是要把多数人从少数人的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都同家庭休戚相关。我们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阶级社会中，家庭首先是阶级的细胞。没有阶级的解放，就谈不到家庭的解放，谈不到人的解放。在阶级消灭以后，人的解放，更离不开家庭的解放，更

应当从解放全人类着眼去谈家庭解放、人的解放。

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为什么有的家庭给人带来幸福,有的家庭给人带来灾难。这是亟待家庭学研究的课题。为什么有些人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却俯首甘为家中的“孺子牛”?“齐家”与“治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家庭学回避不了的问题。学习与研究家庭学不是只为了掌握经营个人小家庭的生意经,而是为千家万户谋幸福。

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人类现有的家庭形态是千奇百怪的。既保留着二三百万年前就出现过的原始群婚制家庭,又出现了现代西方国家那种“邂逅婚姻”和“同性恋”家庭。面对着这些光怪陆离的家庭形态,要切忌带有为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种“妓院眼光”。要用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严格的要求,来从事研究。不要忘记我们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从事家庭学研究。说更明白一点:我们不是立足于西方从事研究,不是立足于 21 世纪从事研究。把未来当现实,把中国当西方,都会出大毛病。

但是,我们也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搞坐井观天式的研究。我们要像大地测量学那样,在世界各地广设测点,广泛占有古今中外有关家庭学的资料,家庭学理论才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只有博采百家(这里包括家庭形态之家)之长,才能为中国的家庭改革献出最佳方案。恩格斯有关家庭的教导,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推翻以后家庭制度的预言、理论,至今有人认为不能适用,这是错误的,是封建思想在作祟。从事家庭学研究的人,必须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家庭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在家庭学方面有所贡献。

三、必须从事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尽管我们所占有的资

料,大量的从前人或旁人的书本上获得的,可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调查来的第一手资料,就无法鉴别和理解间接得来的资料,更无法越过前人的认识水平。调查是获得真知的手段。但是,调查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第一手资料不可能轻易到手,尤其是家庭调查。常言道:家家都有难言的经。人家不肯“言”出,你如何调查?你敲不开人家的家门,如何调查?比如,你要打听人家的家产,谁肯如实说出来?又如,一个人的隐私,谁又肯如实告诉你?而没有这些资料,对家庭的研究就是隔靴搔痒。“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们有求知的欲望,有甘当小学生的诚心,资料还是可以拿到手的。

常言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掌握了资料以后,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判断,这又是一门大学问。从事家庭调查的人,要比清官还清才行,要比清官会断家务事。这里的关键是要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对家庭学的有志之士来说,调查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情。搞了家庭调查对家庭学就有发言权;否则就失去了对家庭学的发言权。现在有些青年人急于求成,只愿意搞“蜻蜓点水”式的调查,追求立竿见影,这是有害的。

四、必须运用多学科的力量,开展家庭学研究。上述三方面基本上是从研究者个体上讲的,而从群体上讲,从整个学科来讲,较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是运用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综合研究。这是国外家庭学研究的新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们要运用经济学,研究家庭的生产与消费、收入与支出,研究家务劳动与娱乐;运用历史学的成果,研究家庭起源、演化和预测;运用法学,研究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财产继承问题,结婚、离婚问题;运用教育学,研究家庭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手段;运用心理

学、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感觉、情绪、习惯；运用医学、生理学，研究性生理，研究生育和遗传，找出优孕、优生、优育的途径，提高人口质量。各种不同的学科从各自不同的侧面观察、分析家庭的一个侧面，然后综合起来，全面地阐明家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收效快、成果大。

(原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通讯》，1982年12月20日)

家庭学研究的新阶段

近百年来,在家庭问题上有革命性见解的,先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接着是蔡元培、秋瑾。康有为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兴办女学。在婚姻上,他提倡契约婚姻,婚姻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个月,欢好者到期允许续订。梁启超发展了康有为的主张,极力反对纳妾。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倡普及性知识。他们的主张有的切合实际,收到一定效果;有的不切实际,未收到实际效果。在辛亥革命中,家庭问题又被作为革命的内容之一而被提出来。秋瑾当时曾被人称作家庭革命的始祖。她在家庭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男女平权,女子自立,自由择偶。差不多与秋瑾同时,还有些女子呼吁女子参军、参政。她们的主张取得了孙中山的支持,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扼杀。

在“五四”时期,家庭问题的研究就其规模和声势来说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带头撰写家庭问题文章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蔡元培以及胡适、吴虞等人。文章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家庭伦理、家庭教育、女子就业等方面都涉及到了。过去未曾引起注意的离婚问题、贞操问题,在“五四”时期也展开了辩论。这一时期家庭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把家庭问题同民主相联系。如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一文,

陆秋心的《婚姻自由与德漠克拉西》一文,仅从其题目上就可窥其一斑了。当然在内容上充满民主精神的文章也不少。

再就是延安时期。这集中表现在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情况。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的社论。这一时期家庭问题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联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康有为开始写《大同书》的时间,也正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时候,不用说他是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就是在“五四”时期,中国人虽有像蔡和森同志那样重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但是他是在国外看到的。国内是在1923年才有个叫熊得山的摘译了书中部分章节在北京发表。中国人看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全文,是1929年的事。因此,在“五四”时期虽然也有些谈家庭的文章提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是由于没见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的代表著作,是难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阐述清楚的。而在延安时代就不同了,不论是在毛泽东同志谈家庭的文章中,还是在周恩来同志谈家庭的文章中,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

全国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的活动一直在开展,可是对家庭学的研究和教学却基本中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家庭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新阶段。现在,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有专门研究家庭的组织,有些大学开设了家庭社会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建立了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联在全国开展了五好家庭活动。许多杂志发表文章探讨家庭问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

料》和《中国哲学年鉴》的报刊论文索引来看,自1980年以来,研究家庭的文章逐年增加,从每年几篇、几十篇到每年百余篇。近年来,家庭学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婚姻基础问题、离婚自由问题、家庭淡化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妇女就业问题,以及家庭本质和发展趋势等。当前家庭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实践,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特点之二是,运用了多学科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家庭学的科学体系。现在投入家庭学研究的学科中,有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未来学等许多门类。这对于开拓家庭学是十分有利的。家庭学成为千家万户的必修课是指日可待的。

(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12月7日)

家庭学的烦恼与烦恼的家庭学

——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随想

不久前,有两位记者找我,称我什么家庭社会学家。我说:“我早就想摆脱这个称号。我早就想写一篇《在家庭规律面前的烦恼》,告别家庭学。”(见《最优势化报》1985年6月18日)在这篇专访发表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提到这件事,并说我现在已经写好了《在家庭规律面前的烦恼》。不料台下递上来一张条子,写道:“你停止研究家庭学,是社会学界一大憾事,是不是在社会面前、政治面前没有勇气了?爱好社会学的大学生支持你,青年支持你。”看了这张条子,确实增添了我的勇气。但是一张条子,并不能完全解决我的烦恼。因此,我依然把这些烦恼摊开来,供大家讨论,只是题目和内容都做了点修改。

家庭学是从微观角度研究社会的,可以称作“细胞社会学”。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微观与宏观都应该是统一的,细胞与整个肌体应该是统一的,可是实际上往往发生背离。能当好厂长的,当不好家长;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却治理不好家庭;不怕日本鬼子的,却怕老婆;写大块文章论述经济改革的,却不赞成家庭改革。这类事见过不少。在中国,封建意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可是封建意识最浓的还是家庭生活。这些也必然反映在家庭学理论中。有许多报刊鼓吹“妇女回家”的理论,有许多老教授大谈

“孝”。这不是明显说明封建的家庭理论还在起作用吗？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在受到抵制。别的不说，近年来有许多文章就在批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可是我们有好几篇文章，包括文艺评论，都主张婚姻以物质为基础，或者是以物质和爱情共同为基础。对马列的话有不同理解、不同认识是允许的。问题是有些人在别的领域中高度重视捍卫马列，唯独在家庭学领域中却置恩格斯的著作于不顾。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还有，我们这几年来在加强法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改变了目无法律的状况。新婚姻法的颁布也是加强法制的另一个内容。新婚姻法同老婚姻法相比，有很大进步，这个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可是，我们有许多报刊，包括中央一级的大报，都公开批评过新婚姻法。近年来，有许多省市颁布了保护妇女的地方法规。其中有些不是对新婚姻法的补充和发展，而是对新婚姻法的抵制。这是为什么？说穿了，还不就是对新婚姻法的那个“新”字不满吗？新婚姻法在离婚的条款上，是比老婚姻法松了。这不只中国如此，许多国家都如此，有的比中国松得多。可是有的省市的地方法规，反而严了，不仅比新婚姻法严，而且也比老婚姻法严。说来说去，无非是怕离婚多，影响社会安定。这两年，离婚案件是在上升，但是，再升也没有1953年和1954年高。现在离婚案的绝对数只相当于1953年的几分之一，这里还

没把人口增加的因素考虑在内。试问：那时候的社会不安定吗？毫无疑问是安定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现在在批评新婚姻法比较起劲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在1953年离过婚的同志。干啥要这样呢？现在只要谁不把离婚一律看作坏事，就要遭非议。一次在北京召开的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上，有位同志在发言中讲了一通离婚难、离婚受歧视的情况，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朋友低声对我说：“他们夫妻生活一定不协调。”我说：“你胡说八道，坐在发言者旁边的那位男同志，就是她丈夫。人家是双双对对一起来开会的，如果不协调，她会这样说吗？”恩格斯说：“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恩格斯说：“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76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在今天如果出自一个普通人之口，人们会不会搬出保护妇女的地方法规去惩治他呢？老实说，新婚姻法远没有新到恩格斯一百年前的水平，就已遭到批评。家庭学理论怎么把恩格斯开放的理论与我们封闭的现实统一起来呢？

中国的家庭职能在削弱。家庭的生产职能在削弱，教育职能在削弱，甚至连生育职能也在削弱，这是显而易见的。家庭职能的削弱，怎能不引起家庭结构松弛呢？大家庭的减少，小家庭的增加，便是家庭分化的产物。已在分化了，为什么还不正视其松弛呢？家庭职能削弱，结构松弛，势必带来家庭观念的淡化。有的书上讲，家庭淡化是私有制下的情况。这是不对的。个体婚家庭恰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家庭观念没有淡过。恩格斯说得清楚：“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

承财产而建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那么,当生产资料基本上不再是遗产时,家庭会怎样呢?讲“减轻家庭负担”皆大欢喜,讲“把家庭利益置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下”,上下都没有意见,可是换成“家庭淡化”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恩格斯在对未来家庭作预测时说,在将来,“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我最欣赏破折号后头的“如此而已”四个字。对这样一个“如此而已”的问题,为什么搞得人们那么烦恼?在本文开头,我说家庭是社会细胞。试问:如果按辩证法,这细胞会不会是永恒的?当然不会。家庭无疑是会消亡的。列宁就曾不那么同意是细胞的说法。今天国外也有人认为,在新技术革命中,“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而不再是家庭”(奈斯比特:《大趋势》)。可以消亡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在消亡前淡化一点呢?

在华东师大学生的鼓励下,我“一鼓作气”讲了自己的烦恼。眼下的后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学术自由,家庭学理论是会曲折前进的。

(原载《书林》,1985年第5期)

探讨家庭问题的历史足迹

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前进,近百年来,中国的家庭运动此起彼伏,中国的家庭理论也是时进时退。19世纪后期,西方的家庭理论逐渐传入中国,为一部分有识之士所接受和传播。

从那以后,中国的家庭运动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一、辛亥革命前后

在辛亥革命前,涉及家庭问题比较多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探讨家庭未来的著作。康有为按照“三世说”的原理,为未来的社会勾画出一个大同境界,即所谓无阶级、无国家、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万物公有,资财充裕,男女平权,人人极乐的“太平世”。他认为,作为对立物的“私”要统统除尽,其中“去人之家”为第一要义,因为“家者……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那么,怎样才能使婚姻符合“去家”的原则呢?他从男女平权的立论出发,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婚嫁平等方案。例如,男女婚配须“由本人自择”,以“情志相合”为基础,切不可“父母尊亲代为择婿”。若男女有意结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他主张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不合则离异;大同之世的婚姻限制,“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合则“续约”,不合则散。他认为这种结合方式“既得人权自由之义,尤得

人道私合之宜”。同时,政府应设“媒氏之官”,发给男女合婚者“印凭”,“于限期之内誓相欢好”。他还将这种男女婚嫁制度的改变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从上述内容看,康有为这方面的思想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的,在当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脱离实际,没从经济基础着眼,流为清谈,况且康有为本人晚年堕落为保守派,把这些闪光的思想一扫而光。

在19世纪末叶的维新变法运动中,除了康有为以外,还有不少维新志士从事家庭运动。20世纪初,有些人提倡剪辫子,这都是同反对封建纲常联结在一起的。维新派相约自己的女儿不缠足,儿子要娶不缠足的女性。他们创办《女界钟》等刊物,提倡男女平权,妇女要摆脱在家庭中的奴隶地位;还兴办女学。他们的这些做法对封建家庭有所冲击,但是只触及了皮毛。

响亮地提出“家庭革命”的是秋瑾和她的好友。正如妇女运动的先驱吴芝瑛在悼念秋瑾的一首诗中所写的:“伟哉秋女士,抗心誓雪耻,振臂而高呼,家庭革命始。”他们认为,婚姻自由“为吾国最大问题”。他们提出废止奴婢,反对“三从四德”。秋瑾曾作《勉女权歌》,歌词是:“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登在1907年3月4日《中国女报》上,颇得人心。

武昌起义时,有一些妇女参加女军。武昌起义后,女子参政的呼声日高。千百年来,“顺男子之教”、“恒从男”的妇女要走出家庭,管理国家大事去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五天,即

1912年1月5日,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的林宗素访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表示男女原应一律平等参政,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光复会首领章炳麟大兴问罪之师,责问孙中山:“女子参政之说果社会良习惯否?……乃问某女士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章炳麟还高喊:“关于中国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留者……(1)婚姻制度仍旧……(2)家庭制度仍旧。”当时,孙中山面对强大的压力,不得不被迫让步,表示:“前日某女士来见,不过个人闲谈。”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看到家庭问题历来是最难冲进去的禁区。后来,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妇女组织荡然无存,家庭革命的理论风流云散。

二、“五四”运动前后

家庭要革命,妇女要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曾提倡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和新民族。1917年,吴虞、恽代英等就结婚等问题发表文章,震动全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22年的三年间,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李达、邓恩铭、李汉俊、蔡元培、鲁迅、沈雁冰、胡适、田汉、叶圣陶、张闻天、向警予、陈望道等都曾写文章提出新的家庭理论,探讨家庭未来远景。他们喊出了“婚姻自由万岁”的口号,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和旧的家庭观念进行了抨击。

在家庭道德问题上,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作了系统论述。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和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什么圣道,什么王法,

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

1919年围绕赵女士之死,学术界对婚姻问题展开辩论。长沙有个赵五贞,父母和媒婆强迫她嫁给一个姓吴的有钱人。可是,当轿子抬到吴家时,“轿夫忽见轿内鲜血淋漓,牵丝不断……乃命媒人先在门外将轿帘启视。但见女士仰面而卧,喉管割痕寸余,血如泉涌。”赵女士死后,“检察官硬于棺木上贴一‘吴赵氏’的封条”。此事披露后,《女界钟》连续发表文章,抨击那煌煌的礼教、赫赫的父命。向警予的好友陶毅在文章中指出:“赵女士之死,我们虽不能完全认他为‘恋爱自由’死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当时无“她”字——引者)为一个‘改革婚制的牺牲人’。”

在家庭改革问题上,“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也曾提出许多设想。沈雁冰在《家庭改革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家庭改革的主眼在三方面:(一)妇女的解放;(二)儿女的良善的教养;(三)私有继承法的废止。”

李汉俊认为,“女子解放是要女子从一切桎梏解放出来而为人”,是要“女子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平等”。

张闻天在论述了西方的“家庭制势成瓦解”之后,指出:“家庭是一个制度,同其他制度差不多没有分别,所以家庭也时时刻刻的变更。”

但是,“五四”时期的家庭改革派很快发生了分化:有的在理论上是一套,在实践上又是一套;有的后来连自己的理论也抛弃了;真正坚持不懈的人不多。在坚持不懈的人当中,有的也因忙于革命战争而没能再写出很多有分量的理论著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全国解放后不久,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使婚姻家

庭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新道德逐步树立,荡涤着旧的婚姻家庭观点;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又使家庭结构、家庭职能、家庭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解放初期,一些社会学家和妇女运动家围绕对婚姻法的宣传,对家庭问题曾发表过不少好的意见,但是缺乏理论分析。1952年后我国大专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课程。家庭学理论更加无人问津了。“十年动乱”期间,那就不只是停顿的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家庭关系、家庭风尚的大破坏。君不见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家庭学这块冻土。近年来,理论界、文艺界开始共同对家庭的起源和分期问题、婚姻的基础问题、离婚的自由问题、家庭的淡化问题、家庭的发展趋势问题全面地展开讨论了。

(本文收入《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西方的“家庭解体”

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塑造了几个未来派人物的形象。这些未来派认为，“家庭的基础动摇了”，主张废除婚姻和家庭。不料，在当时被认为荒诞不经的主张，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竟成了现实。美国的儿童保育专家邦芬·布伦纳最近说：美国的“家庭正在解体”。他们还哀叹：“这一后果不堪设想”，“会在整个社会投下爆炸式的影响，……会使美国社会崩溃”。美国专家讲的是美国，实际上这已是西方世界共同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家庭现状，可以概括为“四多一少”。

一、独身者多。例如，近年来，美国独身主义者激增，1979年独身者已占成年人的25%。“一人之家”比比皆是。

二、离婚者多。在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相当多的妇女结婚三五次。在联邦德国，夫妇离婚和分居者有增无减。1978年日本有13万对夫妇离婚。1975年美国离婚者已超过100万对。美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有17%生活在双亲中只有一方的家庭里。

三、私生子多。例如，美国的私生子占全部儿童的15%。到1979年，比例更高。美国华盛顿特区1979年内，在成活的产

儿中有 53% 是没有结过婚的女子生的。

四、小家庭多。在发达国家一般家庭中，子女长大成家了，便自立门户。于是仅由夫妇及幼儿组成的小家庭多了起来。在美国，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 3.42 人。

五、出生少。发达国家人口的出生率很低。例如，联邦德国每年出生的小孩低于结婚数，据估计，1980 年出生率更低。

造成以上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近几年来，西方世界流行的所谓“性革命”、“性解放”，不能不使家庭结构深受影响。根据主张“性解放”的人们的理论，不生孩子是为了性自由，离婚也是为了性自由，不结婚更是为了性自由。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人们必然视家如“枷”，于是就从各个角度上去摆脱它。美国一些“男男女女都以光棍一身轻而觉得更加自由自在。‘老姑婆’不再有人讪笑”。

促进西方家庭解体的另一个因素是私有观念的膨胀。为了个人私利，到了六七十岁可以闹离婚；为了个人私利，父母可以把亲生子女扔下不管；为了个人私利，可以不养育子女。于是不结婚、不生育的“独行侠”大批涌现。这些无家的“独行侠”成了西方社会上比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他们在购置房屋、汽车的顾客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既有金钱，也有时间享乐、旅游。

在导致家庭解体的种种因素中，经济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目前西方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物价昂贵和生活费用上涨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如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就得夫妻俩都参加工作。但是，根据西方国家政府的税收法则，未婚的与已婚的交纳所得税的税率不一样，后者比前者多得多。尽管职工的工资有所增长，但在西方的多数国家里，工资的平均增长率却赶不上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增长速度，人们的购买力相

应地逐步下降,而单身人购买力所降的比,比三口之家所降的要少些。为避免生活水平下降,不少人尤其是妇女,不愿结婚,更不愿生孩子。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妇女工资较少而失业率又高。为减少经济负担,有的夫妻不得不被迫离婚。从另一方面讲,妇女有了职业,在家中就有了自主权,对丈夫稍有不满意,就可以轻易离婚。日本的离婚事件中,55%是由女方提出的。在美国甚至有“邮件离婚”,这是一种“没有律师、没有法庭、没有合法争论的离婚”,“只要对他们的财产及孩子没有争议就可以通过邮件离婚”。当然,西方的社会风气也有其一定的影响,但是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能不承认的。

目前西方开始出现的家庭解体,对西方社会学家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首先,家庭的解体是好事还是坏事?美国一些以“颓废派”自居的人,认为家庭解体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家庭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认为,“许多当丈夫的和当妻子的都越来越多地只把他们的配偶当成是满足感官需求的物件或工具”,当作“性机器”。因此,他们赞成像“扔掉纸碟子,扔掉剃刀片,扔掉尿片”一样“扔掉人”。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结婚,不生育,会造成社会劳动力的短缺。扔下子女不管,会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据美国门宁格基金会高级精神病专家哈罗思说:“在对吸毒者进行调查时,总是会发现,他们在成年之前的孩提时代没有生活在父亲的身边。”有人估计,美国有800万儿童精神失常……另一方面,不抚养老人,会造成老人流落街头,出现成群结队的“沿街叫卖的母亲们”。此外,还有人认为,家庭的解体引起道德的败坏,因此,是坏事。

其次,家庭解体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有人正在寻求解决的

方法。美国总统卡特在 1976 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曾指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与政治上的种种重要决定的任何一项相比,最紧急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珍惜、援助和巩固美国的家庭。可是,几年过去了,卡特表示的决心也未能变成现实。英国一家杂志评论说:“事情可能已经太严重了,要想解决谈何容易!”

第三,有关家庭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改变?这在西方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不仅社会学家卷进了争论,心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卷了进去。有的小说、电影歌颂原来的道德观念,有的小说、电影反对原来的道德观念。就是在一个家庭中,男女老少之间也不一致。

看来,西方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家庭解体”这个现实中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不断争议下去。但是,结论可能不会在短时期里做出来。记得,三四十年代在西方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歌曲,叫作《家,甜蜜的家》。歌中反映的人们对家无比深情和留恋的思想感情,如今显然已经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生活的人们格格不入了。

(原载《光明日报》,1980 年 10 月 25 日)

对国外家庭研究的研究

——在全国第一次家庭研讨会上的发言

近年来,国外对家庭的研究是比较活跃的。大家知道,这些年美国的哲学研究不那么景气。可是比较起来,美国的应用哲学比基础哲学活跃。而在应用哲学中伦理学又比较活跃。在伦理学中对家庭伦理的研究是最为活跃的。哈佛大学在美国哲学界常常是领先的。如今哈佛的哲学教授,如诺齐克、杜维明等,开始转向家庭哲学的研究,讲爱情,讲“齐家”。法国人认为他们处于“哲学的低潮”阶段。但有关家庭哲学的研究却不是低潮。

国外家庭研究的活跃也可以从出版物上看出来。美国称1983年为“杂志时代”。他们还以此为题开过座谈会。在美国的“杂志时代”中,有关家庭刊物的增多是一个标志。如1983年创办的《家族》,发行730万册。1983年美国还曾办过《家庭》文摘杂志,可见家庭刊物之多。日本称1983年为“杂志年”。仅在这一年5月一个月内,日本就创办了四种新的妇女杂志。因此日本的出版界又把杂志年称为“妇女年”。美、日等国除出现家庭研究的新刊物以外,其他老刊物也增加了反映家庭问题的分量。

国外家庭研究的活跃还表现在政府的关心和资助上。美国的卡特、里根,法国的密特朗,联邦德国的施密特,都对家庭研究

大声疾呼。美国于1980年召开过白宫家庭会议；法国家庭国务秘书于1983年召开过家庭讨论会；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政策研究会1980年专门就家庭问题做了调查，并写出了报告。苏联教育部编纂了两部有关家庭的教材，在一些大中学校开设家庭课程，面向各类人开家庭讲座，搞家庭咨询。仅列宁格勒一地在1977年就向公民提供了四万条咨询意见。

美、苏、日的学者们都认为：从未见过人们像现在这样关心家庭问题。

国外家庭研究的特点

国外的家庭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全球性——这是从家庭研究的组织和研究的地域上看的

从前的家庭研究是各国研究各国自己的。从60年代开始，苏、美之间对口调查。苏联学者于1962年、1980年两次对美国的1000户家庭做调查，美国学者也对苏联做调查。后来发展到几个国家进行联合调查，如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的联合调查。至于一国对别国的家庭进行比较研究的情况就更多了。发展到今天，全球性的特点突出了。1981年和1982年，世界生育力调查组织对60个国家的妇女进行了调查。1979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办了“变化中世界的儿童和家庭”国际讲习班，参加的有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有土耳其、加拿大、美国。会上提出了“家庭模式变化”的国际研究计划。198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五届世界性科学会议，大谈家庭、婚姻。1982年举行的第十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其中的家庭研究委员会举行了12次会议，听取了八十多个报告。许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家庭研究的全球性这

一特点,是家庭研究发展的必然,是比较研究的阶段。苏联学者认为,这也表明世界性的统一的指标体系已经形成。

二、综合性——这是从家庭研究的科际关系上看的

现在家庭学研究所运用的学科之多数不胜数:有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未来学、神学、医学、数学等等。所不同的是,过去是从事家庭研究的学者自己单向运用各学科的成就来研究家庭。现在是其他学科的学者自觉地站在他们学科的角度,运用他们学科的成就和方法来分析家庭。如1981年、1982年慕尼黑天主教大学举行了两次“婚姻与家庭”讨论会,许多神学教授论证了“教会应当更开放、更接近实际”的道理。再比如,从事家庭、人口研究的学者总认为“早婚促多生”,可是,1983年苏联经济学家沃尔科夫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提出“早婚不提高出生率”的论断,打破了传统观念。还有些有价值的老年学著作,也不是社会学家写出的。许多学科的学者认为,“家庭关系具有高度密集和内在的特征”。各学科完全有条件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家庭。近年来,由于许多学科投入家庭学的研究,使得家庭理论有所突破,丰富了家庭研究的理论。

三、实用性——这是从家庭研究的社会效果上看的

不少国家的研究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日本学者针对家庭冲突,写出了论家庭暴力的著作;苏联学者针对家庭破裂,写出了一本又一本论家庭稳定性的专著;法国学者大谈性哲学;第十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对策。在美国,有些社会学家的研究经费的数目,是依其上一年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的状况来定的。

四、家庭研究的理论体系在更新

——对国外家庭研究的研究

国外对家庭理论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源于19世纪的家政学。家政学主要是研究家庭的衣、食、住、行和生儿育女的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生活教育用的。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家庭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比家政学有所扩大,把家庭结构的研究科学化。它不仅回答“怎么办”,还回答“为什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的家庭学。现在搞家庭理论的人花很大力量研究家庭起源、演化,研究家庭未来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不应是社会学研究的范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家庭的起源,是多少万年前的事情,不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家庭的未来,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也不是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还把家庭问题的研究隶属于社会学,就不太妥当了。家庭研究源于社会学,又超出了社会学。家庭研究由于许多学科的介入,由于研究对象——家庭的急剧变化,它的构架、它的体系,正在向“家庭学”迈进。不少国家都在思考这一问题。美国波丢大学的克里斯坦森在分析家庭研究的发展阶段时,就曾多次使用“家庭学”。

国外家庭研究的主要课题

随着家庭学体系的建立,国外家庭研究的课题日益丰富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家庭解体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在研究中首先涉及到现在西方存在不存在家庭解体,其次涉及到如何评价家庭解体。

现在国外有大量学者认为近二十年来家庭在解体,或说“家庭恶化”,或说“家庭危机”,或说“家庭解组”,说法虽然不同,都

是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日本,也都有学者认为不存在家庭解体。理由之一是,认为家庭解体的学者所罗列的现象,过去都存在,现在不过是量的增加而已;理由之二是,即使是量的增加,也不是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严重。如日本御茶水大学教授由泽安彦就指出:“眼下有关告诫家庭分崩离析的论著日益增多,在书籍、杂志和报纸上列出这样一些标题,如‘濒临灭亡的家庭’等等,但是,日本的家庭真的崩溃了吗?……日本家庭基础崩溃的现象远非比比皆是。”

在对家庭解体的看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第一种看法是反对。认为向这类家庭看齐是“危险的”,他们对家庭现状表示“忧虑”、“悲观”。第二种看法是赞成。他们“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家庭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指责这种变化是无补于事的”(美《新闻周刊》1983年1月17日)。他们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墨守与现代条件格格不入的陈规。现在确是鼓起勇气承认现在的家庭与现实是不相适应的时候了”(日本《日本回声》季刊1980年第7卷第3期)。他们认为,现在的家庭制度“处于承上启下的时代”,“是新旧平衡之间摇摆的体制”(法国人口学家鲁塞尔)。还有人认为,“现代家庭并非处于解组过程,而正处于再组过程”。第三种看法是折衷的。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的变化同过去相比,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大多数。

针对家庭解体问题,美国开展了维护家庭制度的运动。早在1980年的白宫家庭会议上,一些政界人物和宗教人物就自称维护家庭。后来,他们又进一步提出要“重振家威”。他们说:“自6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一词已被社会学家一步步地篡改得不知所云了。”他们认为,学校抢走了子女(艾伦·卡尔森:《一

场维护家庭制度的运动》)。1982年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萨尔特等向国会提出“家庭保护法”。现在维护和反维护的斗争还在进行。有人指责家庭制度的维护者“是把近二十年来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演变颠倒过来”，说他们“虽然打赢了一两场政治仗，但是处在明显的少数地位”。

二、离婚问题

日本坪内良博、坪内玲子在《离婚》中写道：“在夫妻关系中，重点研究离婚。”这句话反映了许多国家研究的情况。对离婚问题，学者们探讨了离婚的原因、后果，以及对离婚的评价和解决的措施。

现在有些国家已从原来的有错离婚过渡到无错离婚。美国丹佛的一位律师说：“如果婚姻破裂了，那就是破裂了，无所谓是谁烧焦了薄煎饼。”在苏联，对离婚有两种看法：哈尔切夫认为离婚对教育子女只能起不良作用；而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契乔特则认为：“用不着为离婚数字感到惊慌。离婚的增加绝不是犯罪的增加。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另一面，是个性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家庭压迫和不正常关系的离婚，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法国塞加朗在《家庭社会学》一书中说：“离婚不再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这是新的婚姻逻辑。”

关于离婚的原因，外国学者们的看法大同小异，比较零碎。他们提到的原因有：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滋长；②人们的社会活动增多，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增多；③实现了高老龄化；④住房条件宽裕；⑤不生孩子、少生孩子的人增多；⑥法律放宽了离婚条件；⑦宗教不歧视离婚；⑧子女不养老；⑨家务退出家庭；⑩妻子在经济上不依赖丈夫；⑪婚姻从偏物质到偏精神；⑫草率婚姻多。

为了降低离婚率,许多国家的学者主张用法来堵。苏联有位学者叙述了他们法律上关于离婚规定的历史变化。1917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法院根据单方要求也可以解除婚约;1926年11月又颁布法典,规定离婚只要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可以免费,以致1927年离婚率比1925年增加了六倍多;1936年又规定要付离婚手续费,1944年规定二级离婚诉讼手续,从而把离婚率降了下来。1965年又改为一级诉讼手续,1966年离婚率为上一年的两倍。因此,他们主张修改法律。美国也有学者提出,父母打离婚官司,子女可以请律师辩护。

三、性自由问题

欧美流行的性自由,又叫“性革命”、“性解放”。性自由包括三方面:①性平等,即男女都一样;②防止性痛苦,提高性快感;③相爱就同居。英、美都有人要求修改“家庭”概念。他们把同居与婚姻相提并论,都称为夫妇。

西方对性自由有三种看法:①“性道德领域的自由主义导致了性行为的革新”,“性革命使科学进入性教育”;②性革命是社会弊病的表现,“性自由的提倡者忽略的是:没有责任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乱交的陷阱》,美《读者文摘》1982年2月号);③现在“还谈不上发生了‘性的革命’”(慕尼黑天主教大学教授莫林斯基)。1983年美国离婚案降到百万以下后,美国《时代》周刊认为:“美国的性革命正在退潮。”

关于为什么会出现性自由,尼尔·斯迈尔塞主编的《社会学入门》中说:由于避孕药物的有效,“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性行为区分为生育性的和娱乐性的”。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也认为:“随着避孕药的出现,社会上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趋于旺盛,同居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苏联,还讨论过如何理解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所说的“在婚姻和性关系领域内的革命,正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而来临”;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等问题。

苏联、法国等都发表过不少对婚前、婚外性生活的调查报告。

四、生育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一是人工流产问题。近几十年来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取消了在人工流产上的禁令。只有一些伊斯兰国家仍在禁止。土耳其刚开始取消,走在前面。但在土耳其乡村反对的人很多。就连土耳其的宗教事务部部长还发表文章,把堕胎与谋杀相提并论。美国更奇怪,半个多世纪前,山额夫人(有人译为“桑格”)为提倡堕胎闹了一场风波以后,美国开了堕胎先河。可是,最近美国国会决定,人的生命从娘胎受孕之日起就受法律保护。这一下引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是精子银行问题。三十年前美国开始办精子银行,原来是供不孕者用的。现在在“优生”旗号下,世界上已有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把他们的精子送进了精子银行。这一举动受到舆论的谴责,以致有四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

三是试管婴儿问题。从1978年起,迄今已有130个试管婴儿诞生,分布在15个国家。其中还有双胞胎,三胞胎,1984年1月6日澳大利亚一位31岁的妇女一胎生了四个“试管婴儿”。对试管婴儿的评价各不一样,竟有人给试管婴儿家长写恐吓信,骂他们不道德,弄得他们不得不搬家。

四是胚胎移植问题。英国在试验过程中,法学界、伦理学界

纷纷反对,弄得试验者中途退出试验组。当然,最后还是试验成功了。可是,舆论压力仍然很大,争论还在进行中。

五是1984年3月28日第一个冰冻婴儿诞生以后,使人进一步议论婴儿诞生在父母百年之后怎么办。

六是无性繁殖问题,七是中性人问题,八是两栖人、绿人、“小人”等问题,都引起学者的争论。美国的纽约大学、肯特大学争得最烈。

五、妇女问题

对妇女解放的看法有三种:一是认为应该真正平等。美国《妇女》一书写道:“如果一个女爱因斯坦被批准当助教,那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了,只有当笨手笨脚的女人能同笨手笨脚的男人以同样的速度晋升时,那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二是认为应该消灭男权。他们著文要“开创一个社会‘女性化’的时代”。日本的江城三坂也主张“以女权统治代替男权统治”。三是表面尊重妇女,实际歧视妇女。比如有些阿拉伯国家“把妇女解放等同于‘西方化’”,“在‘民族特征’名义下否定妇女解放”,甚至认为不戴面纱的女人就是“外国代理人”(英国莫利纽克斯的文章)。

在解放妇女的途径上,也有分歧。日本的两种观点最典型。风子寿美子认为,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解放妇女;依知房井认为,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下就可以提高女权。

在家务劳动上,有人主张就业第一,有人认为妇女应当回家。

六、家庭的未来问题

除了继续争论“是继续解体还是家庭复兴”外,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提出,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托夫勒在好几部著作中所谈的“回到家庭中去”,“社会将以家庭为中心”;二是奈斯比特在

《大趋势》中所谈的“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而不再是家庭”。

七、中国的家庭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家庭问题产生了兴趣。美国哈佛大学副研究员全如珣写道：“我们不清楚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们也曾企图将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自1980年第一批美中学术交流会成员来华后，每年都有社会学家来华，了解中国的家庭学研究。

国外家庭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外的家庭学理论至少在以下几对关系中有偏颇，或者是颠倒了。

一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忽视社会属性。

二是在人的社会性上，只讲人共有的社会性，不讲阶级性，不讲阶级特点。事实上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可是不少家庭理论避而不谈这一点。

三是只讲技术的决定作用，不讲社会制度，不讲生产方式对家庭制度的决定作用。托夫勒的家庭中心论就是建立在“非群体化”之上。非群体化，就是不要公有化。

四是虽也讲精神、道德，但他们讲的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

（本文收入《婚姻家庭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学点家庭发展史

家庭,是多么迷人的字眼!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它讴歌,为它悲鸣,甚至为它发疯、殉葬。然而,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家庭?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管是能正确认识家庭的,还是不懂得家庭的,每个人无不生活在家庭之中。人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开始,就是家庭中的一员。小时候靠父母抚养,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长大成人后,结了婚,生儿育女了,就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主持者——家长;即使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不管是和老伴一起生活,还是靠子女赡养,仍旧离不开家庭。家庭是人们基本的生活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

家庭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牢固与恒久!但我们可曾知道,在先古时期,人类却有过一个不知家庭为何物的混沌杂居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才从无家到有家,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家,到要确保父亲一脉血统的家。正如摩尔根所说,家庭“——是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同样,随着家庭的逐渐进化,家庭的结构与作用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四世同堂,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家族的

家庭,逐渐让位于一夫一妻与孩子所组成的小家庭。家庭本来所具有的生产作用、消费作用、生儿育女的作用与培养教育子女的作用,现在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农村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所以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仍然发挥着作用,只是它已有别于历史上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家庭了。而在城市,则绝大多数家庭都已失去了作为生产单位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一部分转由社会所承担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家庭的作用必然还会不断变化,老的作用可能会消失,新的作用逐渐产生。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家庭的存在,重视家庭的作用。

古人曰:“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或许有点“二元论”,没有摆正国与家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处理不好家庭问题,也难免会影响到对国家问题的处理。马雅可夫斯基说过,共产主义也表现在锅台上。这就是要我们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待家庭问题。从马克思与亲朋的通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很重视家庭生活的,他把“孩子们的喧闹”说成是“安静”;在与孩子们的游戏与交谈中,他得到了休息,也获得了继续工作的充沛精力。他说,家庭“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很美满的。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泛指人民大众,但据熟悉情况的人说,这句话当时是从他的儿子身上引申开的。

家庭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家庭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并行不悖,而且是社会发展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认识家庭,一定要读点家庭史。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后的一个世纪里,家庭史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活教材。如果说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剖析商品开始的,那么,恩格斯剖析

人类发展史就是从剖析家庭开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家庭这个角度,揭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冷酷无情,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溃疡和无可救药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引起了家庭关系的改变。家庭,根据恩格斯与拉法格的考证,其本意是奴隶,亦即在一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主人(父权)支配下,统治着一定数量的奴隶。因此这种家庭包含了在私有制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和睦的基础上的。今后家庭关系会出现哪些变化,又会产生哪些矛盾?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随着新兴科学技术应用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领域,如出现了精子库、体外受孕与试管婴儿等,家庭关系将会引起什么新的变化,对家庭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使家庭结构、家庭作用、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发生什么变化?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家庭的来龙去脉,掌握家庭运动发展的规律,了解这些知识,将能有助于我们处理好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旧的习惯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

(本文收入《中国家庭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

婚姻有历史吗？

婚姻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吗？对这个问题，今天回答起来可能是轻松的。可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根本就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恩格斯曾经尖锐指出，那时“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人们认为，在当时流行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也是最古的婚姻家庭形式。换句话说，今天如此，古亦如此。

这种观点，讲得通吗？不用说在今天看来讲不通，就是同当时历史科学的其他领域相比较，也是讲不通的。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唯独婚姻家庭没有历史呢？

这里有一个对婚姻家庭史认识不足的问题。当时从史料和考古中发掘出的婚姻家庭史方面的资料还很少，对各种类型的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也不多。没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势必妨碍史学家们勾画出婚姻家庭史的线条来。

但是，史学家不承认家庭史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资料不足，而是缺乏理论勇气，不敢正视婚姻家庭史。婚姻史是比人类史更加敏感的敏感问题。达尔文吞吞吐吐讲出人类是从猿猴变来

婚姻有历史吗？——

的,结果就有人质问他:“是你的祖父是猴子,还是你的外祖父是猴子?”不难想象,如果有谁提出今日之个体婚是从群婚演化而来,提出兄妹成婚曾经是合乎道德的,那将招来多少人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因此,尽管各种各样的婚姻制度,如父女交媾的血亲婚、兄妹通婚的辈婚以及伙婚、对偶婚等等遍布各大洲,也没有人愿意把这些平面摆着的家庭形态竖立起来,没有人愿意从彼此交织的婚姻制度中找出它们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为什么有些民族的世系不是依父亲而是依母亲来计算呢?为什么在许多民族中间,有的禁止内部通婚,有的非内部通婚不可呢?诸如此类,人们都不予深究,而只是把这些有历史价值的事实简单地看作“奇怪习俗”。1865年在伦敦出版过一本题为《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的著作。显然,这样一本书是应当触及到人类婚姻史的。可是书作者没有重视那些摆在眼前的大量的婚姻史资料,只是很轻率地称其为“奇俗”。

那些与当前的婚姻制度相冲突的婚姻,是有些令人奇怪的,但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科学的使命就在于从“个性”中,从“偶然”中,也就是从“奇”中,揭示出毫不令人奇怪的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来。

1861年,也就是比上面提到的伦敦那本书早四年,巴霍芬在斯图加特出版了《母权论》一书。他头一个抛弃了所谓“奇俗”的空谈。他对一个又一个“奇俗”提出“从哪里来的”质问。不管他在论述中有多少谬误,但是他毕竟是承认了婚姻家庭有自己的历史。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肯定巴霍芬著作的出版,“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同前)。

承认了婚姻家庭有历史,就等于承认了在当时被视为不可逾越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将成为历史,或者说,也将被否定。这在

一片“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喧嚣声中,发出“没有永恒的家庭制度”的喊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巴霍芬到现在,研究婚姻家庭史的历史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了。在这一百二十余年当中,人们对婚姻家庭史的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历史唯物主义为探索家庭运动的规律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今天,我们如能对婚姻家庭史有一定的了解,那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婚姻问题,树立文明恋爱观和婚姻观;有助于我们建设家庭,改革家庭,让社会主义文明之花开遍千家万户。

(此文系《婚姻史趣谈》中的一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选择“野路子”研究家庭史

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两条路子:

第一条是正路子。那就是查史书,找史料,说话有根有据。没有史料作依据的话不说,因此称其为“正路”。我们的《中国家庭的演变》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沿这条路子写出来的。可是,熟悉史学的人都知道:史书上的东西并不都是靠得住的。这只要看一看不同的史书往往说法不一样,就可以明白了。在历史研究上,也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一面。再说,史书上主要记载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至于婚姻家庭,那是不可能占很多篇幅的。可见,正路子有优点,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条是野路子。野路子就是离开史书。我们这部书的编写就是走离开史书的野路子。我们离开史书,却抓住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显然不是史书。可是,文学作品无不是历史的反映。在真实性上,文学作品不是史实,却又有胜过史实的一面。尤其是在婚姻家庭这方面,文学作品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是蕴藏婚姻家庭史的宝库,是分析中国古代家庭的“三棱镜”。再说,我们所要探讨的婚姻家庭史,并非家族史,不必太

细。婚姻家庭的发展不是以一代、两代来计算的。一代、两代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两秒钟。在这里,模糊胜于精确,模糊比精确更精确。因此,我们又在这本书里选择“野路子”来研究家庭史。我们自信这是一条“曲径通幽”的正路子。

当然,由于中国的古典文学浩如烟海,我们一时间还不能通晓。本书只是从一部分古典文学作品来透视唐以前的阴阳变化,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加之,古典文学作品尽管比正史多反映了一些劳动人民的婚姻家庭状况,但是比重较大的还是帝王将相。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了困难。这本书的问世,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束。我们渴望得到读者的评论,并愿根据读者的评论和指点,进一步补充、修改,使之趋向完美。

1987年6月

(此文系《唐前婚姻》一书的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预测家庭明天的依据

谈论家庭的明天不能无根据地瞎说。为了预测家庭,首先要确定制约家庭的因素,并同时对照制约家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然后才能综合起来做出判断。这样做出的预测才是可靠的,科学的,有可能实现的。

制约家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内部的因素,又有家庭外部的因素;既有直接因素,又有间接因素;既有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又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从对家庭变化进程的影响上看,大体有四类情况:(一)有些决定家庭的历史因素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而家庭尚未相应变化或者是刚刚开始变化,可以预见家庭迟早要起变化;(二)有些决定家庭的历史因素刚刚开始形成,尚未引起家庭变化,但随着这些因素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也会导致家庭变化;(三)有些决定家庭的历史因素现在尚未变化,但是将来会起变化,待到它们变化时,必将波及家庭;(四)还有些社会的、自然的现象,今天人们并不认为它是决定家庭的因素,而在将来会转化为决定家庭的因素。

这四种情况分别决定家庭近期、中期、远期的发展程度,组成预测家庭未来的依据。

下面分别就制约家庭的主要因素先作些简要说明。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恩格斯说：“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家庭由血亲、血缘、伙婚到偶婚都同所有制有关。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私有制的每一变化也都带来家庭的变化。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决定了妻子儿女的私有。如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开始代替私有制，正在给单偶婚以冲击。今后，公有化的水平还会一步步提高，给家庭制度的影响也将一步步加深。

二、劳动手段。马克思说：“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资本论》第1卷第195页）人类历史上不分辈份的血亲家庭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用火烧掉的；允许兄妹成婚的血缘家庭是用火烧成的。因为，在用火方面有着明显的技术高低之分，使人们渐渐形成上下辈的概念。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前，人类从使用天然野火发展到人工造火。火的制造，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和人与人的交往。人们渐渐地发展为两个母亲集团间互相通婚，并把兄妹成婚排除在外。因此，如果说父女婚是用天然野火烧掉的话，那么兄妹婚则是用人造火烧掉的，两个母亲集团之间通婚的伙婚制则是用人造火烧出来的。大约在两万八千年前，原始弓箭出现了。人类跟自然界斗争的能力又有了进一步增长。血族社会中的母亲集团有条件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经济组织。于是，族内婚有条件变成族外婚，伙婚制有条件过渡到对偶婚制。因此，我们又可以通俗地说，伙婚制是弓箭射掉的，对偶婚制是弓箭射出来的。一直到几千年前，人类发明了金属。新材料的出现，改进了生产工具，改变了男子在家中的地位；新材料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了朝不保夕的局面，家

中有了节余。于是男子产生了讨一个“仓库保管员”的需要。妻子就这样与金属相伴而生了。金属既“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不用说也是一夫一妻制的“指示物”。举世公认：人类的科学技术是以加速度发展的。如今科学技术已发展到原子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难道这些都不会对家庭制度发生影响吗？

三、生活方式。如今人类的生活水平、生活结构、生活方式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从前，一个人在生活上也差不多是“三十而立”，现在不满 18 岁就可以自食其力、自立门户了。国外有些少年在读中学时便不向父母伸手，或勤工俭学，或向国家贷款。儿女离家时间的提早，会不会减弱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这是社会学家正在思考的问题。从前，年近花甲，就要有人伺候。如今家务劳动的自动化和生活的现代化，年过七旬的老人，生活也能自理。有人考虑，这样会不会淡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更引人瞩目的是：随着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一些本来要由家庭承担或管理的生活事项，现在转移给了社会。如托儿所代替家庭来管理和抚养儿童；托老所代替家庭来管理和赡养老人。尽管托养费要由家庭支付，但是有社会代理同无社会代理无论如何是有差别的。历史上有不少疏生母、亲奶母的故事。今后亲社会、疏家庭的人会不会增多呢？更何况现在有些社会福利事业，连费用也不要家庭负担，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呢。

四、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早是受血族关系支配的，即以血缘为主的阶段。后来发展到地缘阶段。那时一河之隔，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的乡土观念特重。不是有些名人以家乡的地名作自己的雅号吗？如今已发展到以业缘为主的阶段。这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要服从事业的需要。业缘关系高于地缘和血

缘关系。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人的接触面扩大,从“在家靠父母”,过渡到“出门靠朋友”。同行不仅不是冤家,往往比父母重要,比儿女重要。眼界一开阔,谁还会认为“儿子总是自己的好”呢?今日之地球还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尚且有业缘重于血缘的情况,在阶级消灭以后,在交通、通讯工具高度发达以后,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那时的家庭关系还会像从前祖祖辈辈不出山沟的家庭关系那样抱成一团吗?

五、人口政策。自古以来生育都是家庭的固有职能,社会不予过问。现在生育成了社会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干预家庭生育。不论是少数鼓励生育的国家,还是多数控制生育的国家,都在引导人口定向发展,或定向减少,或定向增加。这种人为的定向,势必给家庭带来影响。最明显的是控制人口以后家庭规模变小,接着而来的是家庭结构变化,核心家庭增多。会不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

六、生殖生物学和生殖医学的发展。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无不是在父母性交后,母体的卵细胞受精,在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三百万年来,无一例外。所谓圣人乃野合而生,感天而育,那是骗人的。可是,现在变了。女性可以不同男性接触而受孕,女性可以不受孕而怀胎,如此等等,将导致人类出现“父将不父,母将不母”的那一天。

此外,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伦理因素,乃至寿命的延长等因素,都将对家庭的变化速度起或正或负的作用。

制约家庭变化的种种因素之间,一般说是同向而又同步的,但是也有同向而不同步的时候,甚至还有既不同向,又不同步的时候。因此,在预测时应当把加量和减量同时考虑进去。

(本文收入《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家庭会消亡吗？

有些西方学者惊呼：“家庭要灭亡了！”

家庭会消亡吗？

有的说，不会。理由是：物极必反。现在西方男女老少都已尝够家庭解体之苦。少年成了流浪儿，想回到父母身边；青年出去后找不到职业，想回家；妇女离婚后郁郁寡欢，想结婚；父母没有儿女绕膝，也觉得缺乏天伦之乐。不要以为西方都不喜欢孩子，西方经常发生父母拐骗、抢夺子女的案件。原因是离婚之后想要孩子。因此，有人预言：家庭会复兴。事实上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维护家庭制度运动”。据他们自己说：“已打赢了两场政治仗。”

但是，西方也有些学者认为：家庭会消亡。理由是：如果目前西方社会的离婚率继续上升，结婚和再婚继续减少，独身主义继续增多，未婚同居或同性恋继续蔓延，那么，传统的家庭——丈夫、妻子和儿女将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自独居，或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但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和姻缘关系。他们甚至还预言：终究有一天结婚和生孩子会成为不合法的行为。到那时，社会的细胞将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人。

家庭的命运究竟如何？这是个复杂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

——家庭会消亡吗？

从根本上说,家庭早晚会消亡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据天文学家分析,太阳系已换了两代以上。在太阳系消亡的时候,地球也不会例外,一定是同归于尽。地球消亡的时候,人类往哪里逃?就算未来的人类在预测地球灭亡时,会赶在地球毁灭前搬家。那,比地球毁灭要迟得多的人类,也是要毁灭的。我们承认“人类末日”,不同于目的在于麻醉劳动人民的“人类末日”论。我们宣称的“人类末日”,是辩证法彻底的表现。只有那些羞羞答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才怕谈人类末日。人类有末日,家庭会永恒吗?且不说,刚告别猿的人是不存在家庭的。家庭的产生是人类出现以后很久的事情。看来,家庭的消亡也很可能先于人类的消亡。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赞成“家庭消亡论”。我们相信,未来的人类会为家庭的消亡唱赞歌的。

不过,我们在消亡的时间、消亡的内容以及消亡的途径等问题上,跟西方的“家庭消亡论”者有分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类本无家庭,后来人有了家庭。有家庭,是为了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搞得更好。换句话说,家庭的产生是为了“人本身”。在有了家庭以后,家庭又一步步地由低向高发展,中间经历了好多阶段。应该说,家庭制度每前进一步,也仍然是为了“两种生产”,即为了“人本身”。同样的,人总不会在没有安排好“人本身”以前,就消灭对“人本身”有益的家庭。即使有那么几个亡命之徒,无视“人本身”的利益,而去消灭家庭,那也是徒劳的。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不是曾经要消灭家庭吗?结果,不仅没有消灭掉家庭,反而把自身消灭掉了。只有当“少”完全由社会来“养”,“老”完全由社会来“终”的时候,只有当“男子的嫉妒便会立刻消失”(《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3

家庭会消亡吗? —————

月2日))的时候,一句话,只有当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从地球上统统消灭光的时候,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观念才会消失。

看到西方的家庭有解体的迹象就以为家庭就会在今天晚上消亡,或者说就会在明天消亡,是以偏概全。资产阶级的家庭解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这样的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这样的家庭也发生资产阶级的家庭解体,但这种解体并不妨碍家庭本身继续存在。”家庭既有继续解体的一面,又有继续存在的一面,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

我们不赞成家庭速亡论,不等于赞成西方的家庭复兴论。西方所说的“复兴”,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最终还是要倒回来,生活方式也将回复到以前的状态”(美《未来学者》1979年第1期)。“倒回来”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十分困难的。请听一位较为公允的社会学家艾伦·卡尔森对美国的维护家庭制度运动所作的评价吧!他写道:家庭制度维护者“尽管他们自称占了大多数,他们仍然是一盘散沙,处在明显的少数地位。他们要办的事情,是把近二十年来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演变颠倒过来。然而,目前这方面的发展情况糟糕透了,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斗争正等待着那些维护传统家庭制度的人们”(美《生活评论》)。艾伦·卡尔森的这句话不全对,但是这句话也隐隐约约讲出了这层意思,家庭是随“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演变”而演变的,不是谁主观上想倒就能倒过来的。

对西方的“家庭解体”要作分析。它既有世风日下的一面,又有顺乎潮流的一面。对其世风日下的一面,是应当加以抵抗的;对其顺乎潮流的一面,则应当因势利导。那么,由谁去堵,由

谁来疏呢？不能指望西方资产阶级来解决西方资产阶级的家庭解体问题。因为，西方家庭里该堵的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带来的；西方家庭里该疏的一面，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家庭的存在必然会受它和不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的联系所制约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挽救不了西方家庭。因此，从根本上说，能够对西方家庭疏堵有致、扬弃适度的只有无产阶级。

（本文收入《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家庭改革畅想曲

“你对中国家庭现状怎么看？是满意呢，还是不满意？是需要改革呢，还是不需要改革？”三年来，我每年都以此为题，做一次调查，或者做一次民意测验。没想到三年的调查结果大体一样。认为很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都是极少数，但是认为很不满意的多于很满意的。大多数认为较满意和较不满意，但是认为较不满意的多于较满意的。认为不需要改革或者是不大需要改革的人压根儿就没有，绝大多数认为有必要和很有必要进行家庭改革。

然而，在回答“你对家庭改革的前途怎么看”时，回答“有希望”的人数勉强超过回答“希望不大”的人数。在1981年的一次调查中，回答“有希望”的少于“希望不大”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家庭改革缺乏信心呢？这不能责怪他们。值得追问的是：主张家庭改革的人决心是否大，方向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好。在这一思想激励下，我对中国家庭的现状作了分析。

我认为，中国的家庭质量是世界上较好的。这表现在：

一、婚姻较以前自由。“婚姻自由”之歌尽管各国都唱，但是在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广泛自由的。恩格斯在《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农奴必须把初夜权献给主人，而自由工人献给老板的是每夜权。”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我们中国已基本具备了这种普遍实现的条件。据安徽在肥东、巢县等地方的调查，1979年结婚的一万四千余对中，自由恋爱或是经人介绍后自由恋爱的占90%以上。城市自由恋爱的高于此数。

二、家庭关系比较和睦。在中国的家庭中，男女老少之间是平等的。这表现在：家长有男有女。有的以女为主，以男为副；有的小事以女为主，大事共同商量；也有的表面上男子为一家之长，实际上由女子掌大权。家长的多样性，恰好说明男女都一样。这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刚相当于无产阶级”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同日本相比，中国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她们高；同苏联相比，中国的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比他们中的许多人要高。不要看西方的夫妇形影不离，男的摆出一副绅士风度，提倡什么“女士请先”，就以为他们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他们大多只不过是把妻子当花瓶而已。不仅是夫妻间，包括父子间、婆媳间，中国都比许多国家和睦。据上海一个街道的调查，和睦之家占95.5%，不和的极少。

三、家庭结构比较稳定。外国小家庭增多，一人之家增多，缺陷家庭增多，是家庭崩溃的产物。我国扩大家庭占20%，为许多国家所不及。中国的离婚率只有4~5%，比许多国家低得多。

四、家庭的生活方式比较高尚。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不算高，可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比较高尚，是为集体、为国家，因

此我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健康、生活结构比较合理。马克思说：“用刀叉吃熟肉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这句话说出了消费方式在消费中的作用。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吃自己所养的猪的肉不同于吃抢来或偷来的肉”。这两种肉不仅吃到嘴里味道不同，到了肚子消化吸收的情况也不同。因此，现在连外国人也承认：从帐面看中国收入很低，但是把实际生活方式、生活结构结合起来考虑，中国人生活得并不差。

但是，中国的家庭并非十全十美，中国的家庭还存在许多矛盾。

一、公有制的肌体同私有制细胞的矛盾。我国已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年了。公有制要求作为社会生产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可是在家庭里往往把劳动力看成家庭私有。有人为了家庭，忽视国家需要，为了家庭，用非所学，丢掉专业。有的把“成家”看得高于“立业”。有的要把已经走出家庭的妇女从工作岗位上拉回来，拴在锅台边。

二、现代化大生产同古典式小家庭的矛盾。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网、通讯网，人与人之间需要频繁的、远距离的交流。可是，现在还有人搞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搞什么“故土难离”。这怎么行呢？

三、婚姻与爱情的矛盾。这不是从法律上说的，而是从婚姻观上说的。现在有些人宣扬婚姻以经济为基础；有些父母不顾子女的愿望，极力为他们物色有钱人，以致演出一幕幕现代“梁祝”的悲剧；当然，也有些人作茧自缚，找对象只看钱，不看人，遇到有钱的，就会马上抛弃心爱的。现在社会上也还有“无婚姻的爱情”和“无爱情的婚姻”。

四、新道德与旧道德的矛盾。道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认为道德的,现在可能认为不道德;此处认为不道德的,彼此可能认为最道德。一位希腊思想家说:“若将这一地方认为神圣与道德的风俗,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又从这里面将别处认为猥亵与不道德的风俗一一抽去,所剩必等于零。”这就一语道出了道德的相对性、可变性。现在还有不少人把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家庭道德说成是共产主义道德。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的家庭观时说:“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我们似乎有点辜负恩格斯的期望,我们在家庭方面的舆论造得不够。过去大学里不开这门课,现在才刚开始注意。

全面地辩证地估量中国家庭的现状,目的是为了找到家庭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家庭改革应当从哪里入手呢?

一、在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强调社会第一。细胞就是细胞,细胞离了肌体就难以长存。在注意照顾家庭与社会两头的同时,要进一步宣传服从整体利益的必要性。要在升学、参军、出国、提干、加薪等方面,杜绝裙带作风,反对家庭至上。

二、在家庭与其成员的关系上,家庭要给家庭成员较大的自由度。不仅要反对爱情自私、子女私有,而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家庭的所有成员,至少是要给成年人充分的自主权。在升学、就业和结婚问题上能不能对家长“先斩后奏”?老想把妻子、儿女系在自己裤带上,是办不到的。虐待家庭成员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三、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要强调“他人第一”。以往,人们习惯于把家中的人称“自己人”,把家中以外的称“他

人”。今后这个概念要改变。家庭中的“他人第一”，意思是，对作为长者的人要强调爱幼，对作为幼者的人要强调尊长；“他人第一”还包括当夫妻中一方提出离婚时，要考虑离婚后给对方带来的困难，不要轻易离婚，但作为被离者一方也要考虑，在对方以离婚为幸福时，自己应忍受痛苦而去成全对方。

四、在处理家庭结构的稳定和改革的关系上，要突出改革。稳定，有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当然也会或多或少地有助于社会安定。但是也不能认为越稳定越好，都稳定在四代同堂上，谁去参军？谁去支边？为适应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家庭的形式也应该多层次、多样化。既允许三代、四代同堂之家存在，又允许双职工家庭存在。农村与城市可以有区别。不要一想到改革，就是一哄而起。改革会打破原来的平衡和稳定，会出现按常规想象不到的问题，但是家庭改革终究是家庭的出路。从1957年以后的情况看：没有一次社会动荡是家庭动荡引起的，人们看得较多的是社会动荡引起家庭动荡，带来一部分家庭解体。

五、对旧的家庭道德要大胆清理，对社会主义家庭道德要认真探索。比方说，“从一而终”是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吗？“从一而终”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家庭道德，是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恩格斯语）的家庭制度相适应的家庭道德。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从一而终”，但是不能视为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根本特点或基本内容。如果视为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根本特点，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明显地不如古代。再比方说，“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吗？“婚姻自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婚姻道德，是资产阶级喊了几百年的口号。西方公然声称甩掉配偶如甩掉尿布。我们能这么干么？把“从

一而终”和“婚姻自由”看作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根本特点,是没有抓住要害的表现。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根本特点应当是:他人第一。

(本文收入《幸福家庭》第1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2000 年中国家庭草图

从现在起到 2000 年只不过还有十多年的时间,转眼就到了。家庭会有多大变化呢?变化肯定是会有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到那时候将有很大改观,微观社会同宏观社会总是要同步的。正如一颗小小的生殖细胞里凝聚人体的全部性状一样,2000 年的社会也将在家庭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再从近几年的家庭变化速度看,未来的十多年,家庭变化的速度不会小。从前涉外婚(指同非中国籍的人结婚)全国几年碰不到一个,现在有些城市年年都可以碰上几十对、上百对。尤其是在新婚姻法颁布以后,有些拖了十多年解除不了的婚姻,法院很快就准予解除了。近几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离婚的绝对数都有增长,人口的出生率都在下降,老人和妇女的地位都得到改善。这说明家庭的变化速度既有“十年如一日”的时候,也有“一日如十年”的时候。美国的家庭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约用了二十来年;日本的家庭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有十来年。我国家庭前进的方向和途径同美、日是不同的,但在速度上不会比他们慢。我们相信,到 2000 年中国的家庭将有长足进步,将会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相适应。

2000 年的中国家庭将会怎样?现在就让我们简单地绘一

张草图吧!

先看出生率。近年来,由于我们有效地运用经济杠杆,有效地运用奖惩制度,总算把出生率降下来了。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劲,才勉强在青年中实现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到2000年时,不必像现在这样采取硬性措施,人们就会自觉地少生,甚至不生。那时的人口增长率会出现负数。那时报刊上侧重批评的将不是多生,而是不生。不生要受批评。现在所采取的一些鼓励少生的措施,将会取消。

再看家庭规模。由于出生率下降,家庭的规模将会从现在的平均每户三点几人降为每户二点几人。“七嘴八舌”的大家庭将从现在的将近20%,下降为占家庭总数的不到5%。但是五口之家的中规模家庭仍可能占有一定比例。到那时,家庭规模最小的“一人之家”将引人注目。现在年龄三十出头的大姑娘,其中将有一批成为第一代的独身者。2000年之前的独身者主要是女性,只有到21世纪20年代男性独身者才会增多。

再看家庭结构。由于出生率下降,由于人们的文化素养提高,由于人们求知欲的旺盛,由于就业率的上升,到2000年时,在城市中,双职工家庭将占主导地位。到那时,家庭中将不再有需要从经济上赡养的老人。

再看家庭职能。同今天相比,2000年时的家庭职能是有增有减,从总体上讲,是减而不是增。

家庭的生产职能在近期可能会略有增加。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有些产品可能会移到家中加工。家庭有可能成为大生产的补充。允许个体户开业以后,个体户家庭的生产职能则更多。夫妻店里的夫妻都是流通领域中的劳动力。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拥有除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赢得了劳动力的支配

权。到 2000 年时家庭的生产职能将比今天增加还是减少？这要看那时的生产力发展会对生产关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要看那时我们的国策如何。不过一般说来，工业的现代化必将伴随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的社会化就是把生产由家庭移向社会，移向以国为单位的社会，移向以洲为单位的社会，移向以地球为单位的单位的社会。不管怎么说，到 2000 年，家庭的生产职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就是了。

家庭的消费职能，不管是为了生存的消费，还是为了享受的消费，或者是为了发展的消费，都要大幅度地由家庭移向社会。到了 2000 年时，在上述三方面的消费中，“为了发展的消费”可能移出的最多，几乎全部由社会承担；“为了享受的消费”可能是家庭与社会各半；“为了生存的消费”可能仍以家庭为主，但是社会也承担一部分，有的是承担吃、穿、用的加工，有的是既承担加工，又分担资金。

家庭的教育职能，到 2000 年时，毫无疑义地将大部由社会承担。孩子放在家中分散教育，从人力上讲是最不经济的，从教育效果上讲，也是利少弊多。现在已经出现了父母对社会的贡献同子女的学习成绩的矛盾。有不少父母对社会贡献大的，子女学习成绩差；父母对社会贡献小的，子女学习成绩反而好。因为时间是个常数嘛！你晚上把时间用来辅导孩子的数、理、化、史、地、政，哪里还有时间钻研自身的业务？你晚上一心只读专业书，又哪里来的时间辅导自己的孩子？到 2000 年时，幼儿教育可能会普及，住读的中小学也可能普及。父母不必再像现在这样为孩子的学习操心了。与此同时，双职工也才有可能到社会上去接受“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孩子教育的社会化推动了成人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将极大地削弱家庭

的教育职能，——尽管到那时所剩不多的家庭教育职能仍应予以重视，仍应充分发挥。

家庭的生育职能，到2000年时也许总量是一样的，但是内容将截然两样。一孩化可能不会像现在卡得这样紧了，但是生育过程开始离开人体。1978年在英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到本世纪末体外受孕和购买精子的事会成为家常便饭。

家庭结构与家庭职能的矛盾运动将推动家庭的发展，家庭的发展又决定家庭的观念的改变。2000年的家庭观念将是怎样的？

到2000年，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思想将为全社会所公认，为广大青年人所接受。到那时，无论是文艺界还是理论界，都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围绕“爱情论”、“经济论”、“综合论”争论来争论去了。到那时，人们择偶的标准将不再是权和钱，而是德和才。在才里面可能重的是艺术和科学之才。到那时，夫妻之间的约束力可能减弱，不会像现在这样忌讳配偶的正常社交。舞蹈演员杨华同丈夫相亲相爱，有次她彩排，爱人主动送来冷饮。可是当他看见杨华在台上被男演员托起的动作时，却觉得不舒服，悻悻地提着冷饮走了。杨华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说：“我太爱你了。”因太爱对方而不欢喜对方与别的异性跳舞的事，在今天也许能讲得过去，到2000年时，就会令人费解了。

到2000年时，家庭关系中的上下辈之间、男女之间的平等将普遍实现。子女自食其力的年龄将大大提早，对父母的依赖性将大大减弱。现在的青年在就业前、在求学时完全依赖父母，在就业后也部分依赖父母。如果父母收入高一些的，有些青年不仅在就业后而且在结婚后仍然依赖父母。到2000年时，随着

职工工资的提高,随着承包制的发展,青年人在求学时也有可能取得一定收入,从而减少对父母的依赖。到那时,婚后依赖父母的将绝迹,就业后、结婚前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人,也许还有,但不存在要父母资助的问题。不消说,到那时做父母的也不再会把子女当私有物,不再会认为“儿子总是自己的好”了。到2000年的时候,重男轻女的思想将销声匿迹。现在世界上已有少数实现男女平等的国家,它们从男女不平等到男女平等经历了几十年。核心的一条是抓妇女就业。我们妇女就业率三十年来突飞猛进,现在我们开始实行多层次、多结构的经济,又将为更多的妇女就业创造条件。到本世纪末,妇女就业率可望有更大提高。男女都就业后,家务怎么办?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各种各样的“快餐”、“即席菜”都将在电钮一揿之后到来。再加上那时人们不会像今天这样把家庭当安乐窝,生活在家中的时间不可能再像今天这么多,家务自然也相应减少。到男女就业机会均等之后,也会出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情况,但那是极少数。那时重女轻男的人的比例同重男轻女的人的比例差不多,都是极少数。假如说,重男轻女的人还可能多一些的话,那也多不了多少。

到2000年时,人们的家产观念将比今天淡薄得多。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子为后,从现在开始,将逐步转变为以子和女为后。到本世纪末,将有相当多的人对子女同对自己的研究生一个样,对子女同对自己的徒弟一个样。甚至有一部分人把自己的研究生或者徒弟看得比子女还重。那时很少有人为传子而聚敛财富,家累万金。但是,他们也不会“今日有酒今日醉”,“勤俭持家”依然是未来人的家风。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勤俭持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家;未来的人们能把“持家”与“治国”结合起来,认为“持家”从属于“治国”;“治国”高于“持家”,统帅“持家”。再加

上未来人们的价值观起变化,他们不以百万富翁为荣,而以家藏万卷为荣,这也会促使 21 世纪的人们不敛财。同样的,妻子儿女也不再以“当然继承人”自居。青年人不会再督促老子敛财。有些国家实行遗言继承以后,子女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逼着父母存钱、要钱。因为父母存了,他也不一定能拿到手。我国如能改变继承方式,将会大大改变人们的家产观,改善家庭内部的关系。可以断言,到本世纪末,为争遗产而殴打、告状的事将大为减少。

(本文收入《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中国文坛就婚姻的基础问题展开了讨论。其规模之大、文章之多超过了“五四”前后对家庭改革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的讨论同“五四”时期的讨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五四”时期的论者，虽也有讲社会主义、讲阶级分析的，但是都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在这次讨论中，大多以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不论是理论文章，还是文艺作品，提到婚姻基础，不引用恩格斯名言的，不多。

引则引矣，然而对同一个引语各人的解释是不同的，各人从恩格斯名言中引申出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比较，有一股子宣传新风尚、新道德的勇气。

可是近几个月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渺茫论”。他们认为，要使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遥远得很。他们说：“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就是处在‘杂以爱情的婚姻’阶段。”理由是：“我们的国家，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还存在着私有制的残余。这种残余的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影响有时是很大的,难以摆脱的。”他们认为,现阶段提倡婚姻以爱情为基础,那就是“拿未来的条件和标准去企求现在的东西,当然是软弱无力的”,“是徒劳”。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爱情婚姻只考虑感情因素,不但不现实,也是不道德的”(《采石》1982年第3期)。所谓“杂以爱情”,意思很清楚,就是只许夹杂一点而已。还有一篇文章讲得更明确:“我们只是认为,衡量一个婚姻是否道德,应当把经济尺度和爱情尺度结合起来考虑。不过,由于目前的婚姻基础经济还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当某一婚姻中的经济因素和感情因素发生矛盾时,则主要根据婚姻中的经济因素来做出道德与否的评价,而不能运用理想的道德评价尺度。”(《文汇报》1982年7月16日)既然认为恩格斯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论述渺茫,就必然认为在今天只能把经济作为婚姻的主要基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认为恩格斯的主张渺茫,算客气的。有些人索性就把恩格斯的话略加改动,再掺进一些不知是谁的错话,公开加以批判。《解放日报》有篇文章说:“有些同志则认为婚姻问题上的道德标准就在于爱,就在于满足个人的欲望和感情,就在于实现个人的幸福和自由。这些观点当然不是他们的创造。18、19世纪的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表现的就是这样的观点。”(《解放日报》1982年6月23日)

试问: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婚姻问题上的道德标准就在于爱”,是谁的观点呢?

请看,恩格斯说:“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同)

再请看,恩格斯又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再请看恩格斯所说的：“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事情很明显，“婚姻问题上的道德标准就在于爱”，确实不是今天哪位同志的创造，而是伟大导师恩格斯同志的正确观点；不是什么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的东西，不是什么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潮，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预言。

可是，恩格斯提出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现在在受到公开批评；而婚姻以经济为主的观点，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在一些报刊上占了上风。比如有家杂志，虽也是两种观点同时发表，但是把持有以爱情为基础渺茫的观点，在版式及先后次序上做了强化处理，使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相比势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科学依据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是否应当受到批评，是否能够被批倒，取决于它是否科学。

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预言时，至少有以下几个科学依据：

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是恩格斯首先强调和反复强调的一点。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所有制不变，家庭制度包括婚姻是很难发生质变的；反之，所有制变了，家庭制度包括婚姻制度迟早要起变化。所有制的变化还会带来其他财产关系的变化。财产关系的哪些变化会带来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呢？有人认为是“实现了按需分配”。而恩格斯认为，主要的是：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消灭了，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二、同第一个依据——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与之相联系的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从而使得女性不必出于经济考虑，不必因“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与此同时，男性也才相应失去了购买妇女献身的资本与手段。说到底，当双方都能自食其力，都能从社会上得到经济收入时，婚姻的基础才会由经济变为爱情。

三、同第一个依据相联系的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出于为下一代聚敛财富着想而抛弃爱情，已没多大意思了。无财可传子，固然会促使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可是，如果孩子没人养育怎么办呢？因此，恩格斯又说：当“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时，人们“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没有了后顾之忧，女性才会“毫无顾忌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总而言之，只有当下一代可以得到社会养育，无须继承父母遗产时，下一代才不致成为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羁绊。

当然，决定婚姻基础的因素还有别的，比如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对这一点恩格斯是估计到了的。他说：“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简言之，就是习惯势力他们会破，社会舆论他们自己会造。不用别人担心，未来的人们决不会被他们的前人（即今日之人）的道德规范束缚住手脚。正如我们今天不会用前人“男女不同校”的道德观来束缚我们的教育事业一样。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要存在上述几个前提条件,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就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述几条部分存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部分出现;上述几条基本存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基本出现;上述几条全部存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全部出现。谁也阻挠不了!假如有谁以此为耻,那就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太太以“猴子变人”为奇耻大辱一样滑稽可笑。

什么时候能够普及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从根本上说,家庭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对应的,但也有背离的一面。这表现在: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可能局部存在;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可能不会马上普及。谁都知道,在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因此,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憧憬,一种预言。但是,恩格斯又认为:“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

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具备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条件呢?恩格斯讲得很明确,也很有分寸。他有一次这样写道:“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又有一次他还是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

恩格斯的判断在理论上是充足的,在逻辑上是严密的。资本主义消灭了,所有制自然会变,无产阶级的地位自然会变,妇女的地位也会变,下一代的生活状况也同时会变。这些一变,婚姻的基础哪有不变的道理?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今天距离恩格斯作出预见的时间,快一百年了。一百年后的中国,情况怎么样?换句话说,恩格斯的理论合乎中国的国情吗?

在中国,早在二十六年前,就已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日起,无产阶级就已成了领导阶级,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在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在不停地展开,“妇女能顶半边天”一直是我们的口号。

在中国,对子女的培育虽然仍为家庭的重要职能,但是这一职能正在往社会上转移。社会对青少年的投资在日益增多。国家把关心和培养下一代始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一句话,在中国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国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正在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基本具备,至少也是初步具备了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条件。

可是,由于道德具有一定的粘滞性,由于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因此,在已经初步具备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条件以后,仍有些人认为不具备,认为时尚早。老实说,这种渺茫论还有不小的市场。今年春,有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女性,题曰:《飞向远方》。作者用这般标题显然是在探索。评论者也承认这女性在追求“纯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但评论者仍批评说:“愿你飞向远方,去寻找新的归宿,永远不再回来。”题曰:《愿你一去不复归》。人家把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说成是远方,所留的余地已经够大了。而你还要人家“一去不复归”。这哪里是什么远近之争,这简直是在诅咒了。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存在。但是,存在的不等于合理的。存在的原因,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主要是旧习惯势力的惯性在作祟,主要是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的理论未能为群众所掌握。

未来的婚姻是“词源学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摩尔根说:家庭“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么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古代社会》)。摩尔根在这里提出了未来家庭的性质问题,但是他没有明确回答“将具有什么性质”。恩格斯也提到性质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

恩格斯提出的“否定”是很重要的。有否定才有变化,有否定才有前进。没有对昨天家庭的否定,就没有今天家庭的存在;没有对今天家庭的否定,就谈不到从今天家庭走向未来家庭。

问题在于否定一夫一妻制的什么?

一夫一妻制值得否定的地方不少。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固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夫一妻制从娘胎里带来了不少弊病,都是要随着人类文明度的提高,不断加以否定的。

一、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是私有制。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私有制在一夫一妻制这一“细胞”上打下很深的烙印。一切决心同私有制决裂的人,不消除私有制打在一夫一妻制上的烙印是同私有制决裂不了的。

二、一夫一妻制的目的“是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样就带来了福荫子女的问题,以至发展到子承父位。现在不是也有些人因有一笔家财可承,而抛弃工作,抛弃祖国吗?与此相联系的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传子,别人的孩子再需要,也不肯掏出来相助。这都是一夫一妻制的目的带来的后果。要使这类后果不复出现,那就必须端正其固有的目的。

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关系是不平等的。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恩格斯还形象地说,“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这是对几千年来夫妻关系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就是在今天,这类事也是屡见不鲜的。试问:对这种夫尊妻卑的一夫一妻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四、“一夫一妻制的经常伴侣——杂婚和通奸”,也是应当予以否定的。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卖淫成了一夫一妻制不可分离的对立物;通奸成了一夫一妻制固有的伴生物。卖淫和通奸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人们确信,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对付通奸就象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的,恩格斯认为,如果“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那么,杂婚和通奸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总之,从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基础、目的、夫妻关系和社会后果看,都有其严重的先天性缺陷。也许有人会说,从现在的一夫一妻制的情况看,似乎没那么严重。这自然是有道理的。四害俱全的一夫一妻制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中国的家庭,经过三十三年改革,成绩还是显著的,已不同于“古典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上述四大弊病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只要我们能够继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学理论去改造现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加速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一夫一妻制固有的弊病就可能早日被清除掉。

那时的一夫一妻制都以“互爱为前提”,不再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连变相的买卖婚姻也不存在,连一次性的出卖肉体的情况也不存在。谁也不会为五斗米、“五只机”而勉强地委身于他人。

那时的一夫一妻制以夫妻的真正平等为基础,彼此毫无贵贱之分,大家都是社会的主人,都是人民的公仆。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那时的夫妻之间相爱的方向会不断扩大,相爱的方式会不断更新,相爱的程度会不断提高。那时,双方如果不相爱了,或者对方不爱自己了,双方决不会因离异而感到痛苦,子女也不会因父母的分手而不幸,社会更不会因有人离婚而混乱。

那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到那时,按照恩格斯的理论,男女青年完全有权“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换句话说,通奸化为乌有了。人们要知道何谓通奸,要到词典上去查找了。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家庭

那,这能叫作一夫一妻制吗?能。婚前恋爱以爱情为基础,婚后生活以爱情为基础,离婚以爱情为准绳,再婚又以爱情为基础,这种以爱情贯彻到底的婚姻总比那种表面上不可离异实则是同床异梦的婚姻更具有一夫一妻制的性质吧!当然,这样的一夫一妻制已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有天壤之别了。因此,恩格斯说:“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所谓“词源学意义”,无非是说未来的一夫一妻制决不同于今天的一夫一妻制,更不会同于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如此而已!

(本文收入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编《80年代社会研究》,未出版)

新技术革命与家庭

——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把欧美所谓的“新产业革命”，苏联所谓的“新科技革命”称作“第三次浪潮”，并以此为题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第十六、十七两章，是专门论述家庭问题的。如果说这部书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课题”这一评价并不过分的话，那么书中的这两章就是“热门中的热门”了。因此，认真分析托夫勒的家庭理论，对于研究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对于回答西方来自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挑战，都是极为有益的。

技术革命与家庭革命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的第十六章的开头写道：“在我们通向新生产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潜在的，隐藏在社会内部的变化势力，其变化范围是如此之巨大，以至在我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愿意正视它的意义。这就是，人们的家庭即将进行一场革命。”从通篇看，托夫勒这里所说的“生产”，是指微电子技术等。

关于生产技术与家庭制度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国外“很少人愿意正视它”，就是在中国，也是“很少人愿意正视它”，甚至包括一些搞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只是笼统地提两句，而不作具体分析。

可是,纵观一部家庭演化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庭每向前推进一步,无不是由生产技术的进步引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单从这句话,似乎看不出婚姻形式与生产技术的关系。不过,如果再问一句: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又是如何划分的呢?那就可以对生产技术与家庭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见《反杜林论》)把恩格斯的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研究,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群婚制是弓箭射出来的,对偶婚制是铁剑劈出来的,一夫一妻制是火器打出来的。当然自恩格斯说了这些话以后,整整一百年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人们对人类史、家庭史的分期,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但是,不论哪一种划分的方法,也不论划分的是粗还是细,都离不开生产技术的推动。生产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同时也是家庭发展的指示器。材料的发展,能源的发展,也都是家庭发展的动力和指示器。各项生产技术都会对家庭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生产技术对家庭的作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

一、生产技术会导致家庭职能的转移。比方说织布,在自然经济中一直是家庭妇女在家中从事的生产劳动。可是当大型纺纱机、织布机代替家用的木制纺车、木制织机以后,织布这一生产职能就由家庭转移到了社会。现在仍有手摇纺车、脚踏织机的家庭,怕已寥寥无几了。

二、生产技术会改变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在采集经济的收获量大于狩猎经济的收获量时,从事采集的妇女在家中的地位高于从事狩猎的男子在家中的地位;而当农业、手工业的作用突出以后,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男子在家中的地位又变得高于妇女。

三、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造,导致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再进而影响到家庭。比方说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采用了大机器生产,有些生产为妇女、儿童所从事,资本家大量雇佣妇女、儿童这些廉价劳动力,结果出现了妻子养活丈夫的局面。

四、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进而影响到家庭。在原始社会,人无隔宿之粮,大家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生活,“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至于配偶,谁也养不起,谁也无法专用,自然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今天,生活好了。有些福利国家,孩子能够较早地脱离父母而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代人的关系。

五、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使得家庭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所有制决定家庭制度,这一点十分重要。不过,这里不想多谈,因为多少有些离题。

可是,仅仅这些已足以看出,生产技术对家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然而,谈远容易谈近难,假如一触及当前的新技术革命将对家庭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不少人就羞羞答答了。1984年2月,国内有家杂志写道:“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婚姻关系还是一个未知的王国。”作者企图以“未知的王国”为盾牌,挡住别人对未来家庭的探索。对比之下,托夫勒能够提出“家庭革命”的口号来,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新的家庭制度”,“这个崭新的社会领域与技术领域、信息领域一起,正在形

成”。这一观点是可取的。

家庭道德与家庭革命

家庭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但是,单有技术革命的推动,家庭革命还是爆发不起来的;爆发了,其进程也是缓慢的。这只要看一下现在处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家庭状况并不一样就可以明白了,如果再看一下历史上曾出现过家庭制度与生产力水平相背离的情况,那就更容易明白了。托夫勒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第十七章中说:“在道德准则方面,我们必须逐渐消除因家庭破裂,或重建家庭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内疚。宣传界,宗教界,法庭,以及政治制度应该设法减轻这种内疚感,而不是加重这种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托夫勒在这里提到了同家庭革命有关的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对家庭革命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在这许多方面中,托夫勒突出强调的是道德准则。

道德,尤其是作为道德组成部分的家庭道德,既是构成家庭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又是推动家庭革命产生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先进的家庭道德是家庭革命的催生婆,落后的或者说是反动的家庭道德也会成为扼杀家庭革命的刽子手。

家庭道德对家庭制度的作用,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的。

一是外在的舆论力量。在一定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便是这种社会中人们分辨是非的标准之一,决定褒贬的标准之一。被人视为“有德”者,受社会尊敬;被人视为“缺德”者,为社会唾弃。舆论的力量,对制约人们的行动关系极大。强大的舆论能够驱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比方说,当口头上、书本上都在大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舆论时,人们为了“有

德”，就不得不放弃心上人而去听从父母和媒妁。

二是内在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在接受了某一种道德观念以后，即所谓“溶化在血液”中以后，他不论是在人前还是人后，都会自觉地或比较自觉地按他所信仰的道德标准办事。按自己所信仰的道德办事，精神上就比较轻松、愉快；没有按自己所信仰的道德办事，即使未受到谴责也会感到“内疚”。比方说，一个人在接受了“一女不嫁二夫”的道德信条以后，哪怕她只有18岁就死了丈夫，哪怕是死了没见过面的未婚夫，她也决不会再嫁。假如她偶尔萌发出再嫁的念头，她也会立刻诅咒自己“犯罪”，并加以压抑。

道德的覆盖面是相当广的。家庭道德在家庭领域上的覆盖面要比家庭法大得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无非是说有些家务事，官方很难依法办理。可是，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是非曲直，都可以用家庭道德来鉴别。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运用家庭道德这一不成文法来调节。

可是，家庭道德的标准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3页）经济状况不同，道德原则不同；经济状况变了，道德原则也要跟着变。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从地区上看，在彼处为有德者，在此处有可能为缺德。从时间上看，在昨天为有德者，在今天有可能被视为缺德，假若在今天仍被视为有德，那么在明天也可能被视为缺德。一百年前，诗人瓦格纳曾在一首歌词中写道：“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马克思看了以后，立即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4页上的脚注）马

马克思的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道德的可变性。

道德的可变性是客观存在的。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承认家庭道德的可变性,似乎还是比较轻松的。可是,要承认今天人们所奉行的家庭道德也会变,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什么“传统”喽,“国情”喽,都会成为家庭改革、道德进步的绊脚石。值得提倡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道德,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伤风败俗”,是“道德败坏”,是“异端”。托夫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一般说来,道德准则比社会现实改变得慢。”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说,当社会现实需要新的道德准则产生时,新的道德准则并不会顺顺当当地光临人间。新道德的姗姗来迟,除了因为先有存在后有意识以外,还因为家庭道德有相对独立性,人们没有认识家庭道德的性质、作用,没能自觉运用家庭道德自身运动的规律。

值得商榷的“托氏两论”

托夫勒能够注意到科学技术对家庭的影响,能够注意到家庭道德对家庭的影响,这说明托夫勒抓住了研究家庭问题的前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托夫勒在对家庭作具体预测时,却忘记了这些前提,或者说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得出了不那么正确的结论。

托夫勒在论述未来的家庭时,主要有以下“两论”:

一、“回家论”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回家”。他写道:“新生产体制确实能将数百万职工从工厂和办公室里解放出来。他们是被第二次浪潮冲击到那儿去的,现在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家庭中去。”“回到新的更先进的以电子科学

为基础的家庭工业时代,从而重新突出家庭作为社会中心的作用。”“不久,我们可能看到,将兴起一个运动,要求所有能在家中进行的工作,都在家里干。”托夫勒的“回家论”主张是很明白的。《第三次浪潮》第十六章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回到家里工作”。托夫勒“回家论”的根据是什么呢?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电子”。他认为,电子工业就是“家庭作业”。他还曾引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家庭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是80年代的家庭工业。”因此,他进而推论,未来的家庭就是“电子家庭”。“电子家庭可能因此而作为第三次浪潮力量一个关键的新起点而出现。”此处的“一个关键的新起点”,依我之见,应译为“一个重要因素”。译为“一个关键的新起点”,从字眼上是把托氏的观点突出了,可是,这不仅与托氏原意不符,而且是增加了托氏观点的错误成分。托夫勒的回到电子家庭中去的观点,是有毛病的。因为一般说来,机器分四部分:工作部分、传动部分、动力部分、控制部分。电子主要是解决控制部分的。其余部分虽能控制,但也少不了人去使用。就是都控制了,也还会有新的工业部门产生。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总不能老是停在一个水平上!新的生产部门是要靠双手去创造的,老的生产部门也是要靠双手去改造的。创造、改造都不可能在家中进行。托夫勒等人不是把海洋、宇航看作“第三次浪潮”的“朝阳工业”吗?托夫勒鼓励人们“到外层空间和海洋去探险”。试问:对海洋的研究和开发,不到海洋中去,行吗?宇航,人不上去,也是乏味的事。可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有些生产人们可以在家庭中干,但是,会有更多的生产要人们走出家庭去干。托夫勒缺乏定量分析,以偏概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托夫勒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竟然说,现在美国和欧洲,“要

求将家庭成员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呼声,正在日益增长”。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在美国虽有用家用电脑控制生产的人,但多为残废人。现在在美国也确有“家庭反击”、“重振家威”的呼声,但为数极少,且被美国社会学家所藐视。再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家庭有生产职能,还要看到家庭有生活职能。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后,人们的生产时间将减少,生活时间将增多。试问:到那时家庭都会有足球场、大剧院吗?如果没有,还不是要走出家庭嘛?(太好了!在本文脱稿后,我看到了托夫勒1983年出版的新著《预测与前提》。托氏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在家里干活的人一到晚上肯定会出来参加当地的演剧、教会、政党、联谊会这类活动的。”托夫勒能想到这一点,我们是欢迎的。)

二、“多样论”

托夫勒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这类家庭的消亡,而是第二次浪潮家庭制度的最终破裂,取而代之的是多样化家庭形式的兴起。”多到什么样子呢?托夫勒举了许多例子:同性爱家庭、合同婚姻、连续婚姻、家庭群、“母亲——祖母”家庭、“母亲——姑母”家庭、“母亲——继父”家庭,以及“母亲——其他人”家庭。把这么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一摆,确实像托夫勒说的那样,会多得“令人目瞪口呆”。但是,在这么多当中,哪一种是主要的呢?托夫勒在书中没有正面回答。顺便说一句,1983年初,托夫勒夫妇来华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们夫妇,可是他俩都没有指出什么是未来的主要家庭形式。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认识深度的标记。托夫勒没有指出主要家庭形式,只能说明他还没有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如果我们再剖析一下托夫勒所罗列的几种家庭形式的实质,就不难看出托夫勒所说的“家庭”不合乎家庭的传统定义,已经不是家庭。“同性爱”是连兽性

都不如的东西,是早已为历史所抛弃的东西,怎么忽然成了未来家庭的方向呢?可见,托夫勒的“多样论”是含糊不清的同义语。

《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有关家庭的论述之所以有那么多缺陷,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世界观上的原因。托夫勒那样东拉西扯地宣传“回家论”,无非是从巩固私有制出发的。家庭的作用那么大,还用得着推翻这种细胞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吗?二是方法论上的原因。这一点连西方学者也看出了端倪。《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在1980年3月30日写道:“托夫勒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从分散的资料中搜集大量的个人轶事、杂志纪事和零星数据,把它们拼凑成一盘虚饰花哨而又难以捉摸的大拼盘。”《第三次浪潮》的《序言》说这本书“是一本规模庞大综合的书”。大概是托氏局限于“以家庭为中心”搞科研的缘故,写部涉及面这么大的书,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有困难的,因此写出的东西就免不了给人以“拼盘”之感。

信息社会中的家庭

恩格斯在论述家庭的未来时,曾经庄严指出:“这样的人一旦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可见不论我们对信息社会中家庭论证得多么严密,也未必完全符合以后的实际,但是,有一个对未来家庭的设想同没有一个对未来家庭的设想是大不一样的。看到未来的方向,至少是有助于提高我们改革今日家庭的自觉性,明确改革今日家庭的战略目标。

要论证新技术革命中的家庭,首先必须把握新技术革命的总的特点。那么,有哪些总特点将对家庭产生作用呢?

一、信息的共用性

信息不同于一般实物。一般实物,甲拿去了,乙就没有了。信息则不同,甲在利用一条信息的时候,乙也能利用这条信息,并且用的人越多越好。因此又有人把这种共用性称为分享性。将来在信息取代物质财富而成为社会主要财富的时候,信息的这一特性将会促进财产公有制的极大提高。再加上传递信息的手段日益现代化,比方说采用光纤通讯,信息将如虎添翼,人的社会性更会随之急剧增强。人,才会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属于小家庭的;才会以四海为家,而不以家庭为家。财产上实现了洲有制、球有制,就没有必要再保留遗产继承制,从而也就动摇了家庭存在的根基。因为,“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69页)。

二、电脑进入家庭

微电子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各种家用机电用品进入家庭,尤其是当这些机电用品与电脑连接以后,人们的家务劳动将大为减轻。机器人将取代保姆乃至家庭主妇。与此同时,大批的家务劳动转向社会。这样,人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家庭,也照样能生活得很好。因此,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情况将发生根本变化。现在美国有一批装有电脑的家庭主妇已经在惊呼:“我们变成了‘电子寡妇’!”意思是:装了电脑以后,丈夫对妻子的关系没有过去那样亲密了。在电脑进入家庭还是凤毛麟角的今天已经如此,再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呢?

三、生物工程进入人体

不管现在学者们对新技术革命的内容和标志看法上存在多大分歧,讲十二点也好,讲十点、五点、三点也好,都少不了一个

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当然也是分层次的。现在细胞移植、无性繁殖等等成功在望。这些技术,包括以后将产生的更高层次的生物工程,一旦进入人类的生殖系统,一旦把生育与性关系分开,一旦生育不再依赖母体,必将根本改变婚姻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否定家庭存在的必要性。

四、两性的真正平等

有人提出,在信息社会中教育的特点是全员教育和终身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网络。如果能实现的话,那就正如奈斯比特在谈论“第十一个新方向”时所说的:“教育、职业上的平等会自下而上地从根本上使男女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男女事实上的平等,是对丈夫压迫妻子的一夫一妻制的极大冲击。这一转变的意义,将比由女权转变为父权、母系转变为父系的意义更加伟大。假如容许我们套用托夫勒的“浪潮”说,上面这句话就可以改为:第一次浪潮带来了男子向女子夺权,第三次浪潮才带来男女的平等。

所有这些,都将把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打得稀烂。

一百年前的今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告诫人们:“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再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脚注中,也曾谈到消灭单个经济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问题。请注意这里的“否定”、“消失”、“消灭”等字眼的分量。不消说,要否定自身是痛苦的,要消灭今天在成长着的东西是令人留恋的。可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细胞是要随着肌体的变化而变化的。细胞是可以生物工程来改造的。今天,一个有利于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以共产主义道德

为指导的崭新的家庭制度,正在中国孕育着。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家庭还将继续变化。到那时,还有没有家庭,都值得讨论。但是,不管怎样,在家庭未来问题上,我们不能以感情来代替规律,不能把第二性的东西夸大为第一性的东西。要知道:一切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

托夫勒对家庭的未来作了大胆的探索。国内外对他的看法也是人言言殊,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对他的家庭观也要一分为二,要把他的观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下去观察、分析。

(原载《解放日报》,1984年5月2日)

跋

在编完目录,准备写跋的时候,“敝帚自珍”四个字,飘然而至。

20世纪70年代,在那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帽子满天飞的岁月里,我在研究了一阵人类起源问题以后,潜心于花毕生精力埋头写一部《家庭起源》,不想直接干预现实的家庭生活。然而,在国家进入改革时期以后,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并且重建了。我认为有条件干预生活了,便于1980年9月,针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借《文汇报》一角,发表了《家庭的淡化问题》。从那时起,同家庭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出版了《家庭问题种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生活的觉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家庭面面观》(学林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婚姻史趣话》(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家庭的明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中国家庭的演变》(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唐前婚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妇女学呐喊》(澳门出版社1995年6月版)、《妇女问题杂谈》(云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等十余种著作。与此同时,还主编了几套有关家庭的丛书。除此之外,还为十来位友人的有关家庭的著作写序,并零零

星星写了些小文章，散见于报刊。有些作品在当时曾引发出一阵又一阵讨论，得到读者的关注。这次从上述作品中，选了一部分，再增补了一些从未发表的新作和若干篇曾收入会议文集而未公开发表的旧作，组成了这本《我的家庭观》。全书约收入 70 篇文章，分为 18 大类，囊括了家庭学的方方面面。

家庭学是一门奥妙无穷的学问。能指挥一个集团军或者是一个集团公司的人，能教好上万名大学生学问的人，却未必能治理好自己那个小家庭。贫穷固然不容易幸福，可是，有钱并不等于幸福，有权更不等于幸福。有时候，穷苦之家倒也有幸福的一面，“贱民”之家倒也有高雅的一面。在这些扑朔迷离的家庭问题面前，我的家庭观只是百川之一流。我这“文选”，充其量是不含褒义的“一时之选”。70 篇文章，实则是 70 把破扫帚。不要看我在多次的严肃争论中寸步不让，不要看我对自己的“首次提出”颇为重视，可我始终坚信后人在看我们今天的成果和争论时，会付之一笑：何足挂齿？所谓“一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万分之一秒而已！

不管怎么说，治家与治国总有相通之处。家事是国事的缩影，社会的写照。研究家庭无非是为了改革家庭，建设家庭，提高中国人的家庭品位和生活质量。

愿《我的家庭观》的出版，能有助于人们“齐家”，并从“齐家”着手，进而“治国平天下”。

邓伟志

1996 年 7 月 15 日